

彭真年谱

第三卷

《彭真传》编写组 编

彭真

T17638

ISBN 978-7-5073-3573-6



9 787507 335736 >

定价：300.00元（全5卷）

彭真年譜

第三卷

一九五五——一九五九

《彭真傳》編寫組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

目 录

1955 年	(1)
1956 年	(96)
1957 年	(184)
1958 年	(278)
1959 年	(367)

1955年 五十三岁

1月1日晚，出席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元旦团拜。

1月2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的准备情况和会议的开法等问题的报告。参加会议的还有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李富春。^{〔1〕}

△ 中共中央决定刘仁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 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在中南海紫光阁为沈钧儒八十岁生日举行的宴会。

1月3日 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就黄炎培在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中提议国家不为个人祝寿一事，提出处理意见：“我觉得，借黄的提议，把国家做寿的例停止了为好，免得成了惯例，国家要一个接一个地为多人祝寿。如果中央决定接受黄的提议，我即把信在常委^{〔2〕}适当范围内传阅，并在和几个民主人士碰头时，借征求意见的方式作适当酝酿，非正式地和党外人士商得一致意见。如果不接受黄的提议，也须和黄谈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处

〔1〕 李富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2〕 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理。”

1月4日 晚，和周恩来等出席缅甸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吴茂茂铎举行的庆祝缅甸联邦独立七周年招待会。

1月5日 晚，出席周恩来为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举行的欢迎酒会。十日晚，出席周恩来为哈马舍尔德举行的饯行宴会。

1月6日 新华社发表彭真给日本广岛市长滨井信三的复信，对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广岛居民所遭受到的巨大不幸深表同情，对广岛人民反对原子武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强烈愿望表示赞同和支持。滨井信三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给彭真的信是不久前才收到的。信中说，八月六日广岛市民在遭受原子弹灾难的九周年的纪念会上呼吁禁止原子武器。希望彭真市长和北京市民支持广岛市民的要求和他们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

1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提出：“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十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1月12日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等。

1月13日 审改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业务工作会议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加写“目前形势迫切地需要迅速确定检察机关的编制和建立检察机关的计划，并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检察机关建设和工作的领导。”报告强调全国县检察院应“先把目前已经刻不容缓的一些工作负担起来”。

1月15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

会议。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1〕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和平用途的讲解，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

1月16日 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文教口领导干部谈加强知识分子工作。指出：对知识分子的估计，首先要肯定他们解放后的成绩，再指出缺点，才能全面而使人信服。但是从政治思想方面分析，有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和反动的几类，要抓住两头。一定要把那些思想虽然反动，但不是反革命，又有专长的人争取过来，好好搞几个典型。要吸收思想进步、历史清楚、真诚为人民服务而又自愿的分子入党。这几年，我们有点关门。北京有一千二百多名教授，假如能吸收一两百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情况就不同了。

1月17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

1月19日 批发中共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党委会《关于西郊苏联专家招待所〔2〕设计浪费情况的报告》。报告说：西郊招待所建筑设计的浪费主要表现在追求形式，过分讲究奢华的装饰。最突出的是采用皇宫和庙宇形式的屋顶，还有许多亭台楼阁，挑角、飞檐，片面追求形式，忽视实用、经济与坚固的原则，是建筑方面在提倡“民族形式”口号下搞复古主义。报告建议市委对这个工程的设计加以检查，并对有关的错

〔1〕 李四光，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所长。刘杰，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2〕 今友谊宾馆。

误思想进行批判。北京市委特将报告转发北京市设计院党组、建筑工程局党组等有关单位并上报中共中央，指出：北京市设计院“没有执行党在建筑方面‘经济、实用、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指示”。市委责成北京市设计院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切实领导所属人员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去年类似的设计，切实进行检查，纠正这种错误的设计思想，保证在一九五五年的工作中不再重犯”。

1月21日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会议，讨论建筑事务管理局关于拆城墙的请示。刘仁说：拆城墙，中央原则上同意，拆残缺不全的一段或者拆豁口可以，但大面积地拆，必须通过彭真并报中央。

1月23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宣传工作一般化、简单化，思想性、战斗性不强，是因为理论脱离实际。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矛盾很多，宣传工作者要深入，到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合作社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我们要从现实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方法，又拿回到现实中去解决问题。从实际出发是改进当前宣传工作的关键。解决了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宣传工作就好做了。做宣传工作如果不深入基层摸典型，工作就永远是肤浅的，就会永远浮在水面上，像水泡。讲话还谈到调查研究中的重点和一般、点和面的关系，以及特殊问题特殊处理等问题。该讲话的一部分以《宣传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1月24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名义发表的《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稿。彭德怀、邓小平列席会议。

1月26日 出席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为庆祝印度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月29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彭德怀、邓小平列席会议。

△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永定河引水工程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请示提出：北京缺水情况甚为严重，今后随着人口增长，建设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特别是为了在首都发展现代化工业，仅依靠地下水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现官厅水库竣工，引永定河水进入北京条件已具备，我们把这项工程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内，而且是城市建设计划的一项重要工作。工程计划任务书已由市政府于一九五四年九月报送国家计划委员会，请中央批准此项引水计划并转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计划任务书早日批准下达。

1月30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台湾问题和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参加会议的还有彭德怀、邓小平。

1月31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彭德怀、邓小平列席会议。

1月下旬 听取张鼎丞^{〔1〕}汇报和请示工作，并作指示说：检察院必须很快普遍建立起来，首先把批准逮捕人犯的工作担负起来，“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2〕}，这条法律已经颁布，必须兑现，必须执行。

〔1〕 张鼎丞，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 见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八十九条。

2月1日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列席会议。

2月2日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检察业务工作会议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在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谭震林等表示基本同意报告中关于检察机关业务建设和组织的意见后，发言说：检察工作过去长期纠缠于垂直领导、普遍建立等几个问题上，没有好好开展工作。近一年来才逐渐走上了轨道，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需要把检察院普遍建立起来，但是宪法上规定的任务，还不可能全面都担负起来。检察机关的编制应当集中使用，不要平均分配。同意高检院党组的意见，把中央批准的编制总数交给高检院，由高检院统一掌握使用。

2月3日上午，主持中共北京市委会议，讨论召开北京市一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工作计划。讲话指出：（一）市政府领导成员的组成要反映现阶段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不能搞成清一色。副市长中的几位民主人士，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不一定都发展入党，但党内讨论重要工作和有关政策、计划时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市政府现有八九位副市长，各自分工负责一部分工作，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秘书长综合起来，掌握总的情况，提出问题。没有一个强的参谋部，工作水平就提不高，不是各把一方，就是谁也不当家，工作是散的。（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不能召集下级党的负责人开会或发指示，要么是党和政府联合发指示，不然即是分散主义。市委的名单快提出来。（三）学生负担重，近视眼多，市委要有专人管理。特别是初三和高中的学生，课本分量重，教学大纲和教师又加码，要提出改进办法。学生的睡眠时间要保证，寒暑假中的社会活动要控制，教育工作中还有官僚主义。学校发展党的工作也要抓

紧。(四) 卫生工作退步了,市人大的报告中公共卫生、工矿卫生还讲得不够。(五) 原子时代的工业布局要实行分散方针,新建城市工业不要搞得太大,石景山钢铁厂扩建与否中央还没有定。(六) 统一战线问题,不要把本人参加劳动的小工商业户划成资产阶级。土改中许多小土地所有者不划为地主,对我们很有利。沿海地区的船主,雇有船工,但船上工作他负责,自己也参加劳动,不算资本家。全国有城乡小工商业户九百万,有不少人参加劳动的,应划为资本家的约十五万人,其余的算独立劳动者。饮食业中也有不少业主是参加劳动的。(七) 今年三百万平方公尺的建筑任务不能再加。房屋可以统一管理,设计和施工、验收如果也要市里统一管理,就必须把必要力量也交给市里;但房屋的使用分配不能统一。

2月5日 在北京市郊区办社干部会议上讲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方针、政策问题。讲话指出:郊区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七,绝大多数社员和单干户相比增加了产量和收入;农民中锻炼出一大批办好合作社的积极分子,干部有了办社的初步经验,这是很大的成绩,“我们基本上贯彻了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下一步要解决的是:(一) 大多数合作社,特别是大社还不巩固,因为社的领导核心主要是由上级派去的干部组成的,必须从农民中锻炼、培养一批政治上、管理上有能力的领导核心。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农民积极分子总结办社经验,使他们自己能把社办好。(二) 目前郊区不要再办土地不分红的高级社;已经建立的高级社,如部分社员不是真正自愿,就退回去实行土地分红。郊区土改时只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对中农的土地没有动,所以中农占有的土地比贫农多。土地不分红等于贫农和中农又平分一次土地,贫农沾了中农的光。各农户劳力强弱、技术高低

的差别比较大，如果土地不分红，劳动力少的、弱的，没有劳动力的，就吃了亏。在农民政治觉悟还不那么高的情况下，把土地不分红当做一个普遍的政策来推广，办只对一部分人有利的高级社是不行的。中央没有叫我们马上去发展那么多高级社，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这是实事求是。过若干年以后，农民觉悟提高了，会有土地不分红那一天。（三）牲口、大农具等生产资料归了社，折价要公道。折了价，除应该摊的一部分生产资金外，剩下的应该偿还，定期偿还的，还要给利息。中农和贫农都是劳动者，我们对剥削阶级财产是剥夺，对劳动者不能用直接或间接的任何方式去剥夺。（四）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应该多办中等规模的社，大社办好很不容易，不要急躁冒进，在条件不具备时急于建立很多大社。走得太快，栽了跟头，起来再走就更慢了。把一个个小社办好了，然后合起来，不就是大社吗？（五）农民的私有观念是个体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定要把改变经济基础和教育结合起来，不是一个早上、一个月、一个突击运动就可以解决的。同时，要在完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来。生产关系改变了，所有制改变了，人的思想也就会慢慢改变的。该讲话以《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2月6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情况的汇报。邓小平列席会议。

2月8日 下午，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上发言，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草案）的修改情况作了说明。

△ 晚，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 收到毛泽东就罗荣桓、谭政、傅钟、萧华、甘泗淇〔1〕《关于军队审查干部工作的初步情况向毛泽东、彭德怀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写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的批示。批示说：“此件值得看一下，全党干部审查问题，请邓小平督促进行。”

2月9日 担任张澜治丧委员会委员。张澜于当日在北京病逝。晚九时，到中山公园中山堂亲视张澜入殓。十三日上午，参加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的张澜公祭仪式。

△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农委给市委的《关于当前京郊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报告》，并拟电上报中共中央：本市郊区农业生产合作运动已有很大发展和成绩，但同时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经过市委多次讨论后，已在纠正中，现送上市农委根据我们讨论的结果作的综合报告。报告中说：市郊农业生产合作社经去冬今春的大发展，入社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据中央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2〕精神检查，在大发展中的缺点是：过早过急地组织土地不分红的高级社，入社农户生产资料折价过低，有的还款期长达十年且不付息，侵犯了一些农民的利益；大社办得有些过多。鉴于有些社条件差，领导骨干弱，当时工作粗糙简单，应暂时坚决停止发展，组织力量认真地检查、整顿。（一）目前主要是建立土地分红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新办的土地不分红的高级社，如只有部分社员要求，或不是真心

〔1〕 罗荣桓，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傅钟、萧华、甘泗淇，时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2〕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肯定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发展互助合作的主要环节。

赞成土地不分红的，应说服干部和积极分子加以改变；对社员生产资料的折价款，除扣下应缴纳的人社股金或生产资金外，其余部分应在三至五年内分期还本付息；暂不提倡树木、羊群、蜂群入社，已入社的必须按自愿和互利的原则，慎重地、妥善地加以处理；入社的果树必须给原主合理报酬，不愿将果树入股的，应允许退出自行经营；没有把握办好的大社，如社员愿意可以分成几个小社或中社。（二）立即转入生产并做好春耕准备，制订一九五五年度的生产计划，发动社员进行生产投资。在春耕以前，分期办好乡社干部、生产队长、会计和技术员等训练班。（三）加强并改进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建立和健全社的政治工作。首先加强市委、区委对互助合作运动的统一领导。经过整顿，三百四十三个土地不分红的高级社，有二百六十六个改为按劳力、土地分红的初级社；一百七十八个百户以上的大社中，有十八个缩小规模，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京西矿区十七个勉强办起来的社，群众自愿转成了互助组。整社过程中，有百分之六的社员退了社。入社农户由百分之四十七下降为四十六。三月十四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中共中央各分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批转这一报告，指出：北京市委农委对京郊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情况的分析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适当的、正确的，并且他们开始这样做了之后，已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效果。

△ 为实行义务兵役制，根据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审阅了题为《我国军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的《人民日报》社论稿。

2月11日 下午，出席北京市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会议于八日开幕，审查和讨论了市卫生局关于改进北京市卫生工作、农林局关于市郊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在

会上当选为北京市市长；张友渔、吴晗、王昆仑、薛子正、冯基平、程宏毅、贾庭三、乐松生为副市长。王斐然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贺战军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 在北京市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作总结讲话。指出：（一）我们国家政治上是先进的，但工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还很落后，因此第一件事应该是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市政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等一切工作都应该以生产为中心。（二）医疗卫生工作必须贯彻普及第一、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和以预防为主方针。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必须通盘计划，统一部署和使用全市现有医疗设备和医疗力量，实行分级负责的办法。应该特别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武装医务人员思想；学习苏联经验，批判地接受中外医学经验，提倡西医学中医，总结中医的经验，把中国医学提高一步。必须减少医生除医疗工作以外的繁杂事务，整顿医疗卫生队伍，整顿公费医疗制度等。（三）郊区合作化，关键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办大社、办高级社不能离开当前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在还没有经验时，盲目地发展高级社是要摔跤的。已经发展起来的大社，能办下去的应该加强干部力量继续办下去；办不下去的可以分成小社。土地不分红的社，如果农民不是真正自愿，就应该给以土地报酬，但土地报酬不能多于劳动报酬，否则即是恢复到土改以前的情况了。土地报酬少给或不给，土地多的中农就吃亏。这是个很细致、很复杂的工作，要使劳动力多的和劳动力少的，或者土地多的和土地少的农民都不吃亏，大家都感到公道。如果这项工作做不好，就会影响贫农与中农的团结，影响工农联盟。

2月12日 上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和中国人民保卫

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委联席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发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决议》，制定了开展签名运动的计划，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委员会，推选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甘泗淇为副主席，廖承志、刘宁一等七人为正副秘书长，王阑西等六十五人为委员，决定从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纪念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广泛地开展签名运动。到会全体人员一致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告世界人民书上签了名。

△ 审阅《人民日报》题为《大规模开展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的社论稿。在表述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决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和原子恫吓一段话之后，加写：“其实，在今天最害怕原子战争的，正是那些用原子讹诈进行恫吓的帝国主义。因为他们不但已经失去了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失去了这方面的优势，并且正是他们的国家人口和工业最集中，最怕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破坏”。

△ 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条例（草案）》的说明。

△ 晚，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2月13日 出席全国政协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举行的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大会。

2月14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张闻天〔1〕等到毛泽东住所谈话。此前，彭德怀已在座。谈话结束后，一同出席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罗迈进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招待会。

〔1〕 张闻天，时兼任外交部副部长。

2月15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十五时三十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月16日 晚，张友渔在中共北京市委会议上传达了彭真对市有关机构调整和副市长分工的意见：（一）设立都市规划委员会，以郑天翔为主任，梁思成、佟静为副主任；撤销原都市计划委员会〔1〕。设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办公室。（二）关于副市长的分工。十二日，市委会议曾提出方案，向彭真汇报后，初步决定：张友渔主管计划、财政、预算、税收；吴晗仍管教育、卫生，体委、外事和监察；王昆仑主管文化；冯基平主管政法、宗教事务和市府一般行政工作；贾庭三负责工业及建筑，联系下层；薛子正主管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程宏毅主管商业，包括外贸、运输和手工业管理局；乐松生，主管社会福利。秘书长柴泽民主管办公厅，组织会议，检查工作，并协助市长代管区及市郊农村工作。三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机构设置及人员分工。

2月18日 下午，主持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贯彻市一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决议，决定责成公共卫生局开展经常性的群众卫生运动，并将全市医疗工作在通盘计划、部署下切实实行分级负责的办法。市人民政府的组织机构要按照分工明、责任专、层次少和精简编制的原则加以必要的调整。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市人民委员会要整顿机关的工作作风。各部门的负责人要认真研究和检查自己主管的工作，把重要问题提到市人民委员会来检查、讨论，切实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系统地贯彻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在

〔1〕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设立都市规划委员会，撤销都市计划委员会。

会议结论中，着重提出解决建筑事务管理问题的意见：（一）全年的建筑任务，必须按照轻重缓急，统一安排，决定哪些今年能建，哪些不能建；并尽早通知不能兴建的单位，使他们不要再奔走。（二）建筑事务牵涉到很多方面，应继续运用行之有效的联合办公的经验，由都市规划管理局召集有关方面的干部和公私业主，集中会商一切问题，承办一切手续。（三）都市规划管理局应将建筑事务中的各种问题分别作出规定。该管的管好，不该管或暂时不能管的就不管。（四）主管建筑的首长，对强迫盖大屋顶或滥用职权的事情进行严肃查处。我们在三年前就明白交代，市政府主管部门不要强迫人家盖大屋顶的房子，但主管建筑部门的有些人，对建筑形式任意干涉，强迫盖大屋顶，其责任应由个人来负。

2月20日 收到毛泽东写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的信。信中说：五年计划纲要第二稿已看过一遍，有些意见已告陈伯达。请于日内分别找陈伯达谈一次，将意见和修改的本子交给陈，由他汇集修改，加上地方计划一章，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印出第三稿。“三月十日左右印第四稿，即可作为基本定论。明后天我开始看高、饶问题文件〔1〕，看完再集谈一下”。

2月21日 收到毛泽东写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的批示：“高、饶联盟文件已看了一遍，全文可用，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从第九页起刮掉了两段〔2〕，因为我觉

〔1〕 指准备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等文件。

〔2〕 毛泽东删掉的报告稿中的两段话，主要内容是批驳高岗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攻击某些中央领导人等问题。

得这个问题不宜这样地在这里辩论，刮掉后似乎好一些，请你们斟酌。刘、陈、彭、邓各同志的修改意见，请于日内即交恩来，以便明日或后日谈一下。”

△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厂矿企业中党、工会和青年团专职工作人员是否领取企业行政奖金问题的请示报告》。市委认为：“原则上党的专职工作人员是不应领取企业行政奖金的，工会、青年团脱离生产的专职干部似亦应与党的工作人员相同。”

2月26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对胡风〔1〕如何展开批判〔2〕等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3〕、胡乔木、周扬、胡绳、邓拓〔4〕等。

2月27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全

〔1〕 胡风，文艺理论家，诗人，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编委。一九五五年，在批判胡风的《关于几年来文学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时，将胡风及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定为“胡风反党集团”，五月十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一九六五年，判徒刑十四年。一九六九年，加判为无期徒刑。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九日，经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将复查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建议由原经办的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者，“彻底纠正”。一九八一年，胡风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2〕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3〕 陈伯达，时兼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4〕 周扬，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邓拓，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国粮食统购统销后，安定农民生产情绪问题。

2月28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集体办公会。讲话说：（一）全国去年粮食多购，农业合作化的步子也走快了，“工农关系紧张，是个危险问题。要向农民让步，缓和关系”。中央决定粮食征购量由九百九十五亿斤减为九百亿斤；一五计划期间全国入社农户占总户数比例由原计划百分之五十降至百分之三十三，并要在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中号召节约粮食，加强工农联盟的教育。（二）农业合作社的规模不宜太大，办大社困难很多。市里要有几个负责人先搞典型，取得发言权，还可以联系农村老家的熟人，了解情况，有点感性认识，甚至请他们到招待所来谈情况，由公家出路费。联系工农，是国家的根本问题。（三）领导干部不要陷于事务工作，要抽出身来研究方针、政策等重要问题，日常行政工作，不必提到市委。市府可以设总党组，或者由五位党员副市长把问题归口，提交市委讨论。市里上送和外发的文件，要经主要领导人过目。与中央各部门的联系，要口勤、腿勤，先联系协商，再办公文，不应无事不登三宝殿。参加中央各部的会议，要集中精力，与外省市到中央开会的干部一样到会，钻进去。（四）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毛主席倡导的。建筑方面对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我们还缺乏系统的认识，但是，他在宣扬“民族形式”的口号下，对造成建筑成本高、浪费大是有责任的。一九五一年，市公用局盖大屋顶，我们即指出，市政府主管部门不能强迫别人搞“道士帽”。但是，以后仍然出现一批大屋顶建筑。清华的建筑系、市设计院里的共产党员，他们应该先作检讨，一是思想问题，一是不尊重市委的决议。北京市几年来建筑布局分散，不能责怪梁思成；至于那些大屋顶建筑，有的业主是中央部门，我虽然有看法，但也没有去反对、去纠正，也是有

责任的。当然，我不使用权力加以干涉，但也没有向中央报告。我们先自我批评，然后再批评梁思成。梁思成还是爱国的，热忱要做事情，对他还是要治病救人。等他出医院后，我便与他谈话，让他作自我批评。

3月3日 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北京市一九五四年建筑工程基本情况向中共中央的综合报告》。报告认为：一九五四年首都建筑工程完成情况一般是好的，各建筑企业的工作都有了显著进步。缺点主要是工程质量粗糙和低劣，浪费现象严重，安全事故仍然很多，对培养技术力量、提高干部业务水平重视不够，缺乏长期打算。“设计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有不少设计过分地追求外表豪华、忽视实用和经济，有些建筑错误地强调所谓‘民族形式’，大大地提高了建筑造价，造成严重浪费”，如亚洲学生疗养院、专家招待所、北京饭店、国际饭店、中央组织部办公楼等工程。这些建筑的设计方案虽由业主批准，但也“是某些设计人员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有些也是由于国家控制造价过高），和党的总路线是直接相违背的”。

△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规定：降低下年度粮食征购指标，放慢农业合作化的步伐，以缓和农村紧张情况。

3月6日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半年来执行市委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决定的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广大教职员贯彻市委的决定，围绕提高教育质量，整顿学校秩序做的主要工作有：（一）编写了中小学的教学参考资料和授课计划纲要，减轻了教师备课负担。（二）为一千一百多名中学教师和三千八百多小学教师进修业务和补习文化，成立了师范学院专修班和小学教师训练班。（三）提高了去年秋季中学招生录取标准。对在校部分中小學生进行语文、数学的统一考

试。(四)初步整顿了教师队伍,摸清教职员政治情况,清洗了政治上有问题、品质恶劣或者极不称职的中小学教师;奖励、表扬了五千四百多名工作比较突出的教职员,并按规定定级调薪。(五)市委教育部定出了克服中小学忙乱的几项规定。目前存在一些较严重的缺点,主要是初三以上学生在教学加紧后学习负担显得更加普遍和严重了。学习时间超过国务院的规定,休息睡眠的时间不足,影响了身体健康。原因除教材分量过重、教师水准低外,教育局编写的中小学授课计划纲要对一部分课目要求偏高,规定的作业分量过重,同时由于教育局没有反复说明,许多教师不从学校和班级的情况出发,把“指导性”的纲要机械地要求学生,以致负担过重。批示:“授课计划纲要是干脆取消为好,还是根据实际经验加以修改,订正施行为好,请再斟酌。”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修改问题。邓小平、李富春、胡乔木列席会议。

3月10日 下午,出席周恩来为欢送行将离京返藏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及随行官员在中南海举行的宴会。

△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一九五四年商业工作情况和一九五五年工作。报告说:经过一九五四年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系统改造,北京的市场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批发环节上粮、油、布统购统销,肉、菜、糖重点供应,五金、木材、新药、石油等主要商品经营中,到第四季度私商批发额只占批发总额的百分之六点五六;零售商业方面,私商已降至二十八点六二。在剧烈的变革中,主要缺点是:对市场的统筹安排不够;国营批发业务未跟上,手续繁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

收购盲目性大，商品积压，资金周转慢，没有利用私营批发商的力量，以致国营、合作社忙死，私商闲死，仓库积压，市场脱销；在零售方面则服务质量与管理水平不高，引起群众不满。一九五五年商业工作中心任务是，公私统筹兼顾和统一安排。国营商业集中力量改进批发工作，建立新的批发网。对私营小批发商和二批发商，按其不同情况分别利用、改造或吸收使用；对私营零售商应首先使其稳定下来，继续经营，以维持生活，使其服务于商品流转，然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逐行逐业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3月11日 晚七时，出席全国政协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

3月18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 晚八时五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二十一日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并根据毛泽东提议，十九日下午，召开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会议开至晚十二时。

3月19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高饶问题和监察委员会问题。会议通过：（一）同意三项议程的决议、监察委员会名单。（二）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表会议。（三）同意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只撤销中央委员。（四）准备在一九五六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3月21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3月21日—3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

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并选出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

3月23日 起草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稿。二十九日，将发言稿中有关工农联盟和自我批评部分送刘少奇征求意见，并告：四中全会上已讲过的内容“有增无减”，毛泽东、陈云、邓小平处已另送。

3月27日 中午，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3月30日 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说：在我们这样工业落后的国家中集中力量以较快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全体人民首先是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积极劳动，咬紧牙关，节衣缩食，吃苦耐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目前在干部和群众中克勤克俭地、艰苦奋斗地搞工业的空气不很浓厚，而追求享受、“摆谱”和在生产、国防以外的各种设施中追求高标准的倾向是严重的。在北京，有些大的建筑是很铺张浪费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应该管、也可以管，至少是可以提意见的，但没有管，我应该负主要责任。发言强调：国家已经进入正常管理时期，迫切要求加强立法工作、司法工作，健全司法机关，并且在人民群众中，首先在干部、党员中进行守法教育，使党员、干部成为遵守法律的模范。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服从法律，就是服从自己的阶级意志。那种认为遵守国家的法律是束缚我们的手足，感到不方便、不称心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 下午二时四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4月2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4月3日 晚，出席文化部举办的庆祝匈牙利解放十周年大会。

4月4日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列席会议。

△ 下午，先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二次会议。会议批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三项决议和所选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选。五中全会委托中央政治局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讨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适当的修改，然后提交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予以审议和通过。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5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和访问印度尼西亚的计划、及有关中缅两国关系问题的处理方针。

4月6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4月9日 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作报告。指出学校的办学方针，是在几年之内将县级有经验的政法干部轮训一遍，增长理论和科学知识。青年干部虽有书本知识但缺乏实际经验，要向老干部学习。但是他们一定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能使我们的工作不断提高，使我们的社会不断进步。

4月10日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陈云会见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立特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图尔特。随后，出席中共中央的欢迎宴会。十一日晚，主持中共北京市委为罗伯特·斯图尔特一行举行的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

4月11日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组抵京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专家组五日来京，共到七位

(地下电车道和供热专家尚未来)。我们已于七日与他们正式见面并商谈了工作。副总顾问提出这批专家单独编组，专门帮助北京市的规划工作，已商得李富春同意。现已成立工作机构，调集青年技术干部向他们学习。三十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这批专家单独编组，专门帮助北京市的规划工作，归北京市政府领导。

4月12日 上午，出席黄炎培主持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会上报告：中国出席亚非会议的代表团由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我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为代表团成员。会议一致通过任命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并授予全权证书。接着，向会议通报了十一日中午，我国参加亚非会议的工作人员三人、记者五人，乘坐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客机，自香港飞往印尼途中，在沙捞越西北海面爆炸起火，不幸遇难的事件〔1〕。会议还商定，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于六月间召开，内容是讨论通过五年计划、一九五四年的财政决算和一九五五年的国家预算及其他立法事项。

4月14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的安全问题。

4月19日 与刘仁、郑天翔商议后，修改中共北京市委

〔1〕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自香港飞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途中，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海面时，因台湾国民党特务收买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在机上放置的定时炸弹爆炸而起火坠海，中国出席亚非会议的工作人员和记者石志昂等八人遇难。事后查明，这是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谋害周恩来的阴谋。

《关于北京市城市规划工作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请示说：（一）从目前的国际形势以及从原子战争时代的国防观点看，城市不宜过大，工业、人口不宜过分集中。“因此，在一九五三年向中央报告的规划草案中的二十年左右工业发展规模和人口规模，需要重新考虑。（二）目前北京“基本上还是一个消费城市”，一九五四年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百分之二点六左右，现代工业职工仅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左右。北京“今年还应当建设一些现代工业，而且在北京建设工业也还有一些优越条件”：北京西部山区、东北部怀柔山区和北部南口一带距市中心四五十公里的半径以内，有许多地方，从交通运输和防空的条件来看，“是适宜于建设工厂的（我们正对这些地方的情况进行勘察）”。北京距海较近，“一五”期间，“中央原定在京新建的十一个工厂中，已有四个停建，一个正在考虑，计划扩建的农业机械厂亦已停止扩建”。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是否还在北京摆一些新工厂，石景山钢铁厂还扩建否？三四十年的远景规划如何布局。（三）一九五四年底全市总人口为三百三十五万（不包括驻京部队和外交使领馆人员），今后二十年，中央机关的规模、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发展规模也多未定，人口控制在五百万是否适当？这些数据是帮助我们搞城市发展规划的苏联专家组首先要求我们确定的基本问题，“请中央决定并给以指示。”这个请示四月二十八日上报中共中央。

4月21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有关精神，指示北京当前工作：（一）和农民关系紧张，一是合作社发展冒了点，一是粮食征购多了。今年合作社一般不发展，专做巩固工作。能巩固的尽量补救、办好；部分农民要退社的，根据自愿，不要伤感情，但巩固不是溃退。（二）建设时

期新问题多，省市党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不适应，忙乱于具体事务。省市市委要考虑成立书记处，加强业务工作机构。（三）建筑设计思想批判要快点搞，要动员受梁思成建筑思想影响的人作自我批评；对梁思成，或者他作自我批评，或者我们帮助。（四）《北京日报》有了思想性，反映生产情况，活泼起来了，但批评还是少了。总的是全党办报，凡是有利于推动工作的事情，应该尽可能在报上登出来。被批评的机关要有答复；报纸批评错了也要更正。（五）民主人士工作上要有职有权，有问题可以批评，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合作中没有斗争是不可能的。（六）要向新来的苏联城建专家学习，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接受专家建议，有不同意见应提到市委讨论。

△ 晚，出席中共中央在怀仁堂举行的列宁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4月23日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谭震林、邓子恢〔1〕。此前，四月十九日，邓子恢向刘少奇汇报农村工作会议准备情况，谈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六十七万个，大大超过原定发展计划。二十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邓子恢、廖鲁言〔2〕参加，杜润生〔3〕汇报农村情况，主要讲浙江问题。

4月25日 同梁思成谈话。

4月26日 主持全国政协第六次常委会议。会议通过中

〔1〕 邓子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2〕 廖鲁言，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3〕 杜润生，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一九五五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全国政协各工作组副组长名单。

4月28日 下午，到毛泽东处商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问题。晚，陪同毛泽东等参观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

4月29日 致信刘少奇并毛泽东、陈云、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统战部提出以后政协常委开扩大会时，扩大到在京委员参加，希望也通知卫立煌〔1〕列席，我觉得可以。刘少奇批示：拟予同意。

4月30日 下午，和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准备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审议五年计划草案及会议日程安排等问题。

5月1日 上午十时，主持首都各界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和群众游行并致开会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出席。

5月3日 晚，同梁思成谈话，历时两个半小时。崔月梨〔2〕参加。对梁说：国家年产只二百万吨钢，工人有的还没房住，学生睡的是双层铺，而你们搞设计的人员，不注意国家利益，不顾人民生活水平，不讲经济，只追求美，表现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过去建筑师设计大屋顶，业主欣赏，形成了社会风气。现在建筑师先检讨，然后业主检讨。梁思成承认经济上造成浪费的事实，但对民族形式和“复古主义”的关系

〔1〕 卫立煌，原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解放战争后期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司令，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被软禁于南京。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引退”后，卫立煌去香港。一九五五年三月回国，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

〔2〕 崔月梨，时兼任北京市政协秘书长。

尚未想清。又对梁说：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从长计议，首先解决立场观点。政治上你是拥护党的，建筑思想上和党不一致。梁思成表示同意，说自己的建筑思想是适用、坚固、美观，确实没有经济观念，至于民族形式的发展创造和复古主义问题，自己认识还是很乱。

5月6日 晚，出席文化部举办的庆祝德国解放十周年大会。

5月7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参加亚非会议的情况。

5月9日 上午，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出席司徒美堂^{〔1〕}遗体入殓仪式；十日上午，出席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的公祭大会。司徒美堂是五月八日逝世的。

△ 晚，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5月10日 下午，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晚，和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小平、陈毅等参加毛泽东邀请李济深等十四位民主人士的谈话。

5月上旬 就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问题指示中共北京市委有关领导：公开批判梁思成时，批准大屋顶、琉璃瓦建筑的业主也要作检讨，不然人家不服气。涉及建筑学术问题的讨论是长期的，建议由中宣部领导起来，中国建筑学会出面组织，并需要成立领导小组。实际工作中不要盲目反，如北京饭店的亭子、台阶还是可以要的。

5月11日 下午，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前往毛泽东住所开会。一小时后，毛泽东请陆定一前来参加会议。

〔1〕 司徒美堂（一八六八——一九五五），旅美爱国华侨领袖，曾任美洲致公党主席。生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 晚，设宴欢送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歌舞团人员赴外地演出和招待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全体工作人员并致词。

5月12日 下午，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六时，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到会的还有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等。晚七时三十分，一同参加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中有两句是：“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其手稿旁批有：“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二日最高国务会议通过。存。”

△ 刘仁在中共北京市委会议传达彭真的电话指示：（一）民主人士反映北京粮食供应较松，必须加强管理。全国实行粮食配给制，北京应研究实施办法。（二）对反革命要捕一批，又要大赦特赦一批，中央方针已定，请市公安局准备。（三）建筑问题，梁思成承认追求形式美观，造成浪费的错误。市委一九五三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曾经提出建筑形式由各业主单位首长决定，这是自由主义的态度。各机关首长批准盖大屋顶形式的建筑，也应作检讨；要召集建筑师开会把问题说清楚。不这样检讨人家不服。毛主席认为这样检讨是对的。（四）全国人民代表须到各地视察联系群众，省市代表也须这样办。在城市主要视察铺张浪费问题，在乡村主要视察镇反和粮食工作。这对克服官僚主义有好处，逼着我们下去。要做好准备工作，届时，好的、坏的都应让代表看。（五）毛主席提出中央机关精简一半。北京市的精简工作，市委要向机关提出任务，迅速提出方案。

5月13日 致信周恩来：由于中央政法干校行政上已归属中央高等教育部领导，请求国务院免去自己的校长职务；并代张奚若、谢觉哉、史良、陶希晋转达免去他们副校长职务的

请求。信中还提出办好政法干校的两点建议：（一）今后几年内的任务仍以继续轮训县级以上在职干部、时间仍以一年左右为宜。现在政法部门县级以上的领导骨干，绝大多数是老干部，他们有一定的经验和锻炼，迫切需要用马列主义理论和系统的法律知识来武装。但他们不可能脱离工作，抽出四五年的时间来学习。如果按本科学制要求，只能招收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来解决。（二）干校轮训在职干部期间，在业务上还应当受国务院第一办公室的领导，特别是抽调哪些干部受训，怎样使教学与当前政法各部门的工作密切结合，都必须取得政法各业务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国务院发布一批国家机关、驻外总领事和高等学校工作人员的任免令，免去彭真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校长，张奚若、谢觉哉、史良、陶希晋的副校长职务。

5月15日 下午，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罗瑞卿、陆定一、周扬等到毛泽东住所开会。

△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厂矿、企业精简编制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过去几次精简，总是着眼于“卸包袱”、“裁员减薪”，裁减少数老弱病残人员，没有从改进管理、改善劳动组织、改进工作方法以提高效率着手，精简下来的人员无法安置。对编余人员，应在不使职工失业、不减少职工收入原则下，采取增加生产班次、工作班次等办法，减少每班生产人员，将多出的人员组织轮班学习或短期培训，等候国家调配。这样既可以积极改善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提高职工文化、业务和政治水平，为新建的厂矿储备干部和技术工人，一旦需要时即可按班、组建制抽调，逐步达到精简目的，并消除精简工作中的阻力。据市委重点调查，石景山钢铁厂、发电厂、清河制呢厂的领导和车间干部普遍感觉有信心。

估计全市厂矿系统十二万人中可减少二万到三万人。做好这一工作应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编余人员由行政负责组织，上级行政部门和市委帮助和指导。（二）编余职工学习期间工资照发。厂矿中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应有两种方法，一是只按实际参加生产的职工人数计算，一是按包括学习人员在内的职工人数计算，以使领导和职工群众都心中有数。（三）今后上级行政部门抽调职工时不应只“拔尖”，而应按班、组建制（包括干部）抽调，以免过分削弱厂矿的领导骨干和技术力量。（四）对于老弱人员应另行处理。六月六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并向各地各部门批转了北京市委请示报告，指出：北京市提出的增加班次，组织轮班学习，以等候国家调配的办法，是目前处理厂矿企业多余职工的比较妥善的一个办法，望各地、各部门立即仿效试行。这个办法对于某些国家机关也是可行的，各地、各部门亦可根据这个原则加以试行。中共中央特别责成中央编制工资委员会，在进行中央机关整编工作中，选择一两个点试办，以吸取经验。

5月16日 毛泽东批示杨尚昆，将中央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稿电话征求周恩来、陈云、彭真意见。通知说：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将于七月初召开，会前代表将分赴各地或就近在城市和乡村视察。“视察的重点，在城市主要是粮食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浪费问题；在乡村主要是粮食统购统销、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问题。各地对于代表的视察，应该采取积极和欢迎的态度”。

△ 收到毛泽东的批示：请杨尚昆将黄炎培转给陈云的来信“立即印发给明天（十七）到颐年堂开会的各同志。”〔1〕黄

〔1〕 指出席中共中央准备召开的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的同志。

炎培转来的信，是彭一湖〔1〕向国务院反映湘东农村统购中给农民留粮过低、农民吃不饱、定产量过高和干部强迫命令等问题的信。黄炎培在转送信中说：“以我综合各方面报告，推想起来，到底有粮者叫是少数，无粮者叫是多数，而且前者是随着后者而发生的。要分别处理，但断不可不处理。”同时，毛泽东嘱彭真将来件“发给（人大）常务委员及常委（会）一些工作人员及政协在京常委委员”。

5月17日 零时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罗瑞卿、陆定一、周扬。

△ 下午一时至晚十时，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的十五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粮食工作、镇压反革命、农业合作化、民主人士考察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指出：合作社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的地区就是要“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基本要“发”〔2〕。彭真发言说：农业合作社问题上不要听一股风，冒进、冒退，要实事求是，总的是要办好。

〔1〕 彭一湖，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2〕 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三月中旬听取邓子恢等人汇报时，将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概括为“停、缩、发”三个字，并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指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事后，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原有的六十七万个合作社中巩固下来六十五万个，减少二万个。

5月18日 在建筑师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建筑设计中存在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和某些业主追求富丽堂皇的铺张浪费思想相结合，而市委又没有认真管起来，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反对建筑中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的运动还不深入、不广泛，必须继续开展下去。建筑问题不仅是艺术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国家建设事业。党和国家早就指出建筑的原则是适用、经济，并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适用就是要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永远是建筑中头等重要的问题。经济就是要最大限度合理地、节省地使用国家投资和物资，要用少量的钱，盖更多更好的房子，以便更多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美观当然要，但美观决不应违反适用和经济的原则。建设城市的根本思想是革命的、创造的、发展的，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要逐步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对古建筑要加以分析，区别精华糟粕，分别采取存、迁、拆的办法，将来的建筑形式绝对不是把封建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形式在今天加以再现。我们必须批判地接受一切古今中外建筑中的优良的东西，并总结几年来我们在建筑设计中的经验和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逐步创造出更好的建筑形式。

△ 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委员长刘少奇、秘书长彭真名义发出《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发视察工作问题的通知》，提出：六月二十日以前，全国人大代表抽出时间到原选举单位的地区、原籍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视察范围可以包括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统购统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社会治安、文教卫生或其他方面的情况。

△ 晚，出席周恩来在中南海举行的酒会，招待来华参加“五一”节观礼和访问的苏联和亚洲、非洲各国工会代表团和

工会代表。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胡风问题和对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方案的对策问题。

5月19日 晚，出席周恩来招待到访的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的酒会。

5月20日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一九五四年人口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一九五四年底，全市总人口（不算部队及外国使馆人员）为三百三十五万人。其中常住人口三百二十万人，暂住人口十五万人。预计二十年后全市人口将突破五百万人。如何控制首都人口，我们正在研究。

5月23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有关胡风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罗瑞卿、陆定一、周扬、谭震林。

5月26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会议，讨论召开北京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等问题。在会上，对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问题讲话说：市委曾提出过建筑形式由业主自行决定，该管未管，首先由我负责，我准备在市人民委员会上作检讨并发表；建筑单位的机关首长也应检讨；建筑师当然有责任。责任明确后，现在必须集中力量，转入学术思想上对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批判。要抽几个人，其中包括实际搞建筑的，专门分析研究，进一步提高建筑师的认识，纠正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思想。二十七日，市委约请中央宣传部、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总局有关人员举行座谈，研究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和建筑方面的一些专门问题和中国建筑史等。

△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二十七日晚，出席

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二十八日晚，主持北京市各界人士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陪同参加游园活动；二十九日晚，出席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举行的招待会。六月一日晚，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举行的欢迎宴会。二日晚，出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举行的告别宴会。三日上午八时，到机场为离京赴华东、华南等地参观然后回国的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送行。

△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收到毛泽东审改的中央关于征求党内外对继续镇压反革命和举行大赦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稿。毛泽东加写的意见是：“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举行大赦，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反革命气焰高涨，人民不高兴），过几年再谈这件事，这种意见，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征询见告。”经过向党内外征求意见，中共中央决定不向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大赦议案。

5月30日 经十三次易稿，审定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节约粮食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近几个月来，北京市粮食销量逐月增加，浪费和走漏很严重，如不进一步采取断然措施，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度十五亿五千万斤（部队供应在外）的计划指标必然要大大突破。因此，拟通过克服浪费、杜绝走漏、制止闲杂人口入京、定期停止供应临时户口等办法，争取减少年销量三亿斤。措施是：（一）在全国统一供应制度实施前，先按户核实城市常住人口，本节约原则按实际需要由街道办事处核实供应量。（二）压缩城市人口。新来人口中无固定职业的必须动员他们还乡生产。今后入京的人口必须在本市有正当和固定职业、或本市住户需要抚养的直系亲属才允许申报正式户口。临时户口应自带粮票，否则不供应粮食。

中央各部门集体户口应一律由市公安局按一般户口管理。(三)核减熟食和糕点业的粮食供应量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征收相当于售价百分之五十至一百的附加税。凭粮票购买粮食制品,无粮票的消费者增收附加税。(四)节约饲料。提高运输卡车利用率,减少牲畜大车百分之三十,以减少饲料供应量百分之三十左右,等等。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复电北京市委,同意在全国统一的城市定量供应办法实施以前,暂按北京市委提出的供应办法实行,要求积极为实行以人定量办法创造条件;糕点业和熟食业征税可等全国统一办法确定后再定。

△中共北京市委在《关于查处胡风分子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市委根据中央对处理胡风反党集团的指示〔1〕,召开了党员干部会,布置了这一工作,并成立了办公室专门处理“胡风集团”问题。六月一日,毛泽东批示陆定一:“请考虑用中央名义将此件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处理此事。”

6月1日 晚,到中山公园参加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游园晚会。

6月2日 晚十一时,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邓子恢、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

6月3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收到毛泽东修改的

〔1〕指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对处理胡风反党集团的指示。

《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指示说：“各省市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

△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邓子恢、李先念、陈伯达、王稼祥、陈国栋〔1〕、廖鲁言。

6月5日 晚，去中南海勤政殿看各国军服的展览，随后参加毛泽东主持的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式样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陈毅等。

6月7日 接见应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邀请来华的印度工程师学会主席德依博士。德依博士六月一日到达北京后，参观了北京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的厂房建筑和水道设备，以及长城、天坛等古代建筑，并和中国水利工程和市政建设界人士举行了座谈。

6月8日 中午十二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晚上，刘少奇召集会议，讨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及《人民日报》社论稿。

△ 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筹建中级党校。

6月10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一九五四年财政决算和一九五五年财政预算草案。

6月11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研究粮食和公

〔1〕 陈国栋，时任粮食部副部长。

债发行问题的会议。

6月14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听取贾拓夫〔1〕汇报目前全国轻工业生产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

6月15日 上午，和陈毅等到机场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郭沫若、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副团长陈叔通、廖承志和一部分团员前往赫尔辛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送行。

6月18日 上午，和周恩来等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公祭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当天是瞿秋白就义二十周年纪念日。瞿秋白的遗骨于一九五四年由福建省长汀县运来北京。

6月21日 将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拟关于法律解释问题处理原则的决议草案报送刘少奇：“请中央审阅。如来得及，拟提二十三日常委会通过。”同日，刘少奇批示：拟予同意，并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阅。

6月23日 晚九时三十分，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粮食问题和准备召开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陆定一和陈国栋。

6月24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中国与越南高级领导人会谈的几个文件。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陈毅、王稼祥。

6月25日 上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率领的

〔1〕 贾拓夫，时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轻工业部部长。

政府代表团。中午和晚上，两次陪同毛泽东等会见胡志明。二十六日晚，出席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为胡志明一行访华举行的宴会。

6月25日—7月3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刘仁代表市委作工作报告。大会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总结了解放以来北京市的工作，确定了保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当前必须集中力量做好的各项工作，一致通过拥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的决议。会议选举彭真等四十二人为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十七人为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正副书记、委员和候补委员共二十人。八月四日，北京市委一届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彭真、刘仁、张友渔、郑天翔、陈鹏、范儒生、杨成武、冯基平、薛子正、蒋南翔、程宏毅、杨述、范瑾为市委常务委员，彭真为第一书记，刘仁为第二书记，张友渔、郑天翔、陈鹏、范儒生为副书记，并由以上六人组成市委书记处。

6月27日 晚，出席中印友好协会和中缅友好协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印、中缅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周年大会。

6月28日 下午六时三十分，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越南国民联合阵线纲领。晚七时二十分，和毛泽东等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为胡志明一行访华举行的宴会。

6月30日 晚十一时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

6月 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干部座谈召开全国起诉工作会议问题。指出：起诉工作很重要，捕人要经过检察院批准，

全国检察机关都要把这项任务认真担负起来。这还不够，接着要保证审判工作做得好，判得正确，因为事关剥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剥夺多久和量刑轻重。要做到不放纵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这件事比较复杂，也比较困难。所以，检察院对审判的监督更为重要。必须小心谨慎地、认真地做好起诉工作，注意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7月1日 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出席中共北京市委为庆祝中共成立三十四周年和欢迎胡志明在中山公园举行的游园晚会，并在会上致词。

△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在会上报告因张澜、司徒美堂逝世需协商补选人大常委二人和召开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具体安排。二日下午，主持召开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预备会。会议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国务院各部部长（正职）不参加大会主席团，席次在主席台上。同时，就大会日程、编组和代表生活等作了说明。

7月3日 在中共北京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报告肯定北京市的党组织是有高度原则性的，是团结的、巩固的；党的作风是正派的，实事求是的。要求全市党员干部：（一）用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对待工作，克服自以为工作已经差不多的自满松劲情绪。指出有人主张指标低一点，努力超过，这样不好。因为起点低，即使超过还是低；要求高一点，而又是可能达到的，不违背实事求是精神，这样“积极性自然来了，也就不会骄傲自满了”。（二）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为准则，对自己的工作不夸大成绩，不文过饰非，也

不讳疾忌医；对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敢于批评，不怕得罪人，不怕失“选票”，不做油篓里又圆又滑的球。（三）既要努力钻研业务，又要纠正忽视政治的倾向。不管做哪方面工作的同志，在钻研业务的同时，都必须加强政治、政策、理论的学习。（四）改进领导方法。第一条是在实际工作中抓住典型，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突破一点，推动全盘。第二条是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对自己能够而且有权解决的问题切实解决，对自己不能完全解决或无权解决的问题，请示领导机关或提交主管部门解决。第三条是检查工作，特别要抓住典型进行深入具体的检查。了解新情况新经验后，进一步推动全面工作。关于建筑问题，指出：市委曾主张建筑设计的形式由业主负责，没有明确反对造成浪费的设计，这是自由主义，应该由我负责。关于京郊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现在要坚决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现在的问题不是发展慢了，而是担心占市郊农户总数百分之四十六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办不好。如果跑得太快了，跌了跤就落后了。如果这些社都搞好了，再一翻就到了百分之九十几了。这是保证农村进入社会主义最快最好的办法。先办三五户的社，再办七八十户的社，慢慢的办百多户的社。先巩固后发展，这是确定的方针，是不可动摇的。郊区现有四五百干部在搞合作社，搞不好会包办代替。现在要陆续抽调一些干部回来，让农民自己管起来。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把私营工商业的安排和改造统一起来。对资本家实行团结的方针，是在利用、限制、逐步改造这一道路上的团结，只注意安排不注意改造是不全面的。限制和反限制，改造和反改造，计划和反计划，破坏工农联盟，腐蚀党，破坏团结，所有这些都说明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复杂的。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该报告的

一部分以《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 下午，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晚八时，再次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晚九时，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会谈。

7月4日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协商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秘书长名单及大会议程。晚十一时后，毛泽东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和陈毅商谈问题，至次日零时五十分。

7月5日 上午，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作常委会工作报告，说明九个月以来常务委员会共召开了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案四十项，通过国家工作人员任免案三百三十起。报告主要汇报了已制定的法令、条例和决议，如：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修正草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一九五五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通过了《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关人员的决议》、《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关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和《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为便于审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派工作组分赴新疆、云南等地进行调查；刑法和民法正在草拟等等。

7月5日—30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会议议程是：（一）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审查和批准一九五四年国家财政决算和一九五五年

预算。(三)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四)通过关于治理黄河规划的决议。(五)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六)补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五日下午,在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常务主席,兼大会秘书长。随后,代表们按照选举单位分别组成三十三个代表小组,讨论五年计划草案。十六日下午,在大会上作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三十日,大会通过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和关于授权常委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会议还研究了各国议会联盟〔1〕的章程,决定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代表团,彭真为代表团主席。

7月6日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 晚十时,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听取韦国清〔2〕汇报工作。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

7月7日 中午,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胡乔木参加毛泽东同陆定一、罗瑞卿、谭政、邓拓的谈话。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举行的招待胡志明及所率越南政府代表团的宴会。后参加中越会谈公报签字仪式。八日晨,到机场为赴蒙古和苏联访问的胡志明一行送行。

7月10日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还

〔1〕 各国议会联盟,各国议会议员之间的国际组织,一八八九年成立。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苏联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先后决定参加各国议会联盟。

〔2〕 韦国清,时任国家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广西省省长、解放军公安部队副司令员、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一九五五年八月起,又任中共广西省委第一副书记。

有刘少奇、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

7月11日 晚，和周恩来等出席蒙古驻华大使奥其尔巴特举行的庆祝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四周年招待会。

7月12日 晚九时四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

7月14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罗瑞卿。

7月17日 将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十六日编印的《情况简报》报送毛泽东。这期简报反映：“最近几天来，马寅初、邵力子等在小组会上一再提出人口问题严重，要政府重视这个问题，并限制人口不要再增加，即限制在六亿人口左右。”彭真在简报后附拟发言的要点，请毛泽东批示。发言要点是：一、马尔萨斯人口论^{〔1〕}是错误的、反动的。（1）蒸汽机、电气，以及将来原子能的利用，同人和畜的动力的比较，现代纺织同手纺车的比较，现代钢铁厂同手工铁匠炉的比较，以及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不仅不是按算术级数，而且也不是按几何级数，这类质的飞跃发展，证明所谓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2）人口增加，增大了各种生活资

〔1〕 马尔萨斯（一七六六——一八三四），英国国教会僧侣，经济学家。他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认为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数列增长，而生活资料，以算术数列增长。因此，人口必定发生过剩现象，只有贫困和罪恶（包括战争和瘟疫等）、“道德的意志”（包括禁欲、无力赡养子女者不得结婚）可使生活资料和人口之间恢复平衡。这一理论曾被资产阶级用来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及其侵略和战争政策辩护。

料供应的压力，“但同时也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而人本身就是最主要的生产力。”（3）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穷困，并不能拿马尔萨斯人口论来解释，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现在，美国的工业品和农业品的生产都是过剩的，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并未超过生产增长率，但美国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却是穷困的。二、适当的节育，我们是赞成的，并且应给人民以节育的便利。但这都并不是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出发或者理解为可以同意马尔萨斯人口论。同时，节育、不节育，是由人民自己自由决定的事情，愿节育者节育，原多生子女者多生，人民完全有权利自由决定，国家现在决不能也不应该作出人口不能超过六亿的决定，强制全国人民节育。十八日，毛泽东批示彭真：“我认为你的意见是适当的。”

△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明日开会的问题。

△ 晚九时，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听取陆定一汇报十一省五人小组的情况。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张际春、宋任穷。

7月20日 下午，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访问苏联归国途经北京的胡志明一行。晚十时二十分，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同胡志明一行话别，至次日晨零时十五分。二十一日清晨，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到机场为胡志明一行送行。

△ 晚九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明日开会的有关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

△ 收到毛泽东对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

子的报告》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的批示。报告强调，没有一个大的运动和斗争，广东“内部不纯、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根本不能获得解决的”。毛泽东认为“此件很好”，并代中共中央拟电批转各地，要求参考广东的经验，彻底搞好坦白检举，扩大成果，务求在这次运动结束时能基本上解决一些主要工作部门的问题。

7月21日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开至晚十二时。

7月23日上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7月24日 听取中共北京市委高校党委关于高等院校肃反运动的汇报。指出：追查反革命分子要有根据、有道理。有反动言论的一般技术专家和有政治背景的人要有区别；已经坦白交代的与没有坦白交代的要有区别；反动的与落后的要有区别。要做好三件事：斗争反动的，号召坦白，发动检举，主要是斗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傅鹰^{〔1〕}要说理，跟他谈话，一次不行，可以两次、三次。

△ 分别致电各国议会联盟主席斯坦斯盖特、秘书长布隆内和各国议会联盟第四十四届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法格霍姆，通知他们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选派代表出席联盟第四十四届大会。

△ 晚十一时三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三十分。

〔1〕 傅鹰，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化学系教研室主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从美国返回新中国，是胶体化学专家，对教学改革和使用苏联教材有不同看法。

7月25日 晚，参加周恩来主持的酒会，招待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后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苏丹、日本、阿根廷、智利、巴西、古巴、哥伦比亚、墨西哥、乌拉圭、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十五个国家的和平代表。

7月27日 晚，到毛泽东处谈话。

7月28日 晚，到毛泽东处请示有关问题。

7月29日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子恢、陈伯达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 晚九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列席会议。

7月30日 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党组召开的党员代表第二次会议上，就应授权常委会适时制定一些单行法规，作专门发言。说：“宪法中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的立法机关，而且斯大林同志也这样说过。如果常委会也可以立法，立法机关就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了。”“斯大林同志的结论，根据苏联经验，在实际中已经作了修改。我们这一条也需要修改”，“授权常委会是必要的。”

7月31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8月3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罗瑞卿、陆定一。

△ 致信周恩来：日中友好协会东京都联合会和日本东京都政新报社社长曾分别来函，提出东京、横滨、京都、名古屋、大阪、神户六城市的进步人士拟和中国六城市开展互访活动。经与王稼祥商量后，拟以北京市长名义复函同意。七月三

十日，日方已组成六城市访华代表团筹备会，成员包括市政当局、议会议员、地方自治机构代表和专家、译员共四十五人，并要求参加我国庆活动。九月底来华，访问三周。我方拟由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广州、西安或重庆派员访日，现已开始筹备，何时成行待他们访华时看情况再定。八日，经中共中央同意，电复日方，欢迎日本六城市的代表来华，请将访问团名单、身份，访问计划及起程日期电告。

8月4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市委各部门负责人和区委书记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刘仁传达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精神。讲话指出：毛主席的讲话是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对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形势作了估计，批判了右倾错误。过去提自愿互利发展合作社，在步骤上还没有具体化。这次讲话不但一般地讲了阶级路线，而且讲了农民中的阶层分析，在发展合作化时，要把贫农和新中农中的下中农，老中农的下中农，先吸收进来，因为贫农生活有困难，下中农还不富裕，他们有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有了阶层分析，将有觉悟的农民组织起来，觉悟一批即组织一批，新老中农中的上中农，真正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可以吸收，但不要勉强把他们拉进。这样就有了步骤。我们郊区过去是没有明确阶层分析和发展步骤的。首先要明确思想，再确定发展和巩固合作社的计划。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要积极组织，训练干部，发展互助组特别是互助联组；已经发展起来的要充分巩固，一年整三次。这是个大仗，是向小生产者的私有财产开火。让农民对自己的私有制开火。要符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基本规律，搞不好，牛就卧倒，猪就死。要做充分准备，才能充分巩固，抓住这两条，发展合作社就没有危险。京郊的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增了产，党已有了领导经验，合作社比

较巩固，今年大发展没有危险。会后市委召集郊区区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进行讨论。规划今冬明春入社农户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七年春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左右，菜区快一些，今冬明春即发展到百分之八十。

△ 审改、签发中共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报告》。报告说：七月四日开始，在全市四百八十个单位约十一万五千人中，先后开展坦白检举运动。首先从高等学校学生中发动，按先干部、知识分子，后国营厂矿工人、店员的程序，分批逐步开展。市委机关现正对“重点人物”开展思想斗争，国营厂矿、建筑单位干部亦已进入坦白检举阶段。斗争一般是从讨论《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问题材料〔1〕入手，然后进入坦白检举。通过查言论、行动，群众斗争，都发现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反动小集团”。报告总结说：运动初应当批评、纠正个别埋头业务、不问肃反的错误领导；群众发动后，情况可以判明时，如仍不区别对待，“一律趁热往下打，就会犯轻重不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市委预计，全市将有五十四万人参加运动，党、政、群机关十月底大部可告一段落。

△ 收到周恩来关于出席各国议会联盟大会代表名单和理事名单问题的批示。此前，曾致信周恩来：出席各国议会联盟大会的代表名单和理事名单，只是通过备用，暂不对外公布。需要时通知联盟。周恩来批送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阅：拟予同意，略有更动。当日，退彭真办。

8月6日 主持中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大会的人民代表团

〔1〕指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先后公布的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组成了中国全国人大出席各国议会联盟第四十四届大会代表团，彭真为团长，程潜、廖承志〔1〕为副团长，朱学范〔2〕等十三人为团员。本届联盟大会定于八月二十五日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主要议程是“各国间的真正和平共处”。十九日，代表团秘书长和代表吴文焘前往芬兰。

△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早日决定首都发展规模向中共中央的请示稿。请示说：苏联专家组四月底到六月底比较系统地搜集与整理有关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工作的基本情况，第三季度开始将着手修改一九五三年制定的规划草案，争取年底提出新的规划草案。但首都发展工业规划和人口发展规模至今未定。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限内许多规划项目缺乏必要的依据。在工业规模中，首先是石景山钢铁厂是否扩建，规模多大；其他工业规模如何，希望中央决定。十二月十二日，国家计委、建委在向中共中央的请示中提出：从国防条件来考虑，今后不宜在北京搞大型的或过多的工业。两三个五年计划期内，除对现有工业适当地改建和扩建外，适当地建设少部分中小型工业，具体项目由国家计委在研究长期计划时尽先拟定并报中央；今后十五年左右北京市规划区人口控制在三百五十万左右，包括京西矿区、长辛店等地的规划区内外估计为四百五十万左右。为避免城市无限制发展，五百万人可作为远期（四五十年）的控制指标。

〔1〕 程潜，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

〔2〕 朱学范，时任邮电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

8月14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一）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资本主义企业，量最大的是农业，涉及五亿人口改变生产关系。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有人强调第一步是技术改革，先搞拖拉机、电气化，即先机械化，后集体化，这是方针上的右倾。（二）我们夺取政权后，敌人混进内部，就会有好多机关被篡夺领导权，堡垒最容易被内部夺取，所以要开展机关肃反。“农业不改造，革命要失败；肃反不彻底，机关危险”。

8月15日 晚，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毅、李富春、陆定一、罗瑞卿等在北戴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中美会谈〔1〕及中央十人小组〔2〕工作等问题。

△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准备工作向中共中央的报告》稿。报告说：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文章，正分送十三个人的小组进行审阅，对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尚须先在党内加以讨论，并须请有理论修养的同志加以审定，拟于本月底下月初定稿并在报上发表，“展开这一学术的思想斗争”。

8月16日 收到毛泽东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阅的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

〔1〕 指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中美两国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谈。随后，双方就遣返侨民及有争议的其他问题进行了七十三次会谈。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中断。

〔2〕 指一九五五年五月成立的“中央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五人小组”，组长陆定一，副组长罗瑞卿。同年七月，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任务扩大为处理全国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的问题。

告，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各地参考的电报。电报说：“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并认为辽宁省委整社建社扩社的各项准备工作是适当的，即“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积极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逐级做好发展社的全面规划，特别是着重解决村一级（按：即乡一级，东北各省还未改称乡）合作化的阶级规划；继续做好现有社整顿巩固工作，进一步贯彻合作化的具体政策，审查、清理和纯洁合作社的组织；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打好建社的基础；把整社建社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密切结合起来。”

8月17日 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房屋建筑中贯彻执行中央厉行节约指示的情况和办法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今春以来，在房屋建筑中大屋顶已停止修建，琉璃瓦、大理石、赤金等极其贵重的建筑材料已停止使用，豪华富丽的装修已经削减，琉璃瓦厂亦已停闭。六月初传达中央关于在基本建设中厉行节约的指示后，削减的非生产性建筑占北京地区本年全部建筑任务的百分之五，市属各项工程六月底统计平均节约投资百分之十。但也发生了一些主观片面、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毛病，如因修改不适当设计造成材料上新的积压浪费，不适当地减少墙体厚度、房屋高度、采光面积，不适当地降低建筑层数甚至在城区及其附近大量修盖平房等。市委已指示市人委主管负责人召集有关部门，商议平衡调配材料、制订一批标准设计等办法。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北京市委的报告，对下一年在北京的建筑任务，指示由北京市人委协同有关单位协商解决。

△ 晚，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听取陆定一汇报中央十人小组会议情况。

8月19日 下午，在北戴河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8月22日 凌晨二时，向毛泽东汇报关于参加各国议会联盟会议问题。中午，向中共中央呈送派代表团参加各国议会联盟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一）各国议会联盟是一个半官半民、官多于民的国际政治性的上层统战组织。美国将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斯蒂文森和杜鲁门时的副总统巴克莱等参加。（二）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是：“团结中立（中立国和中立议员），分化西方，争取动摇，影响群众（主要是资产阶级影响下的群众），孤立美帝。”即坚持原则，求同存异，争取多数，孤立美帝。一切活动包括大会发言和其他各种活动的着眼点必须是面向中间分子，面向除帝国主义死硬派以外的全体议员和广大群众（包括左中右），并在会中广泛邀请各国议员访华。（三）我们参加的好处是，抵制台湾参加，有利于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席位，还可以做一些国际统战工作。（四）这次我们参加联盟的可能性较大，联盟主席、英国工党人士斯丹斯盖特勋爵迫切希望我们去参加大会，再三告诉宦乡〔1〕说美国反对不强烈；美未坚持反对我参加联盟秘书处；联盟过去已拒绝台湾参加。但不去的可能性也有，如美国操纵执委会否决我参加，就闹到理事会，理事会否决就闹到大会，最后总要接受我们参加。我们已派代表团秘书长和代表吴文焘于二十二日先赶到赫尔辛基，全体代表出发时间要看执委会、理事会和大会决定情况，早则由执委会通过，二十四日起程，晚则等大会通过，二

〔1〕宦乡，时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代办。

十六日出发，争取两天赶到。因周恩来总理去官厅水库，尚未向他请示，如他有不同意见，再另报中央。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有关中国代表团参加各国议会联盟会议的问题。

8月23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收到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批示说：“此件已根据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讨论，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谈建社准备工作一段和谈苏联经验的两段，其余都是文字方面的修改。请你们收到后一、两天内看一下，提出修改意见，于八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退还给我为盼！”

8月24日 上午，向周恩来汇报我出席各国议会联盟大会代表国先期赴会的代表吴文焘自赫尔辛基来电话报告的情况：今天上午联盟开执委会、下午开理事会，要讨论中国和东德参加的问题。看来此次会上要求联盟明确否决台湾，由我为中国参加联盟的唯一代表，可能性已很小。经与周恩来等商讨，下午五时，将商讨的初步意见报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认为现在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理事会决定接受我申请，对台湾以“条件、手续不完备”为理由拒绝其申请。如此决定，我将出席联盟的会议，并在会内斗争，宣布只有我们有权代表中国。这样，将会出现“联合国有蒋无我”，“联盟有我无蒋”；在联合国须驱逐蒋，在联盟须解决蒋的斗争局面。另一种可能是因美国坚决反对，拖下去，此次大会不解决我参加联盟问题。“以上均系在周恩来领导下确定的，请批准”。二十五日，经邓小平阅后，以特急电报毛泽东。

8月28日 致信各国议会联盟理事会主席斯坦斯盖特和联盟第四十四届大会主席伦纳特·希尔加斯，严正抗议由于美

国等少数联盟执委的坚持反对，执委会竟然决定拖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团参加联盟。这个决定完全违反联盟的宗旨和章程，是非法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团能够代表中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而有人企图用暂时搁置我国代表团参加联盟的办法，来实现其所谓“两个中国”的阴谋。这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二十九日下午，先期到达赫尔辛基的中国人民代表团成员李一氓在记者招待会上散发彭真的抗议信。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的严正抗议》的社论。

8月29日 下午四时，会见途经北京的以第一团长北村德太郎和第二团长野沟胜为首的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就发展和加强中日友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晚，举行酒会欢迎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和以久原房之助为首的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访华团。

8月31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邓子恢、陈伯达收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农业合作社耕畜、农具、土地、劳力、社员投资、自留地、副业等十个问题处理办法的报告写的批语。批语说：安徽省委尖锐批判农业合作运动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完全必要的，所提出的十个具体意见“应当提到全国各省市各自治区，在适当的会议上加以讨论，征求意见，并于国庆节以前报告中央”。

9月1日 晚，出席文化部举办的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会。二日晚，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举行的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招待会。

9月3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会议遵照国务院颁布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讨论北京市按人定量供应标准问题。发言说：（一）粮食定量供应是个大问题，还是先在一两个区内进行典型试验，找出问题，再合理解决。

外国实行定量都有高价粮作补充，我们无高价粮，定死了，出了问题，就手忙脚乱。（二）按国务院的暂行办法，北京市在典型试验的基础上，搞一个实施细则，提交市人民委员会通过就可以了，不必拿到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去讨论，不应各部门都可以立法；报纸也不必公布。将要召开的市人代会第三次会议，主要是就计划用粮进行政治动员，交代政策，听取反映；从积极方面，反对浪费，防止走漏，和遣散盲目入城人口、闲散人口。

△ 晚，出席刘少奇为前来北京接运日共已故总书记德田球一遗骨的日共中央委员志贺义雄和德田球一夫人德田达举行的宴会。

9月4日 和周恩来、陈伯达、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收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写的批语。批语指出：在农村中“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的口号，“要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而目前团结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强迫他们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此外，在农村中首先应依靠党团员；第二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更积极一些分子，这种人应当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应当努力训练出这样一批人；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这个依靠什么人和如何依靠法的问题不弄清楚，合作化运动就会犯错误。”

9月5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会议，讨论准备在市人大一

届三次会议作的政府报告稿及其他议题。讲话说：（一）关于预算报告，问题在税收，中央规定的任务是三亿四千万元〔1〕，市税务局只能完成三亿一千万元，原因是私营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税收减少了。但国家已定的任务不能改，所以，提请大会通过的只是北京市预算二亿一千万元，其余的部分，市无权决定，只能说在消灭偷漏税的原则下完成税收任务。（二）粮食定量供应，国务院颁布的是“暂行办法”，我们只能通过典型试验，搞实施细则，不通过决议。因为形成决议后，将来修改也得通过大会。会上只能是发言，说明粮食合理供应的必要性，以及先在东单和石景山两区典型试验的情况，稳定人心。（三）清查暗藏的反革命问题，也只能是发言。一是不要长敌人的志气，二是不要轻视敌人，三是要以事实说明，凡是我們麻痹大意，丧失警惕的地方，敌人就乘机活动。许多反革命都是从外地投亲访友来北京的。要大家提高警觉，不要包庇。至于那些资产阶级和土豪代表，只要在群众中揭露了他们的面目，就没有大危险了。科学家中，有的专心研究，干工作，对共产主义缺乏认识，只要爱国，不和特务勾结，讲点怪话不要紧；宗教信徒中，只要守法，信仰问题是吵不清的。领导国家，总要从大的方面着眼。当然，搞反革命活动是不允许的。干部中急躁情绪要防止。（四）对市政府的报告稿，认为自我批评不够，建议由几个副市长，集中力量修改，三天内完成。会议还研究了将于下旬来访的日本六大城市代表团的接待问题。

9月6日 晚，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谭震林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

〔1〕 这是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的新的人民币数额。

议草稿和《农业合作化示范章程（试行）草案》。出席会议的还有陈伯达、杨尚昆、廖鲁言、胡乔木、田家英。

9月9日晚，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宋任穷〔1〕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有关授元帅军衔以及陆定一关于肃反运动中一些政策问题的请示。

△ 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邓子恢、陈伯达收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同意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电报。报告提出：一九五六年春播前，全省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三，到一九五七年冬季前，发展到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另计划在一些老区试办几个畜牧业和林业合作社，并把几个基础好的社试办成高级社，摸索经验。

9月10日 致信杨尚昆，转陈伯达、胡乔木并报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草案提出修改意见：（一）对农村的阶级、阶层，按照新的革命阶段和目前实际情况作新的分析的意义，最好再讲得清楚些。因为这仍是党内思想上比较混乱的问题。（二）合作社对于劳动力可以合理地、经济地组织和使用，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决议中也可提一下。（三）大发展后，在一个时期即暂时以巩固工作为重点，不是右倾，是必要的，也可提一句。巩固和发展是相结合的，已建的社办好或办不好，在生产上能否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对于吸引和推动未入社的农民入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农民是很实际的。（四）高级社，在“机耕”前，不可能普遍地发展，这点必须肯定，在决议和章程中已讲得很清

〔1〕 罗瑞卿，时兼任公安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宋任穷，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

楚。但在互利和社员真正自愿的基础上所办的少数高级社，也可允许并好好加以指导。（五）合作社的账目不清和贪污、浪费，对于社的发展和巩固，对于社员的团结和劳动积极性的发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障碍。因此，我觉得除了社要成立监委和规定及时公布账目的制度外，县区两级政府应该设置经常的机构，负责指导建立合作社的会计制度，巡回地检查账目，检查和反对贪污、浪费，并在大的合作社中设立不脱离生产的检查通讯员。对于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的果实，被人贪污、浪费或者分配不公，对于社员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六）社员退社时，公益金应确定不带，已经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公积金也应确定不带，但为了防止发生副作用和给农民退社以若干自由，对于本年度的未变成生产资料的公积金，可以让他带走。这样的事不会多，但如果发现某社有不少社员要求退社，也可以促使我们注意，及时发现问题。（七）地主、富农原来的阶级意识是很难消失的，他们的破坏和捣鬼的办法是很多的。因此，我觉得除了暂时一般地不吸收他们入社外，在将来入社后也可以在相当长的期间（如三个五年计划）只给他们选举权，不给他们当社干部的被选举权为好。（八）在决议中，是否把合作社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管委、监委由社员选举，并受社员监督，由他们罢免，向他们报告工作，每年改选一次等原则也写进去。因为这个决议是一个全面的根本性质的决议。请斟酌。

9月11日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大学发动教授参加肃反斗争情况和做法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北京大学教师中的肃反运动于七月二十九日开始，八月二十九日告一个段落，参加运动的教授、副教授二百零四人，斗争和重点审查的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八。运动中，（一）清查重

点：一是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二是有相当材料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三是解放后言行一贯反动的分子，四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对历史上有重大政治问题但已交代清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已经清理和学术上有资产阶级观点的教师，不作为斗争对象。（二）放手发挥教授中各种积极分子的作用。在三十几个清查小组中，有十八个小组长由非党教授担任。通过态度积极的教授，联系中间分子，帮助有历史包袱的人。（三）坚持有理有据的斗争，不乱扣帽子。那种不凭事实，“只是由少数积极分子急躁前进，图快”，使一般教授跟不上的做法，是会脱离多数的。（四）对重点的斗争和审查对象，要反复地调查摸底，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的报告供各地参考，指出：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不但要达到查出反革命分子的目的，还要达到使更多的高级知识分子靠拢我们，由中间落后分子变为积极分子的目的。这对于今后高等学校的改造工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晚，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宋任穷、杨尚昆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元帅军衔和农业合作化等问题。

9月12日 下午，和首都各界五千多人前往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悼念日本共产党领袖德田球一，并送花圈。十三日上午八时，主持德田球一追悼大会。会后，出席在西郊机场举行的德田球一遗骨回国告别式。

9月14日 致信周恩来，请核定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及文字排列方案，并就碑文内容说明：“政协决议本文，在‘人民英雄’上冠有‘为国牺牲的’五字，标题上没有这五个字；同时为了同毛主席所题字一致，似以取掉此五字为好。”对第

一行说明：“这一行将来排一行或两行，待写出排上再定”。对落款说明：“因为碑文系政协通过，‘书’字有些同志认为应该要，但也有的同志认为可以不要。”

9月15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会议约请副市长吴晗、王昆仑列席。在会上说明：今天讨论的内容和他们分工分管的工作有关。关于召开北京人代会一事，讲话提出：（一）确定下周一开会。粮食定量搞一个实施细则，不必提交人代会，交市人委通过即可。市的五年计划是国家五年计划的组成部分，待中央计划制定后，市人大再讨论贯彻措施。（二）涉及有关副市长工作的发言，以表扬为主，肯定成绩，也要指出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卫生局的工作应批评，工作缺乏生气，领导存在“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差不多思想。但群众卫生工作成绩很大，各医院很多干部也很努力。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做好粮食定量工作和肃反。（三）日本六大城市访问团要来。对日本我们要做工作，争取它以孤立美帝。群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很深，但不能感情用事。要耐心争取来宾，当然不是无原则地迁就。（四）国庆节参加游行的人数原说减到三十五万，现为四十五万人。群众参加是有政治意义的，人不宜搞得太少了，能够在三个多钟头内通过检阅台就行。

△ 下午五时，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会见荷兰共产党总书记格鲁特，谈话后设宴招待客人。

△ 和刘少奇致电日本众议院益谷秀次议长、参议院河井弥八议长，邀请日本国会议员团参加中国国庆六周年庆典。电文说：“日本国会议员团参加中国国庆观礼对于促进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有所裨益”。

9月17日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准备报中共中央、中央十人小组的给市级各部门肃反小组、各区委的《关于肃反斗争中

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稿。指示说：七月初开始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已在全市机关、工矿、建筑企业、大中小学教职工、高校在校学生和高中毕业生十六万三千人中开展，目前，大中小学十万人中的斗争已告一段落，其余单位正在深入开展中。即在群众揭发的基础上，逐步由群众斗争转入调查研究定性的阶段。由于一度斗争“顶牛”，干部群众开始滋生急躁情绪，有的单位出现违反政策的现象。为推进运动健康发展，需解决几个主要问题：（一）系统研究审查对象的情况，对有反动的言论，无反革命行动线索者，斗争适可而止；确有反革命重大嫌疑的，应进行专案调查；证据确凿者，酌情处理；属于政治历史问题，一时难以弄清者，在审干中解决。（二）进一步交代和实际体现宽严相结合的政策，树立宽大处理的典型，争取审查对象坦白交代。（三）工矿、建筑企业、医院中，要追查过去发生而未查明的重大事故。（四）坚决纠正和防止逼供、诱供和一切侵犯人权的现象等。

9月19日—21日 出席北京市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张友渔关于北京市一九五四年财政收支决算和一九五五年财政收支预算的报告，程宏毅关于粮食供应问题、冯基平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工作、吴晗关于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工作的发言。二十一日下午，作总结讲话。关于郊区农业合作化问题，指出：今年春天，郊区农业合作化一度达到农户的百分之五十，不过那时有些毛病：如牲口入社不折价，大农具入社折价很低，而且有的五年十年才还本，还有的不给利息。这是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中农是自己人，又没有剥削，侵犯中农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还有，办土地不分红的高级社，这是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土地不分红对劳动力多和强的有利，对劳动力少和弱的不利，这就造成农民内部的矛盾。由于

侵犯了中农利益，中农不愿意，也就违反了自愿原则。但经过整顿后，现在已有百分之四十六七的农户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了，这是很大的成绩。过去发展中，对阶级路线不明确，现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贫农要积极入社，中农应该分为新中农和老中农，新、老中农中间又分为下中农和上中农。要把贫农和新老中农中的下中农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比原来收入多，他们就有积极性。凡是不愿意入社的上中农就不要拉进来，过几年后再搞。富裕中农不愿意入社，也可以等两三年。富裕中农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应该等待，估计两三年后富裕中农也会入社。现在，郊区要作全面规划，积极稳步地发展，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百分之八十左右农户合作化是可以做到的。

9月23日 上午，和陈叔通会见法兰西共和国参议员埃德蒙·密歇勒、利奥·阿蒙、雷纳·昂扎贝尔、贝纳尔·绍什瓦等。在谈话中指出：中法两国正常关系还没有恢复，但两国人民的友谊有深厚的基础，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恢复外交关系对两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都是有利的。我们一方面爱护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也愿意学习别国的文化。过去中法两国有过较多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我们很愿意这种联系能够恢复和发展起来。

9月25日 上午，会见由团长北岛义彦率领的日本六大城市访华代表团。代表团由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的都议会、市议会议员、市长、局长、专家等四十七人组成，代表民主党、自由党、左派社会党、右派社会党、共产党、无党派和其他党派人士。

△ 晚，为代表团举行宴会。在宴会上讲话指出：中日两国是近邻，人民的友好和经济文化来往应该不断地发展，两国

关系应该正常化，这不仅符合中日人民利益，也有利于远东与世界和平和符合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中国人民和政府 在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方面，一向是采取积极态度的，不断地作了很大的努力。日本的人民，日本不少的民间团体和半官方团体也已作了很多的努力。日本政府也应该对此采取积极的态度和作相应的努力。

9月26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彭德怀、邓小平列席会议。

△ 下午，会见意大利妇女代表团，会见后设宴招待客人。

9月27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军队授衔、授勋问题。会后即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礼。在会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命令。

9月28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出席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闭幕会。

△ 下午，到机场迎接来华访问、参加中国国庆节观礼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访华团由日本众议院议员上林山荣吉率领，团员包括日本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议

员。晚，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设欢迎宴会招待日本客人并致欢迎词。指出：这次日本众、参议员们来中国访问，将有助于促进和发展中日两国间的友好合作、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和两国关系的早日正常化。二十九日下午，参加刘少奇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

△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陆定一关于各省肃反运动情况的汇报。

9月29日 上午，分别会见参加国庆典礼的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越南和朝鲜等地华侨回国观光团团长及波兰军队歌舞团领导人兹·沃尔瓦中校、特·拉特科夫斯基上校、谢·鲁达上校等人。

△ 下午，到机场迎接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及夫人。

△ 晚，出席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员和应邀来中国访问和参加国庆节观礼的各国来宾的宴会。

9月30日 晚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10月1日 上午十时，出席首都各界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群众集会游行。

10月2日 上午，和周恩来等会见日本六大城市访华代表团。

△ 下午，出席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

△ 晚，主持联欢晚会，招待参加国庆节观礼的各国来宾，并致欢迎词。晚会后设宴招待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缅甸联邦文化代表团、日本歌舞伎剧团、波兰军队歌舞团、苏

联艺术家代表团、南斯拉夫“科罗”民间歌舞团等六个国家艺术家们，并在宴会上致词。

△ 晚，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开幕的世界各国首都市长大会议致贺电。四日，致电会议发起人意大利佛罗伦萨市长皮拉，说明因为时间匆迫，本人不能出席会议，特委托现正在意大利的中国艺术团团长、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代表参加，并向皮拉市长祝贺会议成功。五日，会议闭幕，通过决议，呼吁世界各国只能通过和平的、建设性的谈判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发展和加强各国间有益的关系，以进一步发展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和平的联系，为全世界人民建立一个公正的、稳定的和真正的和平。

10月3日 晚，出席周恩来为招待以吴登貌为首的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和以吴温为首的缅甸联邦文化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四日晚，出席缅甸联邦大使吴拉茂为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文化代表团、军事友好代表团、邮电代表团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五日晚，出席朱德为欢迎缅甸军事友好代表团全体团员，并欢送即将提前回国的代表团团长、缅甸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奈温中将举行的宴会。

10月4日—1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还通过了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八大代表名额和代表选举办法的规定。十日，在会上发言说：目前，我们“在农业生产同工业生产的配合方面，关系是相当紧张的”，在农村中“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很尖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农村中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将总是相当紧张的”，它本质上都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大工业、大农业生产方式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

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前些日子，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过程中，在富农影响下，一部分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抓住少数农民宰杀猪羊耕畜，生产不积极等现象，叫嚣“合作化影响了生产，破坏了生产”，而各种反革命分子则乘机加紧破坏活动，使农村空气很紧张，“他们实际上是借此来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分散的小农经济是抵抗农业改造的社会基础，“而且在党内有它的支持者”，不但农村党员和乡区干部中有，“上级干部中间难道就没有这种情况吗？决不是的”。有些同志对合作化就没有像对待土改那样积极和热情，而是“冷淡”、“抵触”，不惜加以“砍掉”、“缩掉”。发言稿九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此件很好”，并作三处修改。在发言稿讲到应该知道农业的优点和缺点处加写：他们“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这样两方面的情况，了解他们有保守性、但是他们的这种保守性又是可以被说服而加以改变的这样两方面的情况。”在批评有些同志曾经主张“四大自由”〔1〕处加写：“这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纲领，这是一条明显的富农路线，这是同我们党的限制资产阶级和限制富农的路线完全不同的。他们不是限制资产阶级和富农剥削自由，而是用法令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可以进行无限制的剥削，并且加以提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个最后彻底消灭农村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一句后面又加写了：“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城市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10月7日 中午，出席全国政协为欢迎世界和平理事会

〔1〕指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

副主席、意大利和平理事会主席、社会党总书记彼特罗·南尼和他的夫人，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波兰物理学家英费尔德和他的夫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英国和平委员会会长普里特和他的夫人，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兼书记处书记、比利时的布伦姆夫人举行的宴会。

10月11日 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闭幕会。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

10月12日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石景山钢铁厂和石景山发电厂精简编制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稿。报告说：经中央批准的两厂精简试点工作初见成效，精简人数约占两厂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预计全年将提高劳动效率百分之二十八。精简的步骤：先在干部中交代方针，研究机构编制中的问题，拟出初步方案，然后发动群众讨论，从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上提出改进意见，确定精简方案。具体方法：减少冗员；取消或合并机构，减少层次；减少不必要的公文报表和统计。为不使工人失业，对精简下来的人除老弱的安排轻活或退休外，其余的组织文化技术学习，或输送给新建企业。石钢的工人有一半只有初小一二年级水平，亟须学习提高。办法是：三班制的工人，改为四班，每班抽两小时学习；一班制的职工，在保证完成任务后，每天在职学习两小时，干部则轮流短期学习。这样，一旦新建企业需要，可以整班抽调；在岗职工乘机提高业务和文化水平；被精简的职工没有“不光荣”的思想包袱。

△ 审阅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关于动员盲目流入本市的农村团员和青年还乡生产向中共北京市委的请示报告》。报告反映：流入北京的农村青年约有七万二千人，大多来自河北顺义、通县、武清、三河，也有来自山东、山西等地，其中以高小毕业生最多，多是来京谋职、打工，投亲靠友，或因地

方受灾，生活困难。为减轻城市负担，安定社会秩序，团市委提出应坚决教育动员他们回乡生产。采取的办法：一是团员带动来京青年共同还乡参加生产。二是通过报告会、报纸、广播等形成舆论，并请他们寄居的亲友督促和动员。三是请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及团省委通知有关的区、乡人民委员会和团支部，给盲目来京的青年写信，劝勉他们还乡，并给以协助和安置。四是对还乡青年中路费确有困难者，建议由北京市民政局给予一定帮助。经过工作，除已就业、就读的青年不必勉强他们还乡外，估计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是可能返乡的。阅后批写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见，指示各单位党委：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进行充分的、耐心的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防止简单化和生硬的做法，并应有负责干部亲自动手，在一两个区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切勿草率从事。同时要与有关省、县党政机关联系，取得他们帮助。

10月15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开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射击与体育检阅大会。

△ 下午五时，陪同毛泽东等会见以上林山荣吉为首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双方就中日友好亲善、和平、邦交正常化、中日贸易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十六日晚，出席刘少奇为即将离开北京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举行的饯行宴会。

△ 收到毛泽东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康生、张闻天阅的经他修改的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稿。毛泽东批：请收到即看，于十六日下午二时以前看完，注明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再作修改，“十六日下午交我为盼！”

10月16日 下午，应约同毛泽东谈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情况，并一起修改刘少奇准备当晚在欢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

团宴会上的讲话稿。

10月17日 晨六时三十分，应约同毛泽东谈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名义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团长上林山荣吉的联合公报问题，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 将审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彭真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团长上林山荣吉的《联合公报》稿送刘少奇核定。晚七时三十分，和刘少奇等出席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签字仪式，并交换了文本。公报是根据毛泽东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双方商定的，主要内容是：（一）中日两国应为实现邦交的正常化积极努力。（二）日本按巴黎统筹委员会〔1〕的规定对中国的禁运物品越来越多，必须予以变更，并且必须以迅速废除它为目标而努力。（三）在两国首都举行的商品展览会作为常设的机构，处理有关双方贸易的联络事务，双方互派的人员予以应有的保护等。（四）努力增进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五）积极照顾双方侨民自由地来往本国。（六）两国应继续把双方死亡者的遗骨尽速地送还其本国。（七）中国方面表示，处理战犯是属于中国主权的事，最近期间将把处理战犯的结果公布。

10月18日 晨六时三十分，到机场为经广州返国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送行。十七日，访华团致信彭真等表示：与周恩来、彭真等的恳谈加深了日中两国间的理解，对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是有很大帮助的。回国后要为两国邦交正常化而努

〔1〕 巴黎统筹委员会，又称“向共产党国家出口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成立，专门检查和管制西方国家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贸易，禁止向其输出战略物资的组织。

力，同时要努力实现邀请彭真及中国各大城市代表访日等。十九日，上林山荣吉在离开中国深圳时发表书面声明说：今后日中两国的有关人员应当为这一联合公报的实现而积极努力。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努力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社论。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臻、陈赓^{〔1〕}、谭政、黄克诚^{〔2〕}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有关抗登陆演习和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的名单等问题。

10月19日 下午，在最高国务会议开会前和周恩来、陈云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谈话后，出席最高国务会议。二十一日下午，继续出席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肃反、外交和工商业改造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议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视察。

10月20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北京市郊区发展合作化运动的全面规划问题。讲话指出：（一）七月我在党代会上讲当前要集中力量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是右倾。毛主席讲省市有权关闸、压缩脑筋。春天停止发展、全力巩固是需要的，缺点是缺乏全面规划，对依靠贫农、新下中农和老下中农不够明确。这一段巩固是有成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都增了产。这次毛主席在结论中作了补充^{〔3〕}，强调了质量，明年开会要比质量，质量首先就是增产。首都的农业发

〔1〕 陈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政治委员。

〔2〕 黄克诚，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3〕 指毛泽东十月十三日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三次修正稿中，在第三节、第四节中都说了注重质量的问题。

展规划和一般地区不同，一要蔬菜、副食品生产及绿化相结合，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二要随着农业机械化进程，扩大合作社的规模。（二）都市规划，要为工业发展留下余地，要有国防观点。有轨电车损坏道路，都要迁到城外去，城里发展无轨电车，办无轨电车厂。电车票价不要太高，以利减少自行车。地方工业，不要盲目发展，要发展有特色的、质量高的工业，产品出口可换外汇，有前途的可以合营。（三）私商的改造，现在是一行一业地安排，维持，很被动。应该按居民区、工人住宅区、学校区有计划地布局，为民服务，如油盐店、杂货铺要分布均匀，摊贩可以通盘考虑。公私合营，赚钱少了资方不干，工资低了店员不满，要进行教育，不能强制，要从批发上控制，先维持，为合营做准备。合营首先是搞掉私商的无政府主义，有些私营商店的品种、特色应当保持，不要只经营大路货，总得有人经营小路货，方便消费者。手工业也要组织合作社，按规划生产，组织消费者协会，监督生产，防止偷工减料。（四）中学按地区布局，划区设立；小学靠近居民区建立，使儿童上学不必过马路；托儿所要办日托，标准高、费用大是没有群众观点。医疗要分级，划分就诊区域，费用太高的问题要解决，要检查几个医院的挂号费、医药费。公园除中山、北海、颐和园外，可考虑不收门票。门票收高了，许多人进不去，就产生阶级路线问题。

10月21日 凌晨一时十分，向毛泽东汇报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后的一些情况反映。

10月23日 下午，参加毛泽东等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团长拉鲁·策旺多吉、副团长安钦·定结活佛、仁钦顿珠，西藏青年参观团团长桑颇·登增顿珠、副团长才旺多登、悦希凭卓和两个参观团的全体人员，及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大会

的达赖喇嘛代表台吉噶雪·却吉尼玛。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对工商界的宣传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张际春、邓拓、徐冰、陈伯达等。

10月25日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召开座谈会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十六人。

10月26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全体会议（扩大），和刘仁传达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精神。讲话说：（一）去冬今春郊区合作社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后来强调整顿巩固也是正确的，主要缺点是大发展中发生过“左”的偏差，如土地不分红、牲口折价还本期过长等办法侵犯中农利益；办大社过多而干部群众经验不够。产生偏差的原因是搞社会主义热情很高，但没有好好研究郊区的具体条件。去年十二月起到今年一月间，市委开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为此市农委二月写了报告，市委转报了中共中央。但也受到过右的影响。五月市农委经市委同意传达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后来受到毛主席批评的“错误”的东西，如一五计划期间只发展三分之一的农户入社。我当时忙于组织全国人大代表下乡视察，未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因此在党代会结论中只说现在停止发展，集中巩固，再一翻就是百分之九十多，使郊区干部思想上有些混乱。现在是非已经明确，要告诉听过五月传达的干部哪些是错误的，使他们头脑清楚，但不要批评下面的干部。（二）按现在的发展速度，今年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百分之八十也打不住，需要控制在百分之七十比较适当。控制的方法是按毛主席指示的根据阶级成分发展，一两年内首先是发展贫农、新中农中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

的下中农，他们经济上差别不大，热心社会主义，依靠他们把社办好，建立起贫下中农的领导骨干，然后吸收上中农，最后分批接收地富分子。（三）各项工作要全面规划。经过研究搞一个大体正确的规划，对工作有利，也便于检查。郊区的规划要适应市政建设的需要，应较早地实现农业机械化。订规划要有国防观念，工业基础还是原来的，有些落后的工业要淘汰，新建工业项目适当分散。商业也不能都集中在前门，应按照都市规划的居民区适当分布，重新部署。卫生、教育等都要有全面的规划。讲话中再次肯定梁思成政治上是拥护党的。他搞的建筑设计也不能都怪他，党内有些干部也该站出来自我批评。会议于十一月四日结束。

△ 晚，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在新落成的北京体育馆举行的印度国家排球队来华访问比赛开幕式。二十八日晚，又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出席观看印度国家排球队同中央体育学院排球队的友谊比赛。

10月27日 零时三十分，毛泽东约谈关于邀请工商界人士谈话问题。谈话至零时五十分。

△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十六位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他们是陈叔通、章乃器、荣毅仁、郭棣活、盛丕华、胡厥文、胡子婴、刘靖基、李烛尘、周叔弢、胡子昂、黄长水、巩天民、陈经畲、韩

望尘〔1〕、乐松生等。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听取彭德怀汇报朝中美三方面军事代表团会谈情况。

10月28日 收到毛泽东上午八时致彭真、邓小平信。信中说：明天下午四点勤政殿的会〔2〕，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内容是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10月29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到会的还有中央领导人和在京的中央委员等共五百多人。会场由勤政殿改为怀仁堂。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改造有两种方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

〔1〕 郭棣活，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监察委员会委员。盛丕华，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胡厥文，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胡子婴，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商业部副部长。刘靖基，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市政协委员。李烛尘，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周叔弢，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副市长。胡子昂，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黄长水，时任广州市副市长。巩天民、陈经畲、韩望尘，分别为辽宁、湖北、陕西省工商界人士。

〔2〕 指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

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方法，是经过许多过渡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时候我们再议嘛。”这就是国有化，它是逐步实现的。届时对资本家政治地位、工作岗位，都会有安排，统一战线还是要的。毛泽东号召大家安定情绪，多做好事。

10月30日 下午，陪同毛泽东等出席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志愿体育协会足球队在中国访问比赛的开幕式，并观看了比赛。

△ 下午，参加刘少奇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团长丹尼埃·麦耶，团员莫里斯·富尔、让-雷蒙·弗吕希埃和雷纳·库恩。十一月四日晚，设宴招待法国议员代表团并致词。

10月31日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邓子恢向毛泽东请示的几个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邓子恢、陆定一、王稼祥。

11月1日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11月2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在讨论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时说：统购包销、加工订货是改造的第一阶段，公私合营是第二阶段。全市加工订货的私营企业已占百分之八十，合营企业去年占百分之十三，今年预计增至百分之二十七。这就快解决了一半。公私合营是大户好办，但北京大企业不多，中小企业的合营或一个国营厂和几个私营小厂合营，或联合成公司，要组成几个小组研究具体办法，不能简单抄袭上海的经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中央定的，地方要搞典型经验。

11月4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精神，进一步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

题。下午，在中共北京市委全体会议（扩大）闭幕会上作总结讲话：（一）去年合作化高潮中，郊区入社农户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这不是冒进，但有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向，二月间我们说一定要扭转这种偏向。从二月会议到秋收，集中力量巩固，不巩固不能前进。这和全国范围“停止发展”是不同的。五月传达了一些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东西，思想有点乱，宛平矿区把七个小社改成互助组，共二百多户，从整个工作看，影响不大，成不了机会主义。事实证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是增产的，已培养了一批骨干。现在思想一致了，主要解决当前的问题。（二）要依靠贫农和新、老下中农办社。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上中农是朋友，他们经济上接近富农，思想上摇摆性很大；社会主义发展了，摇摆就越少。合作社要以增产来争取他们，不能强迫，不要给他们小鞋穿。种子、肥料都要帮助单干户解决，真正愿意入社的，一定要吸收。（三）地主、富农统统不要入社（除个别典型外），因为我们自己还没巩固。（四）今年规划合作社发展由百分之四十六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市委向中央报告是百分之六十），这也不是控制数，只要真正自愿，可以多吸收。今年春天，我们很紧张，现在危险性不大，当前问题还不少。总之，按中央方针，照自己的规划办社。（五）办高级社和办大社，关键是看条件。蔬菜区能办高级社，因为土地少，农活技术性强，能互利。不要一股劲地依靠外来干部和工作组办大社，这是温室里的植物。那种干部包办代替的经验不能推广，要由农民自己办，从小社过渡到大社，能办多大就多大。（六）有了农业机械和有经验的干部，就可以办大社。待合作社巩固了，以乡为单位，合作化程度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时，可以考虑吸收地主富农入社，他们不能当干部，有的不算正式社员。新的事物没有办起来以前，都要搞

典型试验，这是科学方法。

11月6日 晚，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集会。七日晚，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举行的招待会。

11月8日 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根据十月十九日、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提议，安排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会议还通过《关于处理违法的图书杂志的决定》等文件。

11月10日 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的联席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组织代表视察的指示。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和地方政协委员一起出去视察，对立法有好处，对行政有好处，对领导干部联系群众有好处，对下面干部可以起督促作用。中央的领导同志经验是多一些，缺点就是比较脱离群众，联系实际差些。无论中共，无论民主党派，无论是人大常委会或是国务院，总是在上面，如果不出去看看，对情况的了解就差些。工商界的人士，文教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人如果能够出去看看也有好处，以后再安排。这次视察工作时间从十一月十五日左右至十二月十五日左右，在农村主要视察农业合作化运动及粮食生产、消费、统购统销等，在城市主要视察工业、商业（包括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等。

11月11日 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同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予以公布。

11月12日 上午，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九次会议的联席会议上，说明视察工作

的有关事项。

△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决议，作关于如何更适当地改造私营工商业问题的报告。

11月13日晚，举行酒会，招待社会党众议员片山哲为团长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和以小林武为团长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考察团全体人员。

11月14日下午，主持召开北京市五个工厂厂长和党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讨论“一长制”的问题。会上有人认为，苏联工厂的“一长制”和我们干部现在的水平是不相适应的。一个人再成熟也不能样样精通，而独断专行很容易出岔子。讲话指出：现在我们所试行的厂长负责制是一种分工负责制。过去大家一齐忙是难免的，是一个工作阶段。现在要实行的厂长负责制，是指行政管理制度而言，并不妨碍重大问题要经过党委讨论。有的人把厂长负责制绝对化，强调厂长有最后决定权，厂长有否决权。这种行政管理的厂长负责制好不好？我们军队中的重大问题还经过党委讨论，可是我们的军队也很集中，也打了胜仗。我们是不是实行和军队差不多的厂长负责制，凡是带原则性的问题经过党委讨论，都容易取得一致意见。领导水平逐渐提高以后，党委讨论的问题就逐渐减少。有人提出厂长和党委书记谁领导谁，这种说法是幼稚的。党委是指党的一级组织，不是党委书记个人。工厂里的核心只能是党委，厂长不能成为行政和工会青年团等全面的领导核心。厂长越能掌握生产，党委书记工作越好做。

△ 刘仁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彭真在电话中提出的关于粮食三定工作的意见：基层订粮食定量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偏紧，否则事后还要加上来，那时候就只好再向粮

食部要了。要向街道负责干部、积极分子讲清楚，如果不实事求是，将来还要返工。东单区试点可能订得紧了一些。要组织力量下去检查。

11月15日 上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

△ 晚，和贺龙、陈毅等出席为参加一九五五年国际友谊射击竞赛的各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并在宴会前接见了各国代表团团长。十七日下午，出席在北京射击场举行的竞赛大会开幕式。

11月16日 同中共北京市委高校党委干部谈知识分子工作。指出：对高级知识分子要充分估计他们的成绩，再指出缺点，这样才全面，他们才会服气。他们按党的方针教学，这就是成绩；政治上被怀疑，他就不好受，对党有距离。要解决信任问题、安排问题、生活问题、教育问题、入党问题，先要把知识分子分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几类，抓住两头，把反动的争取过来，好好搞几个典型。傅鹰发表的意见，只是对政治领导与业务领导关系的认识问题。这几年在教授中没有发展党员，有点关门，假如北京有二千个知识分子党员，情况就会不同了。要选些进步的教授入党，北京一千二百个教授应该发展两三百个，只要历史清楚，真正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愿意入党的就可以。民主党派中也要发展党。

11月16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草案）》作个别修改后追认为正式决议。决议提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按

照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改造和小手工业、小商业采取合作化及其他形式的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在一九五六年初和一九五七年，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

11月20日 晚，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次日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大会问题。

11月21日 下午，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有三百四十九人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大会。会议由周恩来、彭德怀主持，刘少奇、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小平等出席。

11月22日 上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农业合作化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问题。

11月23日 上午，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会上，周恩来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并建议在全国政协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会议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并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11月24日 上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陈云准备在下午召开的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作的总结。

△ 召集刘仁、郑天翔、蒋南翔、杨述、宋硕^{〔1〕}等开会，传达中央书记处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部署，听取中共北京市委高校党委对大学、中小学、文艺、卫生、科学、工程技术六个方面的知识分子问题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成立市委知识分子问题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筹备年底召开北京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讲话说：（一）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总责的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人小组，党内准备由彭真在月底前起草一个指示，并在年底前开一次大会贯彻；明年一月政协开会讨论，由周扬起草相应文件。（二）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主要是看政治态度，是否拥护党，拥护过渡时期总路线，工作态度，同时看学术成就，但这个问题复杂，不要把政治态度与学术观点混起来。还要了解一下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情况。调查材料要分批整理，有一批报一批，以便及时研究。过去不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主要是领导上没有抓紧，有怕字，对他们的作用估计不足。（三）政治领导业务要做三项工作。一是老干部中哪些人钻业务了，哪些人没有钻，开个单子看看。有些党员知识分子应让他们搞业务。有些老干部不懂得知识的重要，把他们找来座谈一次，搞通他们的思想。二是开展学术争鸣。愿意积极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的知识分子也开个单子，从中发展一批党员，依靠他们做工作。民主党派的成员也可以发展。教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要慢慢改，有时还需要等待。政治上没有问题，只是学术思想上反动的人不许斗争，也不能把工资级别评低了，要用一切

〔1〕 蒋南翔，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第一书记。杨述，时兼任中共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第二书记。宋硕，时任中共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副书记。

力量帮助改造。市委可找知识分子来开一次会，进步的和反动的都可以来一些。学问好、教学认真的知识分子要提工资。三是培养新知识分子。要依靠旧的力量才能培养新的力量，新的成长起来才能代替旧的。

11月25日 召集各省、市有关负责人座谈知识分子问题。

11月26日 上午，和贺龙等出席在北京射击场举行的一九五五年国际友谊射击竞赛大会闭幕式，并致闭幕词。晚，出席贺龙为大会闭幕举行的宴会。

11月27日 上午，参加在北京嘉兴寺举行的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中医孔伯华公祭仪式。孔伯华因病于二十三日上午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11月28日 下午，陪同毛泽东等会见由社会党众议员片山哲为团长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

△ 晚，出席文化部举办的庆祝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会。

11月29日 下午，收到毛泽东当天凌晨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阅的经他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毛泽东批示以上人员看后，由他再看一次即可印发。

△ 晚，出席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纳赛为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一周年举办的招待会。

11月30日、12月1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加速各方面建设，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问题。

12月1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会议由刘仁传达十一月底毛泽东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知识分子改造

的形势的讲话，提出对农业十七条〔1〕的意见。讲话说：（一）农业合作化，毛主席紧紧抓住了群众，运动高潮起来了，规划可能提前完成。市郊反映，上中农紧张，我们暂不吸收他们入社，他们越想入社。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出于觉悟，一部分是想争取领导权。我和刘仁商量，明年二月以前，先组织贫农、下中农入社，等到合作社管委会成立后，再吸收一部分上中农入社。最近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十七条，包括深耕、密植、水利、肥料等，要组织三人小组，贯彻执行。（二）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上半月中央要开会。北京市私营工业户数占百分之九，产值占百分之四十一，五百人以上的大的只有五家。公私合营必须找出过渡的环子，如联营、并厂、加工订货、包销等。合营后“四马分肥”，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已成了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经营者，我们和资本家决定性的一仗已经快过去了。商业，批发已达百分之九十三；国营零售加公私合营，合占百分之八十三，这是社会主义的。夫妻老婆店，先搞经销代销。手工业共十二万人，已组织合作社三万人，明年翻一番，七八万人，困难是原料和销路问题。农业增产后，主动性就大了。几年来，工商业调整、改组、联营、并厂是正确的。剩下的主要问题是人的教育改造。一个阶级要消亡，不从内部分化出一批人来，是不那么顺利的。搞好资本家的教育，每个区都要作规划，进步的、中间的，要搞一个名单，进行教育，实行定息制度后，社会主义改造就更好搞了。（三）知识分子问题，约在一个多月前我向毛主席汇报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问题，毛主席即指示中央组织部作出计划，后来章伯钧

〔1〕 指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党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发展农业的十七条意见。

反映党对知识分子有“六不”〔1〕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第一，造就一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任务尚未完成，特别是理科方面新生的学术领导人还没有培养起来，这两项是长期的任务。北京的情况是，七百五十五名教授、讲师中，进步的占百分之四十八，连同拥护社会主义、但工作中有若干“抵触”的中间人士，合起来约占百分之八十，思想落后的只占百分之十五，思想反动或有反革命嫌疑的约占百分之五。要下决心抽一批有基础的党员加以培养，七年以后就可以培养出一批红色专家。三个五年计划内，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但不作为运动搞。第二，我们工作中还有些缺点错误，和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关系紧张，这是当前要解决的。一是信任不够（也有过分的）。有些党员有宗派情绪，坚持听党课的教授也不能入党，入了党不能转正。问题还是市委有关门主义，把他们另眼看待，包括对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刚进城时我们常找知识分子开会，这几年少了。不能以忙作为理由，有我们思想上重视不够的原因。二是待遇上存在平均主义。教授工资现在很低，中央再三要求提高也没有实行，管这项工作的干部有平均主义思想。有的领导不研究问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不是以理服人。工资先解决第一流的科学家。另外，在北京找两个学校搞工资改革典型。我提议把知识分子工资管理权力控制在市委，降低工资必须经市委批准。褚福棠〔2〕的工资，我再三说过不能减，为什么减了也不通知我？现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多

〔1〕“六不”即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待遇不公，安排不当，使用不够，帮助不够。

〔2〕褚福棠，著名儿科医生，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儿童医院第一任院长。他的工资原为七百元，后自动减为三百元，当时打算再减为二百四十元。

的不减，少的逐步增加，这是毛主席定的方针。三是使用上确有不当之处。李四光等人送往迎来的社会活动过多，没时间搞学问，要全面安排。工资是带普遍性的问题，应报中央，此外还有业务思想的改造和一般知识分子问题，给中央的简报都要集中反映。四日，就以上内容在有各区委、群众团体党组书记参加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作了报告。

12月2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西藏等问题。

12月4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收到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甘肃省委并转各地电。甘肃省委电告中共中央，省委拟决定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入社农户数发展到占总农户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不但数量要多，而且质量要好。中央复电认为甘肃省委规划数字太大，指出：像甘肃这样的情况，“今冬明春分作两批，共发展到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多一点，如果不勉强，则占总农户百分之五十多一点也可以，再多就可能不适合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再一个浪潮达到占农户百分之八十左右那就很好”。

12月5日 同蒋南翔等研究起草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一）完成十二年规划后，国家的面貌大变，需要培养大量的专家。文化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落后于现实，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上落后于实践。知识分子已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有同志还怀疑能不能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也落后于实际，共产党已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还有人怀疑党能不能领导？我不主张和傅鹰教授争论，要刻苦地钻研，赶上去，埋头奋斗；如果是捧场，会使我们晕头转向。（二）要以马列主义武装高级知识分子；要号召他们学习苏联，

十二年内赶上苏联；同时学习世界各国进步的科学成就，只要有利于人民。（三）新老知识分子，应在符合社会主义要求上团结起来，共同提高。要告诉老的，你教给新的，知识传得更广；要告诉党团员，好好学科学技术，尊敬老的，向他们学习。要给青年配好的老师，好的设备，给以充分的时间，八年赶上现有的教授，再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留苏学生要成批地派出。要研究新老团结，发展党，这是关系党的领导问题。（四）要整理民族遗产。中医、农业技术、手工业都有传统的经验。哲学要批判地整理。（五）要不断地总结建设经验、阶级斗争经验。民主党派要来纠“六不”的偏，要使他们和党保持一致。

12月7日 出席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草案指出：“正确地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是党的政策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目前党的迫切任务就是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作出全面规划，使他们能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挥力量和不断地提高业务能力。”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较之全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他们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强调：“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我们必须在我国的建设时期，使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尽可能迅速地脱离落后状态，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12月8日 和周恩来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首都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二十周年和“一二·一”运动十周年大会并讲话，勉励青年学生们要学习“一二·九”、“一二·一”学生运动的最宝贵的经验，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为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要坚定自己的世界观，在这个基础上，努力掌握科学技术，站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最前列。

△ 下午，到西郊机场迎接格罗提渥总理为团长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九日下午，陪同毛泽东等会见格罗提渥。晚七时，出席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九日下午，接待前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拜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团员、人民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彼得·弗洛林。十一日下午，主持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北京市各界人民欢迎民主德国政府代表团大会并致欢迎词。周恩来、陈云等参加。晚，陪同毛泽东等出席格罗提渥举行的宴会。十二日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出席毛泽东举行的欢迎宴会。

12月9日、10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刘仁传达毛泽东十月二十九日在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央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的精神。在九日的会上讲话说：中央对工作的估计、批评右倾完全适合我们。我们没有充分利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尽可能地推动工作前进，市委首先要检讨。首先要检查出哪些可能性我们没有利用。（一）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三定”完成后大约一个礼拜左右从百分之四十六发展到百分之九十二，贫下中农百分之九十八入社了，证明我们过去的认识也是右的。能够这么快而且没有危险，是因为传达了毛主席讲话，我们又有原来的基

础和经验。现在就要防止“左”，即不分上下中农，不分新老上中农，不分积极与否，一下子都拉进来。领导成分一定按中央规定，贫农和新、老下中农合占三分之二，老中农、新上中农占三分之一。凡不愿意入社的不要拉进来。地主、富农今年一般的不准进来，每个区选几个已经巩固的合作社搞典型，吸收一点地主、富农。（二）手工业生产共十二万人，已经加入合作社和合作小组的四万七千人，明年翻一番，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不困难，但不能让小老板参加领导，老板的生产资料算不算股金要研究。重要行业要把小手工业统起来，变成国营企业的车间。（三）地方工业要逐渐把小私营工业“吃”了，否则技术不能提高。工业要很快赶上农业。（四）知识分子要努力赶上国际水准。知识分子行动上在搞社会主义，但还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十日晚，在会上讲话，阐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发展过程，赎买政策的历史由来和合理性。指出：解放以后，很多人爱国反帝，拥护抗美援朝，参加土改，促进商品交流，起了积极作用；打倒地主阶级和农业合作化以后，资产阶级丧失了社会基础，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由利用、限制进而通过赎买完成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困难要作充分的估计，克服困难要有充分的努力；经过改造，要努力提高生产，商品的品种不能减少，服务态度要好，这才像社会主义的样子。

12月10日 到火车站为朱德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送行。两代表团此行是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威廉·皮克总统八十寿辰庆典和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 中午，设宴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劳动党中

央委员会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孙德胜是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威廉·皮克总统八十寿辰庆典途经北京，九日下午抵京的。十一日中午，孙德胜一行乘火车离京赴德。

12月12日—16日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干部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区各部门和与工商业改造有关的党员干部五百零四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指示，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了对全市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初步规划。

12月16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干部扩大会议。近七千人出席会议。在会上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农业和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总结报告。指出：（一）党对资本家、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是两仗定天下，一仗是“三反”“五反”，打掉了资本家的威风；一仗是公私合营，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据市委对五百八十八户私营工商户的调查统计，二百一十九户积极要求合营，三百一十户随大流，五十九户拒绝。这说明有百分之九十是愿意接受改造的，赎买改造是可能的。“实践证明，这个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是在今天中国条件下对我们最有利的政策。这个政策，有助于保证工业产品的供应，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换来粮食、原料供应市场，同时又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但是，所有制改造后，对资本家思想上的改造是长期的，把公私合营企业搞好，斗争也是很复杂尖锐的，方式是和平的。改造当然是依靠工人，也还要在资本家中找些积极分子，当做自己的干部使用培养，使他们带头“共产”，减少困难，克服障碍，加快速度，这并不丧失立场。

(二) 今年抓紧手工业合作社整顿、巩固工作，十二万户中有四万七千户参加合作社，明年发展到九万多，占总数百分之八十，这与农业、工商业改造的速度就差不多了。(三) 农业改造，差不多十天时间入社农户翻了一番，现在百分之九十农户入了社。原来想先发展贫农和下中农，上中农只搞一部分，半工半农的以后再解决，结果上中农、半工半农的都进来了。现在的任务，一是要整顿，搞生产，把社办好。要检查生产准备情况；还要检查入社有没有不自愿的，是不是互利了。个别不是自愿入社的要进行说服，不愿意的可以退社。区委要负责检查合作社的领导状况。二是每个区选一个或几个乡，找比较巩固的、有经验的社，作解决地主、富农入社的试点。三是总结高级社的经验。(四) 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掌握科学文化技术的知识分子参加是不可能的。六年来知识分子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前高级知识分子多数对社会主义不了解，而今天包括多数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能够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工作的岗位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根据北大、清华、钢院等几个学校的分析，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占百分之八十左右，落后分子是少数；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的是极少数，只有百分之几。要使我国的科学文化赶上工业化、农业技术改造的需要，在三个五年计划里赶上国际水平，就要利用中国现有的专家。我们现有高级知识分子不过十万人，必须大量迅速培养新的专家，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领导工作中的一些缺点要解决。必须领导高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组织他们学习，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观点，方式要慎重灵活、和风细雨，不能采取粗暴的或行政命令手段。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要培养大批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

党。(五)中央指示,各个部门各个同志要检查一下工作中的保守主义倾向,把我们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该讲话中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分以《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 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胡乔木收到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和为中央起草的电报。电报请各地和有关部门在准备召开的会议上加以讨论,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以前将应修改之点电告中央。在指示草案中提出的“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动的高级知识分子,应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一处,毛泽东加写:“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指示草案中提到的“各地党组织过去没有注意甚至拒绝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一处,毛泽东加写:“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指示草案要求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规划和几年的计划。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李葆华^{〔1〕}汇报治理长江的规划问题、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情况、王首道^{〔2〕}汇报交通运输问题。

12月18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肃反等问题。

12月18日—24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并作

〔1〕 李葆华,即赵振声,时任水利部副部长。

〔2〕 王首道,时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

大会总结，鼓励大家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克服保守思想，努力完成明年的增产指标。出席会议的有市郊各部门的党员、各乡的支部书记、百户以上农业合作社的主任、国营农场场长、拖拉机站站长、党和团组织的书记和工会主席共一千五百多人。会议要求进一步贯彻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合作化的决议，立即动员广大郊区农民，把空前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整顿、巩固农业合作社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上来，以便把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增产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刘仁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郊区农业合作化和生产问题的报告。

12月19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2月20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汇报财经工作情况、李富春汇报工业情况。

12月22日 中共北京市委工商业改造五人小组成立，组长程宏毅。

12月25日 下午，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字仪式。同时签字的有中德文化合作协定、中德关于植物检疫和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合作协定、中德联合声明。晚，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纪普纳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二十六日上午，到西郊机场为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的格罗提渥送行。

12月26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邀集市工商联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讨论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讲话指出：资本家积极要求公私合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历史上世界各国都是没有的事情，这是很好的积极性。现在问题是全面规划赶不上，所以显得有些乱。为了取得经验，先是少数公私合营。我们采取

全行业安排和定息的办法，定息以后资本家已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者了，资方代理人也不同了，变成国家工作人员。全民所有制以后，资本家的资金融入了国家资产，定息和工作安排都要做好，老人有老人的工作，青年有青年的工作。连家铺是一家人在工作，如果改成合营只吸收一个人，那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可以考虑改为代销店。要有一些内行人参加改造的小组。思想改造要比经济改造长得多，所以工商联有长期的工作任务，任务加重了。资本家光荣不光荣在于改造时他们的表现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就光荣，表现好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立功。所以劝大家不要去搞那些小名堂，如抽逃资金等行为，搞小名堂得不到好处。如果每一行业中都有几十个明白分子，就可领导起这个行业的改造。怕能力不够不是主要问题，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的思想，工作能力慢慢就有了。合营工作分先后，但不一定积极分子都先合营。许多具体问题还要慢慢研究，大家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每个行业中成立有五人左右的小组，来研究本行业中的工作。

△ 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收到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文件集》序言稿。鉴于当时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已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毛泽东在稿中增加了“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化，也可以提前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完成”一句。

12月27日 下午，出席提前三个月建成的官厅水力发电站剪彩仪式。向全体职工和帮助建设水电站的苏联专家表示祝贺说：官厅水电站的建成，说明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不仅能打败国内外的敌人，而且能够战胜自然，改造自然，把水害变为水利。

12月28日 在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

议闭幕会上作报告。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中，你们这次开会情绪和过去不一样，唯恐公私合营慢了，这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是唯利是图的积极性。经过这个改造，企业具有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因素了。大家把公私合营的事情办好，就是给人民、国家立了功。很多具体问题，各行各业的领导人大家商议，处理要入情人理，使每一个人各得其所，一切事情公公道道。资本家自己起来“共产”，不但把自己的事情解决了，也把子孙万代的事情解决了，最后把我们贫穷的、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国家。市工商联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于二十日开幕，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指示、报告，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内容，通过决议，号召全市工商业者积极拥护和接受政府的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经济改组、按行业改造等措施，为逐步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公民而努力。

△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休假或者外出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或者副委员长接受外国使节的决定》作了说明。

12月29日 晚十一时，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讨论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稿。讲话指出：（一）社会主义事业在推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广大知识分子成为劳动知识分子。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大体还好，但问题不少，这是总的估计。（二）发展知识分子入党问题，在大工厂的工程师中发展了一批，党员约占百分之十八；教育界有点关门，教授、中学教师中，党员合占百分之九，原因是对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上有些高级知识分

子政治情况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些非本质性的思想、作风和工农有距离。没有发展的责任不在下面，在于领导。（三）社会科学观点和自然科学观点是要区分的，社会科学的阶级性比较强，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没有什么马列主义的化学家、地质学家。（四）市委的知识分子小组要把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活动统一安排，在教学科研方面为他们创造条件。许多问题中央将开会解决。

12月30日 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市政协常务委员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就本市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讲话。会议通过北京市私营工商业改造初步规划。

△ 收到毛泽东从杭州给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彭真的信。信中说：《人民日报》即将发表的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写得很好，陈伯达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一篇序言请审阅，如有修改请告田家英〔1〕。关于农业十七条的修改，建议明年一月五日在杭州开会，已约陈毅、柯庆施〔2〕来杭州先行商量，要谭震林、廖鲁言三日或四日赴杭；辽宁、山西、甘肃、陕西、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四日到杭，准备五日开始开两三天会。陈云“如病未愈则不要来”。

△ 致信马明方〔3〕、安子文并核转周恩来：人大常委会机关原不拟建立党组。现在同志们感到在党内联系方面，特别是在参加党内会议，阅读党的文件等方面，仍有成立的必要。

〔1〕 田家英，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

〔2〕 柯庆施，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3〕 马明方，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因此提议组成机关党组，以张苏〔1〕为书记。请核批。

12月31日 召集罗瑞卿、杨尚昆、张苏、齐燕铭、平杰三、刘墉如、朱穆之〔2〕等开会，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生活待遇、服务人员配备及报道名次等问题。同日，致信周恩来并向中央汇报处理意见。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周恩来批示陈云、习仲勋阅，表示同意，并送杨尚昆印发中央各领导人。

△ 中共北京市委书面报告中中共中央：（一）截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市委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五人小组已召开了十次全市性的大型报告会，各区委、区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召开了职工代表会、青年资本家座谈会和家属座谈会，向六万多人进行传达和宣传。（二）初步规划，一九五六年对十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百分之九十左右实行公私合营；四至九人的私营工业，多数参加合作社，少数公私合营；私营商业户，百分之九十左右公私合营；连家铺和摊贩，百分之七十合作化，或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改造；手工业户百分之八十左右实现合作化。

△ 审阅中共北京市委《转报市公安局党组关于一九五五年镇压反革命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1〕 张苏，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2〕 平杰三，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墉如，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朱穆之，时任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

1956年 五十四岁

1月1日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和赖若愚〔1〕、刘仁、王炯〔2〕等出席北京市为庆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进入新阶段而举行的联欢大会，参加联欢的有全市各区公私合营及私营的工厂、商店职工一万两千人。

△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号召“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工业和文教事业，提早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1月2日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和陈云应约到周恩来处谈话。晚八时三十分，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接受苏共中央的邀请，派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苏联和东欧八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讨论经济合作兼及军事和国际问题。

1月3日 晚，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纪普纳为庆祝威廉·皮克总统八十寿辰举行的招待会。

1月6日、9日、10日 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人领导小组会议。会议讨论修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稿。

〔1〕 赖若愚，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2〕 王炯，时任北京市工会联合会主席。

1月9日 下午五时，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委书记等所拟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10日 晚，接待由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乐松生、副主任委员凌其峻率领的、为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前来中共北京市委报喜的游行队伍，向他们表示祝贺，接受他们所献的锦旗和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还接待了前门、宣武、崇文、东四等区前来报喜的资本家家属。全市被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商户共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三户，其中包括三十五个私营工业行业的三千九百九十家工厂（含四人到九人的小工厂）和四十二个私营商业行业（含饮食和服务性行业）的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三户坐商〔1〕。当晚，六万五千多名职工和资本家及其家属，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游园联欢大会。

△ 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增补政协委员名单和有关召开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各项报告。

△ 晚，审改《人民日报》准备次日发表的题为《改造私营工商业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稿。

1月11日 下午，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京的中央委员、各省市委书记参加了会议。

△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最近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自去年十一月中央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后，为加速进行公私合营，市、区先后成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五人小组，建立了十三个专业公司和五

〔1〕 坐商，指有固定营业地点的商人。

个专业总店，在专业公司领导下，按行业吸收同业公会和工会代表参加，组成了三十九个公私合营工作委员会；训练了两千多名干部，分别派到准备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商店去进行工作。现全部资本家已卷入这个高潮，分批分期实行公私合营的做法，已经与形势不相适应了，必须采取由资本家和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公私合营的群众运动，办法是先宣布批准合营，再进行清产核资、安排人事和经济改组。因此，我们在一月八日至十日三天内全部批准了资本主义工商户的公私合营。清产核资工作，拟先让资本家自填自报，并由同行业资本家小组相互评议，有公股代表和工人、店员监督，又有资本家积极分子互相评议，即使有些估价偏高偏低，也可以在审核时加以纠正。这样做有利于缩短合营过程，并且有利于迅速转入生产。对资本家的安排，也必须迅速进行，以稳定人心。企业经济改组工作，待生产秩序安定后就可以比较从容地进行了。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的报告，指出：“北京市委由于对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具有敏锐的感觉，因而及时地、正确地改变了自己的工作规划和常规的做法，采取了对申请合营的迅即宣布批准，先接过来再进行清产核资等工作的积极方针和做法，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同时指出：批准合营只是整个合营工作中的一个步骤，此后的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和经济改组都是很繁重的工作，“既要根据需求和可能加快速度，同时必须讲究质量”，各地的进行步骤和具体办法，“应当由党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决定，不必也不宜强求一致”。

1月12日 接待为庆祝北京市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委报喜的手工业者游行队伍，并向他们表示祝贺。十一日，全市三万手工业者申请加入老的手工业合作

社；十二日，又有二万三千八百多手工业者组织了新社和生产小组。十二日当天，全市五万多手工业者到天安门前集合，随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全行业走上合作化道路举行了游园联欢大会。十五日，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手工业改造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加速改造的情况下，手工业者感到单干下去没有出路，对合作化的要求迫不及待。十一日，市委和市政府已批准全部手工业分别按行业入社。现正按行业按地区迅速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拟尽量扩大老社，对新建的社，尽量组织高级的生产合作社，对某些有实际困难的家庭手工业户，暂时组织较低级的供销生产社和生产小组。我们已责成主管部门抓紧安排生产，尽可能维持手工业者原有的产供销关系，以免生产遭受损失；对某些修理业和特种手工艺等，组织起来后可能使群众不便或生产品种减少的，准备暂缓组织，待研究后解决。

△ 晚，出席周恩来召集的会议，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

1月13日 下午五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廖鲁言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稿，和廖鲁言准备在知识分子大会上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作的说明稿。会议决定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十四日下午开幕，讨论三天，二十日前结束；增加一批与农业规划有关的人士和干部与会。

1月14日—20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一千二百七十九人。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报告和廖鲁言关于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二十日下午，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和北京市的社会主

义改造问题》的发言。指出：（一）目前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要求党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帮助，其中不少进步分子迫切希望入党，但他们思想上还有程度不同的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毛病；少数思想落后的分子，特别是思想反动的分子，经过我们的工作和教育，很多人或迟或早会转到赞成社会主义方面来。（二）在团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上，目前最主要的障碍是一部分同志对于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他们居功自傲，轻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看不见几年来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变化，不承认他们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对这种宗派主义的危害性必须作充分估计，切实加以克服。（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必须继续进行，但在方式和步骤上必须切实注意灵活性。必须充分注意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尽可能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启发他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决不可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四）党组织在坚持思想政治原则、掌握方针任务方面，是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文化的；但是，对各种科学、文化的专门业务的具体指导、检查和帮助来说，应该承认我们的力量确实还十分薄弱，称不起什么英雄。我们应该努力改变目前的情况，调集足够数量的干部下苦功夫学习，使他们成为专家和内行。争取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有足够数量的党员迎头赶上去，能够胜任愉快地全面地把科学技术工作领导起来。关于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发言指出：最突出的问题是领导赶不上形势。开始时，市委对群众运动的高潮估计不足，因而所定计划总是偏于保守。农业改造的规划三个月修改了六次，私营商业改造的规划一个月修改了五次，私营工业、手工业改造的规划一个月修改了六次，规划还没有定稿，改造已经完成。“最后完成各种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两个月中，群众伟大的创造性和运动发展的速度，使我们天天感到有掉队落后的危

险。因为瓜已经熟了，不能不摘。群众运动的洪水已到，如果不站在运动高潮的前面因势利导，就有使高潮不能顺利前进，使群众高涨的热情受到挫折的危险。”现在的任务是趁热打铁，抓住农民和手工业者高涨的热情，用增产的成果表现合作社的优越性，巩固合作社和加强社员的团结；抓住工人、店员和工商业资本家的热情，把生产、营业和工商业资本家安排好，正确运用国营企业的经验，吸收和发扬私营企业一切好的经验，改善公私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

1月15日 下午三时至四时，主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北京市各界二十多万人参加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在大会上宣布：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参加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全体人员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受了工人、店员、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界代表为庆祝北京市在全国首先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送上的喜报。

△ 下午六时，审改《人民日报》为北京市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拟于次日发表的题为《在高潮的最前面》的社论稿。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群众运动中，领导要“彻底克服保守主义倾向，充分运用已有的可能条件，使领导赶到群众的前面去领导群众运动的高潮。”

1月16日 上午，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经验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在批准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后，市委趁热打铁，在三天和五天内分别完成了对私营工厂和商店的资产清点估价工作。先让资本家自估自报，工人、店员参加逐件逐项清点估价，实际上起了严密监督的作用。然后由本行业的工商户小组互相审查，最后由公股代表、资方代表、工人代表所组成的行业合营工作委

员会核定。在清产估价工作中绝大多数资本家所报资金数目基本上符合实际（一般略微偏低），极少数偏高或偏低的由合营工作委员会适当调整。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一）传达了毛主席在全国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讲话，资本家明确了政策，认清了前途，相信对人民做的好事越多，人民对他们的报酬就越大，因而在运动中竞相立功，不少人还把企业以外的资财拿出来增加投资。（二）鉴于“五反”中违法户受罚的教训，许多资本家在自估自报资产时不敢高估，甚至有普遍压低的趋势，加上每个行业首先物色二三户思想进步的资本家作典型，树立了“标尺”，别人就不能高估多报。（三）通知工商联和同业公会调查并准备提出在公私合营中表现积极的分子名单，鼓舞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报告同时指出：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拿定息，对企业的生产、设备的关心可能较差；手工业集中后，最大危险是经营的品种花样减少，或给消费者带来某些不便，必须防止和纠正。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将北京市的经验报告转发各地参考。

1月17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各地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意见，并作了若干修改，决定由陈毅、彭真负责，用中央名义邀请在京的民主党派、科学家等一千多人分组讨论，收集意见，以备修改后由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毛泽东指出：这个纲要主要是动员农民来实行，是依靠群众，国家只给予一定的帮助，因此是个群众行动的纲领，国家方面的任务应在五年计划或年度计划中去写，过去写上了一些指标和国家要办的事，大多删去了，以免又发生盲目冒进的错误。

1月18日 下午，和陈毅应约到毛泽东处谈就农业发展

纲要草案向党外征求意见的问题。

1月20日 晚，出席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闭幕会。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1月21日 下午三时至晚七时三十分，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科学报告会，听吴有训〔1〕讲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力学和化学方面的问题；竺可桢〔2〕讲生物学、地学和农学方面的问题；严济慈〔3〕讲技术科学和潘梓年〔4〕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出席报告会。毛泽东提议今后每月可组织两次这样的科学报告会。

1月22日 晚，和周恩来、邓小平应约到毛泽东处商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问题。

1月23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批准设立国家测绘总局。

△ 下午五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根据两天来这一草案已经在京有关民主人士、科学家等讨论提出的意见，将可采取的意见吸收进草案，至晚十二时三十分完成后，立即再印，准备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会议还讨论了国务院关于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和估产两个指示草案，以及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议程。

〔1〕 吴有训，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主任。

〔2〕 竺可桢，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

〔3〕 严济慈，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技术科学部主任。

〔4〕 潘梓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

1月24日 下午，到机场迎接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威廉·皮克总统八十寿辰庆典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晚，陪同毛泽东等会见孙德胜。二十七日晚，出席刘少奇为孙德胜举行的宴会。二十八日下午，到北京车站送孙德胜离京回国。

1月25日 下午三时至晚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 晚，出席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举行的庆祝印度共和国成立六周年招待会。

1月27日 晚九时三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维汉、徐冰、胡乔木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民主党派问题。

1月29日 零时至晨二时四十五分，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周恩来准备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稿；听取中央十人小组召开的各省市小组负责人会议情况的汇报。

△ 晚十一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准备在政协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稿。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四十分。

△ 审阅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纠正公私合营企业工作中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的通报》。通报指出：某些干部、甚至有的领导机关不很好地进行调查分析，不通盘考虑经济效果和政治影响，随便发号施令，影响了合营企业的生产和营业，使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遭受损失。市委规定：“一切有关公私合营企业、

手工业合作社的调整、改组和合并，原有产供销关系的变动，经营品种、经营管理制度和工资福利制度的改变，除非经过研究成熟，并且经过市委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五人小组正式批准（重要的并须经过市委批准），任何单位、任何干部都不得擅自做主。今后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再发生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必须予以纪律制裁。”通报下发给中共北京市各区委、共青团市委及各部门党组并报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了北京市委的通报。

1月30日—2月7日 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三十日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开幕会。出席会议的委员五百八十八人，列席会议的六百十一人。会议听取周恩来作的政治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二月一日、三日、五日、六日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分批招待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委员和列席人员。

1月30日 收到毛泽东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阅的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一月十二日同彭德怀的谈话纪要。双方就缩减顾问编制及装备现代化问题交换了意见。毛泽东批示：“此件值得看一下。似须整个检查一次同各方面顾问专家的关系。”

2月2日、3日 连续两个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国际共运问题。

2月3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两位领导人，谈话至次日凌晨一时许。

2月4日 出席一九五五年北京市劳动模范及先进集体代表会议的闭幕会。

2月5日 下午，和周恩来、陈云、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到机场迎接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后回国的宋庆龄副委员长。

△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到北京市先农坛体育场观看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同北京队的友谊比赛。六日晚，陪同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全体人员。

△ 晚十时二十五分，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研究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等问题。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三时。

2月7日 下午，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闭幕会。会议通过政治报告、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报告，增选达浦生、侯德榜、卫立煌、钟惠澜〔1〕四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会后，在全国政协党组会议上总结说：这次会议毛主席很重视，会上多数发言是有内容的。并就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提前完成和统一战线的性质问题，指出：（一）过渡时期总任务可否提前完成？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改变来说是可以提前完成的。全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约再有三年可以完成，但是，工业化不能提前实现。工业化要求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所以，工农业发展规模和速度要扩大和加快才行。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现在不能讲提前完成，仍然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二）统一战线性质，有人提议应该改提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周恩来认为

〔1〕 达浦生，时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侯德榜，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卫立煌，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钟惠澜，时任北京友谊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不必。因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本来就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的统一战线范围很广泛，中国资产阶级接受改造，参加“消灭”自己是一大特点，但资本主义还有尾巴，少数民族地区还有贵族，许多省农村还没有全面办高级合作社；消灭了剥削，还没有消灭贫困；所有制改造的斗争是激烈的、深刻的，虽然是和平的。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要精确，不然容易产生错觉。讲话还提到，梁思成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入党，可以同意他的要求。

△ 晚，和周恩来等出席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1〕成立大会。

2月9日 晚九时三十分，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

2月10日 晚，和周恩来、陈毅等陪同毛泽东会见团长乃贴·触的努七率领的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团。随后，和周恩来、陈毅、罗瑞卿同毛泽东谈话至次日凌晨二时三十分。

2月13日 下午，陪同毛泽东等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为招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酒会。

2月14日 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六周年和苏共二十大开幕，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莫斯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特别节目上，发表广播讲话。指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固定了中苏两国八亿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促进了中苏两大国的繁荣，维护和促进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

〔1〕 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是根据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至十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的决议而建立的，旨在加强中国同亚洲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委员会主席是郭沫若。

2月14日—19日 参加接待柬埔寨王国首相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及其率领的柬国家代表团。十四日下午，和周恩来、陈云等到西郊机场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国家代表团一行。晚，出席周恩来举行的欢迎酒会。十五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十七日下午，在北京体育馆比赛馆主持北京市各界人民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大会。和周恩来等出席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欢迎宴会。十八日晚，和刘少奇等参加毛泽东、周恩来接受柬埔寨王国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赠予的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典礼。晚，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出席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随后出席毛泽东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欢迎宴会。十九日晨，和周恩来等到机场为西哈努克亲王一行离京赴上海、广州等参观后返国送行。

2月14日—25日 朱德、邓小平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二十四日夜，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会后苏共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情况。

2月15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薄一波、孙志远、谷牧、王鹤寿、陈郁、李聚奎、刘澜波、何长工〔1〕等八人汇报工业发展情况和今后任务的会议。此后，相继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听取三十四个部委汇报工作的会议。

2月16日 下午，会见前来拜会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

〔1〕 薄一波，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孙志远、谷牧，时均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王鹤寿，时任重工业部部长。陈郁，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李聚奎，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刘澜波，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何长工，时任地质部副部长。

团团员、王国会议副议长桑·年，国民会议议员恩格·米阿斯，王国会议议员尼尔·斯莫乌克博士。

2月16日、17日 和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薄一波、黄敬、赵尔陆、张霖之〔1〕汇报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工作的会议。

2月18日 在马玉槐〔2〕反映公私合营后商店购物排队长，商品种类不全、质量降低，营业时间不合理、营业员态度不好以及托儿所不便民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郑天翔：请召集所有与此件所反映问题有关的同志，听他们的意见，议定改进办法。马玉槐还建议，城内各区有必要建立通过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收集、汇报居民群众意见和要求的制度。

2月19日 收到毛泽东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阅的一份报告。二月一日，中央宣传部据中山大学党委的反映上报中共中央说：一苏联学者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看法等，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毛泽东批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3〕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 下午，和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薄一波、安志文〔4〕汇报国家建设委员会工作的会议。

〔1〕 黄敬，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

〔2〕 马玉槐，时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长。

〔3〕 尤金，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4〕 安志文，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2月20日 和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薄一波、刘秀峰、万里〔1〕汇报建筑工程部工作的会议。次日，继续听取城市建设方面的汇报。

△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讲话指出：（一）市政规划问题。东西长安街的道路最宽处规划一百二十公尺，可先定一边的路线，另一边的再说。前三门护城河的游泳区还应扩大。下水道污水用来浇地。城里先建几个居民区，要有各种文化、卫生等设施。工业建设用地从战时考虑、按分散原则预留，精致的中等厂子可以摆进来，次要的工厂挤出去。高等教育、研究机关、试验机关可以设在北京。地下铁道一定要建设。无轨电车的建设速度加快点，明年在东西长安街、阜成门外等处先通车，车型设计要新。（二）私营工商业合营后要把工作做好，质量提高，品种增多。所有资方实职人员、职工的工资福利不要降低，已降低的一律恢复。合营中资本家增资共十几万元，准备退五万元以解决他们的困难，古玩商献出的玉器也要退还。他们长支、垫支、借支的款项都给解决，并和职工一起都享受公费医疗。然后开一个大会，动员搞好生产。有经验的老资本家也可聘为顾问，对生产有好处。（三）肃反定案工作要实事求是。市委书记处要讨论一下，把处理的规格定合适。已定案的，要开大会宣布结论，该宽大的宽大。总的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斗错的要当众恢复名誉，检讨认错。要认真做好平反工作，但要保护积极分子。坏人变好了派出所可以出证明，给予工作。盗墓匪改正了的不要再叫盗墓匪。反革命主动检举的，也可以给他介绍职业，准许悔过自新，消除反革命的社会基础。阶级斗争在公私合营后不是越来越激烈了，

〔1〕 刘秀峰，时任建筑工程部部长。万里，时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

反革命不能是越抓越多。(四)学习苏联不能教条,不要迷信。

2月21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等问题。

2月21日、22日 和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万里、刘杰^{〔1〕}汇报城市建设和原子能工业发展问题的会议。二十一日,毛泽东答万里问: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规律,按经济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北京、保定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2月24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2〕}

△ 收到毛泽东批送的郭沫若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至二十五日率领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期间写的七首诗。毛泽东批示交《北京日报》发表^{〔3〕}。

2月25日 和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王鹤寿、吕东^{〔4〕}汇报重工业部工作的会议。毛泽东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完全可以超过苏联,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

〔1〕 刘杰,时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

〔2〕 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成立,主任陈毅,副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秘书长张劲夫。

〔3〕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发表郭沫若诗时,增加了二首,共九首,总题为《访日杂咏》。

〔4〕 吕东,时任重工业部副部长。

2月26日 下午，和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李聚奎、康世恩〔1〕汇报石油工业部工作的会议。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罗瑞卿汇报。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四十分。

2月27日 下午，和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何长工、刘景范〔2〕汇报地质部工作情况的会议。

2月28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全体代表。

△ 晚，和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刘澜波、王林、程明陞〔3〕汇报电力工业部工作的会议。毛泽东感慨：就这么一点电，怎能不受人欺负呢？他切望本世纪能赶上发达国家。

2月29日 下午，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接见出席河北省第一次区委书记会议和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河北省第一次区委书记会议于二月二十三日至三月一日举行。会议期间到会作报告，着重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要结合各种具体事例继续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加强工农联盟，并且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和采用分别对待的办法，彻底地孤立和消灭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谦虚谨慎、实事求是、遇事好好和群众商量和艰苦奋斗、勤俭办社、勤俭治国的作风。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 康世恩，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

〔2〕 刘景范，时任地质部副部长。

〔3〕 王林，时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程明陞，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

△ 晚，和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陈郁、徐达本〔1〕汇报煤炭工业部工作的会议。

2月 和刘少奇、罗瑞卿、安子文、习仲勋等听取张鼎丞关于制定检察工作两年（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规划和召开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的汇报，并发表以下意见：（一）同意今年检察工作的中心任务仍然是批捕和起诉，再加侦查工作，要求提高工作质量。强调说：不能认为错捕只有百分之一，就可以马马虎虎。对被冤枉、被错捕的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公安、检察、法院都要担负起防止错捕、错判的任务。检察院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发挥互相制约的作用。（二）地方党委要加强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有些地方的党委没有重视检察工作，甚至一年来没有专门讨论过检察工作，检察机关工作有很多困难，像这种法制观点不强的地方，你们要派人下去检查他们的工作，看有多少错案，有多少不合法的事情。把事实揭出来，向党委报告。我们现在不要去争论检察制度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全部担负起来，批捕、侦查、起诉都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地做，组织机构要全部建设起来。这个问题宪法已经规定了，中央也有指示，不这样做，就是不执行宪法，不执行中央指示。（三）实事求是地规划工作。几年来镇反斗争成绩很大，目前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也促使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人发生了新的分化。我们应当利用这种形势，相应地采取更为宽大的政策，以便进一步分化瓦解敌人，促进他们的改造。应当很好研究当前的形势，修改你们的规划。捕人不能赶任务、赶时间，单纯追求数字。这样很容易犯错误。必

〔1〕 徐达本，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须有事实根据，必须实事求是。

3月1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钱之光、张琴秋〔1〕汇报纺织工业部工作的会议。从本日开始，毛泽东开始听取轻工业部门的汇报。

3月2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接见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成员。

△ 下午五时，和周恩来、陈云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贾拓夫、张劲夫、宋乃德、宋劭文、周光春〔2〕汇报地方工业部和轻工业部工作的会议。

△ 审阅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干部群众对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发言的反映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米高扬的发言见报后，干部、职工议论纷纷，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有的认为，米高扬发言关系到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对只提斯大林的过错，不同时提斯大林的功绩，表示不满。个别人甚至怀疑目前苏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否正确。

3月3日 下午，到机场迎接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回国的邓小平、谭震林。四时三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康生、聂荣臻、刘澜涛、谭震林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参加苏共二十大情况。

△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贾拓夫、宋劭文汇报轻工业部工作的会议。

△ 在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一）法院审判要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在这个前提下，刑事案

〔1〕 钱之光、张琴秋，时均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2〕 张劲夫、宋乃德、时均任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宋劭文，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周光春，时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

件的罪与非罪、量刑轻重；民事案件是与非、赢或输，法律是尺度。（二）量刑轻重要根据实际情况。所谓实际情况，包括一定时期的政治形势，和某一案件的具体情节，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略有伸缩是必要的，这是唯物的。（三）毛主席指示的少杀长判，主要是指应判死刑的，少判死刑，判长期徒刑；其次才是纠正在当时轻判的偏向下，依法稍微从重。从重长判是按所犯罪行的情节，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稍微从重判处，并不是轻罪重判，更不是无罪也判罪。（四）判错了的要平反。（五）公、检、法三机关要各尽各的职责，坚持实事求是，对的坚持，错的纠正，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不要有顾虑。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三家是统一的。有的办案畸重畸轻，出些毛病，与我们尚未制定刑法、民法及诉讼法有关，但不能借口这一点，放松法院的责任。（六）现在审判中的指导原则，毛主席说，各方面都要宽一点。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工作部门都要适应新形势，司法工作也必须朝这个方向转变一下。

3月4日 下午五时后，和陈云、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白如冰、邓洁〔1〕汇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工作的会议。

3月5日 下午五时后，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王首道、郭洪涛〔2〕汇报交通部、邮电部工作的会议。

3月6日 下午五时三十分，和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滕代远、钱应麟〔3〕汇报铁道部工作的会议。

△ 出席中央政法委员会会议。针对检察工作中存在照搬

〔1〕 白如冰、邓洁，时分别任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副局长。

〔2〕 郭洪涛，时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副主任。

〔3〕 钱应麟，时任铁道部部长助理。

苏联做法的问题，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说：现行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央当时就觉得不满意，但是缺乏实际经验，准备做大的修改。如一般监督〔1〕，检察院是做不了的，就是在党内，真正有这样的水平，能够搞一般监督的人也不多。应当通过实际工作、通过办案来进行监督。如逮捕人，一定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要起诉，一定要经过检察机关侦查，作出决定。你们应当抓紧这两条，把侦查起诉工作全部担负起来，真正做好。检察机关是很重要的、非要不可的，一定要很快建设起来。过去你们的毛病就是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不去积极提、积极做；做不到的事情，偏要提，因此，写出来的东西空洞而不实际，这是受了教条的影响。你们经常讲“审查起诉”，其实，这个名词用得不对。不是“审查”，而是应当要“侦查”。因为办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开始就由检察机关负责进行侦查，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另一种是公安机关先侦查一段，然后交给检察机关继续侦查。

3月7日 接见越南民主共和国公安代表团。在谈话中指出：公安部门是一个严重的机关，公安工作是一件严重的工作，它像一把刀子，使用这把刀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中国和苏联在这件事情上过去都犯过错误。中国内战时期的内部肃反曾错杀了好同志，在延安审干中也搞错了一部分好人。所以，毛主席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只要人头不落地，犯了错误也易于纠正。

〔1〕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所规定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一九七九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摒弃了检察机关“一般监督”的规定。

△ 到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厂，视察为支援农业制造成功的第一台锅驼机。

△ 下午，出席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首都各界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

3月8日 下午，和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李运昌、朱理治〔1〕汇报交通部工作的会议。

3月9日 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听取范式人、钟夫翔〔2〕汇报邮电部工作，吴法宪、邝任农〔3〕汇报民航局工作。

3月10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苏共二十大问题，讨论一九五六年北京市党的组织工作等。讲话说：毛主席最近在研究工业问题，可能要找市的工业局长或厂长。要准备汇报。毛主席开始时对许多报告不满意，觉得有骨头没有肉，即没有各种不同意见和突出的经验。讲话提出：城市也要搞一个像“农业四十条”〔4〕之类的文件，使大家工作有方向。农业合作化以后，有了“四十条”，全国人民都有奔头了。解决了生产关系以后，还要解决生产力问题。必须摸清北京工商业基本情况，工作才能深入，但基本数据至今还未弄清，如迟迟不动，工人店员的热情会冷下去。公安工作也是如此，该抓住的情况没有抓住。社会镇反，搞一个坦白检举运动，结合运动整顿居民委员会。要开万人大会宣判案件，应有各种类型的案件。这两项工作要抓紧。

〔1〕 李运昌、朱理治，时均任交通部副部长。

〔2〕 范式人、钟夫翔，时均任邮电部副部长。

〔3〕 吴法宪，时任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邝任农，时任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4〕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宋庆龄关于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三国的报告。

3月11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讨论市委《关于北京当前社会镇反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稿等。讲话指出：北京镇反工作应该清理一下。（一）当前情况是，暗藏的敌人已受到沉重打击，社会主义进入高潮，群众觉悟提高，反革命孤立，其活动更加困难。（二）不要让反革命分子的家属老背着政治包袱。许多历史上与反动派有过关系的人感到没有出路，不能想象他们没有饭吃会满意我们。我们的力量被这些人吸引住了，就不能腾出手来搞现行反革命。现在就要把老问题加以清理，集中搞现行的、重大的。对反革命分子刑满后仍留农场改造的，应尽可能使之回农村；处刑五年以下、刑期执行过半或表现较好的，可以交农业合作社管制劳动。（三）坦白检举运动先搞典型试验，不逼、不随便抓人，以街道委员会为单位搞群众运动。把居民委员会组织起来，成为政权的助手。要组织一个指挥部，搞成后开一个大会，分别宣布对各种人的处理。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北京市关于镇反问题的意见很好，各省市可仿效，要肯定过去杀管是必要的。

3月12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及引发的问题。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会后，毛泽东又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康生、杨尚昆谈话至凌晨二时。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娄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娄子，就是讲，无论

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大家可以研究。

3月13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廖鲁言、陶桓馥、李登瀛、陈正人、王观澜、刘建勋〔1〕汇报农业、林业、水利工作情况的会议。

△ 晚十一时，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到波兰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吊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莱斯瓦夫·贝鲁特逝世。

3月14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会见并设宴招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迪·努·艾地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政治局委员黎德寿等。他们是参加苏共二十大后，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宴会后，继续参加毛泽东等同长征的谈话。

△ 晚近十二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同陈毅、张经武、汪锋〔2〕、罗瑞卿谈话。毛泽东交代中央代表团赴西藏访问的任务和应注意的问题。谈话结束后，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一同听取罗瑞卿汇报工作，至次日凌晨三时结束。

3月15日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廖鲁言、刘瑞龙〔3〕汇报农业部工作的会议。会后，和刘少奇、邓小平同毛泽东商谈工作。

〔1〕 陶桓馥、李登瀛，时均任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陈正人，时任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时任农业部副部长。刘建勋，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张经武，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汪锋，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3〕 刘瑞龙，时任农业部副部长。

3月15日—23日 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期间，到会讲话。

3月16日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李葆华、钱正英〔1〕汇报水利部工作的会议。

3月18日 晚，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李范五、雍文涛〔2〕等汇报林业部工作的会议。会后，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同毛泽东谈西方通讯社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3月19日 晨，到机场为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日庆祝典礼的贺龙送行。二十三日晚，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举行的巴基斯坦国庆招待会。

△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上报市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北京郊区当前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说：郊区在今年一月上旬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入社农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七十六户，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六；截至二月底，郊区原有的一千三百三十六个社已合并为四百二十八个社，平均每社四百五十七户。

3月19日—21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李先念、马明方〔3〕汇报财贸工作的会议。

3月23日 晚九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有关问题。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报告尚未公布，会议决定采取发表文章的

〔1〕 钱正英，时任水利部副部长。

〔2〕 李范五、雍文涛，时均任林业部副部长。

〔3〕 马明方，时任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部长。

办法，表明中共中央的态度。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

3月26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曾山、姚依林、王磊〔1〕汇报商业部工作的会议。会后，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同毛泽东商谈工作。

3月27日 下午，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雷任民、李哲人〔2〕汇报对外贸易部工作的会议。会后，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同毛泽东商谈工作。

3月28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全体会议。在讨论市委《关于北京市当前社会镇反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稿时指出：（一）过去有一种理论说社会主义革命越胜利，反革命越多、越凶。这种理论在统治阶级将被打倒的时候，是对的。但统治阶级被打倒之后就不能说越到最后敌人越凶。难道到共产主义社会，敌人就更凶了？因此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反革命是越肃越少了，不是越多了；质和量是分不开的，越少了就不能说是越凶了。（二）历史问题不能和现行问题一样看待。过去在蒋介石统治下，一般职员不参加国民党就难以生活或就业。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号称是世界上“四大领袖”，而那时我们在解放区，蒋管区的工作还不强，怎么能怪人家受蒙蔽呢？参加反苏游行的学生也不能怪他们。对待历史问题应与现行问题不同。（三）过去对社会关系问题缺乏具体分析和全面研究，往往只凭一点社会关系使人家背上政治包袱等。会后，市委在报告中提出：北京解放以来对反革命分子和一般刑事犯罪分子已经几次严重打击，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十分有利于我

〔1〕 曾山，时任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王磊，时均任商业部副部长。

〔2〕 雷任民、李哲人，时均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们的变化，应根据新情况部署镇反工作。一方面对现行犯和隐藏未交代、未被破获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集中力量清查和镇压；另一方面，对于只有一般罪行和轻微罪行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可以了案，摘掉反革命帽子，特别是他们的家属亲戚中未参加过反革命活动，必须通盘加以研究，适当处理，给他们在社会上就业谋生的出路。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分别接见出席重工业部第一届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和全国铁路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接见后，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同毛泽东商谈工作。

3月29日 下午四时三十分至晚十一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参加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会见后，又和毛泽东等一同商谈陈云访问越南事至次日凌晨一时三十分。

3月30日 收到经毛泽东修改后批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阅的中央所拟各地经济工作汇报提纲。提纲说：“中央最近分别听取了工业、交通、农林水和财金贸各部党组的汇报，在今后几个月内中央拟分别听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关于工业、运输、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这种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同时，应当写成书面文件报送中央”。当天，提纲下发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各省、市、区党委。

△ 收到毛泽东批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阅后“退小平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指示。毛泽东批示：“国务院春耕指示于四月一日见报，此件应待一两天，可于四月三日或四日见报。”指示针对合作化后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出现的铺张浪费、滥用民力现象，要求广泛宣传和贯彻勤

俭办社的方针。四日，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王稼祥列席会议。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三十分。

3月31日 在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主要内容是：（一）检察工作的新阶段。我们党是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根据地和长征中，处理人犯比较简单，镇压的都是明显的敌人，只要在党的领导下，有可靠的人去搞，一般的不会搞错。解放初期，人民政协开会时，虽然写了人民检察署的组织条例，但那时，我们没有那么多政法干部，旧的司法机构还没有改造，更谈不上健全检察机关了。所以，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时，还是以军事法庭来进行审判，城市是军管会。现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开始，公开的敌人搞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隐蔽的敌人。如再不加强法制，容易出毛病。所以，去年十二月，中央曾发出要补办由检察机关审查批捕人犯的法律手续的批示。抓住了这个环节，检察机关就可以建设起来了。（二）政法工作的新形势。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已取得很大胜利，城乡群众已经组织起来，政治觉悟提高了，最近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中第四条和第五条，体现了司法从宽的精神，这是依据客观形势制定的。其中，对地主、富农，如果没有破坏行为，可根据具体表现有的摘掉帽子，称为社员，有的做候补社员，有的可管制生产。对历史上有轻微罪行，已坦白交待的反革命分子，可从宽处理，给以出路，在劳动中和群众监督下改造成新人。城市也一样。这样，可使我们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现行的、尚未暴露的敌人。最近，毛主席谈肃反时，强调两点：第一，永远不准用肉刑，肉刑是封建的、野蛮的。第二，永远不准秘密枪毙人。秘密枪毙人是违法的，枪毙人一定要张贴布

告。检察机关抓住这两条，至少可以减少错误。（三）坚决及时纠正错案。错捕、错判要坚决纠正、平反，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是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好人。不要认为有百分之五的错案不要紧，就是百分之一也了不得。因为在你看来是百分之一，对被冤枉的人来说是百分之百。旧法观点，说什么“官无悔判”，这是荒谬之论。检察机关是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执行法律必须采取严肃态度。该报告的一部分以《发现错案要坚决及时纠正》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进服装宣传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稿。三月份以来北京各报刊大量宣传改进服装，讽刺和丑化穿中山服。报告认为我国目前实行低薪制，劳动人民生活还不富裕，应该是在经济、实用的条件下适当地讲求美观，不宜过分提倡和宣传改进服装。但把穿花衣服的人扣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是错误的。

4月1日 收到周恩来批送刘少奇、彭真、邓小平核阅的中共中央《关于抽调干部和工人参加原子能建设工作的通知》稿。

△ 下午，出席永定河引水工程指挥部举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义务劳动和郊区民工竞赛授奖大会，向驻京部队和郊区民工大队授锦旗，并发表讲话。

4月2日 下午二时，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出席谭平山〔1〕遗体入殓仪式，担任谭平山治丧委员会委员。谭平山于当日零时二十分逝世。四日上午，出席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的谭平山公祭大会并致悼词。

〔1〕谭平山（一八八六年——一九五六），生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 下午三时，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先后接见出席民用航空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第三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全国工资会议以及新华通讯社国内分社会议的全体人员，和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与会人员、港澳工商界妇女观光团的成员。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车站迎接访问苏联等国回京的朱德。晚九时三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朱德汇报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到苏联各地参观的情况。邓小平列席会议。

4月3日 下午，出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十周年紀念大会，并致贺词。四日晚，出席周恩来举行的宴会，招待参加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第十六届理事会和成立十周年紀念会的世界科协执行理事会理事、各国观察员及工作人员。

△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晚二十三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胡绳，到毛泽东处讨论修改该稿。

4月4日 中午十二时至下午四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文章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

△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研究从朝鲜调回四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部队装备及补充问题。

△ 出席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在大会讲话中着重指出：

(一) 公安工作要依据阶级斗争的客观实际，调整政策。去年，粮食统购统销，城乡面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从阶级斗争紧张的实际出发，公安工作抓严一点，在法律范围内“少杀长判”一些是对的；今年情况变了，农业合作化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了，政策应当放宽一点。不能认为革命越胜利，反革命越凶；不能说现在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比土改时、比合作化前更激烈了，也不能说资产阶级接受改造后斗争比“五反”前更尖锐了。虽然台湾尚未解放，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反革命还要破坏，公检法失不了业，但总的讲，斗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二) 必须健全法制。中心一环是把检察机关健全起来，这样错案可以大大减少。处理刑事案件，公安是第一道工序，一个都不错捕，只能是奋斗目标，因为被告尚未审问；检察机关侦查起诉，是第二道工序；法院审判是第三道工序，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三个方面，相互制约。还有一个错误和违法问题。一是公安机关未经检察机关批准即捕人，即使捕对了也是违法；一是只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公安机关即使捕错了也不违法，责任是检察机关的。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不要轻信口供，要重可靠的证据；永远不使用肉刑，包括变相的肉刑，如车轮战；永远不能秘密处决人，处决人要贴布告，说明判处死刑的原因。(三) 反对旧警察作风，保证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永远是人民的勤务员，就要按毛主席最近指示，每隔两年反一次旧警察作风。该讲话中关于警察作风的内容以《人民警察是人民的勤务员》为题收了《彭真文选》。

4月5日 下午，和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陈希云、陈国栋、喻杰〔1〕汇报粮食部工作的会议。

〔1〕 陈希云、陈国栋、喻杰，时均任粮食部副部长。

4月6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会议听取陈云汇报访问越南的情况。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王稼祥。

△ 下午，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晚，出席周恩来为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4月7日 凌晨一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毛泽东通报四月六日晚会见米高扬的情况，商定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的基本方案。会议开至三时二十分。

△ 下午四时五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及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二十四人，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同米高扬会谈。米高扬通报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的有关情况。会谈于晚六时四十分结束。

△ 晚七时三十分，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

△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高校党委办公室《关于教师中对〈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反应》稿，简报中共中央：教师普遍重视这篇文章，认为“分析很全面、很透彻、很深刻”，对斯大林功过分明，“使人心服口服”，是篇很好的哲学著作。但也存在一些错误思想，如有人说，“我们的党和毛泽东也有个人崇拜的错误”，“过去讲党史时，强调毛主席一贯正确”，“中国党对刘少奇的作用发挥得不够”等。

4月8日 晨，和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到机场为苏联政府代表团回国送行。

4月9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吴波、王学明〔1〕汇报财政部工作的会议。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张闻天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听取康生汇报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4月10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继续听取财政部工作汇报。之后，接着参加听取曹菊如、陈希愈〔2〕、胡景沅汇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会议。

4月11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全国人民警察、治安保卫委员功臣模范代表大会、商业部全国财产管理职工代表会议和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储蓄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继续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至此，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全部听完。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同陈云、彭真谈话至晚九时。

△ 收到毛泽东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阅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七十八号。简报反映小学教师中存在待遇低、地位低、质量低三个主要问题。毛泽东批示：“此件值得一阅，并应予以解决。”四五月间，教育部《关于提高小学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报告》经国务院批转各地执行，报告提出小学教师工资水平不应低于

〔1〕 吴波、王学明，时均任财政部副部长。

〔2〕 曹菊如，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同等程度的其他部门人员，实行教龄补贴，对有特殊贡献的教师给予特级待遇等。

△ 审阅《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刊登的《抗议各国议会联盟理事会的非法决定》一文。该文指出：由于美国代表的一再阻挠，致使各国议会联盟理事会作出拖延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四月四日举行的议会联盟理事会的决定。这是违反各国议会联盟的宗旨和章程的非法措施。

4月12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先后接见出席全国煤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国纺织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和全国机械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4月16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有关兄弟党的一些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王稼祥、罗瑞卿。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

△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报送中共中央的《北京市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稿。该稿列举了几种认识，有人称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人认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分析是深刻的。在联系中国党的实际时，有人认为毛主席是谦虚的，不让祝寿，不以个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等，但党史教材中是否也有夸大毛主席的作用、歌词中“翻身全靠毛主席”是否是个崇拜等问题。

4月18日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稿，报送周恩来核转中央：“请中央原则批准好同党外商议。”十九日，周恩来批示：拟予同意，即送刘少奇、邓小平核阅。二十五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关

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指出：“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因此，决定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决定的具体内容包括对不同对象免于起诉、从宽处刑、合并论处、提前释放，以及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终审判决等共六条。

4月18日—24日 连续每天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在几天的会上，毛泽东多次就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建设与行政开支、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问题发表讲话。参加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

4月22日 下午三时至晚七时五十五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问题，为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

4月24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全国轻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国农业水利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国交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和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会议的全体人员。

△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来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十九位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会议。会议了解了各省、市、自治区情况，并通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到会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

4月25日 上午，接见英国法律工作者琼斯、高厄、米尔纳，法国法律工作者萨罗特、拉斯克，感谢他们在各国议会联盟会议上为中国参加联盟所作的正义努力。议联执行委员会

同意中国参加，而在理事会上，因美国的阻挠，被否决了。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全国第二机械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地质部门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电业部门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邮电部门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4月25日—28日 出席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之初称为省市委书记会议）。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会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1〕。

4月26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4月27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倡议实行火葬，并第一个在倡议书上签名。先后签名的有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内外一百三十六人。

△ 晚八时，和沈钧儒、郭沫若、何香凝、蔡畅〔2〕等出席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全体理事、特邀代表和工作人员的宴会。

4月28日 下午，出席董必武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对党章的修改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全党设

〔1〕 毛泽东的讲话，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借鉴，力图总结中国的经验，包括：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关系。

〔2〕 何香凝，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蔡畅，时任全国妇联主席。

一个副主席还是几个副主席；二是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每年开一次会，五年一任，请大家考虑。同时强调党章要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妨碍创造性发挥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4月29日 下午，和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等陪同毛泽东会见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兄弟党的负责人。

△ 晚十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有关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问题。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

4月30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接见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主席团，及应邀参加会议的外国工会代表团和港澳工人五一国际劳动节赴京观光团。

△ 下午四时，出席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开幕式。出席大会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六千一百五十六人。

△ 晚，出席周恩来为来华外宾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招待会。

△ 晚九时三十分，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5月1日 上午十时至下午二时，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首都五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集会。在开会词中说：北京市郊农业已经实现了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手工业已经全部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出现了新的高潮，在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和政法工作方面都有了新的成就。

5月2日 下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听取毛

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5月3日 晨二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六时，毛泽东乘飞机赴武昌。

△ 晚九时，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会议听取刘晓〔1〕关于苏联情况的报告。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

5月5日 晚六时三十分，出席在中山公园举行的首都各界人民欢迎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游园联欢大会。

5月7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张鼎丞关于一九五五年检察工作总结和一九五六年工作任务的报告。

△ 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送阅拟提交次日下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联席会议讨论的关于视察工作情况的报告等文稿，并就国歌说明：老舍等曾在大会上提议修改国歌的歌词，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时，毛主席说暂不修改。明日拟在会上讨论，作个决定。周恩来批示：国歌修改问题可以谈谈，但不忙作出决定。

5月8日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十九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联席会，听取两会代表和委员一九五五年上半年视察工作的报告。会议讨论了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的视察工作事项，决定视察工作可从十二日开始，视察的项目、地点、对象及接触的干部与群众，由代表和委员自行选定。

5月11日—25日 在广州，连续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

〔1〕 刘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5月11日 下午，和杨尚昆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陶铸〔1〕汇报广东省工业情况。

5月12日 下午，和罗瑞卿、杨尚昆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农业情况。

5月13日 下午，和罗瑞卿、杨尚昆、陶铸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陈漫远〔2〕汇报广西省工业情况。

5月14日 下午，和陶铸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陈漫远汇报广西省农业情况，广州市委汇报农业发展规划问题。

5月16日 下午，和谭震林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造纸和制糖业的情况。

5月17日 下午，和谭震林、陶铸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杨尚奎〔3〕汇报江西省工业情况。

5月18日—20日 连续三天下午和晚上，和谭震林、陶铸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王任重关于湖北省工业情况汇报，张体学〔4〕关于湖北省财粮贸工作的汇报，王延春〔5〕关于湖北省农林情况的汇报，宋侃夫〔6〕关于武汉市产供销和职工生活情况的汇报。

5月21日—23日 连续三天下午和晚上，和谭震林、陶铸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周小舟〔7〕等的汇报。

〔1〕 陶铸，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

〔2〕 陈漫远，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第一书记。

〔3〕 杨尚奎，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4〕 张体学，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三书记、湖北省省长。

〔5〕 王延春，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副书记。

〔6〕 宋侃夫，时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市长。

〔7〕 周小舟，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5月24日、25日 连续两个下午和晚上，和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陶铸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杨尚奎等的汇报。

5月26日 离开广州，返回北京。

5月29日 下午，到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特别市市长苏迪罗和夫人、副市长达努布罗托及随行人员等五人。晚八时，举行宴会欢迎印尼客人。六月八日下午，在家里接待印尼客人并共进晚餐。十日下午，陪同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印尼客人。十一日，到机场欢送印尼客人。因天气不好，印尼客人次日才离京赴外地参观访问。

6月3日 因病住北京医院。下午五时，周恩来前来看望。

6月10日、11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林铁、阎达开〔1〕等汇报河北省工业、商业、财政、金融等问题的会议。

6月11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伯渠〔2〕等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6月12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问题。晚上，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八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问题。

6月13日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

〔1〕 林铁，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阎达开，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副省长。

〔2〕 林伯渠，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召开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报告。会议决定三次会议六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并通过向会议建议的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人选名单、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和委员人选名单。会议还通过了常委会关于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周恩来提请会议审定的一九五五年国家财政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草案的说明和李先念关于草案的补充说明，以及决定任命和批准任免事项多起。

△ 晚，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为尼泊尔王国驻华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拉纳中将等举行的欢迎宴会。

6月14日 下午，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说明。会议决定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提交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埃及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并委托彭真向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

△ 晚，陪同刘少奇会见巴西众议院议员热罗尼莫·迪克祖伊特·罗扎多·马伊亚一行。十五日，为巴西众议院议员举行欢迎宴会，并致词：这是巴西众议院议员第一次来华访问，你们的来到对增进中国人民和巴西人民的友谊，对于促进和平事业起了推动的作用。二十一日晚，陪同毛泽东会见巴西众议院议员。

6月15日 下午二时十分，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听取陈毅汇报率中央代表团赴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情况。

6月15日—30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十五日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开幕式，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和刘少奇、宋庆龄等十二人为当天

会议的执行主席。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审查和批准一九五五年国家财政决算和一九五六年预算，讨论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6月17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委派李富春去苏联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和苏联援助问题。

6月18日 下午，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埃及驻华商务代表法尔举行的庆祝埃及共和国独立日招待会。

6月19日 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体会议上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谈到人大代表视察活动时说：代表视察制度是保证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面了解实际情况，保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确地决定各项政策、有效地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及时改进工作，并且防止和克服国家领导机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倾向的一项重要措施，应该坚持下去。

6月20日 在最高人民法院免于起诉书上，圈阅同意对在押的小林高安等三百五十四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从宽处理，免于起诉，即行释放。

6月21日 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武部六藏等二十八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案起诉书的卷首批示：“鼎丞同志：这些起诉书可用了，只是后边有几个人，按照现在的方针，是可判可不判的，可以起诉，将来判轻些，准备明年释放。已请示过恩来同志。”

△ 下午，和刘少奇等到机场迎接议长维埃诺·约翰奈斯·苏克舍拉宁率领的芬兰议会访华代表团。晚，陪同刘少奇会见代表团。

6月22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

接见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学员。

△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体会议。在会议休息期间，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应邀参加大会的巴西五位众议员谈话。

△ 晚，出席刘少奇为欢迎芬兰议会访华代表团和欢送巴西众议院议员举行的宴会。二十三日，出席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为芬兰议会代表团访华举行的酒会。

6月23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小平等接见参加中国百货、食品公司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6月24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问题、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和准备工作，以及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看法等。

6月25日 中午十二时，和李先念等同周恩来谈财政预算问题。

6月27日 晚八时，接见日中友好协会的代表池田利子、日本和平联络会的代表中岛利重。

△ 晚十时，和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等参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见芬兰议会议长维埃诺·约翰奈斯·苏克舍拉宁和他率领的议会代表团。

6月28日 晨，出席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永定河引水工程义务劳动赠授锦旗大会。并在大会发表讲话，予以鼓励。锦旗上写着：“用我们的双手把首都建设得更美丽。”

△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体会议，担任执行主席。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公开发表陶里亚蒂答记者问的全文，关于镇压反革命和阶级对抗性矛盾等问题。

6月30日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和刘少奇等担任执行主席。会议听取周恩来就代表们在发言中涉及政府工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如关于各种体制、财政工作、职工群众生活、文教工作和反对官僚主义等，代表国务院向大会表示接受，并分别作出说明和解答；听取陈云就商业工作与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发言分析了商业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错误、缺点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改正的各项措施。会议批准一九五五年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四项和第五项规定的决议等。

7月2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等先后接见出席全国盐业运销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和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一次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及解放军政治学院的毕业生。

△ 晚，和刘少奇、朱德、陈云、彭德怀、董必武、康生、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同王稼祥的谈话。毛泽东交代中央接待参加中共八大的兄弟党代表团和委员会的工作任务。

7月3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研究有关干部文化教育和对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加以改进的问题，还讨论了苏共中央六月三十日通过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影响的决议和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提出的几个问题。

7月4日晚，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招待芬兰议会代表团。五日晚，出席芬兰议会议长苏克舍拉宁举行的告别宴会。六日上午，和刘少奇等到机场为芬兰议会访华代表团回国送行。

△ 晚九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

7月5日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张玺〔1〕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会后，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杨尚昆到毛泽东处讨论问题，至次日凌晨一时三十分。

7月6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董必武、张鼎丞、罗瑞卿、陈养山〔2〕；高克林列席。会议确定法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办理中央交办的工作，研究法律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各部门的分工制约等问题，不受理具体案件。各有关部门的党组直接对中央负责。会议确认：（一）去年进行的镇反运动是十分必要的，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成绩，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缺点主要是错捕和错判了一些人。因此，县以上党委和各级政法部门有必要对捕人、判案、监狱、劳改等各项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如有错误，依法承认。对未决犯应该进行清理。责成高法院、高检院、公安部、司法部组织六个检查组，分赴原来的大区，选择若干单位进行典型检查，每个组要有一个主要负责干部率领。具体组织工作由张鼎丞、高克林、李士英〔3〕、

〔1〕 张玺，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2〕 陈养山，时任司法部副部长。

〔3〕 李士英，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徐子荣、陈养山等负责。上告到中央的冤狱不要一批一转了事，高检院应尽可能派人直接进行检查，高法院必要时也应该提审。（二）镇反运动期间各地采取的公安、检察、法院共同决定问题分别办理法律手续的联合办公形式是必要的，现在反革命分子已经受到严重打击，今后公安、检察、法院必须逐渐做到分工独立负责，既要互相配合，又要互相制约，党委加强统一领导。（三）刑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室继续起草，刑事诉讼法由公安部、高检院、高法院各就主管业务的部分分别起草；有关治安的行政法由公安部起草。十五日，将这次会议的纪要报送毛泽东、中共中央核阅。

7月6日、8日、9日、10日、12日、14日 每天晚上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刘少奇、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的会议，讨论报告起草问题。

7月7日 晚，出席北京市人民委员会邀集的市人大代表座谈会，商谈召开市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向代表汇报市人委第十五次会议的内容，以及市人大的议程，即审查和批准一九五五年度市决算和一九五六年预算；听取市人委关于城市建设工作和商业工作问题的报告，并请代表们提出在会议前需要视察的问题，搜集市民意见，以便在会上讨论和改进政府的工作。

7月11日 晚十一时五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

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接见曹聚仁〔1〕时拟谈的几个问题和全国政协讨论《关于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的办法（草案）》时提出的意见。

7月13日 收到毛泽东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阅的中共中央军委六月十三日关于首都国庆节阅兵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国庆阅兵有两种意见：一是从今年起由各元帅轮流担任，一是仍由国防部长担任。毛泽东批示：“仍由国防部长阅兵，并照旧发布命令，不要改变。”

△ 晚十时四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月15日 晚十时至次日零时四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第一次稿。十九日，继续开会讨论。

7月19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接见出席全国农村金融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7月22日 晚，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2〕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四川省甘孜藏区和凉山彝区人民政府平息叛乱问题，李维汉作汇

〔1〕 曹聚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时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七月十三日、十六日、十九日，周恩来三次接见曹聚仁，并对曹说：国共两次合作都是事实，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等等。

〔2〕 张国华，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

报。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随后，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到毛泽东处谈话。

△ 晚，出席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举行的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十二周年招待会。

7月23日 凌晨二时，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到毛泽东处开会至五时三十分。

7月27日 出席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问题。

7月28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7月30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在北戴河东浴场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陈云为第一召集人、邓小平为第二召集人、彭真等为成员的二十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中共八大的选举问题和中央机构的组织形式问题。

7月31日 晚，到周恩来处谈话。

8月1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讨论刘仁代表市委拟向北京市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作的工作报告稿。报告指出：（一）我们的党代表大会要放手请大家提意见。（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市委有右倾保守思想，这要分析。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运动是一波一波地发展上升的，我们是一步步赶上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确有赶形势的现象。农业社搞大了，是给自己找困难。去冬今春，只抓农业，没有抓副业是不对的。（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市委没有右倾保守思想，但是，生产关系改变以后，生产管理工作没有赶上去。（四）肃反中“从严从宽”、“从重从轻”的精神，不是凭主观愿望，而是适应客观斗争形势的需要。去年在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高潮中，客观事实是有反革命在捣乱，有资产阶级向我们进

攻，机关内部怎能不对反革命言行加以打击，怎能不摧毁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呢？今年，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很大进步，形势变了，所以肃反的做法也有改变，而不是因为去年搞错了。

△ 下午，和刘少奇、黄炎培、章伯钧、胡愈之等到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沙多诺和夫人一行。晚，出席刘少奇为印尼客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二日下午，陪同刘少奇等会见前来拜会的沙多诺等。二日晚，出席印尼驻华大使为沙多诺议长和夫人等访华举行的宴会。四日上午，和陈云、李先念等参加周恩来会见沙多诺议长一行，并与他们共进午餐。当日晚，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招待沙多诺一行。五日中午，与印尼客人在秦皇岛海滨共进午餐。同日，陪同毛泽东会见沙多诺等印尼客人。

8月2日—14日 中共北京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刘仁、范儒生分别代表市委作的工作报告和《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的报告。十四日，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肃清官僚主义，改进领导工作，明确划分职权，彼此协商配合。会议选举毛泽东、彭真等二十九人为北京市出席中共八大的正式代表，并选出候补代表三人。

8月5日 晚，出席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中共八大选举问题和中央机构组织形式、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方案的报告。

8月8日 晚，在北戴河，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张闻天、邓小平到毛泽东处开会，商谈当晚约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问题。随后一起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座谈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支持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初稿），以及镇压反革命问题。

8月8日—15日 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查张友渔关于市财政一九五五年决算和一九五六年预算的报告，薛子正关于市政建设的报告，程宏毅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报告。代表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市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

8月10日 晚，在北戴河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会议结束后，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到毛泽东处谈话至次日凌晨一时。

8月11日 下午三时，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

8月13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北京市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问题。讲话说：（一）一年多以来，首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市委执行中央的政策没有大的错误。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去年夏强调整顿巩固是对的；下半年毛主席发出号召后，迅速赶上形势，入社农户由百分之四十六翻了一番多，因此，不存在右倾保守问题。（二）当前的问题，在于所有制改造完成后，生产组织、计划管理还没有分别地、系统地解决。规模太大的农业社，如果农民愿意分开，秋后可以办成联社；副业要抓紧，我们的干部有单打一的作风，副业比重大的合作社，当时就该抓紧。手工业合作社，由三万人合并成九万人，规模也太大了，产品的品种减少了，公积金和公益金提取多了，以致有的社员收入减少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特别是修理行业和服务行业。为了便利群众，该分开的要快些分开，国家赔点钱也可以。原来的家庭手工业，半劳动力、辅助劳动力都可以参加生产。愿意退社的，可以允许。总之，要使百分之九

十的社员收入比入社前有所增加。蔬菜的生产和供应方面，消费者的需要和生产计划，要经过摸索，克服因盲目性所造成的缺货、排队现象，商店的营业时间和菜站的工作作风都要研究改进。强调指出：生产关系的改变不等于一切工作都变好了，我们要拼命地赶上去。（三）农业生产指标和操作规程要谨慎。市委提出粮食平均亩产三百零三斤，和一九五五年二百五十八斤相比，增产百分之十七点五。过去三年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九，明年订四百零七斤，办不到。指标要定得适当，让社员超过任务好。农业的操作规程不能太死，不能主观主义。土质有不同，山面有阴阳，肥料有多少，基础有好坏，拿一个办法要求大家照办，容易束缚群众的创造性。过分密植了，又得拔掉一部分苗，这样就失了威信。（四）去年，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经过镇反和肃反，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查清了一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今年城乡安定多了，所以就比较宽大，处理要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斯大林的错误是把革命同志当做肃反对象。从实际出发，不断修正，不能说是“左”右摇摆。（五）领导方法问题。要很好地分清市、区和基层的职权、党政的职权、市委各部门的职权，改变“一揽子”的领导方法。市委只管方针政策。高校党委只能管政策、政治思想，检查督促，管干部工作，教学业务是管不了的。要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上下左右协作，坚持原则，加强团结。（六）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提出后，大学生思想混乱，有的说《东方红》还唱不唱？说明小资产阶级凭空气讲话，实质是怀疑论。马克思、列宁都是个人，但他们集中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意志。斯大林有功有过。毛主席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对毛主席的信任是应该的，不过分就不是个人崇拜。十四日，在中共北京市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讲话中继续讲了上

述内容。

8月15日 在北京市一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对代表们批评市人委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因循、敷衍、马虎作风表示感谢。指出：（一）一年来，首都完成了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所有制说，已进入了社会主义，但从社会主义建设说，还正在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向现代化城市的过渡中。一方面，全市工业人口由一九四九年的五万人，增加到三十四万九千人，工业产值由一点四亿元增长到十二点九亿元，在校大中小学生从十八万五千人增加到五十三万七千人。但是，人口由一百九十七万发展到三百八十万，因此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都很紧张，要满足人民的需要，势必督促党和政府以及所有各阶层人民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主要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二）过去我们抓紧发展生产，是完全对的。但是，解决物质文化生活方面有疏忽，甚至“有不能容忍的缺点”。当然，解决住房问题要有一个过程，我们虽然新建了一千四百万平方公尺的房子，因为人口增长，原有的民房多半超过了年限，至今房子仍很紧张。但有些问题是应该而且可能解决的，如增加工资，我们迟了些；修人行便道、解决污水池问题，长期没有人管，主管部门有责任，我也要负责。（三）集体和个人，积累和分配，既是一致的，又是有矛盾的，帝国主义国家靠掠夺殖民地，我们不能，我们积累建设资金的基础是增加生产。“积累多了，工资就增加得少。一个合作社，基本建设搞多了，社员分的钱就少”，这个问题将长期存在，要很好地处理。我们对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注意是够的，而对改善群众生活、福利关心不够，“短期内甚至成为偏向”，要解决这个偏向。（四）要反对官僚

主义，改变工作作风。干部对工作不负责任的表现：一是身为人民勤务员，看到问题，不去解决，成了旧社会天桥“看洋片”的观众；二是遇事推诿，像打排球一般推出去；三是各顾各，互不配合，不协作，像是一筐山药蛋。要在人民代表的监督下，防止这种新的官僚主义的滋长。该讲话的一部分以《克服官僚主义作风》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 晚，出席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金贵南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朝鲜解放十一周年招待会。

8月17日 出席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托举行的印尼国庆招待会。

△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8月18日 下午，和刘少奇同胡绳、田家英、邓力群〔1〕等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中关于国家制度的部分的修改意见。

△ 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八次行政会议上讲话。指出：市人代会严肃批评了我们的官僚主义，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一个致命的毛病。决定先从检查工作入手，有计划地解决思想作风、工作制度和干部职权划分等问题。具体处理办法是：（一）各单位可能或基本上可能解决的问题，自行解决后报市人委。（二）需要市人委作出决定和给予帮助的，提交市人委行政会议讨论，会前要做好准备，提出问题，提出材料，提出处理意见，包括不同意见或方案，比较利弊，并提出主管首长的意见。（三）需有关单位配合解决的，主动找有关单位协商。市人代会是市人委的上级，对人民代表的批评不能无动于衷，

〔1〕 邓力群，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组长。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财经组组长。

要把有计划地解决问题，作为克服官僚主义的试金石。市委的责任是负责解决政策问题、政治思想、干部培养和配备问题，它本身不是承办机关。市人委的各职能部门，才是行政主管部门，他们应是人民的勤务员，共产党员应该在一切工作中起带头作用、模范作用。应该充分发挥现有的力量，解决现有问题。

8月20日 下午，和周恩来、彭德怀、李济深等到机场迎接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及其所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晚，出席周恩来为老挝王国客人举行的酒会。二十一日下午，和朱德、周恩来、陈云等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全体团员。晚，出席周恩来为老挝客人举行的欢迎宴会。

8月21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主席团名单、七届七中全会决议草案、七届七中全会关于八届中委选举工作建议、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八大会议日程和八大预备会议的工作安排等。邓小平列席会议。

8月22日 下午，出席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北京市各界人民为欢迎梭发那·富马亲王和他率领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大会，致欢迎词，并代表北京市人民向亲王献赠礼品和锦旗。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 出席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会议通过向中共八大提出的《政治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草案）》、《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的建议（草案）》以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会议还通过了准备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大

会主席团、秘书处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的草案等。

8月29日 晚十时至次日零时二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和出席八大的各代表团团长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有关八大的各项报告及三十日召开八大预备会议等问题。

8月30日—9月13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到会者九百四十六人。会议对中央委员会准备提交代表大会的各项报告和文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三十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

8月31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各代表团团长参加的会议。会后，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等同毛泽东继续商谈八大会务工作等有关事宜。

9月5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和民主党派列席中共八大会议问题。

9月7日 晚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一时三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和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问题。邓小平列席会议。

△ 将准备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发言稿《关于革命胜利后的群众路线问题》送邓小平，并附言：“如果你觉得大体可用，再送书记处同志审阅。”文稿前半部分，强调执政党需要高度注意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指出：新阶段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是领导六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济、政治、思想等情况“复杂万端而又变化极快”，党需要通过群众路线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

断克服和防止“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和阴暗面”。但是，有一部分同志却发生了一种“错觉和骄傲自满情绪”，好像我们已经无所不懂，无所不能，再用不着深入调查研究；或者以为党的主张既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对党有很高的信仰，无须再进行说服教育，耐心等待，只要党作出决定，发号召，剩下的就是填鸭式的灌输，“我说你服”，“我打你通”，因此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甚至滥用党的威信的现象。民主革命阶段，党经过那么多曲折才掌握规律，取得胜利，但对社会主义，我们所了解的还是微不足道的，而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繁重，机构制度又不尽合理，又不能用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研究，结果许多问题不但不易在萌芽状态时抓住，往往还要在匆忙被动中用突击方式去解决，以致实际工作中不断发生脱离实际的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主观主义偏向。这种偏向曾经发生在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制定工业农业生产指标中。因此，更需要在实现党的主张的过程中，反复和群众商量，不断地修改补充和发展自己的主张。文稿的后半部分，针对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晚年的错误问题，阐述了正确对待革命领袖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指出：反对个人崇拜并不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的作用，不应当把对革命领袖的科学的信仰当做个人崇拜。共产党人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与非完全以实际作标准，既不夸大个人的作用，也不抹杀、降低个人在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对待领导者，也同对待一切同志一样，应该有多少成绩、缺点就承认多少；有多大作用就承认多大作用。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形而上学的片面论者，却持一种绝对的观点，要么把领袖当成完美无缺的神崇拜，要么只看他的缺点错误，在强调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反对个人崇拜的

时候，否定领袖的作用。这是一部分没有经过艰难困苦，没有斗争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中表现出来的危险倾向，必须加以分析批判，等等。十七日，邓小平阅后退彭真时写道：“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发言，但是这篇东西，特别是后面一部分，有的人听了如何，分寸是否恰当，就要多找几个〔人〕斟酌才行。”邓小平建议先请陈伯达看，后送刘少奇审定，“可能的话，请主席看看”；后一部分“过于突出，可以概括一点说，文字上也可得到缩短”。

9月8日 晚，出席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毛泽东主持讨论并通过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会后，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谈话。

9月9日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参加毛泽东邀请民主人士座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应邀出席的有：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章伯钧、陈叔通、傅作义〔1〕等二十九人。

9月10日 下午，相继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 毛泽东就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修改稿致信陈伯达：“国家政治生活部分，修改时，请邀彭真、罗瑞卿、董老〔2〕三同志参加，今日改毕”。

△ 晚十一时四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胡乔木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商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共产党”部分的修改问题。

〔1〕 傅作义，时任水利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 董老，即董必武。

9月11日 下午，会见锡兰政府代表团团长克·科里亚夫妇和团员方席卡。

9月12日 晚十时三十分至次日凌晨一时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次日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中共八大开会的有关问题。

9月13日 晚，陪同刘少奇会见以库斯南为团长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会代表团，并出席刘少奇主持的欢迎宴会。

△ 晚，出席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向中共八大提出的五个文件稿和两个名单。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

9月14日 晚，中共中央举行酒会欢迎应邀参加中国共

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数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1〕。会后，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彭德怀、张闻天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9月上中旬 提议中共北京市委设立政法部，调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刘涌任市委政法部部长。

9月15日—27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五日下午，大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千零二十六人，代表着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大会通过了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大会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单，并且通过了大会的日程和会议规则。主要议程为：（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

〔1〕 他们是：苏联共产党代表团、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印度共产党代表团、朝鲜劳动党代表团、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英国共产党代表团、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德国共产党代表团、阿根廷共产党代表团、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芬兰共产党代表团、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伊朗人民党代表团、土耳其共产党代表团、挪威共产党代表团、锡兰共产党代表团、尼泊尔共产党代表团、瑞典共产党代表团、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团、瑞士劳动党代表团、丹麦共产党代表团、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厄瓜多尔共产党代表团、乌拉圭共产党代表团、以色列共产党代表团、冰岛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和美国共产党列席观察员等。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报告人刘少奇。（二）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人邓小平。（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人周恩来。（四）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大会听取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

△ 晚，出席中共八大主席团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林彪、邓小平等十三人组成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9月16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报告。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9月17日 晚，出席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议。

9月18日、19日 继续修改发言稿，并按邓小平的意见，送刘少奇、陈伯达征求意见，文稿标题改为《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二十日下午，收到陈伯达和邓力群的修改稿。修改稿删去了后半部分关于正确对待革命领袖和反对个人崇拜的全部内容。并告“我们已另抄一份送乔木同志，请他再作一次修改”。为此，将九月十八日二十四时的印刷稿送刘少奇，并附信：“少奇同志，我有兴趣讲的是后半部分，但又恐有碍团结，如怕刺激，把比较透彻的话勾掉（如修正稿），我即不想讲了。”在中共八大上未作发言。

9月21日 中午，和刘少奇、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到机场迎接以比利时众议院议长、社会党元老卡米勒·胡斯曼为团长由十三名众参议员组成的比利时王国国会代表团。二

十二日晚，参加刘少奇为比利时王国国会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 下午，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会代表团。

△ 晚，出席中共八大主席团为欢迎应邀参加大会的五十五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和观察员举行的宴会。

9月24日 晚，出席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各代表团团长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二十分。

9月25日 晚十一时二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商谈会见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等问题。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三十分。

9月26日 下午，和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尼泊尔王国首相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雅。晚八时，陪同毛泽东等会见阿查里雅首相。二十七日晚，出席周恩来为阿查里雅举行的欢迎宴会。

△ 晚，出席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及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

9月27日 下午，和毛泽东等主席团常委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大会听取陈云宣布九十七名中央委员和七十三名候补委员的选举结果，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大会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

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9月28日 晚十一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选举出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是：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副主席，邓小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任候补书记；董必武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刘澜涛、萧华、王从吾、钱瑛、刘锡五任副书记。

△ 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出席中共北京市委为庆祝中共八大成功举行和欢迎参加大会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中山公园举行的游园会，并致欢迎词说：我们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不但看到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远景，中国共产党的坚固的团结和伟大的力量，而且看到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团结和伟大的力量。

9月29日 下午，和周恩来等出席北京市各界在北京体育馆为尼泊尔王国首相阿查里雅夫妇等举行的欢迎大会，并代表北京市向阿查里雅首相赠送锦旗和礼品。晚，出席毛泽东招待阿查里雅首相一行的宴会。

△ 晚，会见并设宴招待来我国参加国庆观礼和参观访问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市议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9月30日 上午，会见来参加国庆节观礼和参观访问的

以东京都议会议员安藤章一郎为团长的日本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横滨、神户六大都、府、县、市代表团。

△ 下午，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到西郊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下午五时三十分，苏加诺总统和同来的高级官员在中南海勤政殿拜会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林伯渠、陈云、邓小平等作陪。

△ 晚，出席周恩来为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两千多外宾参加我国国庆节举行的招待会。

10月1日 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大会。

10月2日 下午，在颐和园举行游园会，招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尼泊尔王国首相阿查里雅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外宾。

△ 晚，出席毛泽东为招待苏加诺举行的宴会。

10月3日 下午，主持北京市各界人民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欢迎苏加诺总统访华大会，并代表北京市人民向苏加诺总统赠送锦旗和礼品。晚，出席宋庆龄招待苏加诺的家宴，家宴后，和宋庆龄陪同苏加诺参观王府井百货商店。四日下午出席刘少奇招待随苏加诺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国会第一副议长蔡努尔·阿里芬、议员约·来梅纳博士和苏塔托·哈迪苏迪比约的茶会。晚，出席周恩来招待苏加诺的宴会。

10月4日 接待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和日本商品展览团团团长宿谷荣一。

△ 下午，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分别接见少数民族参观团，及来自马来亚、越南、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德国等回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观光

团。

10月5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以下问题：（一）书记处工作范围。书记处在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一切原则、方针、政策和重大政治问题由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书记处按照这些决定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书记处应同国家机关各党组和军委取得经常联系；书记处在自己的工作中，既要能够尽到“挡风”的责任，又要不犯越权的错误，并且必须尽可能做到使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各同志能够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工作情况。（二）书记处分工。邓小平负总责，并负责联系宣传部和农村工作部；彭真协助邓小平负总责，并负责联系统战、政法和港澳部门的工作；谭震林负责联系组织工作和地方工作；李雪峰负责联系工业交通部门的工作；黄克诚、谭政负责联系军队方面的工作；王稼祥负责联系对外联络和国际活动方面的工作。候补书记刘澜涛负责联系监委和工青妇的工作；胡乔木负责联系人民日报社和筹办中央党刊；杨尚昆负责联系中央调查部和办公厅的工作。（三）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分工联系。刘澜涛联系华北地区；杨尚昆联系东北地区（拟仍请林枫〔1〕继续联系东北各省）；谭震林联系华东地区；李雪峰联系中南地区；宋任穷联系西南地区；马明方联系西北地区。（四）议决事项。同意今后领导人去世后不设个人纪念馆。决定由杨尚昆拟出意见提请中央政治局决定。已经设立的个人纪念馆，如任弼时纪念馆，待中央决定后，把有纪念意义的历史遗物移交给革命博物馆陈列。会议决定撤销原有的中央书记处几个办公室，合并到中央办公厅。

〔1〕 林枫，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 中午，举行酒会，欢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会代表团并致词。六日晨，到机场为印尼国会代表团送行。

△ 晚，出席苏加诺总统在北京饭店为纪念印度尼西亚建军十一周年举行的宴会。六日上午，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到西郊机场送苏加诺总统一行离京赴我国东北、华东和中南等地参观后回国。

△ 审改中共北京市委报送中共中央并转国家建设委员会党组的《关于北京市总体规划出国展览问题的请示》稿。国家建委党组九月二十九日电告北京市委，拟将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在一九五七年八月莫斯科第五届国际建筑师大会上展览，要市委做准备。北京市委认为条件尚不成熟，在请示中说：目前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只提出了一个草图，规划文件尚未拟定，既未经市委、市人委讨论通过，又未送中央和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查，其中有些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十一月十日，国家建委党组再电北京市委，说明与会各国都认为北京市的规划在九位苏联专家指导下，水平较高，建筑师也特别表示关怀，因此中国建筑学会提名北京参展。展览图纸主要说明城市设计思想，不具体标明工厂和机密性建设工程的名称和位置。可否参照国际建筑师协会的要求，将能够展览的东西拿出去，一时定不下来的问题不勉强，可在规划报告中写明尚在研究。

10月6日 下午，为日本商品展览会开幕剪彩。晚，出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为庆祝日本商品展览会开幕举行的宴会。

10月7日 下午，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国总理和尼泊尔王国首相联合声明、中尼经济援助协定的签字仪式。八日晨，和周恩来等到机场为赴上海、广州等地参观的阿查里

雅首相一行送行。

△ 晚，设宴欢送即将离开北京前往各地访问演出的印度尼西亚峇厘艺术友好访问团。

10月8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书记处成员分工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台湾问题、波兰形势问题等。会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

10月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就一九五七年度中央工作安排进行了讨论。

△ 中午，出席日本六大都、府、县、市访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10月10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谈北京城市规划的创意。指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不要只看到眼前：（一）人口规模，一看客观需要，二看发展可能。我的设想是，近期（十二年内）发展到五百万人左右，将来增长到千把万人。势所必至。（二）考虑道路和交通的大前提是人口数量、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和市民业余生活状况。一九五三年曾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不要怕有人批评“大马路主义”，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现在北京市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几十万辆、上百万辆，到那时，主要的马路九十公尺并不是太宽了。地下铁道是需要的，平时解决交通问题，战时作为防空之用。现在群众最不满意的是排队挤车，无轨电车要发展，有轨电车暂时要保留。停车场不是小问题。在帝国主义还存在时，要有战备观念，一旦发生战争，机关上班、市民上街还得照旧，物资如何运输，飞机在哪里降落？（三）有人主张北京生活电气化，认为中国的

水力资源是世界第一二位，将来长江三峡可以发电两千万千瓦，全国可以结成统一的电网。但现在还是先发展煤气。第一期煤气供应工程的建设，用钢铁不过四万多吨，投资也才六亿多元；煤气厂应该从速着手研究计划，预留出场地。原子能发电的问题，可先搜集材料研究。（四）天安门广场势必要大一些，因为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考虑。（五）引滦河水入北京。北京市将来没有一百来个流量的水不行。（六）为降低人口密度、提供生活便利和防原子弹，城市人口需要适当分散，建立卫星镇。城里不宜盖低层建筑，以免占地太多。（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方针是工业不可太集中。北京不是什么工业都建设，得有一点控制。可以搞一些重型的机械、精密仪器等。（八）要绿化、美化。市内应先划定各区公园分布网。居民楼前靠马路的地方可以留出一些空地搞绿化。工厂区内亦须留出空地建立园林，调剂环境。绿化、美化要与生产相结合，可以种一些果树和能成材的树。把洼地搞成湖，可以种树、养鱼，由合作社经营。（九）先改造一条街以取得经验。（十）规划还要考虑文教区的发展用地和水果、副食品的生产供应问题。该讲话以《关于北京的城市规划问题》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10月14日 下午，到机场为离京回国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市议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送行。

△ 晚，和刘少奇等出席比利时王国国会代表团举行的告别招待会。十五日晚，为代表团举行欢送酒会并致词，周恩来出席酒会。十六日晨，和刘少奇等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

10月15日 下午，到机场欢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市长索海尔博士及其一行；当晚，会见和宴请索海尔博士等。十八日上午，与索海尔会谈；晚，应邀出席索海尔举行的茶会。

10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的领导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等问题。发言说：企业中厂长和书记两长争大，遇事不能很好商量。下边对党委制有意见，一是受苏联厂长负责制的影响，已经搞惯了厂长负责制，二是企业领导素质有问题。文件中不要说只有党委制是马列主义，不能绝对化，资本主义国家、苏联都用一长制发展了工业。还是按毛主席的指示用比较的说法，说我们搞过一长制，也搞过党委制，从经验上看，实行一长制发生了许多问题，所以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制。

10月17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百家争鸣”和缩减军队问题。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

10月18日 下午，和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侯赛恩·沙希德·苏拉瓦底一行。十九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会见苏拉瓦底。晚，出席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为苏拉瓦底举行的欢迎宴会。二十二日下午，出席北京市各界人民为苏拉瓦底举行的欢迎大会并致词，向客人赠送锦旗和礼品。二十二日晚，出席毛泽东为苏拉瓦底举行的宴会。二十三日晚，出席苏拉瓦底的辞行宴会。二十四日晨，和周恩来等到机场为离京赴外地参观的苏拉瓦底一行送行。

10月19日 晚，和刘少奇、李济深等陪同毛泽东会见以阿南塔萨亚纳姆·阿延加尔议长为首的印度共和国国会代表团。二十一日晚，为印度国会代表团举行饯行酒会。二十二日晨，和刘少奇等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

10月20日 下午，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向彭泽民〔1〕遗体告别。二十二日上午，出席彭泽民公祭大会。

10月21日 召集司法部、公安部、检察院、法院负责人开会，讨论检查错案工作。

△ 晚九时三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苏共中央继十九日之后再次给中共中央关于准备武装干涉波兰问题〔2〕的通知。毛泽东指出：苏联准备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违反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会议同意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会议开至次日零时四十五分。因情况紧急，一时许，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紧急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谈话结束后，会议于二十二日晨三时开始继续讨论波兰问题。

10月22日 晚十一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

〔1〕 彭泽民（一八七七——一九五六），生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

〔2〕 苏共二十大在波兰引起极大反响。六月上旬，波兰波兹南发生罢工、请愿、示威游行，并发展为骚乱。事态平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许多人要求改组领导班子，让哥穆尔卡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十月十八日，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突然到华沙，力图干预波党内事务。十九日，波党中央全会决定哥穆尔卡以第一书记候选人资格参加波苏两党会谈。与此同时，波兰人民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支持哥穆尔卡，反对苏联干涉和军事威胁，苏共代表团被迫让步。二十日，哥穆尔卡当选波党中央第一书记。

10月23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次（扩大）会议，传达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讨论波兰局势及毛泽东等同尤金谈话的精神。会议讨论司法工作和一九五五年的肃反问题时，发言说：（一）去年的肃反工作，成绩是肯定的，但也有错误，一定要改正。当时从上面刮了反右的风，后来也纠“左”。据检察系统汇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案件处理是对的，冤假错案约占百分之一、二，有的占百分之四；判决畸重畸轻的占百分之十左右。如果清案的时间充裕一些，错案还会少一些。（二）为了检查冤错案，我意十一月底前，由高法、高检、司法、公安四个机关先搞工作总结，然后起草一个决议或指示。毛主席去年指示，肃反既要敏捷，又要合法。现在检查错案，首先要把冤错案查出来，再细细地定案。先看错不错，再看是否合乎法律手续。（三）关于检察工作，编制要精干、得力。我们的检察院组织法有一部分是抄苏联的，没有自己的传统经验。检察院要深入下层抓典型，总结出中国自己的经验。苏联的检察是监督一切，实际是什么都没做。我们的检察监督，一是侦查起诉，一是批准逮捕，一是监管监狱和劳改队，三个方面做好，工作就起来了。

△ 晚十一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波兰局势。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

10月24日 下午，和周恩来、陈云等到西郊机场迎接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

△ 晚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二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匈牙利事件〔1〕，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

10月25日 晚十一时三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讲话及其他问题。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

△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五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管制办法和人民警察条例等草案。在发言中说：对犯罪分子的管制问题，过去是县公安局批准就可以管制，这不合宪法，应由法院判决，今后任何管制，包括劳改犯人的管制、管制期限长短，都由法院判决。在会上，介绍了刘少奇等在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会谈的情况：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有大国主义，对波兰有民族隔阂。苏方承认，但在斯大林问题上赫鲁晓夫表示没有想通。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除匈牙利外，均在莫斯科集会，中共代表团不参加会，以利主动。并向会议传达：这几天毛主席反复谈到，进城以后，脱离群众，不调查研究，有衰退现象；一做官就摆场面，身边保卫人员很多，这样下去，不要三十年就比苏联更糟：几年来农业未搞好，商业有问题，人民生活这个矛盾是可以发展到对抗性的。

10月27日 凌晨，和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陆定一〔2〕、吴冷西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波兰和匈牙利问题。

△ 晚十时三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

〔1〕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国家电台和政府机构受到冲击。后酿成反政府暴乱。

〔2〕 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匈牙利问题。

10月28日—31日 连日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匈牙利问题。

10月30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六次会议。会议讨论与民主党派关系中服从共产党领导与尊重民主党派的自主权问题，机关学校、企业中民主党派成员有职有权问题和企业中行政干部的工资和工人的差距问题。在会上介绍了波匈事件后的局势和毛泽东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看法，认为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没有政治远见，把斯大林这条膀子砍掉了，刀子掉在地上，被敌人抓起来反苏反共；处理匈牙利事件也没有远见，总的是大国主义、大俄主义、专制主义。要把波匈事件的文件研究一下，从中吸取教训。

11月1日 下午，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1〕}的声明（草稿）》。晚八时，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宣言的声明。声明指出：“波兰和匈牙利人民在最近的事件中，提出了加强民主、独立和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波兰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人物已经注意到了那种企图破坏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反动分子的活动和危险。我们认为，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区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和极

〔1〕 苏联政府《宣言》的全称是《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宣言对过去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申明要贯彻始终地实现列宁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

少数反动分子的阴谋活动，是完全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各国，由于思想基础和奋斗目标的一致，某些工作人员常常容易在相互关系中忽略各国平等的原则。这种错误，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的沙文主义错误，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损害”。

11月2日 零时，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听取刚刚返抵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汇报赴苏联会谈情况和匈牙利问题。会议开至五时。晚十时三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听取刘少奇汇报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情况和匈牙利问题。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

11月3日 下午，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及北京市分会、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合在天安门前举行的首都四十多万人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的群众大会，在大会上讲话说：英、法帝国主义对埃及的武装侵略，是对已经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和人民的挑衅和进攻。他们过去曾经武装侵略过中国，侵略过亚非其他许多国家，直到现在美国还武装霸占着我们的神圣领土台湾。我们坚决拥护和支持我国政府谴责英法武装侵略埃及的严正声明，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要求英法两国和以色列立即停止他们对埃及的军事侵略。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出席大会。会后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

11月4日 中午，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为缅甸联邦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及其夫人等举行的宴会。下午三时，和朱德、陈云等参加毛泽东、周恩来同吴努的谈话。五日上午，和周恩来、陈云等到机场为吴努回国送行。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

大会议。会议讨论苏军进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等问题。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按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会议中间，毛泽东约见了苏联大使尤金。

△ 晚，会见由团长川端文夫率领的日本地方议员访华代表团全体人员。

△ 晚，主持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举行的宴会，招待在北京市级机关工作的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夫人，在致词中对苏联专家的辛劳工作表示感谢。

11月5日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批准周恩来作的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全国人大访问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名单，由彭真任团长，李济深、程潜、章伯钧、胡子昂〔1〕任副团长，刘贯一任秘书长。在会议讨论对人民来信的处理问题时，发言强调：机构要健全，方法要改善。

1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七次会议。发言同意邓小平提出的有组织有领导地主动地在党内外普遍进行一次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以解决波匈事件发生后群众中出现的思想问题。会议决定先由北京市委拟定方案，经中央批准后转发各地。

△ 晚，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在

〔1〕 胡子昂，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南海怀仁堂联合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大会。七日晚，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九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1月7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党的统战工作方针，但有些同志缺乏理性认识，凭盲目的阶级感情，或思想上没有从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框子里解放出来，心理上有点勉强，工作上感到是负担。干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团结的人越多越好，树敌越少越好。统战对象，包括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是社会阶级、集团的代表，我们要帮助他们改造，但不能离开他们。党的政策是社会客观存在在主观上的反映。对于不同阶级的声音，可以使我们兼听则明，工作更谨慎，不放肆，不大意。我们要向全党干部讲透这个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对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做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 晚，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召开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问题。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三时十五分。

11月8日 晚九时，和邓小平、谭震林参加毛泽东邀集准备出席或列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部分省市委书记出席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林铁、欧阳钦。会议开至次日零时五十五分。随后，和刘少奇、邓小平陪同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离去后，又和刘少奇、邓小平同毛泽东谈匈牙利问题至三时多。

11月9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同意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拟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要点；同意周恩来提出由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的建议。

△ 晚八时，和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同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座谈。十一时二十分座谈结束后，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有关召开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问题。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三十分。

11月10日—15日 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全会听取刘少奇作《关于目前时局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和财经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陈云作《关于猪肉、粮食、油料问题的报告》；听取毛泽东的总结讲话。全会着重讨论了国际局势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问题，并宣布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11月11日 出席在政协礼堂举行的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并继周恩来讲话之后讲话。

△ 下午，和刘少奇、张奚若〔1〕陪同毛泽东会见以阿里·布佐为首的叙利亚议员访华团。十二日晚，宴请叙利亚议员访华团并致词。

11月12日 中午，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听取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汇报一九五七年财政问题的讨论情况。

11月14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听取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

11月15日 晨，应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的邀请，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前往三国访问；同时成行的

〔1〕 张奚若，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还有应邀访问三国首都的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1〕}下午四时五十分，两个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受到热烈欢迎。

11月16日 在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陪同下，到克里姆林宫拜会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洛巴诺夫和民族院主席拉齐斯。对他们表示：代表团访问苏联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和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代表刘少奇委员长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代表访问中国，两院主席接受了邀请。拜会结束后，参观克里姆林宫和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下午，参观莫斯科的地下铁道。

11月17日 上午，在刘晓陪同下，访问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听取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塔拉索夫和各位部长介绍基本情况、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和职权，及对苏维埃代表和群众的联系、立法和各部工作等提问所作的解答。

△ 中午，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洛巴诺夫、民族院主席拉齐斯举行的欢迎宴会。致答词说：按照十月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坚定地认为继续巩固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团结，是我们最高的国际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名单如下：团长彭真，副团长李济深、程潜、章伯钧、胡子昂，团员（按姓氏笔画排列）王芸生、区棠亮（女）、乐松生、任国栋、刘长胜、刘贯一、吴克坚、李国伟、李纯青、周叔弢、武新宇、陈其尤、陈翰笙、郎咸芬（女）、马腾霭、高崇民、梁希、郭棣活、陆士嘉（女）、程砚秋、黄绍竑（身体不适未去）、赵庆夫、龙云、韩兆鹗、严景耀，秘书长刘贯一（兼）。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名单如下：团长彭真，副团长张友渔，团员张洁清（女）、甘英（女）、杨述、辛毅、贾星五、彭城、陈明绍、武韵庵、汪通祺、陈文珍（女）、吕展。

义务，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最可靠的支柱。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总是毫不停歇地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团结，并且企图用“各个击破”和“从内部夺取堡垒”的办法颠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坚定地同苏联人民站在一起，坚信革命必将战胜反革命，和平必将战胜战争。

△ 下午，参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献了花圈。

△ 晚，应邀率领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宫为正在莫斯科会谈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赫鲁晓夫介绍了匈牙利事件的经过，并表示决心根据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与民族独立的列宁主义原则继续发展苏波关系，指出苏波两国的国家完整和安全、波兰的安全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友谊的增长和发展。哥穆尔卡表示，波苏会谈的进程证明，苏联方面对波兰方面充分谅解，并且真诚地愿意良好地解决我们所提出的广泛问题，相信会谈会得出良好的互利的结果。宴会结束后，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芭蕾舞剧。

11月18日 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洛巴诺夫陪同下，乘火车从莫斯科到达列宁格勒〔1〕。在列宁格勒车站的欢迎仪式上致词：三十九年前，就是在这里发出的一声炮响，震动了整个世界，并且在人类的历史上打开了新的世纪，从那个时候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便照亮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道路。列宁格勒劳动人民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时期，表现了伟大的英雄

〔1〕 列宁格勒，一九九一年复称“圣彼得堡”。

主义气概，并且在战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城市的建设，使它成为全苏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的榜样。当天，代表团游览了市街，访问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少年先锋宫，参观了地下铁道。晚上，观看了歌剧。

11月19日 上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听取执行委员会代理主席斯特尔查尔科夫斯基介绍列宁格勒市苏维埃的活动、列宁格勒市的财政预算以及各企业和城市交通的情况。当天，还分别了解了市苏维埃执委会各部门的活动情况，参观了基洛夫电气设备工厂、列宁医院、日丹诺夫大学和国家古物博物馆，访问了列宁格勒州加特奇纳区的集体农庄。晚上，到小歌剧院看芭蕾舞《海盗》。二十日上午，参观列宁格勒的斯莫尔尼宫后，前往拉兹立夫参观列宁纪念茅舍。代表们还分批参观了一些工厂、研究所、学校和列宁格勒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在植物保护研究所同一些科学家进行了交谈。全国人大代表团副团长李济深、章伯钧和胡子昂分别讲了话，一部分代表会见了报纸和电台的记者们。

11月22日 率领两个代表团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当日，访问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向代表团介绍了市苏维埃的工作和市政建设情况。还参观了莫斯科飞机制造厂，出席了全厂职工为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大会。

11月23日 率领两个代表团继续在莫斯科参观访问。部分团员参观了全苏农业展览会和工业展览会，访问了列宁故居博物馆所在地——高尔克村等。

11月24日 在莫斯科参观苏联科学院原子能发电站时，对苏联记者说，苏联科学家创立了功勋，因为他们实现了把原

子能利用于和平的目的。

11月25日 率领两个代表团乘专机离莫斯科前往苏联塔什干共和国访问。期间参观了塔什干纺织联合工厂，访问了共和国科学院、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塔什干市苏维埃执委会。

△ 中共中央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通知彭真、刘长胜前去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

11月28日 从塔什干返回莫斯科。晚，率领两个代表团，应邀出席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的苏中两国人民友谊晚会。在会上介绍中国建设的情况，并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是有着巩固的基础的。在思想上，我们有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信仰；在物质上，有着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在组织上有着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纵然发生了纷争，也是应该和完全可以协商解决的。最近，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同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政府的会谈和关于苏波关系的共同声明，就是一个例证。中国人民认为，这次苏波谈判和声明会促进两国的友好团结，并且增进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我们应该像保护眼珠一样地来保护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保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全国人大代表团副团长李济深、程潜、章伯钧和胡子昂相继讲了话。

11月29日 下午，率领两个代表团的全体人员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双方进行了三小时的谈话。

△ 晚，出席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访苏举行的招待会。苏联方面出席的有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莫洛托夫、赫鲁晓

夫、朱可夫和穆希金诺夫等。赫鲁晓夫在会上赞扬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是根据本国条件创造性的运用，而不是机械地搬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始终如一地执行着国际主义的原则。在致答词中，感谢赫鲁晓夫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指出：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不仅是俄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也是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全世界劳动人民解放的道路。中国人民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今天的成就。有苏联的先进经验和宝贵的教训，使我们在革命和建设获得了许多的便利，并力求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的一些新经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体来说，对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经验来说，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小的部分。打个比喻：我们的经验好比是我们面前这瓶花上的一些枝叶和一些花朵，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体，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的整体，好比是花的根和干。花朵和枝叶正是从根和干上长出来的一个统一体。

11月30日 在克里姆林宫会晤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洛巴诺夫、民族院主席拉齐斯和两院各常设委员会的委员们。听取他们简要地介绍了最高苏维埃的机构设置和工作。联盟院预算委员会主席谢宁和一些常设委员会的委员介绍了各自的工作范围并答复了代表团成员提出的问题。苏联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布津，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佩罗夫，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副主席库尔斯基详细地谈了苏联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北京市人委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十月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图拉耶夫。当晚，洛巴诺夫和拉齐斯设宴招待中国客人。

△ 全国人大代表团继续在莫斯科参观访问。副团长李济

深、胡子昂和全体团员参观国立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受到了大学师生和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同日，副团长章伯钧参观了列宁图书馆。

12月2日 上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乘专机离开莫斯科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访问。行前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上午十一时，抵达布拉格，受到捷国民议会主席、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费林格，国民议会副主席霍迪诺娃—斯普尔娜，副总理、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别茨基和布拉格市市长斯沃波达等的欢迎。在欢迎仪式上致词说：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很多先进经验，我们这次访问是为了加强彼此的了解和增进友好，也是来学习的。

12月3日 上午，率领两个代表团，在中国驻捷克大使曹瑛陪同下，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听取费林格主席、各委员会主席和有关议员介绍捷国民议会的组织、工作方法和在政权建设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的情况。随后，率领代表团到无名烈士墓和哥特瓦尔德陵墓献花圈。中午，出席布拉格市市长斯沃波达为代表团访捷举行的宴会。下午，部分团员访问捷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12月4日 上午，率领两个代表团分别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萨波托斯基和总理西罗基。

△ 晚，出席捷国民议会主席费林格为欢迎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委代表团举行的宴会。致答词说：我们认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是世界持久和平的重要保障，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和整个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保障。我们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尊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

础之上的，是以互利互助、共同促进各国经济的高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则为基础的。我们不但有着休戚相关的根本的利害一致作为物质基础，而且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信仰作为思想基础和行动指针。这种团结应该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苟延残喘的命运，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用各个击破、从内部夺取堡垒的伎俩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团结。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应该维护和珍视这种团结，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

12月5日 致电中共中央：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八日下午或晚上开幕，中共代表团已取得签证，拟于七日由布拉格启程去罗马出席会议。代表团的工作方针我们认为应是坚持原则，促进各兄弟党的团结，对国际共运中有争论的问题，除中央已经表示过和已确定了的意见外，不拟发表意见。电报中还就会议讲话稿提出个别修改意见。同日，就这些修改意见打电话给王稼祥，王稼祥同意彭真的修改。

12月6日 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访问苏联情况：苏方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都十分重视中苏团结；苏联现在处境困难，也需要中国支持。他们对我们关于十月革命道路的提法很重视，认为是对他们的支持；对我们关于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普遍满意。次日，又致电毛泽东和中央汇报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情况。

12月7日 受中共中央委员会派遣，同中共中央委员刘长胜乘飞机自布拉格到达罗马，参加将于八日开幕的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

12月8日 和刘长胜出席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

12月10日 晚，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致词

并宣读中共中央的贺词。致词说：（一）意大利共产党是拥有二百五十万党团员和六百万张选票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光辉地位的战斗队伍。这个战斗队伍团结其他民主力量，不但英勇地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而且在建立共和国、制定共和国宪法以及依据宪法原则发展和扩大民主方面赢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最近几年来，又进行了争取意大利人民的政治生活向左发展的斗争，以争取实现现行宪法，保卫民族独立，维护劳动群众切身利益，在民主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经济改革，采取争取世界和平的积极政策。对于你们的党和你们的人民正在进行的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极大的尊敬和同情。（二）目前，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又一次遭到严重的威胁。在近东，帝国主义对于独立的埃及发动的侵略战争计划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是他们并没有中止对于埃及、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以及其他地方的侵略。在东欧，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和破坏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为目的的“冷战”机器又疯狂地开动了起来，企图利用匈牙利的事变打开社会主义阵营的缺口，而在他们的阴谋失败以后，就在西方各国掀起反苏反共的叫嚣。我们同时注意到：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支持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事业，支持苏联对于社会主义匈牙利的援助，保卫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利益，并且认为这是正确的。一切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民，一切以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为共同奋斗目标的进步力量，都要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击退反动派的进攻。（三）中意两国人民有传统的友谊。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阻碍两国人民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人为障碍正在逐渐被破除。近年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接触和自由往来正在逐渐增长和扩大，从而促进着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同

情和信任。我们相信，这种通过扩大接触而建立起来的互相了解、同情和信任，终将导致中意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而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并且符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12月16日 晚，和刘长胜乘火车由罗马回到布拉格。

12月17日 上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向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辞行。在讲话中深信并预祝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继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下，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加强友好合作和团结，加强相互的学习，首先和主要的是加强我们向捷克斯洛伐克的学习，特别是在工业和科学方面。

△ 晚，出席曹瑛大使为两个代表团访捷举行的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萨波托斯基、总理西罗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国民议会主席费林格等党和政府领导人。在全国人大代表团副团长程潜、章伯钧、胡子昂讲话后，讲话说：捷克斯洛伐克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坚强堡垒，是一个具有高度技术的工业国家。在访问中我们看到你们的工厂正在为中国制造一些机器，这表现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中国人民兄弟般的帮助和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社会主义各国内部的团结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我们是携带友谊而来，也满载着友谊而归。

12月19日 下午，在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说。在介绍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和当前的任务后指出：针对帝国主义者造谣诬蔑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不民主那样不自由，揭示帝国主义的“民主”、“自由”是政治上奴役弱小民

族、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破坏、经济上野蛮地、残酷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的血汗。演说最后强调：我们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要加强团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之间要加强团结，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民族独立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之间要加强团结。只要世界所有的和平民主势力团结起来，世界的持久和平就有了保障，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人类的安全幸福的生活就有了保障。我们应该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它和不断地加强它。

12月20日 下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乘火车离开布拉格前往罗马尼亚访问。

12月22日 晚，率领两个代表团到达布加勒斯特，在车站受到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团副主席萨多维亚努、罗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阿波斯托尔、罗部长会议副主席康斯坦丁尼斯库、莫吉奥罗希、政府各部部长，罗工人党布加勒斯特市委员会第一书记德尼拉克和市人民会议主席弗勒多尤等的欢迎。致答词说：罗马尼亚人民在解放以来的十二年中，在光荣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各种斗争中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们这次来访问是为了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学习你们各方面的先进经验；加强我们两国议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12月23日 率领两个代表团，由中国驻罗大使柯柏年陪同，访问了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团，受到正在康复中的罗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罗查接见和副主席萨多维亚努·穆日克等的接待。当重病初愈的格罗查回顾他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访问中国的情景时，当即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委员长表示问候，祝他早日康复，并说，社会主义国家是伟大的，先进的，

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堡垒。中午，率领代表团参观了布加勒斯特毛泽东工厂。晚，观看罗马尼亚的歌舞表演。

12月25日 率领两个代表团，由布加勒斯特到西那雅访问。晚，出席普罗什蒂州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宴会。

△ 致电刘少奇、外交部并报中共中央，提出全国人大代表团负责人商定的访问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名单和计划，预计年后一月二十七日前启程回国。同日，还和刘长胜致电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出席意共八大的情况。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电复同意访问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计划 and 名单。

12月26日 率领两个代表团到达罗马尼亚的工业中心斯大林城，受到斯大林州人民会议主席约尔加的迎接，致答词说：你们城市的“恩斯特·台尔曼”拖拉机工厂为我国生产了一千台拖拉机，这是对人民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帮助，你们的工作对所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有益的。代表团访问了斯大林城人民会议，参观了“红旗”汽车工厂，工艺学院，工人住宅区。晚，出席斯大林州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宴会。

12月29日 晚，率领两个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举行的欢迎宴会。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国民议会主席团副主席萨多维亚努等出席。致答词说，罗马尼亚是一个具有光辉革命传统的国家。我们亲眼看到了你们在各方面的光辉成就。我们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社会主义必将在各种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们在访问中所获得的总的印象，也是一贯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12月30日 中午，率领两个代表团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

议主席斯托伊卡。主人介绍了罗马尼亚的工业、农业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 晚，出席中国驻罗大使柯柏年和夫人为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委代表团访罗举行的招待会。罗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国民议会主席团副主席萨多维亚努等出席。讲话说，代表团在访问中了解了许多先进的建设经验。这次访问加深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团结。

12月31日 中午，率领两个代表团访问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双方互相介绍了工作情况和两国首都的情况。

△ 在全国人大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在罗马尼亚参观了许多工厂、农庄和文化机构，同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团、政府、党等各方面的领导人进行了畅谈。我们的印象很好。

1957年 五十五岁

1月2日 中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离开布加勒斯特前往保加利亚访问。

1月3日 上午，率领两个代表团到达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在车站受到几万群众集会欢迎。

1月4日 上午，率领两个代表团会见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达米扬诺夫。会谈中说：我们这次来访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中保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友好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友好团结，同时也是为了学习你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先进经验。在会见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时说：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需要本国内部的团结，而且也十分需要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需要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及人民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无论国家大小，无论人口多少，都需要这种团结和合作，才能顺利地保卫和平，顺利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日，还率代表团到季米特洛夫墓前献了花圈。

1月5日 上午，率领两个代表团应邀出席保加利亚国民议会第八次特别会议。在讲话中说：中保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成员，我们已经建立起兄弟般的亲密友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着密切的合作。今后我们两国人民将继续发展这种友谊和合作，将继续发展我们同苏联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所有

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国家大小和人口多少，只有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才能胜利地粉碎和制止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复辟阴谋和颠覆活动，才能制止他们的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和顺利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下午，代表团会见了索非亚市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主席波波夫。

1月6日 率领两个代表团参观保加利亚最大的斯大林水库。

1月7日 上午，率领两个代表团离开索非亚赴普罗夫迪夫、季米特洛夫格勒等城市访问。在普罗夫迪夫市中心广场上向参加欢迎会的七万群众转达了六亿中国人民对保加利亚人民的深厚友谊。当日，访问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纺织厂、农业学院、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市政机关。八日上午，在季米特洛夫格勒市参观了工厂，访问了市人民会议机关。下午，代表团回到索非亚。

1月9日 率领两个代表团出席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达米扬诺夫、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和国民议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科佐夫斯基在部长会议大厅举行的欢迎宴会。在讲话中说，在一个多星期的访问中，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建设成就是辉煌的，有不少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1月10日 和刘长胜同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政治局委员拉·达米扬诺夫等进行会谈，交流两党的情况，对讨论的问题双方见解完全一致。晚，和全团成员出席我驻保大使周竹安为两个代表团访保举行的招待会。保加利亚方面应邀出席的有于哥夫、日夫科夫等领导人。会上，和章伯钧、程潜、胡子昂等先后讲话。

1月11日 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离开索非亚前往阿尔巴尼亚访问。抵达地拉那机场时受到

欢迎，发表讲话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勤劳、勇敢富有才能。在许多世纪中，阿尔巴尼亚人民进行了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解放后，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兄弟国家，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着密切的合作。下午，率领两个代表团会见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马尔科。

1月12日 上午，率领两个代表团分别会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费·谢胡和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列希。还参观了地拉那市郊的斯大林纺织厂。下午，会见地拉那市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主席伊·泽尔库巴等领导人。

1月13日、14日 率领部分团员，在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马尔科陪同下，访问斯库台市，参观了工厂和文艺机构，参加了群众欢迎集会。十四日晚，应邀率领两个代表团出席马尔科举行的宴会。在答词中说：我们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国家大小、人口多少，都是需要互相支持和友好团结的。同日，章伯钧率领另一部分代表团成员访问了阿南部的发罗拉城和斯大林城。

1月15日、16日 代表团成员分别同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地拉那市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阿尔巴尼亚工会、妇联等部门的负责人座谈，交流工作经验。

△ 收到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在访问南斯拉夫时拟采取的方针和态度。

1月16日 和刘长胜会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别利绍娃、谢胡、马尔科等。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徐以新在座。晚，同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徐以新为代表团访阿举行的招待会，并在讲话中热忱感谢阿尔巴尼亚议会和党政

部门及人民群众的亲切接待。列希、马尔科和谢胡等阿领导人应邀出席。同日，胡子昂率领部分代表团成员访问都拉斯市。

1月17日 上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乘专机离开阿尔巴尼亚前往赴南斯拉夫访问。在地拉那机场欢送会上致答词，赞扬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保卫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的坚强意志，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朝气蓬勃的精神、创造性和积极性。列希、马尔科、谢胡等到机场送行。

△ 中午，率领两个代表团抵达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在机场讲话中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共领导下战胜了德、意法西斯侵略者，取得了全国的解放，十多年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还在我们各自进行革命战斗的年代里，两国人民就已经相互寄予无限的同情和关怀。两国建交以来，友好合作关系在不断地加强和发展。并强调说：我们之间的团结和合作、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团结和合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对于我们两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世界和平和各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重要的保障，是中南两国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爱好和平人民当前最大的利益。我们应该重视这种团结，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1月18日 接到正在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国政府会谈的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要彭真单独会见铁托一次，向他转达中共中央的建议：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

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1〕。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和周恩来：在会见铁托时，对目前召集兄弟国家会议问题不要表示意见。

△ 上午，李济深、章伯钧、胡子昂副团长及两个代表团团员，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陪同下，会见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皮雅杰。随后，到贝尔格莱德市郊阿瓦拉山，向无名英雄墓献花圈。中午，出席皮雅杰主席的宴会。下午，率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市人民委员会，会见了委员会主席米尼奇，参加了委员会讨论城市社会计划草案的会议。

1月19日 上午，率领代表团参观摩托车工厂和原子能研究所。下午，同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皮雅杰等负责人员举行座谈，交流议会工作情况，出席座谈会的还有联邦院和生产者院的主席、副主席和两院各委员会负责人。晚，出席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的招待会。

1月21日 率领两个代表团在伍修权陪同下赴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著名的“谷仓”、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首府诺维萨特，会见了该自治省和诺维萨特市议会和政府的领导人，就有关农业问题进行了长时间交谈，还分组参观了农业机械工厂、农业研究所、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

1月22日、23日 率领两个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中部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共和国。在首都萨拉热窝，代表团参观了历史博物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皇太子被刺的

〔1〕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向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转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铁托表示还是召开双边或多边会谈好。二十五日，周恩来将此情况报告中共中央。

图片展览馆、木材加工工厂和钢铁联合企业；还同共和国、县、市领导人和企业负责人就有关市政、公社和企业自治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1月24日 上午，率领两个代表团抵达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人民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市，参观了拉德·冈查尔电机制造厂，并就工人委员会和企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下午，参观了民族博物馆和画廊。晚，观看歌剧。二十五日，率领部分团员参观了萨格勒布市最大的百货公司，随后同克罗地亚国民议会经济委员会主席察·杜山、克罗地亚贸易协会主席马·杜山和该百货公司的经理、工人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等，就公司的经营情况、职工工资、利润分配、物价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另一部分团员由章伯钧、乐松生和周叔弢率领分别同该共和国农业生产合作总社和萨格勒布市人民委员会就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市政问题进行了座谈。

1月26日 上午，率领两个代表团到达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人民共和国首府卢布尔雅那。当日，赴市郊的波斯多伊纳参观了世界闻名的钟乳石洞等。晚，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同斯洛文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马林科、副主席托姆希奇、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组织书记科扎克，以及该共和国的党、议会、政府等的其他负责人、社会各界名流等八十多人会面，就文化教育、卫生保健和公社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

1月27日 上午，率领两个代表团访问了卢布尔雅那市人民委员会，参观了一些文化、社会机构。出席国民议会主席马林科举行的午宴，并讲话说：中南两国人民有着长期的友谊，我们都主张一切国家之间按照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处理相

互间的事务。但这并不是说，在我们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之间不会对若干问题的看法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分歧。在我们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之间，不同的意见比起相同的意见来，往往是比较小的和次要的。同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从团结出发，经过实事求是的冷静的科学的同志式的讨论和研究，不同意见应该是可以取得一致的。即便暂时有若干论点不同也并不要紧，可以在继续探讨中求得一致。我们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兄弟国家人民一道，为不断地加强我们的团结尽一切可能的努力。下午，代表团返回贝尔格莱德。

1月28日 下午，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应邀出席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爱德华·卡德尔举行的茶会。双方在谈话中表示相信中南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今后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1月29日 率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到总统府拜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铁托，合影留念后，即和铁托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在座。

△ 向中共中央电话汇报同铁托谈话的情况。

△ 晚，和两个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出席伍修权大使为代表团访南举行的招待会。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皮雅杰、工会联合会主席萨拉伊、贝尔格莱德市人民委员会主席米尼奇等应邀出席。

1月30日 下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离开贝尔格莱德，乘飞机取道莫斯科回国。

1月31日 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当日，会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

共中央委员波诺马廖夫和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会见时在座。会见结束后，即率领两个代表团离莫斯科回国。

2月1日 下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回到北京。三时二十分，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参加的会议，汇报代表团出访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

△ 分别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联盟院主席洛巴诺夫、民族院主席拉齐斯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皮雅杰、贝尔格莱德市人民委员会主席米尼奇，感谢他们对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委代表团热情友好的接待。

2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归来》的社论。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派出的这个访问团，在增进我国人民同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方面，在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的事业方面，获得了良好的成果。

2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全国总工会党组提出的《关于职工罢工请愿情况的报告》，决定由中共中央工业部和全国总工会党组代中共中央起草一个处理企业职工和党委、行政之间的关系的指示。会议还决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收集、研究学生请愿罢课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一个报告，并代中央起草一个解决学生同学校党委、行政之间的关系的指示。在讨论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干部管理制度的文件时，发言说：过去我们思想不明确，所以初中、高中的毕业生都要求升学。可以学日本的办法，初中多搞职业教学，毕业后可以当工人、农民和参军。会议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办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干部学校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一九

五七年接收党员工作的通知》。

2月8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提出：为了缓和目前经济生活和财政收支的紧张局面，必须适当地调整一九五七年度基本建设的规模，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

2月9日 晚，出席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的驻华使节为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六国归来在北京饭店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2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少数工人罢工、学生请愿和复员军人为安置问题发生闹事等问题。发言说：学生、工人请愿，应分别清楚，工人不满，派人去上级部门讲是正当的，不应当一律批判。北大研究生要找总理，已解决。解决不好，再找也是对的。邓小平说：学校发生一些问题，总的应该说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凡是合理的要求，找出原因改进工作；不合理的，做工作说服。总的原则是不要动武，要讲清道理。会议决定由胡乔木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学校处理学生罢课、请愿问题的指示。为了控制北京市的人口，会议还决定中央的任何部门，要在北京市设立机构、新建房屋，须服从北京市的建设规划，否则，北京市委有权阻止。

△ 晚八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出访欧亚十一国访问情况。

2月13日、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全国政协委员视察文教工作和政法工作的问题。

2月15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召开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各项问题。关于增补政协委员问题，议定由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徐冰等研究并提出名单交政治局常委审阅。会议还决定彭真任全国政协党组书记，李维汉任副书记，徐冰任秘书长。次日，和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徐冰等继续商谈增补政协委员问题。

2月17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1〕、王稼祥、胡乔木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2月19日—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十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和新华社的工作等问题。在讨论新华社的工作问题时发言说：照目前情况，《参考消息》反面问题登得多，还有内部参考；党报是教育多，新闻不多，而大家要求多知道消息，如不改变，就会影响党报威信。苏联、捷克的学生中都有不看《真理报》而听外国广播的。报纸如不改，不会有好的结果，要研究解决。对干部教育，国外的重大问题不知道或知道得很晚也不好。首先要知道基本事实，才能判断是非。所以我主张登一些反面的，有些很反动的东西也会激起对敌的仇恨，或认清某些人的面目。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讲话，好的坏的都可以登。在方针上，利害第一，全面、客观；不要把利害同全面客观对立起来。第二，新闻的写法要改进，有些新闻写得既不全面又不清楚。我们的记者，一定要研究报道对象的情况，如在意大利，就要了解意大利的全面情况，才能写出好东西。第三，时间问题也必须注意。新华社只此一家，就不抢新闻，不赶时间。新闻要求快，特别是国外新闻。设备可以解决，主要是记者的主动性要加强。第四，

〔1〕 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至于民办官办，问题不大，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法律上有所区别，民办报纸少登点奉命声明就是了。会议决定，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研究修改民族自治条例。会议讨论了在民族杂居地区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共中央关于研究工人阶级问题的通知草案的修改等问题。

2月23日、25日 主持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三十七次会议，讨论召开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准备工作。

2月23日 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徐冰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拟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的报告稿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等问题。

2月24日 下午，和邓小平、李维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商谈推迟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问题。

△ 和邓小平、李富春、李维汉、杨尚昆、徐冰出席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会议商谈增补全国政协委员事宜。

2月25日 晚，和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徐冰、罗瑞卿、徐子荣应约到毛泽东处商谈问题。

2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日程安排、中共中央《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草案）》和农业税问题。发言说：周总理出访亚欧十一国的情况，政协常委很关心。毛主席决定，先开最高国务会议，后开政协会议。毛主席说，要使政协和人大会议成为教育党外人士和与党外人士共同办事的过程。具体安排是，先由李富春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纲要，征求意见，然后在怀仁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政协委员列席，党内一些同志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讨论几天后，请周总理报告出访情况。在讨论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时，邓小平传达：毛主席说，少数工人请愿罢工，要承认是合法行为，是

调节人民内部矛盾、调节社会生活的方法，此起彼伏地解决，可以避免大规模地爆发，对严重的官僚主义，应该采取这种方法。党员应该站在群众方面反对官僚主义。邓小平说，过去没有讲过这个问题。工会的文件太长，而未直接讲党员领导群众反对官僚主义问题，所以文件中要说清楚。

△ 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预备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处理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陈云、邓小平、陆定一、李维汉、徐冰、林枫〔1〕等及党外人士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张治中〔2〕、程潜、章伯钧、马叙伦、龙云〔3〕等三十七人。

2月27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请愿问题的指示（草案）》。

△ 晚，和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徐冰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3月4日 晚，和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西藏、新疆问题和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问题。

3月5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

〔1〕 林枫，时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

〔2〕 张治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3〕 马叙伦，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

龙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取张经武、汪锋汇报关于西藏工作和讨论甘孜地区的改革问题。

3月5日—20日 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五日下午的开幕会上，听取周恩来作《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

3月6日—13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十二日的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3月6日 在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举办的有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的女干部参加的报告会上作形势报告，鼓励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中，继续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能力，增加知识，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

△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的会议。陆定一、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周扬、石西民〔1〕、杨述等共十六人参加会议。会后，同毛泽东谈话。

3月7日 晚，和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教育部及部分省市教育厅局负责人。

△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收到毛泽东批阅的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反映：自治州牧区和农牧区早已完成合作化，

〔1〕 石西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农业区的民主改革，十四万人的地区已完成，其余十八万人地区正在进行和准备继续进行。报告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巩固改革成果，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教育藏族上层，认清前途，消除顾虑；促进藏族地区的发展和进步。毛泽东批示：“我认为应当同意这个方针。”

3月8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西藏自治区的民主改革问题时，发言说：西藏的民主改革，从客观上说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国家也有力量支持，问题是条件是否成熟。西藏的上层人士是不愿意主动改革的，他们又掌握了宗教领导权，西藏人民中少数要求改革，大多数人还缺乏阶级意识，和统治阶层尚未分清界限，群众中缺乏干部力量，在内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单靠外力不行。汉族地区土改中曾发生过“明改暗不改”的情况。在藏区，如果群众条件不成熟，反动分子就会煽动民族和宗教情绪，说是汉人欺负藏人。当然，反动分子要搞独立是不允许的。为了准备改革的条件，目前要从内部做工作，争取右派和中间派，发展进步力量。达赖目前还处于中间状态，可左可右，我们对他要仁至义尽，争取他进步。我们在西藏只孤立那些闹独立的人；培养干部，消除民族隔阂，多为藏民办好事，促进奴隶的阶级觉悟。进藏的人民解放军，是一个大的工作队，不打仗，不筹款，就为人民做好事，促进其内部分化。我们不吃他们的粮，有灾荒还给予救济，过若干年，干部起来，民主改革就好办了。

△ 晚，参加毛泽东约请沈雁冰、舒舍予、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路坎、胡采、

蔡楚生、赵丹〔1〕等文学、艺术工作者出席的座谈会。座谈结束后，和陆定一、康生同毛泽东谈话。

3月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继续讨论西藏工作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问题。在发言中说：康西地区不同于西藏，不少地区改革已经完成了，目前的工作是要好好地安置藏族的上层人士，对寺庙实行包下来的政策，长期维持，准备花钱，搞出样子给雅砻江以西的人士看；道路要用一切办法修，越快越好，雅砻江以东地区，大量培养干部，武装藏民。反动分子不动，和平改革；他们动手，就有计划地反击。已经改革了，不能停下来，西藏的上层人士可能会叫，要分析工作上有没有错误，要总结经验，干部和军队都要总结，要开展宣传活动。

△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到南苑机场，欢迎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威廉·西罗基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晚，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西罗基一行。

〔1〕 沈雁冰、即茅盾，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舒舍予，即老舍，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巴金，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周信芳，京剧表演艺术家，时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徐平羽，时任上海市文化局长。方纪，作家，时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于黑丁，作家，时任湖北省文联主席。周钢鸣，作家，时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常苏民，作曲家，时任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音乐家协会主席、西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路坎，作家。胡采，时任西安市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蔡楚生，电影艺术家，时任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赵丹，电影表演艺术家，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

△ 下午，会见阿尔巴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3月11日晚，参加毛泽东约请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胡锡奎、杨献珍、冯友兰〔1〕等高等教育工作者出席的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和陆定一、康生同毛泽东谈话至次日凌晨一时。

3月12日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十二次会议。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召集的大学、中学、报刊、文艺、宣传五个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后说：毛主席召集的座谈会都是和党内外同志一起谈的，一方面是调查情况，一方面是酝酿思想，凡与工作有关的都谈了，总的是百花齐放。会上主席一再问放得够不够。对陈其通的文章〔2〕，毛主席批评他们方法是教条主义，方针是违反百家争鸣，但是各省把意思传反了，说毛主席赞成这篇文章。毛主席说，有人说百花齐放放坏了。不是坏了，不放会有这许多思想出来吗？这些思想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有五百万知识分子，百分之十懂马列主义世界观。高级干部中究竟有多少人赞成百家争鸣还是个问题，他们不了解中国有五千万地主、富农，还有大小资产阶

〔1〕 杨秀峰，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陈望道，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彭康，时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匡亚明，时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彭迪先，时任四川大学校长。冯乃超，时任中共广东省委高等学校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山大学副校长。胡锡奎，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献珍，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冯友兰，哲学家，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

〔2〕 陈其通的文章，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发表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上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

级，他们的世界观未经改造。怎么办？一个是压，斯大林后期，混淆矛盾，敌我和是非不分，就是压。这个方针是错的，我们不能学。我们要走另外的道路，就是用辩论的方法，在辩论中教育人，说服人。毛主席说，我们有许多事要与党外人士合作。各门自然科学目前我们事实上不能领导，只能领导计划、物资安排，第三个五年计划后，情况才能改变。党内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使党内党外合作不好，要打破“小窝子”作风，用辩论的方法，经过十年、几十年，把这些人教育过来，争取过来，然后通过他们教育人民。在讨论处理当前矿工、临时工和学生罢工、请愿等问题时，会议提出如下安排：凡是工人、临时工请愿罢工，由赖若愚负责；学生要求升学、罢课等，由胡耀邦〔1〕负责；山西潞安矿工的事件，由李雪峰〔2〕批文件。北京市各部门，由彭真通知处理。

△ 和周恩来出席苏联政府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3〕的全部设备无偿赠送给我国的接交仪式，接见在医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十三日，设晚宴招待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二十一日，医院改名为北京中苏友谊医院。

3月13日晚，参加毛泽东约请郭沫若、张劲夫、童第周、钱三强、潘梓年、向达、费孝通、谈家桢、沈志远、翦伯

〔1〕 胡耀邦，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2〕 李雪峰，时兼任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

〔3〕 该医院于一九五二年六月由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援建。

赞、于光远〔1〕等科学界人士出席的座谈会。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会后，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谈工作，和陆定一、康生等在座。谈话至三时三十分。

3月14日 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关于北京地下铁道线路选择的初步方案请示中共中央。报告说：市委认为线路设定后，需要三年设计，七年施工。苏联专家回国后，我集结的技术力量可自行钻探设计。

3月15日 主持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增选全国政协常委名单草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关于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和关于增产节约问题的决议初稿。

3月16日 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高等学校党委的负责人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即将开展的整风问题。指出：人民

〔1〕 郭沫若，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童第周，生物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物地学部副主任。钱三强，核物理学家，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潘梓年，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向达，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兼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费孝通，社会学家，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副局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常委兼文化教育部部长。谈家桢，遗传学家，时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沈志远，经济学家，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翦伯赞，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于光远，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内部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四十年来没解决。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态度：一方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两类矛盾混淆起来，要搞大民主，想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我们；另一方面，老干部认为党、马列主义不能批评，中央、地方没有官僚主义，批评就是居心不良，阶级异己。内部问题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解决。这些同志为党为国，但认识不对。不是“放”坏了，问题本来存在，不让讲，就藏起来，背后讲。思想是主观的东西，又是客观存在。对付官僚主义，罢工罢课闹事可以，不然死官僚主义没法解决。总之，用这种办法把消极的东西和矛盾揭发出来，不断地加以解决。不然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延安整风后，十二年没有在全党整风，但党员人数增加了十倍。老干部，整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新干部还有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敌我不分。不搞大会斗争，搞小组会，先放。六、七、八月要开始整风，北京市要作典型。

△ 和周恩来、陈云、陆定一收到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稿。稿中“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一句，改为“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3月17日 和周恩来、陈云、陆定一收到毛泽东发自天津的来信，指示加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信中说：“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

3月20日 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闭幕会。周恩来在讲话中说：这次大会发言踊跃，内容丰富，可以说实现了百家争鸣的号召。

△ 上午，召集谭震林、李雪峰、杨尚昆、胡乔木、李颀伯〔1〕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草稿等文件。当晚，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会议批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甘孜自治州继续进行民主改革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学校中加强思想政治领导、改进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等事项。

△ 审阅《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发表的题为《贯彻人民政协的新精神》的社论稿。

3月23日 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闭幕后召开的全国政协全体党员大会并讲话。讲话就百家争鸣问题指出：根本的方针是不要把人大和政协的会议搞成形式，敷衍了事，而是要认真地同党内外人士一起，共同商量解决问题。“就是要百家争鸣，唱对台戏”，“百家争鸣，看谁鸣得对”。“有意见的都在会上提出来，这样，就可以改进工作，人民内部关系就可以得到调整，有一点矛盾就可以解决，就可以避免矛盾的总爆发。”

△ 晚，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巴基斯坦国庆日招待会。

3月25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基本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

〔1〕 李颀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决定前者由胡乔木作个别修改后当天发出，后者由李立三负责再作修改。指示和通知下发前，均送毛泽东审阅。会议还讨论了拟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区域范围、西藏工委干部的调配、农村副业生产的管理等问题和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解决干部、军属生活困难问题的请示。

3月26日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人民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欢迎威廉·西罗基总理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的大会，并致欢迎词。二十七日下午，出席周恩来和西罗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中捷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字仪式。同时签署的还有中捷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中捷文化合作协定、中捷保健合作协定。晚，在全聚德设宴为捷克客人饯行。二十八日上午，和周恩来等到北京西郊机场为捷政府代表团送行。

△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几年来北京市民族工作的情况：全市现有四十八个少数民族，人口共十七万二千多人，其中回族八万二千九百七十人；满族八万零四百十一人；蒙古族六千九百四十六人；藏族三百三十三人；其他四十四少数民族的人口共一千三百八十七人，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来京的干部和学生。报告提出了加强民族团结，发挥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性的措施。

3月27日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先后接见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的代表（包括二十八个民族的一千多位业余演员）、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和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大会的全体代表。

3月31日 下午，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四次（扩大）会议上，作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六国情况的报告。代表团副团长李济深、程潜、章伯钧、胡子昂作了补充报告。

4月1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李维汉和平杰三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委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在发言中说：（一）关于民主党派的问题。民主党派组织上独立，行动上自由，政治上、思想上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没有改变。独立、自由是指在组织上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彼此有批评的自由，互相监督。中央统战部过去管民主党派是对的，今后组织上不加干涉，但政治上、思想上要抓紧。报纸刊物由中央宣传部管理。章伯钧想办《光明日报》，我们决定放，有错误可以批评。（二）有人认为统战工作中对资产阶级“重安排，轻改造”，我看不这样提，不要把对人的安排同思想改造对立起来。公私合营后，资本家一定要安排，至于具体工作中安排得够不够，思想改造是否抓紧，各地自己去检查，主要看方针是否有问题。党内要注意两种倾向：一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特别是同党外同志商量很不够，“统左不统右”的现象是有的；二是思想改造抓得不够。这是全党的责任。（三）精简机构的精神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动摇。要因事设人。是否每个县委都设统战部，不做统一规定。工作上的问题要及时向党委请示报告。

4月2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会上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一）争取和欢迎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自愿回国参加建设，特别是学科学技术的人员。回国后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要请先从国外回来的人对他们进行教育，组织参观，编一点解放前后对比的材料给他们看。（二）关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名行文问题。国务院在行政上是有威信

的，有的文件不一定和中共中央联名，但有的是必须的，如需要发动群众来完成的工作。（三）关于转发中共山东省委解决军人家属生活困难的文件。赡养父母是子女的义务，首先要进行道德教育。合作化以后，高级社土地不分红，没有劳动力的老人生活困难，“五保户”应该由合作社照顾好。合作社包不了，儿女又养不了的，民政部门应给予救济。报纸应造赡养父母的舆论，到适当时机再立法。（四）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是毛主席从天津来信提出的。政治课被削弱是事实（胡乔木插话：中学政治课去年经中宣部同意停的），责任不在教育部。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产阶级合营了，小资产阶级合作化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但是思想上对抗性矛盾还是有的。政治思想教育要对症下药，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具体化，中宣部要召集各有关方面讨论，提出解决方案。要恢复政治课，编写新的政治教材，要把过去编大、中、小学教材的人集中起来，系统地研究一下再定。此事由教育部门出面组织，和中宣部一起研究。调干部加强政治教育要定下来。（五）公开报道企业民主管理内部试验的经验要慎重。北京电车公司民主选举厂长，是企业群众路线具体化的试验，和企业归工人所有有原则的区别，未经中央认定，不得公开报道。新华社是中央通讯社，重要的言论、政策性的新问题，要报中央，就是中央书记处决定，也要请示政治局。

4月3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联席会，就委员们赴各地视察以前听取有关部门情况报告的安排作了说明：今年全国有三百六十万小学毕业生不能升中学；一百一十万初中毕业生，只有四十万可以升高中；十九万高中毕业生，只有十一万可以升大学。由高教部、教育部报告情况。农村问题，去年有一亿几千万亩

地受灾，这些地区的灾情由主管部门作报告。高法院、高检察院、司法部的报告也要组织听。除参加视察的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外，在京的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也可以参加会议听报告。会议商定上半年视察工作的时间为四月十日左右至五月十日左右。

4月4日—6日 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及其说明，批准财政部党组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六年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预算安排及其说明等。

4月4日 晚，出席匈牙利驻华大使馆为庆祝匈牙利解放十二周年举行的酒会。

4月5日 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机关党员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这次到各地视察，是全面检查肃反工作、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和思想改造工作，使全国人大和政协常委会的委员们了解情况，认真地同党协商解决国是、民事。在视察中，党员可以同党外人士讨论，看法不一致的，要耐心说理，入情人理，使人口服心服；一时说不服的就等待。这样生动活泼，有益于改进工作。经济制度基本解决了，思想斗争、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思想改造工作，要针对具体思想情况，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地做，才能使人心悦诚服。

4月5日—17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六至六十五次会议。会议先后听取并讨论了有关部门负责人向参加视察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介绍的工作情况。介绍工作情况的负责人有：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公安部副部长周兴和

司法部部长史良。

4月7日 下午，和周恩来、陈云等去机场迎接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八日下午、晚上，和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陪同毛泽东会见并宴请西伦凯维兹及其一行。九日下午，主持北京市各界人民欢迎波兰政府代表团大会并致欢迎词，赞扬波兰人民在重建华沙城的事业中表现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坚强毅力、无限热情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十一日上午，出席周恩来和西伦凯维兹签署中波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 审阅公安部党组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现有的二十三名苏联顾问、专家，聘期满后，拟留顾问组长一人，技术性专家十一人，其余人员陆续回国。批示“可以同意”，并报周恩来、邓小平核准后，交公安部党组照办。

4月8日 下午，和朱德、陈云、李富春、聂荣臻应约到毛泽东处谈工作。

4月9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十五次会议，讨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在听取薄一波、李先念、杨尚昆、习仲勋等提出在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着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领导工作方面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的发言后，说：请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共青团、总工会等部门先准备意见，如对高级干部的整风怎么办？知识分子和军队中怎么搞法？并请周扬电告陆定一，在上海向几个省、市的同志征求意见。集中几个方面准备的意见后再座谈几次。

△ 审核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我党致新西兰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贺词的请示》。

4月12日 主持政法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公安部副部长周兴准备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关于肃反工作情况

的报告稿。

△ 中午，同周恩来谈话。

4月13日 下午，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经毛泽东四月九日审阅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处分党员的批准权限的具体规定等。

4月14日 下午，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出席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成立大会的代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五年优秀影片得奖者代表、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云南省、湖南省各民族参观团全体人员。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4月15日 上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听取张苏〔1〕报告广西省平乐县等地区去年灾情严重，领导估计不足，救灾措施不力的严重情况。在讨论中说：广西饿死人的问题，不仅是平乐县，是一个严重问题。建国以来，中央三令五申，发生任何灾情都不能饿死人。有官僚主义就会饿死人。国务院已发了通知，要广西彻底检查。去年十二月，中央派人去检查，监察部长钱瑛也率检查组前去检查，检查组月底可能回来。这件事是不能容忍的，应该严肃处理。提出有三个处理方案：一是由监察部向国务院提出报告，属于行政处分的，由国务院处理；应受法律制裁的，交最高人民检察院处理。二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处理，该法办的向最高人民法院起

〔1〕 张苏，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

诉；属于行政处分的再转回国务院处理。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调查委员会去处理。

△ 下午，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到南苑机场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晚，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毛泽东会见伏罗希洛夫并共进晚餐。

4月16日 上午，陪同伏罗希洛夫游览景山公园。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邀请伏罗希洛夫发表演说。晚，出席周恩来为伏罗希洛夫一行访华举行的酒会。

4月17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讨论进一步办好《人民日报》问题。

△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在会上就以下问题作了说明：（一）需要起草一个劳动教养法。社会上有一些害群之马，不遵守公共道德和社会秩序，如小偷小摸，戏耍妇女，蓄意损毁公物等等，虽还不构成犯罪，但屡教不改，群众不满，而执法机关又无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成立小组，研究起草劳动教养法。（二）关于肃反运动中的十人小组。这是群众肃反运动中建立的工作小组，它不是司法组织，不能逮捕人，不能起诉，也不能审判，而是领导群众清查、检举反革命的组织。因为在群众性的清查中，会提出很多线索，很多检举材料，这个小组专门研究分析检举材料，督促有重大嫌疑的人交待问题，也防止重点怀疑对象发生越轨或自杀行为。在群众运动中，这是需要的，但运动初期，有的单位因为没有经验，未经监察机关批准，宣布“隔离反省”，这些不合法的事情，后来纠正了。（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对肃反中的问题可以全面检查。此次人大和政协常委视察

的时间不长，全面查案卷，不可能，只能抓重点：一是查冤案、错案，冤案一定要平反，错判的一定要改正；二是查在押的或尚未判决的案件，因为这是比较重要的。已判决的案件，如有人申诉，也可以查。至于量刑略重略轻的，不是重点，有的一时难于决断。到某一机关视察，可以问那些被斗过的人，本人有无意见，群众有无意见，这样，在短期视察中可能事半功倍。

△ 下午五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到毛泽东处商谈问题。

4月18日 下午，主持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首都各界十万人参加的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大会，并致欢迎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

4月19日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部分成员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谈外出视察的情况。

4月20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1〕总结大会上，就学习讨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所提出的问题作总结讲话。指出：（一）中国历史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基本解决，反革命残余基本肃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就显露出来了。在思想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与解决敌我矛盾根本不同。对敌我矛盾是用打倒、压服、强制改造和消灭的办法；对人民内部矛盾，除了

〔1〕中共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于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三日召开，有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一千四百九十四人参加；四月二十日召开总结大会，有二千八百多人参加。

违法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外，只能用同志式的态度，民主的方法，讨论说服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三）派代表向上级领导请愿是正当的手段，不是违法行为，不应当阻挠或压制。罢工、罢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和敌我矛盾混淆，也不要和犯法混淆。有些单位领导上官僚主义严重，群众起来“闹事”，领导应和群众很好地商量；群众所提的要求，凡是应该办和可能办的，必须迅速解决，现在还办不到或错误的意见，应实事求是地向群众解释清楚。（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断提高认识、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是好事、喜事。既要百花齐放，就一定会出现香花和毒草；而真理和谬误只能从争鸣、讨论、斗争中鉴别出来。怕放、怕鸣是怯懦的表现，怕“闹事”是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气魄。要在争鸣中搞清问题，讲通道理，正确的接受，错误的批评；要改变老习惯，喜欢搞“全场一致通过”，那样就会停滞不前。强调指出，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放得不够，鸣得不够。（五）党内是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是联合组织，党内有民主，在党的政策没有决定前，可以讨论，组织决定以后，个人的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但必须执行党的决议，不允许“另立门户”。（六）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要相信党外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同党搞好关系，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和党共事七八年了，应该互相信任，成为比较熟悉的朋友。有人说有“墙”，实际上不存在。近几年比较疏远，市委有责任，有事和大家商量不够。所以党要整风，先整党内，党内先整领导干部，党外同志自愿参加，不强加于人。

△ 下午，会见以书记长、众议员浅沼稻次郎为首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二十三日晚，出席该团举行的临别宴

会，并讲话说：从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来看，中日两国都希望进行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都希望两国关系早日正常化，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邦交，彼此往来还受着阻挠，是因为在我们之间还有着美帝国主义设下的障碍。

4月22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讨论高等学校知识分子入党问题。讲话指出：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中央在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前已决定，可是我们动作不快，难怪人家不满。我们党内对知识分子总有一点宗派主义情绪。品质好、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就可以吸收入党，吸收这样一批人，可以提高我们党的知识水平，不能因为有缺点就不吸收。梁思成主张“大屋顶”，我们共产党员也有主张“大屋顶”的，不能因此不吸收他。知识分子入党后，仍然有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其实我们现在还有，所以要整风。中央同意北京先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要放开，不要束缚自己的手脚，要相信我们党有能力领导。在吸收他们入党之前，应找他们开个会谈谈，把我们党内有些毛病统统和他们说清楚，要说明党是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健全起来的，党总的是健康的。我认为，允许罢工罢课，实行“双百方针”，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等措施，都是有利于党调整人民内部矛盾。

4月2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决定：（一）同意李立三的意见，厂、矿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各地可以逐步推广，不必限于试点。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的规定。（二）把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送各国兄弟党。在讨论关于改进工业系统干部管理制度问题时，对有些兄弟国家强调物质刺激和惩罚制度，发言表示异

议。

△ 和邓小平收到毛泽东批示转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党组关于迎接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给下属组织的通知，毛泽东在转发文件上加写：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是“为了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肃清反革命残余分子和处理尚待处理的反革命案件，科学地总结肃反经验，以便发扬正气，批判歪风，帮助绝大多数正直地忠心耿耿地在肃反战线和司法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同志，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之目的。”并批示：彭真和邓小平“再阅”后交杨尚昆发出。

4月25日 零时四十五分，应约到毛泽东处谈《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的修改问题，凌晨一时十五分谈话结束。同日，去杭州。

△ 晚，和周恩来、贺龙、江华〔1〕等出席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为伏罗希洛夫一行访问杭州举行的宴会。二十六日上午，和周恩来、贺龙等陪同伏罗希洛夫一行在杭州参观访问。二十八日中午，陪同伏罗希洛夫一行到达广州；下午，和贺龙、陶铸等陪同苏联客人游览广州名胜古迹。二十九日上午，陪同伏罗希洛夫参加广州各界十万人在越秀山人民体育场举行的欢迎大会。当晚，和贺龙等陪同伏罗希洛夫一行回到北京。

4月26日 夜，在杭州打电话给张苏，嘱告刘仁：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天安门游行，加上两个口号：（一）欢迎伟大的盟邦元首伏罗希洛夫主席（或同志）；（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万岁。

4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中国共

〔1〕江华，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五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4月29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康生、陈伯达〔1〕、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整风运动的有关问题。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三十分。

4月30日 上午，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整风运动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2〕。”

5月1日 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群众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讲话，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等四十六个国家的贵宾参加大会，表示热烈的欢迎、深切的感谢和敬意。讲话强调我们将永远同伟大的苏联人民团结在一起，永远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永远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坚持奋斗。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从革命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发生变化。”我们将按照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指示，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建设的同时改造自己。因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

〔1〕 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2〕 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加强党和政府同工、农、兵、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紧密联系，加强全国六亿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完成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伟大任务。

△ 晚，陪同毛泽东等和伏罗希洛夫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并与各国代表团见面。

5月2日 上午，到中山公园参加游园会。晚，在中山公园文化俱乐部举行酒会，招待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萧恢塔、马格里勃（摩洛哥）国民协商议会代表团和日本东海地方自治体访华代表团。

5月3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北京市委关于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的传达和学习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讲话说：（一）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大声疾呼，所有的党报宣传落在非党报纸后面。百花齐放在延安时就讲过，百家争鸣去年讲了一下，推不动。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人民日报》没有表示态度，不是紧跟中央的精神。所以，宣传工作会议党内党外一起开，会后才逐步提高认识。（二）北京市干部做实际工作埋头苦干，抓得紧，但是嗅觉有点迟钝。到三月底为止，先后向党内外干部、教职员、民主人士等三十五万人进行了传达，但认识还不系统。（三）斯大林的根本问题是对两类矛盾没有处理好，没有找到规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受影响。毛主席的讲话是划时代的。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已讲过，人民内部只有民主集中，没有压服。现在形势改变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把问题展开了。我们还没有认真讨论，还没有掌握。因此市委要分组很好学习，搞通思

想，然后在局处长、区委以上、大厂党委以上干部中检查思想。不要怕鸣，不要怕放，不怕罢工、罢课，先锋队自己先站稳，然后到群众中去，每人联系两个合作社，或两个工厂，参加劳动，联系群众。全国现在还有五千万过去的地主、富农，有的十年二十年变了，有的不变，要耐心地、说理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总会有一些人与我们不一致。所以人民内部大量的的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没法团结六亿人民战胜自然。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脑子里还没有酝酿成熟，认识是逐渐提高的。

5月4日、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团中央起草的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草稿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

5月4日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传达和学习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向中共中央呈送报告。报告说：（一）到三月底，全市已有三十五万党内外干部、教职员、工人、学生、民主和工商界人士听了传达；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有一千四百多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讲话。对去年下半年以来处理人民闹事的情况开始作检查。（二）学习开始，包括市委在内的许多干部实际上是不理解或不完全赞成，经过学习，党内拥护中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方针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有怀疑和顾虑”，如认为“放”应有限制；要“适可而止，防止产生无政府主义”；首当其冲的基层领导感到“措手不及”，有埋怨，认为许多问题是“上级的官僚主义或某些规章制度所造成的”，不是他们权限以内所能解决的，担心“从此天下多事”；有的表示消极，“实在没办法时，只好摘掉乌纱帽”。（三）党和知识分子间的关系有所缓和，有的“敢于

管事”，“发表不同意见多起来了”，“批评也尖锐起来了”，但还有不满：如对肃反中的错误和思想改造中的批判“耿耿于怀”；对有些社会科学课程不让开讲和入党申请长期不解决不答复不满。五月七日，中共中央认为“报告很好”，转发各地参考，并可登党刊。

△ 晚，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陪同伏罗希洛夫参加首都各界青年为庆祝五四青年节、欢迎伏罗希洛夫访华在中山公园举行的游园晚会。

5月5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收阅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毛泽东在四月三十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到下届选举国家主席时不提他的名。五月一日，陈叔通、黄炎培联名上书刘少奇、周恩来，提出：鉴于社会主义发展事业尚待巩固，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斗争剧烈，“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毛泽东在来信中有“四处注解”〔1〕并请刘少奇召集一次有一百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又请邓小平把陈、黄的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全体党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所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展开讨论，打通思想，取得同意。毛泽东批示：“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

〔1〕 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在陈叔通、黄炎培的信上，答复他不当国家主席，有“四处注解”，大意是：一、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说到完全巩固，依苏联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故不宜论及”。二是“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三是他将公开声明理由，人民中“可以减少惶惑”。四是至于国际间的谣言，“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五月八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意见。绝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 中午，和邓小平等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北京大学。六日凌晨，赴机场，送伏罗希洛夫一行赴印度尼西亚访问。

5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铁路系统设立政治部、邮电系统加强党的领导和省市委交通部长会议情况及沈阳市试行职工代表大会的经验总结等。在谈到铁道、邮电等工交企业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党、团、工会基层组织如何设置时，发言说：我主张车间工会干部不脱产，企业工会主席轮流当，党团组织也是这样；民主选举，不当选的就去参加生产。建议作个规定，干部连选连任不能超过几届。现在脱产人员多，工人把专职干部当外人。我们是从军管时期的传统过来的，军管时期有些不懂行的专职人员是必要的，现在仍这样就脱离群众。会议还讨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选和修改选举法等问题。

5月8日—6月3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分别召开了十三次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二十五次工商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意见。共有一百八十多人发言，对中共提出批评和意见。六月八日，李维汉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时说：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的性质是严重的。

5月8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整风首先要学好毛主席的两个报告和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及

《人民日报》有关整风的社论。要认真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防止教条主义；要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自上而下，从检查市委常委和市人民委员会党内的主要领导同志们的思想作风开始，作出榜样，取得经验，然后层层往下推进。必须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同时又坚持和风细雨的方法。有人说和风细雨会造成无风无雨；又担心说的时候是和风细雨，运动搞起来就是狂风暴雨。两种说法都是不妥当的。现在已经是“满城风雨”了，说无风无雨的同志可能是还在那里睡觉，没有很好地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运动起来后，会不会有狂风暴雨呢？也可能发生一点大风，只要我们的领导者坚决按照中央指示的要求去做，有毛病也可以及时得到纠正，因为我们整风的目的，不是为了整人，而是要搞清是非，提高思想认识，改进工作。这样整风会搞得更深，干部在精神上也就不会受到打击。和风细雨的做法，是这次整风运动的特点，各级党的领导必须紧紧地掌握这种精神，使运动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同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成立整风领导小组，由刘仁任组长。

5月9日 和刘仁等到北京猪市大街参加修马路的劳动。对一同劳动的干部群众说：我对体力劳动还很熟悉，从小干过十多年的庄稼活。在延安的时候，很多中央负责同志和干部都下地劳动，现在应该继续发扬这种好的传统。

△ 下午，和刘少奇等去机场欢迎以主席里塔·马尔科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

△ 同中共北京市高校党委同志谈话。说：整风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广泛征求意见，检查思想；二是改进工作，改造思想。严肃认真就是弄清是非，提高思想，改进工作，不是追究责任。混淆两类矛盾是主观主义，压服也是主观主义，不

“放”就是脱离群众。急风暴雨容易伤人，和风细雨，雨水就透到地下去了。第一阶段两个月，先从市委做起，集中时间听意见。

5月9日、10日 收到经毛泽东三次修改而成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草稿第一稿”。毛泽东分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等，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汇总修改”。

5月10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批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向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

5月11日 晚六时三十分，陪同毛泽东会见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人民议会主席马尔科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

5月12日 下午，和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以帕伏列斯库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晚，会见以马尔科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

5月13日 下午，同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帕伏列斯库和主席团秘书希纳丘座谈两国议会工作。在谈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情况时，介绍了会前、会中和会外的协商工作，说这样可以更充分地听到在党内和政府内不容易听到的批评和建议，最近还准备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比如成立监督政府工作的机构等，用以反对官僚主义。

5月1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中央、国家机关精简和政府各级机构编制的控制问题。发言说：第一，关键是党中央机关要精简，中央不简，别的也不好动（邓小平插话说：副部长下去当厂矿书记、校长，现在副部长、司局长二千三百人，放下去一批），首先从这里下手，肉搭骨头，拿一批出去；第二是国务院；第三是各部委，搞几个典型，教育部就可以搞典型；然后是省、市。这方面不搞，没有社会主义，都吃了、用了。中央和省、市都需要设立编制委员会。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对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决定的批示；通过中共中央对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甘孜自治州继续进行民主改革的批复；批准中央军委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和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要点等。

△ 晚九时，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有关整风鸣放的情况。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

△ 毛泽东在五月十日出版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上批示：“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1〕

〔1〕 解放日报社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邀请二十二位中小学教师座谈他们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十日，该报第二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说：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5月15日 下午，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这次大会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收阅毛泽东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文稿原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本报评论员”，六月十二日改署名为“毛泽东”，作为内部文件下发。

5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十次会议。会议讨论整风鸣放问题和教育部关于今年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安排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教育部代中央起草一个指示，着重谈不能升学学生的出路，一是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在中、小企业、手工业单位安排一些。中等技术学校不招生，无法安排的毕业生各地包干办理。要做充分的工作，大力宣传从事劳动的道理，对鄙视劳动，歧视不能升学的要批评。会议讨论迅速制止黑龙江、吉林牲畜瘦弱死亡问题时，发言说：可以

分散到户喂养，但不要绝对化。会议决定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代中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

△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说：“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要求各地注意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 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计划的通知》。

△ 晚九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整风鸣放问题。会议开至次日晨一时二十分。

5月17日 同北京市有关领导干部谈当前整风问题。指出：整风运动开展很快、很好，一下子把党员的宗派主义、特权思想、盛气凌人等问题暴露出来了。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批评是“良药、忠言”，不管话说得多么难听。但有一些意见不对头，是右翼，攻我们目的是要共同领导，由他们来领导。群众会鉴别，他们会孤立。有朝一日我们要说话。有的同志灰溜溜，因为成绩讲得少，不要紧，事情摆在那里，不必悲观失望。现在是首先要把问题、意见“放”出来，正面的可以慢慢讲。总的是健康的，当前，一是要主动，主动到群众中去听意见，主动地改正缺点错误，不要顶牛，不要官官相护，使群众对整风增加信心；二是不要打“离身拳”，上推中央，左右前后推给别人，下推给部下和群众。学生上不了初中、进不了大

学的，要动员他们劳动，不要装好人，许愿，说什么“我没意见，就看领导”，这是市侩作风，要向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肃反搞错了的，该在全校平反的，就在全校平反，不要欠账。肃反中的毛病，市委担起来，属于制度方面的，中央会解决。总之，一是改正错误，二是团结群众，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狂风暴雨就不会有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就孤立了。

△ 晚十一时三十分，和周恩来、陆定一、陈伯达、吴冷西到毛泽东处商谈问题。

5月18日 主持全国人大常委座谈会，主要讨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否设立常务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怎样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问题。在发言中说：这是一个大问题。是毛主席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要监督政府的工作，如不设常务委员会，监督是个问题。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涉及修改宪法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我们经验不多，办法也不很多，是否在常委会里分一些组，有人大代表参加，或者另设若干委员会，请大家考虑。此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已通知几个省来人共同研究。

△ 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前来市委请愿的学生四十八人，听取他们反映学院领导整风运动中保守落后，对解决肃反遗留问题不彻底，党员有特权，部分学生因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而不被信任，到国防工厂去实习受限制，毕业生分配不公平和歧视华侨学生等问题。当即决定市委明日派人到该校继续听取群众意见，并告诫来访学生不要急躁，不要停课，要整风、上课两不误；党员不应该有特权，有错误要公开检讨。鉴于过去经验，意见一定要讲完，问题一定要弄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

和风细雨，狂风暴雨容易伤害好人。

△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新闻界的政治思想动向，着重讲了新闻的阶级性和党性问题；对于新闻界的各种议论作了分析。

5月19日 凌晨二时，应约到毛泽东处汇报情况。当晚，毛泽东召集彭真、陆定一、胡耀邦商谈问题。后又增加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赖若愚参加。会议开至次日零时四十五分。

5月20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十一次会议（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处理广西省平乐县等灾区因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对灾情估计不足，救灾措施不力，造成饿死人的严重错误问题。发言说：广西去年灾情遍及平乐等四十一个县，全国人大常委视察回来意见极大，连港澳地区也有强烈反应，但时至今日，广西省的主要领导还意见不一，互相推诿，有关人员至少应受撤职处分。为了挽回党和人民政府的影响，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党内外职务，并建议省人委主要领导也应受行政处分。六月十四日，国务院第五十二次会议讨论了监察部对事件的调查报告，通过给予两位副省长撤职处分，有关失职人员也分别受到处分。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的社论。

△ 晚九时四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十分。

△ 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示说：“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得不够”，“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要求各省市区党委指导宣传部

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

5月21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党报宣传方针问题。发言说：党报有两大错误：一是立场不鲜明，有的同志没有敌情观念；二是随波逐流，赶时髦，人家错也跟着错，结果打在自己脸上。党报要有思想性，只要思想上坚定，就可以把资产阶级打下去。资产阶级抓国防、公安、财经不行，比较容易的是思想战线，这是今后和资产阶级的最大斗争。党报要在中央领导下努力加强思想性。《人民日报》是世界性的，几个党报要合作，要有分工，互助合作，发挥自己的长处。会议决定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分类排列运动中暴露的错误论点，以宣传部为主，组织力量写文章，先写短文，后写长的，署笔名发表，少数用社论。文章要注意说理，不要发火，不要损伤整风中正确的批评意见。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关报社负责人谈写回答党外人士批评的文章。

5月22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召开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展整风运动和孤立右派等问题。

△ 晚，向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

5月23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如何领导当前整风鸣放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机关正副部长，国务院各部门党组负责人共二百七十人。

△ 晚，陪同毛泽东会见以纳·马·佩雷斯为首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会见结束后，同毛泽东谈关于整风和召开

省市委书记会议问题。

5月24日 在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干部四千余人参加的大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整风的必要性。整风运动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若干单位中展开，在党内党外“夹攻”下，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党的工作中和党员思想作风上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如某些党的领导干部居功自傲，对党外人士不尊重，用压服的方法处理内部矛盾；有的党员盛气凌人，在评级、加薪、提职和出国留学等问题上闹特权等，说明有些党员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十分严重，不整风不得了。必须肯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是端正党风的良药。但也有一些意见，是从右的方面或资产阶级观点出发的。不论批评的动机和观点如何，对我们了解情况，辨明是非，整顿作风都有莫大的好处，即使有些人借机发怨泄愤，也不是坏事，因为气平了，就容易合作共事了。（二）整风的目的是要加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领导作用，而不是削弱；是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而不是隔阂，这决定于我们能否团结大多数党外人士，特别是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把党外人士和群众的批评充分发动起来，整风运动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关门整风，就会事倍功半。当前的问题，还是放手得不够。党内有的同志不敢引火烧身，或者听到个别人的恶意攻击，就更没有勇气下决心放。应该相信党和人民的力量，应该沉住气，党是批评不垮的。（三）要适时地把狂风暴雨转为和风细雨，办法是循循善诱、釜底抽薪。要解决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一要实事求是地肯定肃反的伟大成绩。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凡是完全搞错了的，要当众平反，恢复名誉，赔不是。要保护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他们是站

在工人阶级立场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斗争，称他们是“yes-man”〔1〕是错误的。二是必须肯定思想改造的成绩和必要性。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都要在斗争中改造，怎能设想在资产阶级教育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有人甚至直接间接为反动统治者服务过或者反对过人民革命的人就不需改造呢？但我们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应该检讨。三是选派留学生的条件不尽合理、个别人不够选送条件，应该检讨，但不能笼统说是宗派主义，今后仍然要坚持学习成绩和政治条件。四是党和国家的机密都必须保守，保密范围规定不恰当的，应该和可能在整风运动中随时改正。（四）整风运动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健康地进行。近期应集中力量在党政机关、文教系统解决党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矛盾。不要在工人中和中小学中开展整风，以免分散力量。大学生应该有领导地提意见，并且展开各种争论。（五）不要放过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它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必须加以反对和清除。

△ 晚九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后，到毛泽东处谈话。

5月25日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改期至六月二十五日召开。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接见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1〕 yesman，英文，意为唯唯诺诺的人。

他号召：“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人民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 下午五时，和夫人张洁清举行酒会，欢迎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和夫人。周恩来出席酒会，并同富尔就台湾问题〔1〕交换意见。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为访问印尼、越南后回到北京的伏罗希洛夫及其一行举行的便宴。会见结束后，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二十六日晨，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到机场为伏罗希洛夫赴蒙古访问送行。

5月26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汇报整风运动的情况。

5月27日 晚，继续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汇报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补充发言说：整风运动开始是整顿党的队伍，现在发现有阶级斗争的问题，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我们进攻，有的集中力量攻肃反，攻公安工作，有的要在政协组织知识分子委员会；党内也有一些政治上动摇的“起义分子”，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大放，才能识别各种人物的政治面目，牛鬼蛇神才能看清楚。放的好处是右派暴露，中间派出气；对的意见我们接受，做错的事改正。放是否会出乱子？机关出不了，无非是学校的领导有顾虑。闹起来也不过一个星期，狂风暴雨后，我们工作改正，中

〔1〕 台湾问题，指台北市五千多名群众于五月二十四日捣毁了“美国大使馆”，抗议驻台湾美军当局释放一名杀死中国人的美军士兵。

间派的气也消了，右派的面目进一步暴露了，经过教育，大家和右派划清界线。工厂中不要放，中小学也不能放，对大学生，要告诫他们不要停课，不要上街，不要下工厂影响生产，这就不会出什么毛病。

5月28日 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5月29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5月31日 晚，参加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联欢会。

△ 晚，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为阿人民议会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 晚，到毛泽东处谈话。

6月1日 通过有线广播向北京市四五千工人、店员参加的广播收听会讲整风问题：（一）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是客观事实，有人不承认，说这是教条主义。这要看对谁来说，例如土地改革，农民说成绩是主要的、根本的，地主说这是灾难。同样，对肃反、“三反”、“五反”、合作化、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都有个对谁有利问题。但是有人跑到工厂，对工人说：你们有什么困难，我来替你们说话；有人还乘共产党整风之机，到摊贩、手工业工人中，煽动说新中国成绩不是主要的，这是唯恐天下不乱。（二）共产党整风，是要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党员从旧社会沾染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整掉，使党组织更纯洁、更健康，和群众联系更密切，更好地加强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三）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机关、国家机关和高等学校中进行。中小学暂时不搞。工厂的生产任务很繁重，事关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

活，现在一般不进行整风。大工厂的领导比较强，可以有计划地、从上到下地整风。工厂里整风是整干部、整领导、整党员，不整工人群众；至于破坏生产秩序、违犯劳动纪律的，那是另外的问题。一定要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要在生产时间以外，开小会不开大会，提意见，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厂党委、行政、工会的领导都应该同工人打成一片。（四）中央指示，整风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现在大学里已经是狂风暴雨了。但党并不害怕，狂风暴雨是刮不倒我们的。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都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解决，意见都要听，毛病都要改，不要采取罢工、怠工的办法。（五）“三反”、“五反”和肃反的成绩是肯定的，但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应坚决改正。如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没有与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的好人，我们把他当反革命斗了，就要给人家平反，在多大范围内斗的就要在多大范围内赔不是。在“三反”中被错斗的人，要给他恢复名誉，赔不是，直到他消气。凡是有贪污行为的，不管贪污数额大、小，都不该平反。

△ 听取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和北京石油学院等校负责人汇报鸣放中的情况。

△ 晚，和陆定一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6月2日 中午，和周恩来、李维汉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6月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关于鸣放情况的汇报。会议对当前整风运动中的问题，作出如下决定：（一）在学校方面，除主要负责人仍暂时不发表意见外，应组织人讲正面的道理，开展争论；党支部内部，应允许发表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各大专学

校继续召开教授座谈会。中央民族学院也可以召开教授座谈会，但不发动学生搞整风运动；座谈会上涉及民族问题的言论，一律不登报。（二）国家机关应继续放，召开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除有关机关内部的具体问题外，司、局长级干部不要急于反驳，其他问题，司、局长级以下的党员干部，可自由地发表个人意见。（三）中央各部委除负责本部整风外，还应按照联系单位的分工，负责领导国家机关部门的整风。（四）在整风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吸收一批入党等。

△ 中午，和刘仁到毛泽东处谈话。

△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工厂、商店、建筑业的干部大会上讲话。指出：六月一日的大会后，工人已经稳定下来，但干部不应该睡大觉。大家要抓紧时机改正错误，有贪污或账目不清的，主动谈出来，每月把贪污的钱扣出来，不要不好意思。现在不主动“下楼”，将来更难堪。不接近工人的，现在就到群众中去。过去在农村的时候，走多少里路，都要去接近群众。这是党的光荣传统，可是现在进了城，这些作风都丢掉了，应该赶快恢复起来。工人中有什么问题应该解决也能解决的，抓紧解决。这样做，整风就会和风细雨地进行，不然就会被动。强调目前的斗争是两个：一个是内部整风，改进工作，纠正错误、缺点；另一个是阶级斗争，就是跟资产阶级的斗争。

6月4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李维汉、胡乔木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6月5日、6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准备提交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的报告（草稿）》、《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陈云、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组成五人小组，对文件作进一步修改。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校毕业生的指示》。

6月5日 晚九时四十分，参加毛泽东同陈叔通、黄炎培关于“鸣”、“放”问题的谈话。谈话至次日零时十五分结束后，和刘少奇、周恩来、罗瑞卿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谈整风问题。会议开至凌晨二时。

6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当日起草的《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指出：“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

6月7日 在上海。向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作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指出：（一）目前的运动有两个性质，一是共产党整风，一是很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次整风不同于过去，对党提出批评的不仅有群众，还有阶级敌人（反动分子实质上是阶级敌人）。运动不到三个月，里外夹攻，既揭露了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又暴露了右派的面目。批评有善意恶意之分，善意的批评也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种，凡出于善意而不正确的批评，不要过分去反批评，我们应该欢迎。要辨别人家的批评，标准就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题》讲的六条。^{〔1〕}（二）整风成败的关键在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过去从中央到地方对中间分子重视不够，联系很少，他们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有牢骚，有气，但是当右派否定一切时，他们觉得不对头。在反击右派时，我们一致对外，但要保护中间分子，不要乱砍一阵，批评要说理，注意态度，使中间分子听了口服心服。反击右派后，有一种危险，可能有些干部又翘尾巴了。我们应该和风细雨地深入整风，上下级坐在一起开小组会、座谈会，交几个中间分子做朋友，检查工作和思想，去掉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改正缺点错误，再读几本书，提高理论水平。（三）要按中央指示精神，及时解决机关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中“三反”、肃反中遗留的问题，成绩要肯定，错误缺点要承认，弄错了的要平反，恢复名誉。但要保护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是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忠于社会主义的，要撑他们的腰。应由中央、地方担的责任，要担起来；应由他们自己担的，从中吸取教训，受到教育。（四）阶级斗争不能全线拉开，工厂、农村、中小学都要稳住。工厂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高级技术人员可以召开座谈会，动员他们提意见，但不登报。要召开老工人会议，讲清整风的目的，工厂的生产，事关国计民生，不能受影响，工资、福利方面的问题，整改时有步骤地解决。中小学教师如要放，由市委、区委召集座谈会。

〔1〕 六条标准即：（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要告诉学生，不上街、不下厂。（五）公安局、检察院是国家机关，不能泄露机密，可以关起门来整风。报告最后指出：上海放得不够，凡是没有放够的，抓紧时机，放只会烧掉我们的毛病。

6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命题并改定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十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在全国范围展开〔1〕。

6月10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有关整风反右的问题。

6月上旬 除到上海外，还赴天津、南京、武汉、郑州等地，先后在中共天津市委和中共江苏、湖北、河南省委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共中央对整风运动形势的分析和反击右派的布置。

6月11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军队中将以上军官及北京市党政高级干部共四百七十九人参加的会议上，作关于当前整风运动和反击右派进攻的报告。

6月12日 在北京市各大学党员干部大会上讲整风和反右派的问题。指出：（一）右派进攻是一场“政治化的思想斗争”。（二）现在是“齐放”、“争鸣”阶段，是继续放，不是

〔1〕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整风过程中，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动的进攻，予以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收。前一阶段，为了便于大家提意见，我们少放少鸣，不作解释；现在既然有人向共产党进攻，我们也是一家，就要与九十九家争鸣，也是一“花”，就要与九十九朵花齐放，适当的反批评是必要的。互相监督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平等鸣放的条件。我们的年轻人，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中成长，教育方法又受教条主义影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要在争鸣齐放中锻炼自己。鸣放阶段结束，我们才有和风细雨继续整风的条件，但要防止一种危险，有的同志又翘尾巴了。（三）对这次狂风暴雨中中间分子的表现，我们要感谢，他们承认党的领导，但对党的工作的缺点错误，不客气地批评。把中间分子团结好，右派就孤立了。他们的善意批评，不管言词多么尖锐，我们要同他们交换意见。在反击右派时，不要乱点名，不要伤害中间分子。（四）右派是少数，也不要搞得太面，批评要讲道理，不能乱扣帽子，压服人家。讲的道理不仅要使党员信服，也要使中间分子信服，是非标准就是毛主席提出的六条。

△ 下午六时，和陆定一、李维汉应约到毛泽东处商谈问题。

6月13日、14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一、七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策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问题。

6月13日 晚，和刘少奇、朱德、陈云、胡乔木、吴冷西到毛泽东处商谈修改《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发表的本报编辑部文章，题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一篇文章。

6月14日 在北京高等学校党员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

强调：右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点要有足够的认识。前两天我说反右斗争是“政治化的思想斗争”，是不确切的，就是政治斗争。人家不是帮助你整风，是要你的命啊！当然，我们对于这些右派分子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对他们的反动思想一定要驳斥得体无完肤。要认识到这是一场残酷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当然要说理，不要扣大帽子，不要粗暴。我们要求干部认真检查和坚决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以解除和中间分子的矛盾；只有中间分子和群众跟我们在一起，才可以放手向右派反攻。中间分子的标准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他们提的意见虽然尖锐，但是善意的，傅鹰就不是右派。梁思成则表现很好。对右派就是要把他们孤立起来，没有孤立就没有斗争，就没有团结。

△ 下午，和胡乔木、吴冷西〔1〕应约到毛泽东处商谈问题。

6月15日 晚，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有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湖北、四川、陕西、辽宁、天津、河南等十个省、市党委书记参加的电话会议，听取柯庆施、刘顺元〔2〕、江华、陶铸、张平化、李井泉、张德生和黄欧东〔3〕汇报当地整风鸣放的情况。

6月16日 上午，在中共北京市委召集的各大学部分副教授以上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讲话。参加座谈会的有梁思成、傅鹰教授等共一百二十多人。在讲话中说：五月一日中央发布的

〔1〕 吴冷西，时兼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2〕 刘顺元，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3〕 张平化，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井泉，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整风指示上没有提到阶级斗争问题。整风开始后，绝大多数的党外朋友向我们提出很多善意的意见，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有建设性的，对这些忠言、良药，我们非常感谢。但是也有相当数量是恶意的，最突出的是否定一切成绩，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要共产党退出工厂，退出学校，放弃对文艺界的领导，诬蔑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是“家天下”、“党天下”。总之，他们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社会主义，这就使整风运动中出现了“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出现了一场政治斗争。在这些人中，过去我们把他们看成是好朋友，现在看，他们是戴了假面具的，我们要跟他们讲：你们那套行不通。诸位也可以做做工作，多争取一个总是好的，但是不要调和。有人说，要同共产党打三个回合。北京市委已经向二十二所高等院校作了报告，一方面要接受善意的合理的意见，改进工作，一方面要和右派分清是非，三十个回合我们也干。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维汉、胡乔木到毛泽东处开会。

6月17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并批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和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会议还决定向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授予勋章。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二十八人。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地区的大鸣大放的情况。会后，又和陆定一、李维汉同毛泽东谈话至次日凌晨一时三十分。

6月18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座谈会。会议就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议程、大会预

备会议和下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等事项进行了协商，并提出建议，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情况。讲话说：社会主义革命在党内没有进行过大的斗争。现在，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而人的思想没有进入，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清除。党员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过关，人被带过来了，而思想没有过来。

6月19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五次会议。根据日前召开的副委员长座谈会的意见，就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日程安排、大会预备会议和下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等事项作了说明。

△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和卫生部整风中的问题。

△ 晚，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报告。

6月20日—25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预备会。二十日，向预备会议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本届大会的议程和会期等问题的建议。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预备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座谈将提交大会审议的关于国家预算、决算（草案）和国民经济年度计划（草案）的两个报告。

6月20日 晚，和杨尚昆召开有黑龙江、吉林、福建、安徽、山东、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电话会议，就当前反击右派进攻问题作报告。

6月21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6月2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研究整风和反右的安排问题，确定在学校暑假开始前，集中力量打好反右派的政治仗，属于错误思想的批判如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待下学期开学后再进行，报纸点名要控制。下一步，人代会结束后，全国转向整风，改进工作，报纸宣传重点要转。民主党派的整风，由他们自己转，我们帮助。党的整风，也分三段：一是大放大鸣，二是齐放齐鸣，三是转入正常。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6月23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准备向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大鸣大放情况。二十四日，会议继续讨论并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

△ 晚，陪同刘少奇会见并宴请巴基斯坦人民联盟总书记拉赫曼为首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

6月24日 主持召开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预备会议的代表小组组长会议。会议协商通过：一、大会延长两天；二、提出调整主席团成员候选人名单；三、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章乃器，改为李烛尘。以上三项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6月25日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六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大会议程、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和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名单等三项草案提交一届全国人大四次大会审定。会议还审议并通过周恩来提出的关于适当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议案，决定每人使用的这种土地，连同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的土地，合计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百分之十。会议还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

△ 晚，审阅《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发表的题为《这一次的人代会》的社论稿。社论指出：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之日，正是“全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有人以为，既要批判右派，就似乎不好同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了。“这显然是一种误会。对于错误和缺点的积极和善意的批评，只会使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快地前进，这同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反人民的诬蔑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愈能放手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错误的所在，错误的由来和改正错误的正确道路，我们就愈能够有效地改善工作，也就愈能够有效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也就愈能够孤立右派”。

6月26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十四次会议。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时发言说：重刑、轻刑的问题，现行犯要重刑，历史犯可以轻刑，有的历史犯重新犯罪，要老账新账一起算。强盗、惯骗、凶杀、放火、破坏交通、强奸妇女，要重刑。人民内部问题，可轻刑。所有经验不成熟的条文都删了，以后可以补。先原则通过，还要修改。

△ 下午，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前，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维汉等到毛泽东处商谈问题。

△ 晚，陪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以拉赫曼为团长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

6月26日—7月15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二十六日下午，在大会开幕会上，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在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被推定为常务主席之一。在七月二日的全体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6月27日 主持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关于刑法草案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共四十六人。在介绍起草过程和答复有关问题时说：草案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参照中外历史经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拟订的，虽还比较粗，但基本的内容写上了。在说明立法无期徒刑的理由时指出：“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实际执行中，无期徒刑犯劳动改造表现好的可以改判为有期徒刑。在回答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的争论时说：这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刑种，实际执行中只有千分之五到十执行死刑，其余绝大多数改判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这样，使那些可杀可不杀的犯罪分子就可不杀。在说明对部分罪犯实行管制的出发点时说：实际上管制起来就是免于被关起来。因为被关起来的罪犯，自己不能生产，家里人没有饭吃，国家还得救济。因此，对罪行较轻的犯人，管制比判刑好。

6月28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汇报会议，听取外贸部、文化部、地质部、建筑工程部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汇报整风运动近况。

△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在会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在听取法案委员会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的起草过程和问题后，发言指出：刑法草案的起草历时两年半，曾征求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意见。目前我国整个社会在过渡，经验还不成熟，起草工厂安全、商品检验、出版、干部处罚等法规涉及面很广，问题复杂，一开始规定许多界限，恐怕不适宜，“宁疏勿密”。在试行过程中，由粗到细，有的还可以搞单行法。同时，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和自己的经验搞，不抄袭书本和搬用外国经验，不成熟的不写上。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将刑法草

案发给代表们征求意见，待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后公布试行。会议还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

6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在文件中加写：“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

6月30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维汉、胡乔木、吴冷西等到毛泽东处开会。

7月1日 上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干事会会议，听取反击右派情况的汇报。

△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点名批判了所谓的“章罗联盟”。社论发表后，正在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又集中批判了民主党派中的一些被点为右派的人大代表。

7月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拟在七月底八月初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部署下一步的整风工作。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王稼祥等听取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介绍苏共中央全会处理马

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问题〔1〕的情况。

7月3日、4日 连续两个晚上，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通过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电报，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

7月5日 上午，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电话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支持苏共中央关于“反党集团”决议的决定〔2〕。晚九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及军队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传达上述中央决定。

7月6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到机场，欢迎前往朝鲜和东欧各国访问途经北京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晚，出席招待胡志明的宴会。

7月7日 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反右派斗争中应注意事项的通知》，并上报中共中央。通知指出：（一）各高等学校反右派的群众运动发展是健康的。但近日来也发生了一些简单粗暴，说理不够，单纯依靠压力等错误做法，必须引起严重注意。“一切批判右派分子的会不论是大会小会，都必须是说理的会，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要用道理和事实驳倒右派分子。”

〔1〕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当时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2〕 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在杭州会见专程来华通报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情况的米高扬。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向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

大会批判的方式“应当慎重，应当有充分的准备”，除非十分必要，否则不要用。在一切批判会上“都应当给右派分子发言的机会”。（二）要说服群众，无论开会、贴大字报都应在本单位内部进行，不要上街，不要到别的单位去贴大字报。（三）对顽抗狡辩的右派分子，群众提出停职反省、撤职、开除、法办等要求，目前一般的不应答应。否则，就会把斗争简单化，妨碍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彻底胜利，同时也不利于争取、团结和教育中间分子和群众。（四）在斗争中追问右派分子的组织关系或反动小集团，必须慎重。没有掌握切实可靠的材料，不宜贸然进行。八日，中共中央将此通知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批示：中央认为北京市委的处置是对的。北京市的群众在反右派斗争中所发生的一些现象，各地也很有可能发生，请你们加以注意。

△ 晚，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去三峡游泳的提议。

7月8日 晚，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电话会议，听取邓小平作关于当前整风运动的报告。

7月9日 下午，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7月10日 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全国人大党组干事会会议，讨论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几个决议草案。

7月11日 晚，列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整风运动的问题。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

7月15日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会。会议批准：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

修正后的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和李先念作的相关说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薄一波作的相关说明、彭真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董必武作的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张鼎丞作的关于一九五六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通过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代表选举必须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以前完成，代表名额仍为一千二百二十六人；还通过了关于成立广西僮族〔1〕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两项决议。会议决定将刑法草案审议修改后公布试行，在试行中征求意见后再提请全国人大审议；今后一切死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

7月16日 凌晨，审阅《人民日报》拟于当日发表的祝贺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的社论稿《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社论指出：“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们经过各方面的揭发和批判，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其中有些人的检讨“表示有悔改的决心”；有些人“究竟是企图用避重就轻的欺骗手法蒙混过关，还是也有若干交代悔改之意，需要他们今后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也有些人的“检讨”，“一望而知是还没有交代悔改的诚意的。但是，只要他们不是怙恶不悛，自绝于人民，只要他们真正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总是值得欢迎的。”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粮食部党组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报告，基本批准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七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本届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有严

〔1〕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二日，广西僮族自治区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改族名为壮族。

重反社会主义言行者的通知》。

△ 晚，和周恩来在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大会上作报告。报告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联合组织，吴晗主持。

7月17日 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同机飞抵青岛。

7月17日—21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

7月22日 离开青岛返回北京。

7月2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十七次会议。会议传达在青岛召开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精神，讨论整风运动中的问题。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毛泽东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决定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修改审定。会议还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基本批准关于当前普通刑事犯罪活动和开展对刑事犯罪斗争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处理盗窃、流氓、凶杀、抢劫等刑事犯罪分子政策界限的规定。

7月23日—8月4日 出席北京市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二十三日上午，主持开幕会，听取一九五六年财政收支决算和一九五七年财政预算的报告。八月四日上午，在全体会议上再次当选市长；张友渔、吴晗、王昆仑、冯基平、程宏毅、贾庭

三、乐松生当选副市长。^{〔1〕}同日下午，作大会总结。指出：这次会议是进一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反动言行的会议，是检查和改进工作、推动整风运动继续深入的会议。在阐述了反右派斗争的意义后说，我们的成绩是巨大的，但错误、缺点很多，有些是很严重的。并列举了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有很多同志同工农群众缺乏应有的联系，缺乏把工作中的问题和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和解决，再坚持下去的习惯。（二）有些机关政治空气稀薄，有些同志对重大政治问题不能及时发现，甚至不加注意。（三）工作中缺乏认真负责和坚决克服困难改进工作的精神。（四）有不少同志不善于抓住典型，突破一点，系统地推动解决普遍性的问题。（五）有些同志认为工作已经做得很“差不多”了，很容易满足现状。（六）机关和企业冗员过多，机构庞大。我们必须采用深入整风的方法，进一步整顿思想作风，把首都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要求人民代表和全市人民进行经常的监督。同时强调干部下放，参加体力劳动，学习生产知识，获得全面锻炼。八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

7月2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侯维煜^{〔2〕}汇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整风运动的情况和陆定一谈召开宣传部长会议筹备工作的情况。

7月26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十八次会议。

〔1〕 北京市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选出的市长和副市长共八人中，共产党五名，民主党派三名；三十九名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士占二十名，共产党员占十九名。

〔2〕 侯维煜，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党委第二书记。

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的核心思想除策略性的问题外可以公开宣传。在发言中说：有些人同右派沾边，但同右派不同，他们检讨了，要保护他们。

7月27日 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有些单位错误地斗争中间分子的通报》。指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对打击右派分子，提高群众觉悟、争取中间派，收获很大。但斗争深入后，有些单位错误地斗争了少数中间分子，诸如：把因为对学校某些工作不满而向上级请愿者“与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混同起来”；一些鸣放不够的单位，企图从中间偏右分子或有右派嫌疑而材料不足的人中发现右派分子；或斗争“同情过某些右派言论又没有积极参加反右斗争的中间分子”。通报强调：“上述做法，不仅分散了斗争右派分子的火力，而且扩大了打击面。”市委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运动的具体领导和具体检查，“必须把中间分子的糊涂认识、对我们某些措施的不满以及非政治性的思想作风问题同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区别开来”，对中间分子的缺点，“绝对不能采取斗争的方法，只能依靠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布置学生思想小结时，采用逐个在群众中通过的做法，“很容易形成对中间分子的斗争，因而是不妥切的，必须加以纠正。”

7月30日 晚，会见并宴请以市长苏加塔达萨为首的锡兰首都科伦坡市政议会访华友好代表团。

7月31日 晚，参加在中山公园举行的首都人民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并和朱德、彭德怀先后在大会上致词和讲话。八月一日晚，出席彭德怀为庆祝建军三十周年举行的酒会。

夏 主持解决首都建筑物防雷击问题。入夏以后，北京地区雷雨较多，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和明十三陵的长陵

棱恩殿相继遭受雷击。遵照周恩来关于高大建筑和有文物价值的古代建筑都必须安装避雷针的指示，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在故宫、天安门、正阳门、景山、颐和园、北海白塔等处安装了避雷针。有些有文物价值的古树也安装了避雷针。对新建高楼制定了防雷设计标准。

8月1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批准《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

△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和毛泽东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还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8月3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市二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总结提纲。在讲话中强调：干部下放很重要。干部需要补充生产知识，需要参加体力劳动。干部下去搞几年就全面了。要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搞起来，实行“上下轨道”。

8月4日 晚，主持召开新一届的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当前几项主要工作：继续深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认真精简行政机关和企事业的管理机构，抽调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到基层参加生产和工作。工业方面，要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切实注意生产安全。商业方面，要做到损耗少、费用少、管理人员少，商品质量好、服务态度好和便利群众。对于没有考取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年龄和体力适宜的，可以在劳动中锻炼和学习；不能参加劳动的，政府和家长

都有责任，群策群力，不使一个中小学毕业生游荡失教，主管机关要很好地领导这项工作。会议一致同意以上的工作方针和意见，并责成各主管部门订出具体方案，提交市人民委员会讨论。

8月5日 和周扬、龚子荣、刘仁听取苏谦益、王铎、胡昭衡〔1〕等汇报内蒙古整风反右问题。讲话指出：（一）这次资产阶级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是以资产阶级右派为主，目的是复辟资本主义，其他如封建地主等是右派的同盟军。在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同盟军，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是统战对象，但是，右派趁共产党整风，从统一战线内部发起一场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大家必须认清矛盾的性质，坚决予以反击，但斗争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使人信服。我们整个的口号是整风，工人阶级内部反对“三个主义”；争取知识分子、富裕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打击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右派。（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可分为极右分子和一般的右派分子，领导要好好掌握。有三道防线：中间偏右的不动，一般右派不斗，集中打击极右分子。这样，右派和中右就要检讨，中间派就安定了。极右分子是同我们坚决作对的，所以毛主席说：不得温情主义，否则就是阶级立场不稳。右派只要不当特务，不再搞破坏活动，还给饭吃，给事做，使有错误的人不恐慌，利于改正，推动进步，利于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措施。（三）党内不要机械地每个单位去分左中右，这不利于团结，但要在运动中看每个党员的实际表现，把右派区别开来。党内右派、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要从严处理，对其他的

〔1〕 苏谦益、王铎，时均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胡昭衡，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一律帮助教育。要注意改正工作中的错误，改了错，反右就主动了。乘反右时机检讨改正错误，是帮助干部过关。（四）农村要抓紧，要帮助专区和县的干部学会整风，要反对党内的右倾，例如富裕中农的动摇，在统购统销、肃反、合作化、城乡关系方面的错误思想，是辩论的重点。生产队要增产、增收，使资产阶级右派没有文章可做。富裕中农如经过教育，坚持要退社，应允许，但不能超过百分之二，以后每年进行一次教育。（五）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民族合作是中国的特点，合作才能提高蒙古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汉族干部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蒙古族人民，要搞好生产，做到人财两旺；要鼓励蒙古族人民生育，增加人口；要在自愿基础上，动员蒙古族青年到企业去学技术，要办技术学校。

△ 晚，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首都大专学校教授、学生共六万人参加的报告会上，讲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问题。号召知识分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和工人阶级紧密结合，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8月8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在北戴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8月12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并宴请冰岛统一社会党主席奥格尔森和夫人。

8月14日 上午，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全国妇联执委会拟向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作的工作报告稿。

8月18日、21日 下午，列席和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

稿。

8月19日 上午，应约到毛泽东北戴河住处汇报北京市情况。

8月20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胡乔木到毛泽东处开会。

8月22日 离开北戴河返回北京。

8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十次会议。会议讨论调整工资和反右派斗争问题。在讨论工资时发言说：工资问题需要按照我国情况和发展远景系统地研究一下，打破平均主义，主要是提高老工人的工资。

△ 下午，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为庆祝罗马尼亚解放十三周年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8月28日 下午，和朱德、邓小平等到机场欢迎访问亚欧九个国家后返国途经北京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一行。二十九日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宴请胡志明一行。

△ 和邓小平、贺龙等观看一九五七年全国游泳、跳水比赛，并以市长身份将两枚金质奖章发给这次比赛中打破全国纪录的林锦珠、唐宛架。

8月29日 下午，列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与胡志明会谈的一些问题。随后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同胡志明、黄文欢会谈。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胡志明。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约一小时。三十日晨，去机场送胡志明一行回国。

8月31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和关于党内右派分子的处理

理问题。会议确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步骤，总的方针是有利于大鸣大放，并使粮食统购任务完成。关于党内右派分子的处理，会议重申党内外和新老党员一视同仁，特别是老党员，更应从严处理。决定由中央组织部起草指示，明确划分右派分子的具体标准；中央监委要密切注意党内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会议还讨论了中央手工业局、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的报告，关于对外宣传单位干部队伍的意见报告。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罗瑞卿汇报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情况。

9月2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报告稿《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和全国妇联章程草案、修改章程的报告。会议还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指示》；通过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报送的拟调往高等院校任正副校长、正副党委书记的一批干部（六十三人）名单。

△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 下午，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阮康为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9月3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伯渠、董必武、陆定一、康生等出席毛泽东离京外出前召集的会议。

9月4日、5日、7日、10日、13日 主持召开中央法律委员会扩大会议。四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最近召开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的情况。针对各地反映的司法、检察、公安工作中

的右倾问题，讲话指出：目前各方面对司法工作都有些意见，法委打算开几次会，汇集一下主要问题，商谈出一致意见。五日，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汇报时说：对检察工作服从党的领导思想不通的人，一部分是没有党性，一部分是没有经验。司法部和法院、检察院要有决心，首先在党内澄清糊涂思想，才能和右派作斗争。建议你们和公安部一样，抓一抓各省市区检察机关的反右派斗争。“专政机关的右派不搞干净，就会软弱无力”；“高层领导干部中思想认识上的争论，一定要透彻。司令部不统一，就无法作战。七日，听取司法部的汇报时说：青岛会议上有的省反映，司法部右倾，要好好检查一下。当前要把反右派斗争搞彻底，首先司法部领导人员要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大家按《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检查思想，就有共同语言。十日，听取监察部的汇报时说：反右派的关键在党内，右派的危险也在党内。对党内的右派，不能讲温情主义，不能政治上不严肃。十三日，听取最高人民法院的汇报时说：法是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意志的。董老〔1〕讲，法一要便利人民，二要不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是束缚专政对象的手脚。守法同服从党的领导不矛盾；人民法院向人民委员会汇报工作，完全应当。这次召开司法座谈会，我看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反对右倾思想，划清同资产阶级右派的界限；二是端正对党的态度。

9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整风情况碰头会。

9月9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出席在政协礼堂举行的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1〕董老，即董必武。

△ 晚，出席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涅加尔科夫举行的保加利亚国庆招待会。

9月11日 晚，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王稼祥等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商讨关于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来我国访问的事项。十二日晚，出席周恩来欢迎伏克曼诺维奇一行的宴会。十三日晚，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伏克曼诺维奇及其随行人员。

9月12日 上午，参加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公祭九月九日去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蓝公武大会，并和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等主祭。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提交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审定。会议还讨论了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问题，决定由彭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联席会议，成立筹备委员会。

9月13日 审阅《人民日报》关于北京南郊国营农场精简脱产人员的报道及题为《农场管理上的重大改革》的社论稿。批示刘仁、赵凡：“这是一项具有全国意义的大改革，只一个农场的材料，说服力还嫌不足，最好把东郊、西郊等国营农场精简的材料和这个社论一同发表”。并嘱：数字等统请核正。补充内容后的报道及社论于九月二十一日发表。

9月14日 下午，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以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十六日下午，在首都各界人民欢迎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大会上讲话

说：保加利亚人民不朽的领袖、国际工人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和敬仰的。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鼓舞，对中保两国人民友谊的建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9月16日 陪同刘少奇会见并宴请以主席彼得·斯坦鲍利奇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

△ 晚，列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邓小平拟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的《关于整风和反右斗争问题的报告》稿。十七日上午，继续参会讨论邓小平的报告稿。

9月19日 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司法厅局长参加的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政法战线在激烈的反右派斗争中，对右派的反击开始很没有力量，很软弱，现在才比较有力了。当前政法各部门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是对政法机关是不是专政的武器以及是哪个阶级的专政武器问题上有右倾情绪。前者表现为反“左”有劲、反右不积极，当严不严，放纵、开脱罪犯等；后者表现为脱离党委领导，公安要搞“垂直领导”，检察要搞“一般监督”，法院要搞“司法独立”。强调指出：政法各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严格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领导，同时服从上级政法机关领导。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是指具体地判案，独立地进行工作，不是“司法独立”，更不是“审判员独立”、“法官独立”。公安、检察、法院既要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又要分工负责、通力合作，目的是为了准确有力地狠狠打击敌人。要报请党委审批的只是一些重大政治案件，而不是一切案件。反“左”反右、或宽或严，要实事求是。

是，从实际出发，怎么对人民有利就怎么办。政法战线必须彻底开展反击右派的斗争，使得我们政法各部门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纯洁起来，这样才能顺利地担负起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

△ 下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邀请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演讲。晚，出席毛泽东欢迎拉达克里希南的宴会。二十日下午，在首都各界人民欢迎拉达克里希南大会上讲话。说：只要亚非各国人民坚定地团结起来，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亚非人民的正义事业一定会胜利。中印两国十亿人民的团结一致和两国的友好合作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晚，出席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为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访华举行的宴会。

9月20日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北京市高等学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报告说：新学年开始后，主要部署是：（一）以提高质量为中心，改进教学工作，在文、哲、社会科学课程中，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在工科教学中，精简不必要的教学内容；组织力量研究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学制和教学计划等重要问题。（二）整顿领导作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精简机构，减少非教学人员，改进行政管理等。（三）结合改进工作，继续发动群众，开展大辩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总结反右斗争经验，检查思想，树立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方向。十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将此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批示：“高等学校的整改工作，是整风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这项工作进行得彻底与不彻底，直接关系到今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高，直接影响到整个整风运动的胜利完成。请各地党委切实掌握运动的情况，

抓紧‘整改’环节，领导各高等学校贯彻中央‘坚决地改、大胆地改、彻底地改’的精神，大力改进学校各方面的工作。”

9月20日—10月9日 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三中全会。会议听取和讨论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基本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和《关于工人、职员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等文件。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 and 具体部署等问题，重申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十月九日下午，毛泽东在闭幕会议上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他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他还改变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9月24日 晚，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和夫人。

9月2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十三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整风问题。在讨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问题时说：标准要掌握得紧一些，划宽了将来要检讨的。各单位要搞标兵；可划可不划的不划，并且要有审批制度。

9月26日 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的联席会议。会议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筹备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建

议，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由包括彭真在内的四十四人组成，刘少奇为主任委员，宋庆龄、郭沫若、吴玉章〔1〕为副主任委员，钱俊瑞〔2〕为秘书长。会议还通过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如何执行问题给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

△ 和刘少奇委员长共同签署给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批复说，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按照法院组织法，由高级人民法院负责核准或者终审判决的死刑案件，仍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负责审核。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即由高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的规定发回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或者提审。”

9月27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去机场迎接同机到达的以卡达尔总理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以费林格主席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代表团和以斯沃波达市长为首的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晚上，陪同刘少奇会见并宴请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次日中午，会见并宴请布拉格市代表团。

9月29日 上午，和刘少奇等去机场欢迎阿·鲍·阿里斯托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晚，陪同毛泽东先后会见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代表团以及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

9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十四次会议。会议

〔1〕 吴玉章，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2〕 钱俊瑞，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讨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草案）。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 晚，出席周恩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 晚，陪同毛泽东会见以阿·鲍·阿里斯托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10月1日 上午，主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的群众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首都群众五十万人参加的游行队伍。

△ 中午，宴请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

10月2日 中午，宴请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及随行人员。

10月3日—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参加的会议，讨论有关整风、体制、编制、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等方面的问题。

10月3日 下午，在首都各界人民欢迎以卡达尔总理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大会上致词说：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匈牙利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斗争。周恩来等出席大会。

△ 晚，举行酒会，欢送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并致词。四日晨，去机场送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代表团回国。

10月6日、10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彭德怀、杨尚昆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商谈关于派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活动的问题。

10月7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各组正副组长会议。

10月8日 审阅《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发表的题为《在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的社论稿。

△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就精简、整风和政法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发言。关于精简问题。指出：在北京的五十五个中央国营单位，非生产人员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地方国营北京人民机械厂，竟占百分之四十六。全国现有产业工人包括交通、邮电、公用事业在内共一千二百万人，非生产人员按百分之二十五计，达三百万人，一线的产业工人只有九百万人；而由国家支付工资的职工共有二千四百万人，冗员多、素质低、机构庞大，这样不合理的人员结构，严重影响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积累，而农业的积累很低，农业税每年只有三十亿元，只占国家总预算收入的百分之一。因此，必须精简，也可能精简。据石景山钢铁厂调查，保持现有生产规模，可以减少职工三分之一。以此类推，全国可以减少职工八百万人。这件大事，首先领导要有决心，其次，要把精简下来的人员放到基层生产单位去，而不是层层下放，三是要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建议国务院和党中央做出榜样，领导和推动这项工作。关于工矿企业的整风。指出：政策、方法、步骤和高等院校应该有所不同。高等院校六月八日前，右派趁大鸣大放之机猖狂进攻，教职员和学生思想很混乱，迅速转入反击右派是必要和正确的。厂矿不同，工人鸣放后，领导要抓紧改进工作，一改再改，改得差不多时，有领导地组织辩论，目的是教育工人，方式越和风细雨越好。工人群众是自己人，只能推心置腹，披肝沥胆，决不可以采用任何不诚恳的办法，否则在工人中会留下很恶劣的影响，使他们感到我们在耍手腕。在工矿企业中，如采取急于辩论批判的做法，眼前也许不觉得怎么

样，实际等于在政治上欠了高利贷，以后事情一定不好办，是得不偿失的。现在，大专院校反击右派的斗争差不多了，但接受群众的批评和意见、改正缺点错误的工作，做得很不够，等于刮了一阵大风，下了几滴暴雨，结果只是湿了一层地皮，根本谈不到改得透。而有些学校的领导，却以为雨过天晴，改的劲头已经很小。他们不应健忘，右派进攻时，是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很多严重缺点和错误，抓住我们的小辫子；而中间分子也因为对我们的缺点错误不满，暂时对我们发生动摇。只有我们切实改正，才能彻底孤立右派，把中间分子争取过来。我们反击右派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另一半，甚至可以说是一大半，是改进工作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我们在高等院校还欠着债。准备在北京三十四所高校中再发动一次鸣放高潮，依靠群众的力量，学习上海的经验，推动改进工作。关于政法工作。指出：当前，根本问题是赞成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党的领导，特别是地方党委的领导；政法机关该不该沦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使用的武器。我们决不能把法律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毛泽东同志是有明确指示的，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规定：“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

10月10日 召集北京市各高校党委书记和部分党总支书记开会，再次督促大家认真整改。说：反右斗争已取得基本的胜利，现在的工作中心是解决整改问题，不然，中间分子不会口服心服，反右斗争不会取得完全胜利。现在，离改进工作的要求来说是差得很多，各校要着重解决一批问题，向群众报告，再听取群众批评。重大问题的整改，要同群众商量，干部作风不好的，要向群众作检讨。

△ 晚，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大使馆举行的音乐演奏会。

10月11日 上午，主持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港澳工作问题。

△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等同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安东·于哥夫，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吉米特尔·加涅夫，政治局委员鲍里斯·塔斯科夫以及中央委员卡洛·卢卡诺夫举行会谈。

10月13日 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在旅大参观访问。

△ 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整风运动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问题。会议同意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及其步骤。对于修改后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会议同意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的联席会议加以讨论，之后，在全国人民中讨论。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讲话。

10月1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一）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事宜；（二）关于民主党派中右派分子和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和政协机关等部门的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

10月15日 上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指示》、《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报告》和《关于在中小学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等。

10月16日 上午，受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委托，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的联席会议。听取并讨论谭震林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说明。

△ 下午，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欢迎以阿·鲍·阿里斯托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和以费林格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的扩大会议。晚，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欢送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10月17日 晚，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随后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欢送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回国。

10月22日 下午，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的联席会议。会议基本上同意《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决定在报上公布，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10月23日 上午，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在发言中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做事是靠政治觉悟，赏罚是辅助手段。有些人工作做得很好，你不赏，而有的人，犯了很大的错误，甚至违反了纪律不处罚，这是赏罚不明。不能赏罚严明至少要赏罚分明，这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辅助，要造成这样一种风气。建议国务院吸收讨论中的意见将《暂行规定》稍作修改后，原则上通过。会议还根据周恩来提出的议案，审查了一九三〇年七月五日在伦敦签订的、并以中国政府名义加入的《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决定予以承认；同时审查了对一九三〇年《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附件二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修正建议，决定予以接受。

△ 下午，和周恩来等到机场欢迎阿富汗王国首相萨达尔·穆罕默德·达乌德。晚，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会见达乌德首相一行。二十五日下午，在北京市各界人民欢迎达乌德首相大会上致词说：中阿两国人民将继续维护和发扬万隆会议精神，在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维护民族独立，促进亚非国家友好团结等方面，共同努力，做出贡献。晚，和朱德、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郭沫若等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达乌德首相一行。

10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十六次会议。会议讨论解决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有关问题。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 晚，出席阿富汗首相达乌德举行的答谢宴会。

10月27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

10月28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活动的有关问题。

10月29日 出席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同意《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会议还决定由彭真、陈叔通、邵力子等十三人组成小组，研究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关于各级政协组织进行整风的通知（草案）》，然后交由常务委员会讨论。

10月30日 晚，举行宴会，欢迎以铃木东民为团长的日本港湾城市市长访华团。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1月2日 上午，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到机场为毛泽东率领的赴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的中国代表团送行。代表团是应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决定派出的。代表团在访苏期间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分别在两个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和平宣言》上签字。

△ 晚十一时，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通报了以下事项：（一）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苏，我方已请苏方免去毛主席抵达莫斯科时的群众夹道欢迎，因为其他国家党的代表团都没有受到此礼遇，我们不应突出。（二）工厂和农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第二阶段的内容，毛主席的意思是着重搞整改，干部和群众齐心协力狠狠地改进工作。第三阶段搞辩论。（三）毛主席请各地抓紧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四）关于干部参加劳动，中央拟抽调三万人下去，不包括北京市，各省、市、自治区也要放一批干部下去，使他们得到多方面锻炼。毛主席很称赞江苏一下拿十三万人下去。此外，还谈了肃反问题。

11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国家、合作社、个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以及企业和国家机关中普通工和勤杂工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

11月6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三次会议。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和吴波的说明后，讨论通过《一九五八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 晚，主持首都各界一万八千人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刘少奇在会上发表讲话。

△ 致电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波布罗夫尼科夫，祝贺十月革命节。

11月7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等会见来华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的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为首的苏联各界代表团。晚，陪同代表团观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约有五十万人参加的联欢晚会。并出席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在北京苏联展览馆中央大厅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宴会。九日晚，陪同苏联各界代表团，参加中山公园游园晚会。

11月10日、11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十七次会议。会议听取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司法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汇报，讨论右派的划分问题。

11月11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由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

△ 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结合大辩论整顿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和《关于郊区农村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整党整团的指示》。

11月12日 审阅《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发表的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稿。

11月13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十八次会议。在讨论处理农业生产合作社部分社员瞒报的“黑地”问题时说：查“黑地”问题，先搞典型试验，将来规划生产时核实

土地就解决了。同时，根据一地的经验中央就发指示也不好。会议决定不发指示，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去搞典型试验。会议还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等。

△ 晚，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华使馆吊唁捷克总统安托尔·萨波托斯基逝世。应布拉格广播电台之邀，十八日为萨波托斯基总统逝世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发表广播讲话。

11月14日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 审阅《人民日报》拟于十六日发表的题为《大家都来支援农业》的社论稿。

11月15日 召集谭震林、李雪峰、刘澜涛、李颀伯开会，讨论整风问题。

△ 晚，和徐冰应约到周恩来处谈工作。

11月16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关于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中普通工和勤杂工的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

11月18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十九次会议，听取山区工作会议情况汇报，讨论山区建设问题。在讲话中指出：（一）机关精简要把工业、文化、卫生、教育部门的干部带上山。党、团、报纸都要注意抓开发山区的工作，这是三中全会确定的大方针。（二）总的情况是因地制宜。不能把城里的、

平原的东西简单地搬上山去。(三)山区开发的方针是抓水土保持和粮食生产。水土保持是关乎全局的问题,粮食要争取自给有余,在此种情况下搞多种经营。(四)要有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层层有计划,无计划是小农经济的特点。计划要包括具体措施。(五)开发山区,总的是依靠群众,国家给予必要支援。发展交通,国家要指导,水利、造林、积肥靠群众,强调群力合作。资金主要靠群众,国家贷款要有贷有还。(六)加强地方党委和政府对于山区的统一领导。(七)林业,伐、用、保、造全面安排。要伐一棵植几棵,越伐越多才好。(八)宣传工作,由中央农村工作部指导。请中央农村工作部写报告,报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

11月19日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国营厂矿企业整改工作情况。报告说:北京市交通、运输、邮电系统的七十三个国营工业和市政企业,两个月来整改成绩很大:干部开始纠正简单粗暴的作风;工人的劳动条件有所改善;厉行节约,克服浪费;生活福利方面,解决了一批党委权限内能办到的事情。五十五个中央国营厂矿企业和六个市政企业,计划精简一万四千八百余人,占原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已经有四千二百三十多人走上生产岗位。国营工业第三季度总产值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点五。报告说在鸣放开始时,工厂领导中有两种意见:一是准备在大鸣大放后,立即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另一种意见认为那样会增加群众顾虑,放松整改。事实证明后一种意见是对的,也说明在群众鸣放高潮中改进工作的速度是很快的。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并批示:“中央认为,北京市在工人群众大鸣大放之后,紧接着就坚决转入整改阶段的做法是正确的,经验已经证明,这样做是比较好的。各地在工人群众大鸣大放以后(科室人员在外),

在农民群众大鸣大放以后，除开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单位以外，一般地说，都应该紧接着进入整改阶段。应该在群众鸣放高潮的基础上，干部和群众齐心努力狠狠地改进工作。”

11月20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雪峰关于企业厂矿整风情况的汇报、谭震林关于农村整风情况的汇报、陈正人关于山区生产、交通和人民生活情况的汇报、安子文〔1〕关于各地下放干部情况的汇报。在谈到干部下放时，发言说：解放后新参加工作的人员、旧人员、新知识分子，都应分批下放劳动。现在北京市干部脱离群众，不劳动不行。干部下放，第一是改造思想，第二是改进工作。劳动中表现好的抽调回机关。

11月21日 下午，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同中央和北京市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学校和部队的代表数千人，到南苑机场迎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自莫斯科回到北京。

11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报告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情况。

11月24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上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干部下放等问题。

△ 晚，和李雪峰、刘澜涛、赖若愚、李颀伯等到刘少奇处商谈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

11月25日 晚，出席宋庆龄为招待以安德烈耶夫为首的苏联各界来华参加中国人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二十七日上午，到南苑机场送安德烈耶夫一行回国。

11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五十次会议。会议听

〔1〕 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取中央各部委关于整风运动整改阶段情况的汇报。在讨论整风整改问题时，发言说：中央各机关整改工作已真正展开，厂矿企业，鸣放以后就转入整改。整改的重点是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经过同各省商议，一般做法应当是鸣放以后即搞整改；有些地方或合作社鸣放以后有问题需要辩论，也可以先辩论再整改。干部下放问题，可先动员、报名，等整改后再下去。要防止有的领导借干部下放之机“收摊子、卸包袱”，把不能劳动的干部“推出去不管”。少奇同志说，要向下放干部讲清楚，一是去劳动锻炼，二是回老家，待有机会优先录用。下放干部的工资先按原薪发，以后逐年补足劳动收入不及原薪的差额，不要把下放人员弄得波动不安。全国约有二百四十万干部下放，占行政管理人员的四分之一，对下放干部的政治、文化、技术学习，中宣部要安排，口粮要照顾。

11月27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杨尚昆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11月28日 零时四十分，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 晚，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为庆祝阿尔巴尼亚独立四十五周年、解放十三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1月29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周恩来关于直辖市和县以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时间的提案，确定了选举的日期。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消防监督条例；批准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会议还讨论了国务院《关于调整获利较大的经济作物的农业税附加比例的规定》。

△ 晚，出席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为庆祝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庆举行的招待会。

11月30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委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题为《团结全国人民，勤劳节俭，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工作报告稿、《中国工会章程》修改草案及《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报告》稿和中共中央向大会的祝词稿。

11月 在北京市委研究治安问题的一次会议上说：解放八年多了，在北京西郊还发生抢劫案，我们有责任。市政府一定要把北京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像水晶石、镜子一样清楚。并指示市公安局：控制敌情，加强隐蔽斗争。

12月2日 下午，出席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会前，陪同毛泽东等接见参加代表大会的各国工会代表团。

12月3—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有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高等学校、文艺界、出版界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

12月3日 晚，和邓小平、杨尚昆、刘宁一陪同刘少奇会见并宴请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和中央委员约希。

12月4日 下午，和邓小平等陪同刘少奇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常任干部会委员志贺义雄和中央委员藏原惟人。

12月5日 晚，出席周恩来为欢迎缅甸联邦吴觉迎副总理和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举行的宴会。

12月6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五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右派分子的处理等问题。在讨论宁夏回族自治区机构编制方案和安排宁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项目时说：（一）各地经验证明，人多了不好办事。同其他各部门比，自治区的编制也不算少。主要干部可以增加一些，机关其他人员，下决心再减少些，搞得精一些。（二）修建办公楼放后一

点，带头树立一个好的勤俭的风气。会议还听取了廖鲁言汇报牧区工作会议情况。

△ 下午，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汇报率领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情况。

12月7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继续讨论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

△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调整获利较大的经济作物的农业税附加比例的规定》，还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草案）》。

12月7日、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五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股份基金的补充规定》、《关于正确对待个体农户的指示》、《关于各单位在农村招收临时工的规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接收党员工作的通知》，《关于第二届全国人大、省、市人大、第三届县、市人大会议和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省、市、县委员会民主人士安排的通知》，《关于民主党派改组各级领导机制的意见》，《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严格管理外货经由西藏流入内地各省区的指示的措施》。会议决定以上各项根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会议还讨论并原则同意劳动部党组关于起草国家劳动法的几个带根本性问题的请示。

12月8日 上午十一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及徐冰参加毛泽东离京去杭州前召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出席的会议。他们是：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1〕、张治中、邵力子、朱蕴山、梅龚彬、陈劭先、陈此生、熊克武〔2〕、沈钧儒、史良、高崇民、胡愈之〔3〕、黄炎培、王绍鏊〔4〕、许广平、杨东莼〔5〕、许德珩、梁希、李纯青、季方、陈其尤〔6〕、宋庆龄、傅作义、张奚若、杨明轩〔7〕。会上，毛泽东谈了莫斯科会议情况和关于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的设想，以及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

12月10日 约请部分高等院校的领导干部分和教授，座谈

-
- 〔1〕 蔡廷锴，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 〔2〕 朱蕴山，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梅龚彬，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陈邵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中央团结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此生，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副秘书长、宣传部长。熊克武，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 〔3〕 高崇民，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秘书长。
- 〔4〕 王绍鏊，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
- 〔5〕 杨东莼，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
- 〔6〕 梁希，时任林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李纯青，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副主席。季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陈其尤，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
- 〔7〕 杨明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整改和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讲话中说：党中央已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商量了，认为右派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但要留有改造的余地，思想斗争从严，处理从宽，要群众通得过。教授中的右派分子，行政领导职务要撤销，可以继续教书，有的还可以保留一些职务。共产党员中的右派分子，要开除党籍。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经商量不一定开除。总之，既要严肃又要慎重。

12月10日、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正确对待个体农户的指示》、《农业生产合作社股份基金的补充规定》、《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作家下厂下乡问题》和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等规定、条例。

12月15日—31日 到河北保定、石家庄，河南郑州、洛阳，湖北武汉调查研究，了解工农业生产情况，参观视察工厂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8年 五十六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一个胜利的开端。”并提出“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1月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五十四次会议。

△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高等学校处理右派分子的工作部署。

1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1〕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审阅由胡乔木起草的这个通知初稿后，嘱胡：“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二次会，发表意见，修改文件”，把道理和办法“讲得入情人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

〔1〕 四害，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将除四害列为第五十条，条文是：“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一九六〇年后，将除四害的内容改为消灭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1月3日、4日、7日 出席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月4日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修建十三陵水库。该工程于同月二十一日开工。

1月6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次会议。会议讨论召开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会期和议程、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等问题。会议通过《关于适当提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的决定》；原则批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

△ 晚，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在杭州会议〔1〕上的讲话。

1月7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五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在讨论中央组织部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吸收党员的通知时，提出：应在适当地方加上“革命成功后发展党员要经过更多的考验”的内容。在讨论对大专院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组织处理时，会上商定由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等市分别选择若干学校，进一步研究提出方案，待胡乔木回京后讨论决定。在讨论安排下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民主人士代表的通知时，提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要多注意安排非党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和非党劳动者代表人物。遵照毛泽东通知，刘少奇、周恩来、陈

〔1〕 杭州会议，指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华东四省一市的党委书记等参加的小型会议。会议主要讨论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和技术革命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批评了一九五六年反冒进。

云、邓小平、彭真等十四位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十二个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于十一日或十二日去广西南宁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指定“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会议决定邓小平、彭真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由谭震林主持，彭真回来后，由彭真主持。

1月9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1月10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讲的十七条工作方法问题。

1月11日—22日 在广西南宁，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九省二市的党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后通称为“南宁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讨论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责任。会议在安排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指标的方法上，提出了“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一本是期成的，中央的“期成”账是地方的“必成”账，使计划层层加码。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工作方法十七条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纳了中央和地方许多负责同志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这个文件印发全党。

1月22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南宁会议的同志参加南宁市游园大会。晚，继续开会至次日凌晨结束。二十三日回到北京。

1月24日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有关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问题。在讨论关

于右派分子的代表资格问题时说：在去年召开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的意见，和秘书处收到的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一千零三十二件来信中的意见，均要求撤销右派分子的代表资格。大会同意主席团的意见：对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不宜急于作组织处理，将此问题和有关来信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酌情处理。右派分子背叛了宪法的根本原则，应当被撤销人大代表资格。但根据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代会没有撤销代表资格的权力，只有原选举单位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随时撤换本单位选出的代表。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提出一个临时处置办法，“停止他们出席这次会议”。然后，由原选举的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作出撤销其代表资格的决定，完成法律手续。

△ 晚，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同意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 and 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稿；同意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的建议名单；同意给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加调干部等。二十五日晚，继续开会。

1月25日—31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二十五日下午，向会议作关于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安排的报告。报告说：预备会议安排七天，因为大会的议题多，文件多，需要有时间阅读，多开些小组会交换意见；国务院将派有关负责人到各小组作说明，以利代表们对各议题的审议。正式会议二月一日开幕。会议通过了这个安排。

1月27日 上午，召集华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开会，传达南宁会议情况。晚上，由出席南宁会议

的欧阳钦〔1〕、刘仁继续传达。

△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李景林的工作汇报。

△ 晚，到毛泽东处谈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问题。

1月28日 上午，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到会的党内和党外负责人九十三人。会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谈话。三十日上午，会议继续进行。

1月29日 上午，和谭震林、吴冷西、李颀伯等商谈问题。

△ 下午，继续向几位省委书记传达南宁会议情况。晚，向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共中央各部正副部长、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正副书记及部队的负责同志共一百六十五人传达南宁会议上提出的一些问题。

1月30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召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讨论有关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筹备工作问题。

1月31日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三次会议。向会议报告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并向大会建议的议程项目、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的人选以及提案审查委员会人选等。会议讨论通过常委会准备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周恩来作的说明和提出的议案，决定撤销章乃器粮食部部长职务、章伯钧交通部部长职务、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会议还通过常委会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

〔1〕 欧阳钦，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

会议提出的关于罢免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以及国防委员会中十名成员的职务的建议。

2月1日—11日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常务主席之一和大会秘书长。一日下午，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体会议作工作报告。十一日上午，主持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并对提交大会审议的各项议题的决议或决定的草案作说明。十一日下午，大会全体会议决议：原则批准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修改批准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和李先念作的相关报告；批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薄一波作的相关报告；批准彭真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原则同意吴玉章〔1〕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会议补选程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汪锋、陈垣、唐生智、梅龚彬为常委会委员；还补选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的委员。会议还通过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定，并决定了国务院若干组成人员的任免，其中任命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通过关于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任免问题的决议，决定任命郭沫若为院长，陈伯达、李四光、张劲夫、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为副院长。会议还通过决议将天津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

2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第一次提出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事业“全面大跃进”的口号。三日，发表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号召“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力争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

〔1〕 吴玉章，时兼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

义建设”。

2月4日 晚，和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同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让·维美徐为首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会谈。十日晚，陪同刘少奇会见法共代表团。

△ 晚，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2月5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五十八次会议，讨论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干部处理问题的报告。

△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关于提请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决定任免国务院若干组成人员的议案》，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

2月6日 晚，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声明》稿等文件。随后，出席朱德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关于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声明问题。

2月7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收到毛泽东批示“即阅发”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传达和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情况报告》〔1〕，当即用电报发各地，并印发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2月8日 上午，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2月12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汇报会议。刘澜涛、胡乔木、赵尔陆〔2〕、李葆华等出席会议。在听取出

〔1〕 中共河南省委一九五八年二月二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毛主席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是保证把技术革命搞成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获得自己充分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进一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必要的条件”。

〔2〕 赵尔陆，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席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山东、山西、陕西、广东、吉林、黑龙江、辽宁、上海、广东等省市党的负责人汇报在“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工农业发展的情况和问题后，讲了以下意见：（一）大家干劲很高。这次人大会议通过的工农业指标是第一本账，“比较保守”，农业如无天灾，可以“大大超过”。各省新的要求，可以列入第二本账，交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考虑。（二）指标高了办不到，放了空炮怎么办，有两条，一是气可鼓不可泄，二是不能有很多办不到的指标，办不到，还是泄气。从省到乡，都搞两本账，定两个指标，一个是保证数，一个是争取数，将来算保证数，这样就不致泼冷水。（三）体制问题，中央要考虑，从全国平衡的需要，总要有一些受管的内容。解决现行体制的矛盾，南宁会议提出，先取得典型经验，有了经验就可以突破。条条块块的矛盾一万年也会有，要采取多种形式调节，地区协作，开联系会议，主管业务的部长每年下去四个月，或地方派人到北京来面谈等。（四）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晋冀鲁豫四省五年可达到，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缺干部、缺劳力，要七年才能达到。干部来源一是从中央各部抽调，二是从晋冀鲁豫调一点，交流经验，请安子文研究。（五）处理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除了违法乱纪者外，对犯政治错误的干部，一要严肃，二要谨慎，要分清是非，耐心教育，做到仁至义尽。广东批判“地方主义”，对古大存、冯白驹〔1〕的处理，毛主席同意省委意见，说他们过去有功，古保留省委常委，冯保留委员。还是一看二帮。对右派的处

〔1〕古大存、冯白驹，时均任广东省副省长。一九五八年一月，因所谓“地方主义”错误，二人均被撤销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

理，方针已定，经过斗争后，还是要讲团结改造；允许同右派来往，帮助他们改造。（六）中小学教员队伍要清理，为人师表，挑选要从严，可从下放干部和中学毕业生中补充师资。要处理坏人，决心把这条战线搞好。（七）当前旱灾威胁，已打井、修坝，但抽水工具应当做为战斗任务加以保证，五月前解决，不得误农时。（八）思想工作，是《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很重要的一条，主要讲思想方法。各地要经常注意这个问题。

△ 晚九时，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2月13日—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

2月13日 下午，去中山公园中山堂参加公祭黄敬〔1〕的仪式。黄敬于二月十日在广州逝世。

△ 晚，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李雪峰汇报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情况。朱德参加会议。

2月14日 晨，和陈云等到机场为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朝鲜送行。代表团访朝期间，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一九五八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

△ 晚，和朱德、陈云等出席刘少奇召集的讨论职工工资福利问题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书记处有关同志、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负责人。

2月15日 下午，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2月16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李雪峰准备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上作的总结讲话。

〔1〕 黄敬（一九一一——一九五八），生前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

△ 下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主要内容是：（一）为了促进生产高潮，必须抓好整风。去年在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主要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今年要进一步解决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我们的干部，如工厂里的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行政上的市长、省长、部长，他们不是人民群众的“统治者”，“不是一群官”，而是人民中的一员。要通过整风，解决他们中存在的官气、暮气，办事不走群众路线，不搞民主集中制，不以平等态度对待普通劳动者的作风，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同时解决不利于生产发展、不利于工人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规章制度，这些东西，不改变，不可能解放生产力，把生产大大推向前进。所以，生产高潮要掀起，整风一定要坚决继续贯彻下去。（二）一九五八年一定要成为一个大跃进，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一切方面的大跃进。要从反浪费、反保守入手，把工厂、企业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出现一个生产新高潮。中央考虑，这一阶段，抓反浪费、反保守，既是整改的纲，也是带动生产高潮的纲。贪污一定要反，但要有步骤。（三）整改中，涉及工人的工资、福利问题时一般不要降低。有的地区如边疆工资补贴太高，有的规定太不合理，不利于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的也要逐步调整。但是，真正增产节约不应在这个方面打主意，千万不要只看到几个钱，看不到群众关系，甚至影响到群众关系。特别是老工人的工资、福利还应调高一点。要从大处着眼，改进设计、施工标准，降低成本、减少次品，提高工人的积极性等方面去考虑。（四）商业改革问题。北京的天桥百货商店是一个典型，基本改革是调整营业时间，改善服务态度，干部站柜台，精简职工。要负责地对待减下来的人，不遣散回家，另做安排，但工

资照发。此外，讲话还谈到清理中小学教师队伍和对右派做教育争取工作，要把他们中的多数人改造好。

△ 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记处书记吕剑人汇报工作。

2月17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央书记处对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来的指示，和周恩来提出的设立政法、经济、文教科学、农林、外交五个组，党政统一，但各组不议文件等意见。在发言中说：过去，书记处负责处理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但反映情况不够，因为各方情况我们也不完全了解。文件处理花的时间很多，特别是处理文稿质量不高的文件。今后，国务院各部门要向书记处反映情况；书记处只抓原则，不批文件。大家都愿意出去了解情况，但书记处的工作不能停摆。建议国务院方面，周恩来和陈云同志两人中，一定要有一人在京，不然，都归到书记处，情况不熟悉。邓小平说，书记处工作范围扩大了，开始新的工作方式，有两条：一是为政治局“挡”一些日常工作，二是怕越权。作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过去一般说没有越权，但及时反映情况不够。对当前工作，书记处的分工是：政法工作，由彭真、胡乔木分管；农村整风，由刘澜涛、谭震林分管；工厂整风，由彭真、李雪峰分管。

△ 晚，毛泽东和朱德商谈问题。六时五十分后，请彭真参加；朱德离去后，继续谈至晚八时五十分。

2月18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等共一百一十九人。毛泽东在会上讲南宁会议的情况，继续批评“反冒进”。

2月21日 下午，和邓小平到毛泽东处商谈问题。

2月22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集的几个高等学校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谈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问题。说：在工厂整风中，工人可以写大字报批评厂长，改变领导和工人的关系。这一次是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各方面都在跃进，是进城以来，群众发动得最广泛的一次运动。

2月23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访问朝鲜的报告。

2月2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五十九次会议，讨论多项事宜。主要有：（一）在讨论西藏地区一九五八年工资标准调整方案和赴藏工作人员休假、换班制度的规定时说：要从低工资搞起，建设才有希望。今后要多动员青壮年去西藏工作。休假制度可先在内部试行，不公布；试行一个时期以后再考虑修改定案。会议批准工资调整方案，决定现有汉藏工作人员按此标准执行，以后吸收新的工作人员，另订新的工资标准，并事先签好合同。（二）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安排一部分老干部担任荣誉职务的通知时说：应规定担任荣誉职务的人员不要干涉人家的具体工作，而要多做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宣传工作，教育后代。（三）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和密切地方党委同军队关系的指示》时提出：军队可以有一位负责人参加地方党委。（四）在讨论关于禁种鸦片问题时说：现在我国种鸦片禁得差不多了。国际上公认有几个国家种鸦片，供医药用。我国现在每年医药用只需一二百万元的鸦片。毛主席的意见，我们还是不种为好。会议决定：全国各地一律不种鸦片。医药用鸦片，必要时可向国外采购。（五）在讨论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的编辑方针和阅读范围时说：有些需要中央处理、通报的内容，还是由中央批转为好。凡是登错了的，省市市委有意见，一定要更正。至于外国的

事情，要少印发一些。（六）关于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名称问题，提出可删去“民主”两字，不必改称“中华全国青年联络委员会”〔1〕。会议请刘澜涛与团中央商议后再报。

△ 下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会议上作《关于反浪费反保守问题》的报告。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的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在报告中指出：（一）整风运动如果不归结到改进工作，改进业务，发展生产，只能说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要把发展生产和坚持整风推向前进，就要抓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比政治上的进步。这是深入推动整个运动的一个纲；抓住这个纲，所有工作都抓起来了。（二）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要求是广泛发动群众，树立劳动人民的主人翁感、干部和群众的平等关系，使劳动者的责任心发扬起来，鼓起社会主义干劲，自觉地和促进生产、改进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事业出现一个大跃进的高潮。因此，运动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要把解决生产问题和解决思想问题、政治问题结合起来，否则很容易搞成单纯的清仓库，算经济账，追求数目字，结果把整风冲淡了。（三）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起来后，工作改进，必然会打破部门之间原来的平衡。是鞭打快牛，还是鞭打慢牛？应该想尽各种方法，帮助和动员落后的赶上去，达到新的平衡，不能用平常的平衡方法去指挥运动，

〔1〕 共青团中央建议：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上，拟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更名为“中华全国青年联络委员会”，后来，接受中共中央的意见，定名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在万马奔腾的速度中，总的应是落后的赶上先进的。当然，有时太先进的也要适当地控制一下。（四）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法规，很多是对工作有益的，但是，有许多现在不适用了，有的甚至束缚生产力发展，妨碍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包括一些技术规章制度。凡是束缚生产力发展，束缚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发扬的，要把它废除，或加以修订，使其完备。会议还听取了北京市和化工部等四部委关于反浪费、反保守的情况介绍。

2月25日 出席有周恩来和有关副总理参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关系问题。

2月26日 上午，和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冶金部、化工部、煤炭部、石油部、一机部、国家技术委员会的负责人。

△ 下午，出席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大会的闭幕会。参加会议的连同市、区、乡、社干部在内共二千多人。在大会讲话中号召大家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彻底打掉官气、暮气、阔气、娇气和骄气，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哪里先进就要向哪里学习，为争取提前实现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努力奋斗。并针对当时防旱的急需，要求工农团结互助，立即准备排水灌溉机械，以备抗旱，争取当年大丰收。各区要开展以亩产粮食

“过黄河”、“过长江”〔1〕，争取成为“千斤社”的竞赛活动。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处理中共青海省委有关干部的问题。

△ 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稿。指示指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认为只要发动起群众性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使干部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因此，中央决定以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这个指示。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3月2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六十次会议，听取林铁和黄火青〔2〕汇报天津的情况。

△ 下午，和陈伯达、吴冷西到毛泽东处谈话。

3月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六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多项事宜。在讨论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关于共同办刊物问题时说：要防止办个刊物乱干涉别的党的内部事务。这个

〔1〕 按《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要求：粮食每亩平均年产，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过黄河”、“过长江”，即要求亩产达到或超过五百斤或八百斤以上，作为竞赛活动的指标。

〔2〕 黄火青，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市长。

党批评那个党的文章，要慎重，不要轻易刊登。在讨论全国总工会党组请示劳改企业中的刑满留厂就业人员能否加入工会问题时说：劳教人员本不应该剥夺其选举权；反革命分子无选举权。在讨论国务院几个部改组后副部长、部长助理人员的调整方案时说：基本问题是人多，一个部十一个副部长，十三个部长助理，怎么工作？各省的副省长，也请组织部调整一下。这个问题不解决，“暮气搞不掉”。

△ 晚，和陈云、邓小平、胡乔木等到毛泽东处商谈问题。

3月4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负责人汇报整风情况。在发言中肯定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高校的整改经验时说：复旦大学等四校提出，高等院校最大的浪费是培养的学生红得不透，专得不深，这就把问题抓住了。高等学校中要把“双反”〔1〕运动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结合起来，把提高教学质量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列入学校的整改计划。

3月5日 听取北京市高校党委汇报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情况。说：大学办得好不好，要看教师教得怎样，学生是否又红又专。我们还要把高校的科技力量发挥出来，为地方的建设服务。北京要站在技术革命的最前线。科学家要通过业务接近共产主义，对他们急不得，要欢迎他们一点一点地进步，积极起来。要召开几千人的会，左、中、右都来，市委要讲一讲。会后，中共北京市委按照彭真的意见，立即组织部分高等学校的领导干部去上海考察学习。

△ 下午，出席朱德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治

〔1〕 指反浪费、反保守运动。

金工业部的工作。

3月6日 上午，和朱德、陈云等出席邓小平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的会议，讨论西南铁路建设问题。

3月7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高等学校干部、教师和学生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整风运动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

△ 下午，出席李济深主持的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四次会议。会议批准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关于国境及其相通河流和湖泊的商船通航协定。会议还讨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办事机构的日常工作和整风问题，并通过决定：自一九五八年四月起取消全国人大代表每人每月五十元的工作费。工作、生活有需要的，另行补助。

△ 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六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草案）》、一九五八年十万军队转业干部的安排、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保护现役军人婚姻的措施以及召开农业先进代表会议等问题。会议决定上述有关文件根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由彭真“阅发”。在讨论关于领导干部每年下去调查四个月的规定时说：人大代表的视察，在京的，根据自愿组织下去，全国不统一组织。有关技术性的文件，今后由各部委自己签发。

3月8日—26日 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后通称为“成都会议”）。会议期间，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成都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和《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

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三十七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评“反冒进”。会议号召实行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3月8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王从吾、钱瑛〔1〕分别汇报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部整风运动和筹备召开全国监察会议的情况。在讲话中指出：监察部的工作，总的方向是对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一九五五年监察工作方面，推广苏联的“事先稽查，垂直领导”，作为试验，是经政治局同意的，实践证明不适合我国的国情，责任不在监察部。又指出：（一）党组织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监察部、司法部、检察院都要服从党的领导；不只是服从党中央，还包括各级党委。把各级党委抛开，服从党中央就名存实亡。这个根本问题弄清了，其他问题就清楚了。（二）监察工作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一个时期抓一个主要方面。中监委是党内的司法机关，任务是维护党纪，主要是抓中央直属各单位，对省市主要是思想方针的监督；监察部主要是维护政纪。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意识形态方面和资产阶级、封建残余的斗争还是长期的，这些错误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员和干部中来。这是一条斗争的主线，党主要靠教育和定期的整风提高干部的思想，辅之以党纪、政纪的约束，严重的要绳之以法，违法不到犯罪程度的，归监察部负责处理。在当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监察工作要抓主要的错误倾向和错误的典型，通报和处理。（三）针对县一级监察组是取消还是和监委合并或合署办公问题，回答说：暂时不要取消，先总结经验，现在十八个省市区党委书记正在成都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后，报中央决

〔1〕 钱瑛，时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

定。(四)应和在监察系统工作的民主人士长期合作。讲话最后勉励大家,开好全国监察会议,依靠党的领导,放手工作,不要束手束脚。

3月10日、11日 和陈毅两次应约到朱德处谈话。

3月10日 参加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1〕的治丧委员会,为委员。程砚秋是三月九日逝世的。

3月12日 审阅公安部起草的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内容为公安工作跃进的方向的社论和一篇关于四省六市〔2〕公安工作跃进的报道稿。在电话中告刘复之〔3〕说:“毛主席提倡实产实报,反对虚产虚报。你们的社论压几天看看,有许多事情没有把握,不放心。”十四日,又告徐子荣:“现在搞跃进,干劲、积极性是好的,口号、指标公布的一定要能实现”,“不能实现的搞出去不好”。公安工作不同于工农业生产,它“决定于阶级消灭的程度,群众觉悟程度,坏分子改造的程度,不是公安部门单方面可以解决的”。又说:“形势是多做事,少出头”,“别人放空炮,我不放;别人热,我不热。积极性不受影响,调动积极性做实际工作”。

△ 下午,出席朱德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王震〔4〕访问日本的情况汇报。

3月13日 听取中共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党委负责人汇报

〔1〕程砚秋(一九〇四——一九五八),生前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研究院副院长。

〔2〕四省指辽宁、黑龙江、吉林和河南省;六市指北京、沈阳、上海、哈尔滨、大连和郑州市。

〔3〕刘复之,时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

〔4〕王震,时任农垦部部长。

学校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发展情况。

3月14日 收阅陈正人给邓小平、彭真并报毛泽东、中央各负责同志的《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徐水县去冬今春苦战三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二十一日，毛泽东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1〕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3月16日 审阅郑天翔准备在全市有六百二十多位负责干部参加的整风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稿。讲话稿提出整风运动中应深入阅读文件，严肃认真而又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官、暮、阔、骄、娇五气，在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中，改进实际工作。

△ 夜，阅改《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发表的题为《自我改造的正确道路》的社论稿。社论赞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北京举行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上，通过公约，表示决心跟共产党走，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决心向工农学习。社论希望他们“说到做到”。

3月17日 在第七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监察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并强调监察工作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是宪法序言明文规定的。监察部门是党和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部门是平等的，并不高人一等；不能对其他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事先监督”。监察总是事后的，事先监督不可能，但可做预防工作。监察工作必须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多数，走群众路线，这是根本的工作方法。

〔1〕 指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三日谭震林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

3月18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六十三次会议。在讨论工商界人士提出的取消定息、降低保留工资和参加劳动等建议时说：定息是中国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经验，在亚洲各国影响很大，毛主席说七年不变。不要轻易接受取消的意见。保留工资是为了争取他们，降低了生活水平，他们就会喊叫。对资本家参加体力劳动问题，发言说：真正自愿的可以安排劳动。站柜台容易，下车间较为困难；下乡上山，年轻力壮的人，真正有决心的可以允许去。全国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家属在内有二千五百万人，他们有文化，有技术，搞得不好，得不偿失。这项工作不要忙。在讨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起先锋作用》时说：赞成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各界青年。青年人不仅要在思想上过社会主义关，而且要当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在会议结语时说：干劲很大，做法不一定对，要帮助解决。报纸宣传要注意讲明措施，不要追求指标，也不要光靠劳动强度，要讲技术，这是带有方针性的问题。煤炭工业部和各部的产量指标，在报上宣传，要经过李富春，只能公布“第一本账”。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邀请我国党政领导前去休假问题，会议决定一律婉言谢绝。

3月19日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五次会议。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将国家计量局改属国家技术委员会，物资供应总局改属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央手工业管理局改属轻工业部，中国民运航空局改属交通部；批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3月21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六十四次会议，听取刘建勋、韦国清〔1〕关于广西干部处理问题的汇报。会议认为广西应通过这次组织处理，整顿和提高党的队伍；并决定中央组织部与各部门商量，抽调一部分干部去广西工作。

△ 下午，出席朱德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解学恭、刘志坚〔2〕汇报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开展情况。

3月22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集的有机机关干部、党团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共约二千七百人参加的大会上，讲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问题。主要内容是：（一）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指出：一九四九年，人民政权接管了占工业总量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企业，新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还没有一般地废除私有制。一九五六年，通过“三大改造”，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开始不久，由于反击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而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思想上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二）关于整风问题。指出：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上层建筑方面需要进一步革命，包括劳动组织，劳动管理，规章制度，干部的思想作风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等需要改造，我们共产党“自己要革自己的命。”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面前，我们面临的是怎样搞工业、农业，怎样搞机械化、电气化，要在整风中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打掉，从头学起，才能和劳动人民建立平等的关系，彻底解

〔1〕 刘建勋，时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时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

〔2〕 解学恭，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刘志坚，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放生产力。党外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的朋友”，希望他们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丢掉个人主义、骄傲自大，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从全国六亿人的利益出发，把自己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对右派分子要“化敌为友”，我们“第一希望他好，第二看他改不改。”党对犯错误的人是一看二帮，即治病救人。只要愿意改，就要像大夫、护士看待病人一样，用高度的耐心帮助他，只要真正记取教训，他们也可能因祸得福。大家不要不理他，夫妻间也不必离婚，而是帮助对方改造。（三）关于正在开展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群众热情很高，指标也提得很高，但一定要有具体措施；没有措施，光靠希望，凭劳动强度，不但不能持久，指标会落空。群众运动起来后，不会没有缺点，要注意防范。在“双反”运动中，“生产大跃进，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会有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我们要准备改正。”二十四日，将报告内容和听众的反映一并书面上报毛泽东。

3月25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六十五次会议。在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检察长会议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时指出：报告原稿中有些提法不妥当。检察院组织法上规定公安、检察、法院三个机关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内部是集体领导，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提出把“一般监督”作为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这就把所有的国家机关直至党的机关都包括进去，违背了公、检、法机关互相监督的原则。又指出：最近，政法各机关（包括各地）提出许多跃进指标，要求“反革命破坏活动和普通刑事案件发案率比去年减少百分之七十以上”、“安全合作社、安全国营企业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提出“五无”、“十无”、“十五无”等等指标，都是不妥当的。政法机关只能从破案角度去考虑，发

案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决定于阶级斗争的紧张程度和长期性；强奸、流氓、贪污等犯罪问题，同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觉悟程度、守法水平有极大关系；迷信问题，到共产主义社会还可能会有，怎么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订指标，又怎么能讲“无”呢？《人民日报》的社论《四无是公安工作跃进的方向》决定不发，中央政法机关今后不要发这类文件，因为这是同脑筋发热发胀有关的。检察院的《工作方法四十条》也不搞。工作方法应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根本的是实事求是，各部门都搞，条条多了，自己也记不住。关于报刊宣传问题，指出：报纸要站稳立场，地方报刊搞“客里空”〔1〕，中央报刊不要随风倒。毛主席说要实干，实产实报。（杨尚昆插话：徐水的经验主席说不登报）高潮中，不要泼冷水，但主要抓措施；各地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要通过报纸说明改进的措施；报纸只登指标的第一本账，第二本账完成了才能登报。跃进是为了生产，围绕生产，还是抓这个中心。一九五六年冒进就是因为挡不住，缺点纠正就好了。

△ 下午，出席朱德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科学规划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汇报。二十六日下午，会议继续进行。

3月31日 上午，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生产高潮中应当控制劳动强度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八大二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1〕“客里空”是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一个惯于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后来我国新闻界借以泛指那些脱离事实、虚构浮夸、说空话的新闻报道作风。

3月底 听取北京大学党委汇报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情况。说：这次运动中，把教学改革、科研改革和思想改造联系在一起，是一次思想革命。知识分子和党靠拢，教学、科研才能改得好。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解决的。这次围绕红专问题破资产阶级思想，方式上温和，思想斗争很激烈，给傅鹰教授也贴许多大字报。要尽量和风细雨，用整风的办法，自觉批判错误思想。有关业务思想方面，一要坚持“双百”方针，有利于比较鉴别。二要理论联系实际，圈子不要划得太小。苏联研究人造卫星是早就开始的。有的是长远需要，合作研究也可以。三要以政治领导业务，具体业务不要乱干涉，乱做结论。要警惕我们自己翘尾巴。新生力量起来了，也不要甩掉老的。

4月2日 下午，出席朱德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全党在目前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告一段落后，及时地转入整风。在党委领导下召开二三十人的小型会议，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揭发和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提高自己。一般应在六月底以前基本结束整风运动。

4月3日、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听取薄一波、李富春传达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和会议精神。会议由邓小平主持。

4月3日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人民欢迎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大会，并致欢迎词。

4月5日 下午，出席陈云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成都会议提出的《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批准成都

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和《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

4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六十六次会议。在听取董纯才汇报教育行政会议情况后说：各地普及初中、小学要有两本账，登报宣传应是第一本账。关键是师资问题，没有教员就不能普及。勤工俭学要实事求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没有条件的地方不宜乱组织，如北京的小学生卖报、卖票，就不合适，占用了温习功课的时间。扫盲和正规学校教育要有区别；对正规学校的质量要求要高。大学无论如何要发讲义。中学的作文要增加，去年上半年一个季度只写了两篇作文，太少，应每周写一篇，而且教师要批改。写字要多练，把字写好。数学教员也要改作业。现在中小学不是减少教员编制，而是应该要求他们把课教好。会议还通过批转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民办农业中学问题的报告，报中央政治局审核。

4月8日 下午，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通过中共中央致南共中央的信和复苏联共产党中央的信。

4月13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接见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4月1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六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中共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对股份基金等三个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批复问题，决定暂不处理，继续研究。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工业各部门领导干部配备定额和中央一级机关中减少副职、取消部长助理的意见稿，决定将上述两件合成一个文件，以中央组织部名义提请中央政治局审议。

4月15日 主持中央政法委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一）

政法部门注意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加强教育改造，逐渐减少犯罪分子是可能的，但解决这个问题，包含经济基础、教育、意识形态各方面的工作，是全党的任务。政法部门有治罪之权，有改造之权，但无“消灭”犯罪之权；另一方面，不要硬套多、快、好、省。要抓办案质量，不搞文牍主义和繁琐手续，不要提办不到的事。（二）执行政策上宽和严的问题。前年所有制改造完成后，毛主席曾说，过去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是因为“大蒋”打倒了，“小蒋”未打倒，现在除西藏外，群众基本翻了身，应当宽一点了。一切要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今天的形势是要宽，少捕多管，可捕可不捕的管制起来，或送劳教，这不能算右。”“这个问题，准备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来。”（三）“各级检察院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由上级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上对下只是监督，不干涉。各级检察院要向同级人代会报告工作。”

4月18日 下午，召集政法各部门负责人开会，谈如何贯彻成都会议的精神问题。

4月21日 上午，和贺龙、聂荣臻、杨尚昆视察北京清河农场，同农场为培养后备干部所办的青年农场〔1〕的学员代表座谈。在讲话中鼓励他们要在劳动中锻炼自己，学会当会计，当技术员，学会开拖拉机，管理生产，成为专门人才。并为青年农场题词：“鼓足干劲，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加强锻炼，提高政治觉悟。”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准备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稿。

〔1〕 在青年农场培训的学员共七百余人，均是一九五七年中学毕业生。

4月26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在会上传达周恩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改变北京市市容的意见。周恩来的意见是：首先拆通东单到建国门的马路，改变东西长安街的面貌；中央机关在北京的房产，除中南海地区以外，交北京市统一管理，并与长远建设结合，增加投资，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传达后讲话说：过去有人批评“大城市主义”，后来中央讲了话。北京市将来要有千儿八百万人口，马路要留宽一点，可以栽树，可以停汽车。关于修地下铁道，有些人不赞成，说没有需要，现在中央已经决定修，由铁道部负责设计施工。

4月29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六十八次会议。会议同意周恩来关于彻底改变北京市面貌的各项意见。在发言中说：这几年北京盖的房子，等于两个旧北平，现在要盖点像样的建筑，如人大的礼堂，长安街盖点高层建筑，再盖点宿舍等，铁路和公路交叉的地方，应建设立体交叉道口。并按周恩来的意见，由北京市统一规划，统一施工。会议同意国务院关于现役军官退休的暂行规定、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均送政治局审核。会议还同意文化部党组关于文化工作会议的报告及钱俊瑞的汇报。会议认为：文化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文化工作第一位是要抓政治，继续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作家要走出象牙塔，到群众中去。普及文化事关六亿人民，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要搞中国人的文艺，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文艺，也要学习古代的和外国的东西。文化部门对文艺创作不要干涉过多。

4月30日 下午，会见日本东京都各界访华团。

5月1日 上午，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

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揭幕典礼。在庆祝大会上讲话说：过去一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广大干部和群众正在大跃进的基础上，进行着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的隆重的日子，我们向一八四零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崇高的革命敬礼。

5月2日 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讨论理论队伍建设问题。提出要办一个理论刊物，并指定一位常委和市委宣传部负责筹备。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将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工作报告稿和关于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决议稿。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到刚从广州返京的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有关问题。会后，和胡乔木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5月3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在讨论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市政建设的规划时说：有轨电车两年拆除，煤气三年进城。天安门广场工程、东单到建国门的马路工程，要在明年“五一”前完工。

△ 晚，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共八届四中全会。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讨论并通过中央委员会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和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

会议的决议（修正稿）等文件。

5月4日 上午，和陆定一等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稿。

△ 下午，应邀参加北京大学成立六十周年校庆大会。在讲话中勉励北京大学师生，坚决地彻底地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和宇宙观，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全心全意为六万万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5月5日—23日 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会议还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基本通过《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论断，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肯定了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我国当前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5月5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开幕式，听取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邓小平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

5月6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5月7日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参加的会议。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情况的汇报。

5月8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会议。毛泽东作关于破除迷信问题的讲话。

5月10日、21日 两次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商量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安排问题。

5月11日 下午、晚，和邓小平、陈伯达、康生、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等参加刘少奇召集的会议，商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对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意见。

5月13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大会发言后，又和刘少奇、柯庆施听毛泽东谈话。

5月14日 晚，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会议后，在怀仁堂休息室，和刘少奇、邓小平同毛泽东商谈问题。

5月15日 凌晨，同周恩来商谈问题。

5月16日 晚，和李富春、叶季壮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列席经互会〔1〕成员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的问题。

5月17日 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谭震林对《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的说明和毛泽东作的第二次大会讲话。

△ 晚，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增选中央候补委员问题。

〔1〕 经互会，即经济互助委员会，一九四九年一月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参加国有：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

5月18日 到北京市东单区东交民巷投票站，投票选举东单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会议继续讨论增选中央候补委员问题。

5月19日 下午，到机场欢迎以执行委员会主席恩·伊·波布罗夫尼科夫为首的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代表团。晚，会见并宴请代表团。二十日上午，同客人举行座谈。二十三日晚，和陈毅等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见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代表团。

5月20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毛泽东作第三次大会讲话。

5月23日 上午，参加在中山堂举行的赖若愚追悼会。赖若愚是五月二十日逝世的。二十一日，曾到北京医院向赖若愚的遗体告别。

△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会，听取毛泽东作大会讲话。

5月2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六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有关干部的处理问题。

5月25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劳动休息时，毛泽东应邀题字：“十三陵水库”；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分别题了词。

△ 晚，出席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出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六月一日正式出版。

5月26日—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

会议的有中央书记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委领导干部共五十五人。会议讨论经济协作和企业、事业单位的下放问题，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草稿）》和中共中央《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决定（初步草案）》。会议建议把本年的钢产量由原计划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八百万至八百五十万吨。

5月26日 上午，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上，范谨传达：昨天彭真同志来电话，要检查一下《北京日报》有没有刊登过“反冒进”和“一长制”方面的文章；还说，《北京日报》是地方报纸，但应办成全国水平。报纸应有工农群众语言，要办得生动，有思想趣味，有政治趣味，不仅仅有生活趣味。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草稿）》和中共中央《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决定（初步草案）》。

5月27日 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汪德尔，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二十九日下午，向毛泽东汇报同汪德尔的谈话情况。

5月28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草稿）》。

5月29日 晨五时，毛泽东函示邓小平：“昨天会上气氛不大好，值得座谈一会儿”。“请通知柯、陶、王、张、林、

欧、李〔1〕七位协作区主任委员留一天，我想有些事和他们谈一谈，或者由常委召开会议，或者由我、你、彭真主持。明天酌定。”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也以留一天为宜，“待座谈会本日开后，明再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

△ 上午，到毛泽东处开务虚会。到会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谭震林、彭德怀、黄克诚、李先念、赵尔陆、王鹤寿、贾拓夫〔2〕和七位协作区的主任。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加强协作区工作问题讲话。

5月30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作关于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周恩来对经济协作区和企事业单位下放问题作了说明。下午，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出席。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规定了协作区的区划、任务和组织领导，为便于互相支援和交流经验，“北京、上海、沈阳、哈尔滨、天津、广州、武汉、成都、西安等城市由彭真、柯庆施两同志每年召开一次到两次各大城市的联席会议。”六月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其中规定：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百分之九十八点五下放给省、市、自治区；冶金、一机、化工、煤炭、水电、石油、建工等部所属的企事业单位，下放百分之

〔1〕 柯，指柯庆施，时兼任华东经济协作区主任。陶，指陶铸，时兼任华南经济协作区主任。王，指王任重，时兼任华中经济协作区主任。张，指张德生，时兼任西北经济协作区主任。林，指林铁，时兼任华北经济协作区主任。欧，指欧阳钦，时兼任东北经济协作区主任。李，指李井泉，时兼任西南经济协作区主任。

〔2〕 王鹤寿，时任冶金部部长。

六十七，化工部最多，下放的企事业占百分之九十一。下放企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的交接工作“一律于六月十五日以前完成”。〔1〕

5月31日 晚，陪同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代表团，参加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游园晚会；又和周恩来等出席了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同中方中央乐团、人民解放军首都联合乐团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音乐会。

6月1日 晚，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代表团访华举行的招待会并讲话。说：我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在不断粉碎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获得新的发展和胜利，人类的实践将继续证明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的伟大意义。

6月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七十次会议。会议同意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试办一所新型大学的请示；决定由辽宁省帮助广西壮族自治区“搭一个工业架子”；同意中央宣传部关于成立亚非学会的报告。会议针对北京不少单位在宣传总路线时流传有“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之说，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注意加以控制，不得把这样的说法当做政治口号登报和对外广播。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陈云汇报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列席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的情况。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

6月3日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在讨论国家农业税条例时说，农业增产很多，但农业税不

〔1〕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收回下放给地方的重点企业和地方的重点企业上交中央接管。”

要增加那么多，仅仅是为了把负担平衡一下。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6月4日 上午，召集中央政法小组成员开会，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 晚，和刘少奇、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6月5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七十一次会议。在听取杨献珍汇报中央高级党校当年招生和教学计划时说：对新干部、中下级干部讲党史时，要着重讲党如何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经验。哲学课以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纲，再讲些必要的哲学常识。辩证法最根本的东西是矛盾论。毛主席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对矛盾论的发展。党的建设课，讲党的基本原则，思想意识、党性等，要理论联系实际，讲解党中央各个时期的重要指示，解释基本的政策文件。教授每年要有几个月下去。学生放假回去要与本单位联系。否则就会形成学院式教学倾向。

△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七次会议。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定加入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在华沙签订的《为统一有关国际空运某些规定的公约》。

6月6日 上午，出席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讨论情报工作的会议。随后，主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会议。

△ 下午，参观化工部主办的展览会。

6月7日 下午至夜晚，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工作安排问题，

决定从六月九日起听取国家机关各部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

6月8日 下午，和陆定一、康生、张际春、杨秀峰、董纯才、蒋南翔〔1〕、林枫等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讨论教育问题。

△ 晚，和邓小平到毛泽东处谈话。

△ 毛泽东将经他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批“即送”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周恩来、陈云、朱德、彭德怀阅，并批：“阅后，退小平提付政治局讨论、通过，然后发出。有不同意见，请即告我。”毛泽东在通知稿中增写的关于小组职权划分的重要规定是：“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十日，中共中央发出

〔1〕 蒋南翔，时兼任清华大学校长、校党委书记。

《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1〕，其中政法小组，组长：彭真，组员：董必武、乌兰夫、罗瑞卿、张鼎丞。

6月9日 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周恩来、彭德怀的工作问题。会议认为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

6月10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听取化工部、水电部、建工部的工作汇报。

6月11日—13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听取第一机械工业部、铁道部、农业部、农垦部、林业部、水电部、纺织工业部的工作汇报。

6月1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七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关于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情况的汇报和关于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同意第一、第二商业部合并方案；批发农业部、农垦部和林业部党组关于企业事业单位下

〔1〕 中共中央的通知规定：一、财经小组，组长：陈云，副组长：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组员：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赵尔陆。二、政法小组（见谱文）。三、外事小组，组长：陈毅，组员：张闻天、王稼祥、廖承志、刘宁一、叶季壮。四、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组员：宋任穷、王鹤寿、韩光、张劲夫、于光远。五、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副组长：康生，组员：陈伯达、林枫、胡乔木、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

放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通过邮电部党组关于改变邮电体制的请示报告。

6月16日 上午，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外交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副部长和部分驻外使节等共二十三人。会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彭真谈话。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李先念汇报；继续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

6月17日 下午至夜晚，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执行情况 and 一九五九年经济发展设想的汇报；预计一九五八年钢产量将达到九百万吨〔1〕，初步安排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为二千万吨或二千万吨以上。

6月18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廖鲁言、王鹤寿等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议定将一九五八年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改为一千一百万吨，并将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改为二千五百万吨。

6月20日 上午，和邓小平、刘澜涛、杨尚昆同李颀伯、

〔1〕 关于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此前已有三个指标，亦称三本账：第一本账是一九五八年二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第二本账是四月十四日由国家经委汇总各地上报的预期完成数后提出的七百一十一万吨；第三本账是五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八百万吨到八百五十万吨。

刘宁一〔1〕谈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的问题。

△ 下午、晚上，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陆定一、康生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学校教育问题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

△ 下午三时，接待驾着井冈山牌小轿车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市工会联合会报喜的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职工，并乘坐这辆轿车在台基厂马路上行驶一周。晚，安排井冈山牌小轿车连同兴平机械厂制造的巨龙牌拖拉机和北京农业机械厂制造的红旗牌万能底盘拖拉机，开进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报喜。

6月21日 上午九时，听取李维汉、徐冰、平杰三等汇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青岛召开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的情况。

△ 上午十时，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听毛泽东讲话。

△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社论说：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问题。

6月23日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并就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向中央请示：（一）首都的性质和发展规模。认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其发展规模不可能很小，全市总人口控制在一千万人，其中市区五百到六百万

〔1〕 刘宁一，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人。基本格局是背靠西山，以城区为中心，郊区和卫星城以“子母城”形式向四周围扩展。（二）北京的水源。北京是一个缺水的城市。现永定河引水计划已经完成，潮白河引水计划准备二三年内实现。这样，京津两市近期的用水，大致可以解决；将来还需要从滦河引水，为根本解决京津一带的水源，还可考虑引黄河水经桑干河入京。（三）改建城区。解放以来，北京已盖新房二千一百万平方米，因城内建房，安置居民难，费用大，故所建新房只有四分之一在城区，以致城内百分之八十是年久质差的平房，相当数量已成危房，古老破旧的面貌仍未根本改变。根据中央和毛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准备从一九五八年起，有计划地改变这种状况；而且从改善城市交通需要也必须改建旧城。初步考虑：每年拆旧房一百万平方米左右，建二百万平方米左右新房，十年左右就可以完成城区的改建。（四）新建筑的层数和标准。平房占地过多。我们认为：“在市中心区，应盖比较永久性的建筑，以四、五层和六、七、八层的楼房为主，在主要街道和重要地区，要建八、九、十层或更高的楼房”，标准不宜过低，“应该适当讲究建筑艺术，把适用、经济和美观结合起来”。为节省投资和五金，在适当地区盖一些完全临时的简易平房。（五）关于规划方案的实行。报告说，结合北京的具体条件，不照搬苏联经验。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城市建设必然会提出新的要求，新的经验，规划方案应随时修正补充。强调要做到多快好省地进行城市建设，必须实行“六统”，即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投资、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统一管理。

6月2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七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保卫和平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及全国总工会的工作等问题。

△ 下午至夜晚，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学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意见。会议还决定劳动部党组《关于当前工业企业补充劳动力问题的几点意见》，应根据刘少奇和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加以修改。

6月26日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北京工业建设问题和《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工业发展纲要》。报告提出：北京有中央的就近领导，中央各部的指导，有中科院和许多最新科技研究机构及著名的工科大学，北京的工业发展绝不能落后，“而应当面向全国，站在我国技术革命的最前线”。北京的工业，“要着重发展最新的尖端工业，以精密的、重型的、高级的、技术复杂的工业为骨干。”为此，提出规划：“五年内新建扩建重要项目一百多个，现在已有二十多个开工，秋后还有一批开工，争取多数在三年内建成，一边建设，一边投入生产。”其中包括机械电机制造，无线电和精密仪器仪表及化工等。同时请求中央在北京“摆一个重型机械厂（即具有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重型机械厂）和一个重型和超重型的机床厂（即能生产每台五十到一百吨的大型机床的工厂），这是首都工业的头脑和骨干，是发展新技术的重要条件。”

△ 中共北京市委批发北京市公安局党组《关于保卫首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规划的报告》，并报送中共中央。市委认为，市公安局党组提出要在三五年内实现彭真提出的“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像水晶石、像镜子一样”，是正确的，即市公安局一定要对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了如指掌。

6月27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在讨论地方主义问题时指

出：地方主义就是没有党性，是反共产主义的，是封建主义。要以马列主义整地方主义。要进行自我批评。但处理上要慎重，检讨好的可不戴帽子。这样就使人感到真是搞思想，搞是非，不是整人，是非就分明了。

△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邓子恢、李先念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问题。

△ 晚，陪同刘少奇会见柬埔寨王国议会议长桑·年及其率领的代表团。

6月29日 下午，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八次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一九五九年一月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底以前选出。

7月1日 出席北京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大会。发表讲话说：十三陵水库是我们用光荣的义务劳动，经过一百六十个昼夜苦干、完成二百三十万土石方建设起来的。先后和经常参加义务劳动的有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郊区的农民、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工商业部门职工等共约四十万人；还有许多国家驻华使节和许多外国朋友。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省市有关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劳动，因此，“十三陵水库工地，不仅是一个建设工地，也是一个很好的进行义务劳动的共产主义学校。”“大家在义务劳动中表现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的精神和风格。”

7月2日 下午，和邓小平、杨尚昆听取李维汉、徐冰关于统战工作情况的汇报。

7月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林铁关于华北协作区会议情况的汇报。

7月8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七十四次会议。

在讨论即将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时说：统战工作有很大成绩。这是又团结又斗争的工作。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是团结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现在是改造资产阶级，一道搞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接受改造，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去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猖狂地向党进攻。反右派斗争胜利后，局面改变，但斗争是长期的，今后还会有反复，我们的工作也要有松有紧。现在有两个问题：一是有人提出放弃定息。如取消定息，他们生活有困难，还得照顾，保留定息，有利于促进他们的思想改造。二是摘帽子。问题比较复杂。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要总结经验。解放初成立教育工会时，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时，也承认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反右斗争中，不少知识分子翘尾巴，说明从思想、政治看，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毛主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概念。城市如何划分阶级，将来恐怕要专门研究。

7月9日 上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并批准中国和苏联通商航海条约、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等。

△ 审阅《人民日报》题为《普遍开展多面手运动》的社论稿。

7月11日 下午，和刘澜涛、杨尚昆到邓小平处商谈问题。

△ 夜，毛泽东同彭真谈城市街道居民组织等问题。谈话至次日凌晨。

7月1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七十五次会议，听取胡耀邦汇报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的有关情况。发言指出：

你们反映青年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明确，你们是党派到青年中去工作的，要坚决贯彻党的路线。不是青年在党内的代表。这一点搞对了，一通百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7月14日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谈外交工作问题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彭德怀、陈毅、李先念、胡乔木、罗贵波、乔冠华〔1〕。

△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听取市委宣传部汇报创办理论刊物的意见。

7月15日和邓小平、彭德怀、陈毅、李先念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伊拉克局势〔2〕。

7月16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关于统战工作的跃进，要有一定限度。政治运动也如此。整风、交心、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弦绷得很紧，现在应该松一松。工商业资本家、小业主，民主党派成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表示愿意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统战工作应帮助和领导他们做好工作，用实际行动体现思想改造的决心和程度。统战工作的跃进，就是把统战对象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实践中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和进步，防止出现反复。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出：经过整风反右斗争，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次深刻的教育，许多人有比较大的进步。党的方针是要把他们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在教学、科研、工程技术等领域做好自

〔1〕 罗贵波，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2〕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三日，伊拉克的军队推翻费萨尔王朝，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美英两国相继出兵进行武装干涉。

自己的工作。我们应该耐心地教育帮助他们。关于放弃定息和“摘帽子”问题。指出：经中央研究，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定息还是保留好。“摘帽子”的问题，根据历史的经验，地主、富农，依照表现好坏可以评为社员或候补社员。对工商业资本家，根据改造程度自然也可以分左、中、右；进步、中间、落后，但不作法律处置。至于加入工会问题，将来另行处理。统战工作要伴随着阶级的消灭，阶级消灭了，统战工作才能结束。

△ 下午，和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等接见出席统战工作会议、妇女工作会议、民间文艺工作会议的代表和贵州省农具参观团的成员。

△ 晚六时，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伊拉克问题。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聂荣臻、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罗贵波、乔冠华等。晚十一时、次日晨零时十分，毛泽东又两次约集邓小平、彭真、陈毅、陆定一等谈承认伊拉克共和国问题。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大规模支援伊拉克革命政府和黎巴嫩起义人民，反对干涉阿拉伯各国人民内政的运动的指示》。

7月17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七十六次会议。会议同意二机部党组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意见和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修建密云水库的请示。

△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抗议美国武装侵略黎巴嫩，支持伊拉克共和国，支持黎巴嫩民族独立运动。在大会上讲话指出：伊拉克和黎巴嫩人民的斗争是两国的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干涉别国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的自由。但是美帝国主义不顾一切，竟悍然派兵在黎巴嫩登陆，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这是美帝国主义对国际公法和联合国宪

章根本原则的公然破坏。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强烈谴责和抗议美帝国主义这一可耻的野蛮的侵略干涉和战争冒险的行动。

△ 晚，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聂荣臻、胡乔木、罗贵波、乔冠华等开会，讨论有关伊拉克问题等。十八日晚，继续开会，讨论英国侵略约旦问题。

7月20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当前国际形势和军队战备等问题。中央军委委员列席会议。

7月22日 上午十一时至下午四时三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王稼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表示不赞成苏联提出的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和在中国海岸建长波雷达观测站的动议。

7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七十七次会议，讨论甘肃、青海、四川等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问题。

7月2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七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全国妇联党组的工作汇报。会议决定：（一）同意召开全国妇女积极分子会议。（二）各级妇女组织应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三）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党组应是一套组织。在全国妇联负责人汇报当前妇女工作大跃进情况后发言说：北京的食堂能不能持久办下去，还要看一看。农村也是办农忙食堂、农忙托儿所。大连需要几万个劳动力，北京也需要，因此，要把一部分妇女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去参加劳动，但不是所有家庭妇女都离开家庭事务。妇女们都来要工作，也不成。八十岁的人参加劳动、残疾军人参加演出这类事，表现顽强意志是好的，但不要过分提倡。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全国总工会党组工作汇报，讨论对有关干部的处理问题。

7月25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七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水电部党组关于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的报告；讨论并同意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党组关于天主教自选圣主教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报告。

△ 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月27日 上午，到机场欢迎访问东欧六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后途经北京回国的以孙德胜主席为首的越南国会代表团，并设晚宴款待。

△ 晚，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主管农业的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部长等参加的电话会议，由谭震林〔1〕布置推广农具改良工作。

7月28日 主持召开北京市农业会议。谭震林及北京市主管农业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谭震林在会上说：北京不管种什么，都要全国第一。他批评北京郊区有的地方庄稼种得不好。主管农业的干部干劲不足火力不够，是下游。

△ 晚十二时，应约到周恩来处谈话。此前，周恩来于十时十五分会见了苏联大使尤金。

7月29日 下午五时三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彭德怀、陈毅、廖承志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日本问题。

7月30日、31日 上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

〔1〕 谭震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排问题的汇报，决定由国家计委和经委分头派人去各协作区进行传达，请各协作区加以讨论，提出意见，以便在八月十三日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定案。

7月31日 下午二时三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王稼祥、黄克诚、胡乔木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商谈赫鲁晓夫来京会谈问题。三时，和毛泽东等一同到南苑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 晚九时三十分，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8月1日—3日 参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一日上午会谈中，在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之后，中方拒绝了不久以前苏方提出有损我国主权的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二日下午，继续参加会谈。会谈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王稼祥、黄克诚等谈话。三日下午，参加会谈和会谈公报的签字仪式。随后，和毛泽东等去南苑机场为赫鲁晓夫等回国送行。

8月1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八十次会议。会议听取黄火青、黄欧东〔1〕等关于中共辽宁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汇报。

8月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八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传达中苏两党领导人会谈情况；讨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举行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请示报告。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水电部党组关于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的报告，决定提交北戴河会议讨论。

〔1〕 黄火青，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

△ 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伯渠、李先念等接见东北机器制造厂来京报捷的代表。

8月5日 和邓小平、陈毅、杨尚昆等到河北省武清县参观丰产稻田。随后，经天津去北戴河。

8月7日 下午、晚上，出席刘少奇在北戴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汇报。

8月8日 晚，同周恩来谈话。

8月11日 晚，在北京举行酒会，招待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和法国民主社会抵抗联盟议员罗兰·杜马。

8月12日—22日 出席北京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十二日，主持会议开幕会。会上，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二十九人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再次当选为市长。万里、冯基平、吴晗、王昆仑、程宏毅、贾庭三、乐松生当选为副市长；刘仁等三十九人当选为市人民委员会委员。

8月13日 和刘仁召集北京市各区（县）党委书记会议，研究召开全市农业誓师大会事。

8月14日 下午，和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先念、陆定一、黄克诚、罗瑞卿等参加毛泽东约集的谈话。

8月15日 晚，和贺龙、陈毅等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西哈努克首相和他的女儿诺罗敦·索丽娅·伦赛公主以及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

8月16日 上午，在全国公安、检察、司法三个会议的联席会议上讲话。主要内容是：（一）党的领导问题。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宪法总纲第一条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

的先锋队，代表无产阶级实现领导。党的领导当然包括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二）民主与专政问题。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要犯政治立场的错误。“左”和右都牵涉立场问题。“左”了，把人民当专政对象，能说没有立场问题吗？对敌人要实行专政，但又不要虐待他们，给他们吃饱，对他们进行教育，目的是要把他们改造成成为新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党的政策。所以，我们办案子要慎重，错了就改。（三）尊重唯物论，从实际情况出发。检查过去的工作，决定当前的方针政策都要尊重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论者认为认识来源于客观实际，而辩证法的精髓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说，要依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离开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就离开了唯物基础，违反了辩证法，成为形而上学。比如，对罪犯量刑的轻重，处理的宽严，离开了客观实际，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法律规定一点伸缩余地，就是便于从具体情况出发，合情合理地处理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斗争，对剩下的反革命还要坚决地肃清，但“总的来讲要宽一些，从当前的斗争策略讲，也是要宽一些”。“当然，有反必肃，对那些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该抓的还是要抓。但主要是少杀、多管制。根据全国现在的形势，可以少捕，少捕对我们没有坏处。”（四）跃进问题。建国以后，没收官僚资本、土改、镇反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跃进；农业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废除剥削制度，又是一个跃进。围绕这些中心任务的政法工作都有跃进。当前全国各地方的安全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跃进。但是，各地提出的“五无”、“十无”等口号，“要力求符合实际斗争情况，力求科学一点，考虑周到一点。”“发现下面口号提得不对要纠正，但不要泼冷水。”讲话

最后谈到公、检、法三个机关联合办公问题时说：“联合办公是直接协作，直接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协作，互相制约，实事求是把事情办好。”

8月17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在天坛公园举行的有一万五千多市、区、乡、社干部参加的农业跃进誓师大会。在会上讲话指出：今年郊区的农业生产虽然有很大进步，但是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标准来检查，与全国先进地区相比较还是较落后的。必须抓紧秋收前的田间管理工作，尽可能多种小麦，这是当前农业生产方面的关键问题。要抓紧平整土地、打井修渠、保障灌溉；深翻土地，多施底肥；选用良种和合理密植。要使农业大跃进，必须继续破除迷信。对过去的经验、书本上的知识、科学家的意见和“操作规程”，应该有分析，有批判，凡能够使我们多快好省地增产的，应该采用、发扬，不适用的要批判、抛弃。对小麦的亩产指标和各项措施，都必须经过群众认真地、充分地讨论后作出决定，才能万众一心地把它实现，才能普遍地大跃进、大增产。建议每个区、社、队、组都种试验田。最后强调指出：在工作中必须贯彻穷干、苦干的精神。要自力更生，不要有依赖思想；要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还要创造自己的先进经验。工业、基本建设、商业、教育、文化和政法等各部门，都要根据农业方面的新形势，鼓足干劲，立即赶上去。在会上其他领导干部也讲了话。有的区提出“小麦试验田要占全区小麦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一，亩产一万斤到十万斤”。针对会上大跃进空气过热的情况，大会后，和刘仁商定，由市委办公厅立即通知各区、县委书记：大会上各区县挑战时提出的亩产数字不算，应从实际出发重新确定亩产指标。之后，又让刘仁派一些有领导经验和熟悉农业生产的干部回家乡了解真实情况，学习外地高产经验。

8月17日—30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彭真留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北戴河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一九五八年全国生产钢一千零七十万吨，即比上年的产量翻一番；要求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八千亿斤到一万亿斤，钢的总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8月21日 晚，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在天坛公园举行的全市工业、交通运输业跃进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工矿企业和手工业社的职工代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和部分师生以及农业等战线的代表共五万多人。在郑天翔、贾庭三和七个工厂的领导干部大会发言后讲话。大会号召首都广大职工对当年生产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大检查、大整改，制订新的跃进计划，进一步掀起大跃进的新高潮，千方百计地克服跃进中的新矛盾，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计划，力争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站在全国最前列而奋斗。

△ 晚，和贺龙、陈毅、萧劲光〔1〕、谭政、粟裕〔2〕、章汉夫等到周恩来处开会，研究中国政府关于领海宽度的声明

〔1〕 萧劲光，时任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2〕 粟裕，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

稿。会后，周恩来同彭真、贺龙、陈毅谈话。

8月22日 在北京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要把北京从一个旧的消费城市改变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城市，有一系列工作要做。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要进一步把一切不劳而食的人改造成为劳动者，并且肃清一切非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社会风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现在要通过基层生产单位的群众鸣放辩论，确立和修改本单位的跃进的生产指标，采取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并且抓紧思想和组织领导，保证实现。必须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必须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方针，必须继续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教师、学生参加生产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干部永远密切联系群众，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在谈到北京的城乡建设规划时，指出：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供应着想，城市的布局不要过于集中和过分地扩大，应该在城市周围建设卫星城市和工业基地，发展乡村工业，才能逐步缩小以至消灭城乡差别。

8月23日 下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扩大联席会议，邀请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发表演说。在欢迎词中说：西哈努克亲王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一九五六年初，他第一次访问我国，同周恩来总理发表了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柬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两国的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础。最近，由于亲王的倡议，中柬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展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四日下午，出席周恩来总理和西哈努克首相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 晚，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为庆祝罗马尼亚解

放十四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 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占据金门、马祖岛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警告性的炮击。

8月27日 上午，约集王稼祥、谭政、刘宁一、赵毅敏等开会，研究办国际刊物问题；后又同有关人员谈国际学联问题。

8月30日 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会议，商谈国际学联第五届代表大会问题。

9月1日 毛泽东在关于编印《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文件汇集》给杨尚昆的信中说：几十个决议〔1〕，除印成一本发给各中央委员和几级党委外（似应发到县级，军队发到团级，作为内部文件），哪些应在报纸上公布，请与小平、彭真同志商定。

9月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八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一九五八年国庆和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的筹备等问题。关于干部每年劳动一个月和逐渐改为供给制问题，决定由杨尚昆负责组织一个委员会制订方案，在中直机关范围试行。邓小平在会上宣布：一、邓小平外出时，书记处工作由彭真主持；彭真每年下基层四个月的任务，可以短期出差来实现。二、首都建设筹备委员会由彭真任主任。

△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在研究庆祝国庆和准备明年建国十周年大庆问题时说：届时要请几千名外宾及华侨，

〔1〕《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文件汇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包括计划和体制、农业、财贸、教育和其他共五个方面三十七个文件。

要把我国大跃进的面貌表现出来，要立即进行准备。（一）组织筹备委员会。（二）改建北京市。以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为重点。建筑项目有：万人大会堂（包括可容纳五千人的宴会厅）；有三千座位的国家大戏院；八个博物馆和展览馆（工业、农业、科技和艺术展览馆；革命、历史、军事和民族博物馆），除改建已有的北京展览馆外，其余新建的展览馆、博物馆，明年七月底完成，以便布置；拟在前门大街修建百货公司大楼和邮局大楼；拟在新街口以北修建新北京图书馆；拟建总面积三十万平方米的迎宾馆和几个大饭店；改建从南苑机场进永定门、前门和从中央航空港进建国门的道路；城内重要街道两旁植树；把天桥改建成劳动人民的娱乐场所（类似上海的大世界）；改建天安门前的观礼台，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好从石景山钢铁厂通往城区的煤气管道，并开始送气，等等。现项目正在商讨定案，为完成以上工程任务，建筑部门十月以前必须抽出足够力量，劳动力问题要动员机关和农村支援。（三）组织群众游行。群众游行队伍要有新花样。文艺、体育队伍要早做准备。（四）工农业生产。北京市工业总产值明年力争翻一番。农业产量，明年要大跃进，各种农作物，特别是道路两旁要有大面积的丰产田和小面积的高产试验田。改建三四个村庄，使之城市化，有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商店、医院、马路、上下水道、楼房、俱乐部等文化设施和市政设施等。北大、清华等大专院校要帮助农村办大学。（五）其他方面，如故宫，展览和说明词要革命化。陶然亭、玉渊潭、龙潭湖等公园可以搞大花房，把全国的奇花异草移植进来。接待外宾一律乘坐国产小轿车。

△ 下午五时三十分，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国防部关于美蒋使用“响尾蛇”导弹向我空军攻击的声明，和

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及对此问题的宣传方针。

△ 晚，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欢迎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代表来北京参加国际学联第五届代表大会，并致词。本届大会于九月四日至十六日召开。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徐冰等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决定九月五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

9月4日 上午，到周恩来处谈北京市规划问题和密云水库问题等。

△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胡乔木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有关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1〕、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军事方面的问题。

△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次会议。会议批准我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 晚，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农业的书记汇报人民公社发展情况。会议开至次日凌晨。

9月5日—8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外交政策等问题。毛泽东讲话指出：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在

〔1〕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此原则同样适用于台湾及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收复台湾和澎湖等地，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农业、工业、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建设事业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重点放在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首先要抓紧钢铁和机械工业。

9月5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八十六次会议，讨论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各项工作，研究为国庆十周年而拟建设的“十大工程”事宜。

△ 晚，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电话会议，讲话布置农副产品收购、销售、调运和储存等工作。其要点是：（一）收购工作。今年农业大丰收，秋后农副产品收购数量大。粮食、棉花、油料、烟叶、麻和生猪六种产品的收购约占农副产品收购总值的百分之七十，要贯彻大收大购的方针。（二）销售工作。下半年向农村投放的货币连同农村人员工资共为二百四十亿元，而可供应的物资只有一百五十亿至一百八十亿元，其中生产资料只有四十亿元，差额较大。因此，要在保障“三个元帅”〔1〕、“两个先行”〔2〕需要的前提下，尽一切力量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其他日用品凡货源足的要贯彻大销大卖的方针，放手销售。物资供应和货币投放的差额，要用信用回笼来平衡。（三）物资调运。最近，粮、煤等重要物资的调运相当紧张。北京、天津和吉林自统一调运以来，粮食库存量一度只能销售二十天。下半年城乡货物运量达二千亿斤，与去年同比增长一倍多。除充分发挥火车、汽车、轮船等现代运输工具的效能外，各地应统一安排，利用回空，减少浪费，并调用机关的卡车，组织较多

〔1〕“三个元帅”，指粮食、钢铁、机械。

〔2〕“两个先行”，指电力和铁路运输。

的农村运力搞短期的突击运输。必须统一规划，全面安排。（四）储存工作。仓库问题，要当做政治任务来解决。可由国家出些钱和材料，群众出工，共同建仓库、油库，并指导人民公社建仓库。（五）重视出口物资的收购。今年上半年由于生猪收购不上来，大城市猪肉供应减少，出口不能如期交货。有些地方松香无人割，春茶无人采。出口计划完不成，减少了外汇收入，影响国家信誉。希望商业部门努力做好下半年的收购、商品调拨计划等工作。工农业生产跃进不要挤掉商业，否则对外影响不好，对内也可能出大毛病。

9月7日 下午，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各界一百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大会。在游行前的大会讲话中，表示坚决拥护中国政府关于中国领海的声明和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反对美国侵略中国领海，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大会由刘仁主持。

9月8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八十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一）蔡畅为全国妇联党组书记，邓颖超等四人为副书记；陈克寒、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二）按成都会议规定，中央国家机关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部长负责制。（三）由杨尚昆、安子文、邓典桃、龚子荣、齐燕铭等组成一个小组，研究在党中央直属机关逐步实行供给制问题，杨尚昆为组长，安子文为副组长。（四）同意彭真的建议，由国家经委布置北京、天津、上海、长春等地协作，生产一批高级小轿车，供国庆十周年时接待外宾使用。（五）关于苏联专家问题，已同苏方商定，取消顾问制，减少人数。邓小平说：此事请与周总理商量，总政治部不需要，其他部门请总理通盘考虑。（六）西藏的驻军，当前主要任务是保护进藏人员和交通线的安全；目前在西藏地区不宜像内地一样搞大跃进。会议还讨论

了《关于解决今明两年新建工业企业干部问题的通知（草稿）》、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外事小组《关于处理现有在华外国人工商业、房产的报告》的通知稿、中央组织部《关于出国人员审查工作情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等文件。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张国华汇报西藏工作情况。

△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中国政府关于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案，听取王炳南〔1〕关于前一段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张闻天、黄克诚、王炳南、乔冠华等出席会议。九日下午，会议继续进行。

△ 晚，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汇报钢铁生产情况。在讲话中说：务必使各方面保证按时供应所有原已分配的设备、材料等，否则一脱节就垮下来了。关键在铁的产量，请各地抓紧。今后请各省、市、自治区把钢铁生产计划，按每一天、每五天、每十天列个进度表，争取每五天提前完成一天。每个单位也要列一个进度表。如到年底再突击就来不及了。只要九、十月的任务完成好，十一、十二月就好办了。各个大厂每天的报表要送冶金部和党中央。毛主席要求九月十五日前后钢铁生产有个大的跃进。下次电话汇报会定在下星期二（十六日）晚七时。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三十分。

9月10日 凌晨一时四十分，和薄一波、王鹤寿向毛泽东汇报钢铁生产情况。同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离京赴外地视察。

9月11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八十九次会议。

〔1〕 王炳南，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

在讨论中央宣传部的干部问题时说：有些人在民主革命阶段很积极，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积极了。对这些人要作历史分析。许多人是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当时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是抽象的，对于革命的发展是慢慢清楚的。对他们民主革命那段的贡献不能否定。但是，他们往往对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好，思想上、工作上犯有方针错误。对他们的成绩和错误要作适当估价，一般说是党内问题。党性问题是个人与党的关系问题。思想批判要彻底，不能妥协，不能含糊，组织处理要从宽。以此为典型把宣传部内的思想清理一下，以共产主义思想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思想应是共产主义思想。

△ 下午，出席林伯渠主持的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一次会议。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时发言说：现在工农业生产在大跃进，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税目、税率等，需要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加以研究解决。因此，现在先把税制简化，这是各地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会议对条例中的第三条第二款：“个别税目税率需要增减、调整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确定”，建议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确定对个别税目税率的变化、调整。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决定由国务院下达试行。

9月14日 和陈云、薄一波、王鹤寿、刘澜涛等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钢铁生产紧急汇报会议，讨论当前钢铁生产情况。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九月上旬钢铁平均日产量比八月份平均日产量有所增长，但同九月份的任务相比还有一定距离。今后半个月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为此，中央各有关部门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大力协助各省、市、各钢铁厂及时解决当前生铁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会上商定十七条措施：增强采矿技术力量；改

善铁路运输；抽调万名大专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分赴各省市帮助建立小高炉、土高炉的分析化验室，培训分析化验人员；加强废钢铁回收工作，等等。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钢铁生产紧急汇报会商定事项的通知》。

9月16日 凌晨二时三十分，同周恩来商谈工作。

△ 晚，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电话会议，讨论关于钢铁、机械设备生产问题。王鹤寿通报：生铁九月份计划产量二百万吨，到十四日为止，仅产四十四万九千吨，差一百五十万吨；钢的月计划差八十六万吨，现全国日产钢二点四万吨，完成年产一千零七十万吨计划，要有跃进的措施。各地汇报情况后，薄一波说：当前要集中力量到可靠的矿点上去采矿；要解决轧钢、电机等大型设备，此事关系到明年任务的完成，毛主席离开北京时特加叮嘱。彭真在综合会议情况后说：矿石、机电、煤炭，任务很重，装卸也很紧张，各地要排一下队。大家忙于当年，明年一季度的任务，也要预作考虑。会议开至次日晨二时。

9月17日 下午，和周恩来、林伯渠、贺龙、聂荣臻、郭沫若等接见参加全国第一届矿产会议的全体地质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议和全国科联、科普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 晚，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正副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书记参加的会议，听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

9月18日 下午，和陈云等到周恩来处开会，商讨毛泽

东从安徽合肥来信中要求的、对中美会谈〔1〕和沿海军事斗争问题提出指导性的建议。当晚，周恩来将议定的五条具体措施用电话传给毛泽东。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即复信周恩来：“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

△ 李先念致电彭真并中共中央，汇报近日到河北省、河南省了解和研究人民公社成立后财贸工作如何适应新情况的问题。汇报提出改变原有征收和上交办法，采取新的临时性措施，建议采用河南省最近规定的由人民公社实行财政包干，统一上交的办法。

9月20日 上午，和周恩来参加在北京大学举行的首都师生奔赴钢铁前线誓师大会。北京十所高等院校和六所中等专业学校的五千多名师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奔赴全国十六个省、市钢铁战线，参加采矿、选矿和化验分析工作。在周恩来作大会讲话之后接着讲话说：你们这次上钢铁生产前线去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参加钢铁大军，帮助解决找矿、开矿、选矿及化验分析等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一个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学习生产本领，锻炼自己的工人阶级意识。

△ 在北京动物园接见莫斯科动物园主任萨斯诺夫斯基，对莫斯科市赠送黑天鹅等动物给北京市表示感谢，并祝北京和莫斯科的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9月21日 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三时，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二次钢铁生产紧急汇报会。到会的还有薄一波和煤炭、机械、铁道、交通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第二次钢铁生产紧急汇报会商定事项的通知。

〔1〕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中美两国开始恢复大使谈判，并将会谈地点由日内瓦改为华沙。

9月22日 到周恩来处开会，商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阿巴斯来电要求承认事。

△ 下午，前往机场欢迎以契尔文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和以科斯托夫为首的索非亚市人民会议代表团。二十三日晚，举行宴会欢迎保加利亚两个代表团。

9月23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九十次会议，讨论全国钢铁生产的形势。王鹤寿汇报，截至九月二十日，全国钢产量共四百九十万吨。十八个重点企业九月一日到二十日计划生产九十一万吨，实际完成四十三万吨，主要是生铁、焦炭、机械和技术跟不上。十月份，如生铁、材料等能解决，估计年底可以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在讨论中指出：目前钢铁生产形势和今春农业跃进的形势相像，不经过试验上不去，现在省、地、县干劲起来，运动形成了。在这样形势下，书记处抓任务，王鹤寿抓生产中的具体措施。今年后三个月，需完成五百七十万吨，平均月产一百九十万吨。首先是保证重点，十八个重点企业上去了，产量就上去了，因此好铁、配套设备、焦炭、耐火材料先供给重点单位。二是解决土铁炼钢的技术问题，因为好铁只有二百六十万吨，不用土铁，钢产量就落空，要抓一二个厂试验推广土铁炼钢的技术。三是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无洋，质量不巩固。钢的生产要搞小、土、群〔1〕，要把小、土、群作为钢铁生产的方针。四是要抓基建，既是今年生产的需要，又关系到明年一季度的生产，要早抓。五是工会和青年团要发动群众参加炼钢铁运动。产业工会要下去收集群众炼钢的先进经验，加以推广。

〔1〕 指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时的一种方法——小型（小平炉和小转炉）、土法、群众运动。

9月24日 致函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报告有关钢铁生产的主要情势，提出社会生产的综合平衡问题：（一）从九月份起，各地抓钢铁生产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有些省有一二百万甚至三四百万农民开上钢铁战线。虽然九月份没有完成一百二十万吨的任务，估计十月初，生铁的产量“将有一个大的跃进，完成铁的生产任务较有把握”，“看来全年一千一百万吨的任务是肯定可以完成的”。目前的问题是，在群众性的炼钢铁运动中，“政治和技术还没有很好地结合”，需要开展钢铁战线的“试验田运动”，使党政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相结合，从点到面解决炼铁特别是炼钢的技术问题。（二）普遍利用“小、土、群”的办法炼铁，实际是“洋土并举，大中小结合”方针的具体化，从思想到实际经验已为群众“信任”，但在用土法生产的铁炼钢方面，因为技术上没有解决，很多人还是信“洋”铁，不信“土”铁。在炼钢方面，实际上是“有洋无土，有大中而无小”，这是目前钢产量不能迅速增加的一个关键问题。（三）为了确保短期内使钢铁的产量跃上去，必须做到：第一，好的生铁（今年第四季度全国只能生产洋生铁二百六十万吨）、焦炭、各种配套设备和辅助材料，首先供应已能正常出钢的生产单位。第二，要适当地集中力量，先采富矿，先支援已能正常出铁的大中小炼铁炉。第三，为推进以“小、土、群”办法炼钢，要指定若干钢铁厂，分出个别炼钢炉，试验解决土铁炼钢的技术问题。第四，随着钢铁产量上升，生铁、煤炭、矿石和各种材料的运输量大增，交通部门需做好准备。（四）要着手部署明年第一季度各部门的生产“平衡问题”。目前“以钢为纲”，已经感到焦炭、运输、电力等“十分紧张”（我们已经另作了部署），已经挤了“别的工业”，其中如电力、机车、钢轨、化工设备等是很重要的。今年为钢铁让路“是必

要的”，明年若“仍要以钢为纲”，就必须“同时使几个元帅、先行之间有进一步的平衡，而且现在必须着手安排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和基本设备，否则对明年钢铁的生产，也会发生不利的影晌”。报告还说：为督促钢铁生产，书记处已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年内每月、每周上报钢铁生产计划和措施，“每日把生产结果报告中央”。

9月25日 下午三时，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关于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会议开至夜十二时。二十六日零时三十分，向在杭州的毛泽东电话汇报：大家信心很足。四川现在每天都有八百万至一千万人上阵。九月份未完成的任任务，十月份可以补上去。从九月底起，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山东、山西、四川、江苏八个省，每天都可出铁一万吨以上。这样，到月底每天就可能出铁十万吨，钢九万吨。铁的问题现在看来到月底大体可以解决。现在主要是抓钢。详细数字正着人整理。

9月26日 下午，到周恩来处开会。

9月28日 上午，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三次钢铁生产紧急汇报会。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次紧急汇报会商定事项的通知。

9月29日 到周恩来处开会，研究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言人关于蒋介石空军在美国直接指使下使用导弹武器向我人民解放军空军进攻的声明稿等问题。参加会议的还有彭德怀、陈毅、张闻天、聂荣臻、刘亚楼〔1〕等。

9月30日 凌晨一时四十分，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 上午，出席首都各界人民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庆祝中

〔1〕 刘亚楼，时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国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十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并讲话。说：“十个友好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同各兄弟国家人民的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关系的一个新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是新型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般互助的关系。”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贺龙等出席大会。

△ 晚，出席周恩来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应邀出席。

△ 收到毛泽东对中共河南省委报告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取得共生产生铁六万七千二百多吨的“跃进”成绩的批示：“此件似可改写成一篇新闻报道，在报上发表。即酌办。”十月三日，《人民日报》以《群众发动越透，钢铁跃进越快》为题，发表了经过改写的这个报告。

9月—11月 同赵鹏飞、沈勃^{〔1〕}几次谈关于天安门广场和大会堂的建设问题。说：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十大工程，这件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市委、市人委要坚决贯彻，抓紧筹划，广泛约请全国著名专家精心设计，切实保证工程质量，在国庆十周年前如期完工。十大纪念性工程的完成，将在人民中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鼓舞和动员人民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这类纪念性的建筑要少而精。中央决定只在首都建筑一些，其他地方不要搞，还是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建设工厂，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天安门广场改建和扩建的设计，

〔1〕 赵鹏飞，时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沈勃，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

毛主席指示：要反映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天安门广场要庄严宏伟，气魄要大，能容纳百万人集会。因此，我们的设计方案是：天安门前的马路要一百几十米宽，路面坚固，要经得住最重的坦克通过。广场西面建大会堂，东面建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东西相距为五百米。大会堂的建筑风格，要继承发展我国建筑的传统，同天安门、故宫、正阳门、前门相统一，同时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东西，为我所用。在封建时代，皇帝搞的建筑，体现他的“唯我独尊”。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搞的建筑大部采用拜物教的手法。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大会堂，设计思想要体现“以人民为主”、“物为人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使工人、农民一进大会堂，不仅感觉到庄严雄伟，同时也感觉到自己就是建筑物的主人，不能使人走进大会堂像是走进故宫那样有压抑之感。要注意节约，精打细算，不要铺张浪费。设计工作最重要是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集思广益，解放思想，百家争鸣，大胆创作，群策群力。方案要多设计几个，进行比较，取长补短。要发挥老专家的特长，同时也要鼓励年轻设计人员敢作敢为。方案设计出来之后，制成模型，组织展览，广泛听取干部、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汇报，请他审查，他是国庆工程的总设计师。

10月1日 上午，主持首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周年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群众游行队伍。

10月2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陪同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索非亚市人民会议代表团，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蒙古的军事代表团，以及苏中

友好协会代表团、波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苏联原子能代表团。

10月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九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当前钢铁生产问题。在发言中说：九月二十九日，全国钢的日产量由二十天以前的二万四千吨，增产到五万八千吨，但是出现了一些虚报的现象，有的是计算上的问题，有的是把五天或十天的原材料，集中到一天突击生产，上报为日产量“千吨县”。二十九日是产量高峰，检阅了我们的潜力。现在，我们应提出：生铁要保证质量规格，保证调出（给炼钢厂）。工作中有个别缺点，各省自己改正，我们不泼冷水。但对省委、地委要讲，讲了不算泼冷水。“千吨县”，应是日产数，将五天或十天的材料集中到一天突击的，只能记平均数。不能因为工作有成绩，就不能讲缺点。如果不讲，将来一翻过来都是缺点就不好。如果十月后，日产可以步步上升，能否内定十一月底或十二月上旬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届时如果还差一点，还有二十天时间作保险。小、土高炉，现在费矿石、费焦炭，要改进技术。对宣传报道问题发言指出：有重要的创造发明，不要登报，可以内部通报各省、市、自治区。徐水县提出工商界取消定息，毛主席的意见是，大城市不要搞，《人民日报》不要登。

△ 下午，陪同刘少奇会见保加利亚国民议会议长、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文科夫和代表团中的保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 晚，列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

议分析讨论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1〕。

10月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九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公安、政法方面的问题，原则同意公安、检察、司法三个会议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10月5日、6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当前局势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徐达本、吕正操〔2〕等关于当前钢铁、机械、煤炭的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情况的汇报。会议还听取了邓小平外出视察情况的汇报，和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就计划、财政税收和人民公社问题所作的汇报。

10月5日 晚十一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六日，《人民日报》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金门，以便使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八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暂停为蒋军护航。

10月6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九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谭震林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意见。在会上提出，已与董必武商谈，中央政法小组组长由罗瑞卿担任，政法小组扩大成员，人选由罗瑞卿考虑。十日，中共中央决定免除彭真

〔1〕 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他在谈话中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国共“双方放弃武力”的立场，批评蒋介石政府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保持大量军队不明智和不谨慎，并承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一个“假设成分很大”的计划，认为“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会回到那里去的。”

〔2〕 吕正操，时任铁道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职务，任命罗瑞卿为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10月9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钢铁生产全国电话会议。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汇报生产进度后，要求各地订出一个从十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的钢铁产量保证数字和争取数字。讲话指出：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大的、洋的炉子出好钢，就是技术难掌握。大的、洋的是“野战军”，中型的是“地方武装”，小的、土的是“民兵”。煤紧张，要搞小煤窑，不要乱砍树。焦炭也要用土法炼。运输力量要分轻重缓急统一安排，要一手抓钢铁，一手抓粮食，缺一不可。会后，即书面报告毛泽东：“各省、市、区党委一致同意：（一）十二月十日完成年产钢一千零七十万吨的任务（各省、市、区具体保证的数字是一千一百万吨）。（二）本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争取稳定地日产钢七万至八万吨；日产生铁十五万至二十万吨。”并附上各省、市、自治区已同意的计划指标。

10月10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公安、检察、法院三个会议的文件。

10月15日 在天津杨村停靠的专列上，和陈伯达、王鹤寿等应约同毛泽东谈话。

10月16日 下午，参加毛泽东在天津市俱乐部召集的有关干部会议。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问题。

10月中旬 在中共北京市委会议上说：学校中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劳动，体力劳动主要是思想锻炼，与工农打成一片，对身体也有好处，但要适量。基础课教学质量只能提高，不能降低。它与学生参加劳动可以统一，搞得不好则会发生矛盾。要坚持下去。北京市的教育不能落后。工业落后，可以说是底子薄，教育工作落后，没有任何借口。

10月18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

北京市人民公社问题。

10月20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供给制问题。

△ 国务院决定：将河北省的怀柔、密云、平谷、延庆四县划归北京市管辖。至此，北京市面积为一万六千八百零七平方公里，人口为六百三十一万八千人。

10月21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九十七次会议，讨论钢铁生产问题。会议决定十月二十三日召开上海、北京、河北、湖北、广东等十二个省市负责人的电话会议，研究有关钢铁生产的具体政策和生产安排问题。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喇嘛教工作的请示，决定此事由彭真向毛泽东报告。

△ 晚，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陆定一、黄克诚、杨尚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台湾问题。

10月23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有上海、北京、河北、湖北、广东等十二个省市负责人参加的电话会议，汇报和讨论钢铁生产问题。

△ 晚，举行宴会欢迎马哈茂德为团长的伊拉克人民友好访华团。讲话说：中伊两国人民，亚非各国人民，全世界各国人民风雨同舟，有共同利害的关系，美帝国主义者却同中国、伊拉克、亚非、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为敌。只要全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斗争，美帝国主义一定失败。

10月25日 下午，和周恩来、陈毅、黄克诚、胡乔木、乔冠华、吴冷西等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毛泽东起草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署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文告说：

“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逢单日也不一定打炮”。文告还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

10月26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郊区县委书记会议上重申：农业产量要实事求是。八月中，区、县委书记们在天坛大会上挑战时提出的粮食亩产指标不算，要一块地一块地另定指标，并提出管理措施，总之，要实事求是。

10月28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九十八次会议。周恩来出席会议。会议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几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一）关于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分配问题。发言说：实行供给制要考虑几个问题：首先是劳力强、收入多的农户和劳力少的户有矛盾。第二，是地富反坏和二流子同社员有矛盾。供给制包的面越宽，矛盾越突出。第三是供给制是有条件的，过去我们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因物资匮乏，不患寡而患不均，而且那时候多数人没有老婆孩子。现在，要在全体人民中实行供给制，必须建立在物资丰富的基础上。（二）关于有的地方为了支援工业动员资本家捐献的问题。发言说：我在毛主席那里讲过这事，关键是对资产阶级要不要挖“底财”。资本家的企业已经合营了，定息七年，还剩三年，这是大头。全国定息每年一亿一千万元，取消了有很多麻烦。北京市私方资金才七千万元，年定息三百五十万元，不挖“底财”，舍得这些定息，共产党言而有信，政治上主动。不然，国际影响也不好。会议决定：不挖“底财”，几个月后再作处理。（三）关于宗教政策问题。发言说：凡是利用宗教进行违法活

动的，依法惩处，但个人信教自由。问题很复杂，请有关的干部来座谈，十一月五日前开座谈会。会议还研究了钢铁生产保证重点的问题。

△ 下午，出席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首都各界人民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归国大会。在大会讲话中说：你们同朝鲜人民一道，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扑灭了美国侵略者燃起的战火。停战以后，又同朝鲜人民一起，对巩固朝鲜停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你们完成了光荣使命，全军胜利归来了，我以全国人民的名义，热烈地欢迎你们！庆祝你们的辉煌成就！庆祝你们为祖国的安全、为远东和世界和平立下的不朽功勋！朝中人民的胜利，证明了只有坚决地反抗侵略，才能维护和平。美帝国主义者不可战胜的神话破产了。但是，美帝国主义者至今还侵占着我国领土台湾。美国侵占台湾的任何借口，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人民统一自己祖国的事业，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朱德、周恩来、陈云、陈毅、郭沫若、王平〔1〕等出席了大会。朝鲜驻华大使李永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也先后在大会上讲话。

10月29日 下午，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以杨勇和王平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和志愿军文艺工作团。同时，接见了来京参观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的延安专区代表团。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彭真等谈话。

△ 晚，举行宴会，欢送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契尔文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

10月30日 下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

〔1〕 王平，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

会举行的扩大联席会议。在开会词中，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崇高的敬意。接着，听取杨勇作《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伟大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贡献了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决议号召全国人民必须再接再厉为解放台、澎、金、马，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到底。晚，和朱德、陈云等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协和市抗美援朝分会联合举行的京剧晚会，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和志愿军文艺工作团。十一月一日晚，和刘仁等陪同他们参加首都各界人民在中山公园举行的游园大会。

△ 接到毛泽东批示：将王鹤寿《关于钢铁生产方面应当立即动手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即印发有关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并带至武昌准备发给到会〔1〕各同志。”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转了王鹤寿的报告。

10月31日 上午，和陈毅、郭沫若、沈雁冰、张奚若等参加因十月十七日飞机失事遇难的郑振铎、蔡树藩〔2〕等十六位同志的追悼大会。

△ 下午，和周恩来、陈云等向毛泽东汇报有关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

10月 就中共北京市委拟创办理论刊物的刊名和发刊词

〔1〕 指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举行。

〔2〕 郑振铎（一八九八——一九五八），生前任文化部副部长。蔡树藩（一九〇五——一九五八），生前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问题多次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十三日，在市委书记处会上说：发刊词就是要说明办刊物的方针。并决定自己撰写发刊词。在月底召开的市委书记处会上又说：这个发刊词主要解决的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批判主观主义，即批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

11月2日—10日 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后通称为“第一次郑州会议”）。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一）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都只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二）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三）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必须关心人的方针。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向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建议，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

11月3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九十九次会议。会议听取习仲勋关于西北农村情况和薄一波关于召开工业会议情况的报告。发言说：钢铁生产形势已有根本的变化。北戴河会议时大家没有把握，因此全国搞“小、土、群”，找到了“以钢为纲”的办法。“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现在量的问题解决了，关键是质量，铁的质量不好，土钢很多，不能做大件东西。其次，钢突上去了，与其他“元帅”发生了尖锐矛盾。真正“以钢为纲”是这两个月，但把其他方面挤了一些，也带起了一些，如冶金机械、动力机械、燃料、化工、运输等。挤

了点农业生产和收购。第三，群众运动，炼铁、炼钢，也炼人，打破了工业的神秘感，农民办起了工业。其中有浪费，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是支流问题。整个运动是健康的，方针是正确的。对如何解决当前的问题时说：明年钢产量还是以三千万吨为基础来布置全局工作。前一段钢铁生产“分散打游击”，现在需要集中统一安排，要根据铁矿、煤炭等资源和运输条件，把基地建设起来。“小、土、群”要提高为“小、洋、群”，基地化，工厂化。各省、市、自治区在三千万吨钢的国家任务之外，要搞多少由自己确定，超产部分自产自销，中央不另给设备，价格也不贴补。钢铁与农业的矛盾是真正的矛盾。西安会议确定农业全劳力拿出百分之二十来搞工业，这个比例差不多，请武昌会议再定。东北三省农村明年主要搞农业，陕西也以农业为重点，其他省份要再摸一摸。任务定了，各省再去安排劳力。

11月3日、4日 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张霖之、刘澜波、余秋里〔1〕、吕正操、王首道、彭涛〔2〕、刘秀峰等汇报到各地视察了解的情况，研究存在的问题。

11月初 就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的刊名问题，致信邓拓：“请你再和书记处同志们一商。刊物的名字是否即定为前线。”之后，在得到中共北京市委其他领导同意后，为该刊题写了刊名《前线》。

11月6日 下午，出席周恩来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

〔1〕 张霖之，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刘澜波，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余秋里，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

〔2〕 王首道，时任交通部部长。彭涛，时任化学工业部部长。

六十余人参加的国内外形势座谈会。

△ 晚，和朱德、周恩来等出席由全国政协、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等联合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一周年大会。大会由吴玉章主持，林伯渠〔1〕讲话。

11月8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传达正在进行的郑州会议的新精神。发言指出：关于人民公社，毛主席说，是“大集体、小全民”；政、社、党合一是错误的，政社可以合一。公社成立后，党的领导要加强。公社的规模，与会者多数赞成办县联社。会议还议论社员分配的供给制和工资制，积累和分配的比例问题。城市公社还没有摸出一条路子。毛主席说，上海、北京不要搞快，以免给全国增加压力，但可以组织社会劳动力参加生产。计件工资取消后，工人实际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二十。毛主席说，要补足工人的工资。（二）听取汪锋〔2〕关于喇嘛教和伊斯兰教地区的工作汇报。发言说：已向毛主席汇报过，确定把反革命、封建特权和群众的宗教信仰分开，这是方针。打击反革命活动、反对宗教特权，按政策办。群众信不信教，当不当喇嘛，干部不要管。（三）关于农村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问题。发言指出：徐水的县委书记，一是强迫命令，二是工作虚夸，三是生产不如安国县，很务表面。但徐水有些地方过去是不毛

〔1〕 吴玉章、林伯渠，时均兼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

〔2〕 汪锋，时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之地，现在的确翻了身。我已告刘子厚〔1〕，要切实帮助徐水的干部整风。（四）关于国庆十周年的建筑问题。发言说：已定的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快定下来，不要多变；规模要限制在必要的面积内，不要引起铺张浪费之风。展览计划中，有关过渡到共产主义远景的具体措施我删掉了。北京市委的办公大楼，我不主张修。

△ 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前线》发刊词。

11月11日 下午，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薄一波汇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2〕提出的问题和邓小平传达郑州会议的情况。

11月13日、15日、17日、18日 出席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会议，学习和讨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以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这次学习会议，是按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

11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零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在谈到各地农村搞军事化时说：有的地方用军事化的办法，调十万劳动力上山，但不宣布去处，又不说去多久，使群众惶恐。这些地方只学军队的“集中”、“命令”，而不学军队的民主作风，不妥。在邓小平指出现在要注意农民问题，不能把对农民的政策同对鞍钢工人等

〔1〕 刘子厚，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

〔2〕 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春的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作出部署。

同起来时，发言说：不注意会把农民闹翻的。河南省工作浮夸，领导头脑过热。我去河南时，省委主要领导人对我说，共产主义非搞不可，要两步并一步走，说红专大学是正规的，现有的大学是过渡性的。我未表态。临走时，我对他说：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运动中头脑一热就要犯错误。我在延安审干的经验是，欠了债总要还的。

11月1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零二次会议。在讨论修改《郑州会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草案》时，发言说：体制下放后，钢铁生产的十六个重点企业，中央该抓的还是要抓，不能削弱重点。各省对下放的重点企业中央该管的未管，也有意见。冶金问题，今年成绩伟大，只批评明明是假还弄虚，批评这个不是打击积极性，反而可以发扬共产主义积极性。所以今年这个运动要总结一下。在研究明年如何搞法时说：今年钢的指标是六月才定下来的，是紧一点，所以明年一季度的生产任务，今年十二月后半月就要集中准备。

11月20日 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先后乘飞机去武昌。当晚，和陈云、邓小平等到毛泽东处谈话。

11月21日—27日 出席在武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武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在继续纠正“共产风”的同时，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会议决定将一九五九年钢的生产指标降为二千万吨，对外公布为一千八百万吨。

11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时说：要全面完成全民所有制才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

那个少则三四年。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彭真说：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刘少奇说：农民穷一点好转。毛泽东说：就是这个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刘少奇说：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难包了。彭真说：搞慢了不利。毛泽东说：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

11月22日 晚，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及七个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出席毛泽东在武汉洪山宾馆召集的会议，商谈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问题。

11月23日 回到北京。

11月24日 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会上，对宣传工作提出以下意见：（一）毛主席的讲话明确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条件〔1〕，目前一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把人民公社办好，整顿好。（二）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报道中央已经定了的内容。报纸的社论、新闻、标题，都要注意政治，凡是不可靠的指标不要登。不要离开实践讲理想。重大的理论问题，宣传要经过书记处、

〔1〕《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随着社会产品由于全国工农业日益高涨，逐步由不丰富到丰富，公社分配制度中的供给部分逐步由少到多，供给标准逐步由低到高，以及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日益提高，全民教育日益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步缩小，国家政权对内作用逐步缩小，等等，随着这一切，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将逐步成熟起来。”

政治局。共青团中央的报告，有关共产主义社会务虚的内容我删掉了。领导人的讲话，有的是酝酿思考的内容，有些是试验性的，有些是启发人讲话，不是定论。（三）人民公社是短期内发展起来的，成绩很伟大。过去很多问题大家都不明白。事情涉及千万人的行动，不要泼冷水；要当做自己的事业，热情帮助，多讲正面的东西，慢慢地把弯子转过来。不要枪打出头鸟。这一点搞不好，要犯错误的。

△ 下午，和周恩来、贺龙、陈毅、李济深、郭沫若等出席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首都各界人民欢迎金日成首相和朝鲜政府代表团大会。在大会讲话中说：中朝两国是休戚与共的。金日成同志和其他许多朝鲜同志同我们并肩作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两国优秀儿女的共同作战把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牢固地凝结在一起。美帝国主义既不能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澎、金、马，也决不能阻挠朝鲜的三千里江山归于统一。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可以任意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1月25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陪同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并宴请金日成首相和朝鲜政府代表团成员。次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继续参加毛泽东同金日成的会谈，并一同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

△ 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前线》半月刊正式出版。创刊号刊登了彭真撰写的发刊词，题为《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文章指出：整风、反右和全民大跃进以来，北京市绝大多数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作风是“正派、健康的”，“有飞跃的进步”，但是有少数人确实有些很不好的倾向，“这就是中庸主义、中游主义和对群众运动的吹毛求疵派。”文章指出：中庸主义者实际上“是各种歪风邪气的庇护者，党内外

右派的同盟军”；中游主义者，“实际上是人民内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保守派。”如果让这种思想作风在党内蔓延起来，“不但跃进不起来，甚至步履维艰，行动都会迟滞起来。”号召大家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永远作促进派，不作中间派，当然，更不作促退派。”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就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即以群众自觉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为了使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相适应，“必须经常地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当前的具体情况，连续地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没有对于现实的科学认识，“我们就没有确定方针、政策和树立决心、信心的根据”。文章强调：在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不能按照片断的材料和表面现象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对于政治工作者来说，还必须“从事物的萌芽形态中，从新鲜事物的典型研究中，从对新的典型经验的总结中，看出一般，抓住关键，抓住主流，探索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方向和前途，以便形成从本质上概括情况的若干概念，形成科学的政治预见，用来指导自己和群众的实践。否则，所谓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就会变成一句豪迈的空话，或者实际上变成随波逐流的尾巴主义者。”该发刊词收入《彭真文选》。

11月27日 晚，和陈云、邓小平、胡乔木到毛泽东处开会。

11月28日—12月10日 出席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

中全会。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会议对当年八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作了较大调整。钢产量指标由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降为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万吨。会议要求一九五九年要继续大跃进。

11月30日、12月4日 和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毛泽东讲一九五九年经济计划安排等问题。

12月2日 晚，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12月5日 晚，和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12月7日 晚，和邓小平陪同毛泽东接见湖北省红安、麻城两县县委书记和部分公社党委书记等，听取他们关于种试验田的汇报，并观看他们带来的花生、棉花样品。

12月8日 晚，和刘少奇、邓小平、胡乔木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12月9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人民公社等十二个问题。

12月12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情况和

会议公报，以及对一九五九年二月会议〔1〕的安排。

12月16日、17日 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会议研究修改《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

12月16日 召集刘仁、万里、陈克寒、赵鹏飞、张文松〔2〕等研究国庆十周年工程和文化、教育等工作。提出如下意见：（一）关于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工程。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美术展览馆五项，预计一九五九年二月中完成整体结构，争取六月前完成，然后集中力量突击人大大会堂。要争取提前完成，必要时抽调工业建筑力量。要搞责任制，把大工程分成部分，分工包干；设计要走在前面，否则返工，得不偿失；要巧干，开展技术革命；要劳逸结合，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要睡好觉。欲速则不达。（二）文化工作。体育的根本方针是增强人民体质，要大力发展业余的，在技术上加以指导。六亿人口一定能出人才。戏剧学校，要开设政治课、文化课。有些人天赋不够，可转业，否则一辈子“打旗”不行。全国业余文化馆中，可选一批唱歌、表现好的人才，加以训练。人才要从群众中来。（三）教育工作。每个县至少要办一两个水准高的中学，将来以此为基础，搞专科学校。学生参加劳动，已经安排了二十四四个工厂与学校挂钩。将来可考虑在学校附近盖点车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课外的会议太多，浪费学生精力。教育要系统研究一下，郊区办教育要和人民公社一起研究，召开点家长会、校长会，合理安

〔1〕 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为第二次郑州会议）。

〔2〕 张文松，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部部长。

排课堂教学、会议和生产劳动，先试点，经市委批准后推广。

12月17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零三次会议。会议讨论以下事项：（一）一九五九年二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安排。（二）一九五九年一季度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三）准备提交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四）关于收回下放给地方的重点企业和接管地方的重点企业上交中央问题，由国家经委提出方案，交中央书记处讨论。（五）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建设纳入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六）关于杂钢的验收和成套设备的检查问题。（七）抓紧解决目前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问题。决定：十八日召开全国城市供应问题的电话会议，保证副食品不涨价，亏损由国家补贴。（八）控制随便招收学徒工和临时工。（九）国家机关的调整问题，决定由习仲勋主持组成一个小组，研究提出方案。

12月18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在会上说：武昌会议后，有关的文件将陆续公布。会议公报已宣布：一九五九年钢的产量由北戴河会议时定的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降为一千八百万吨至二千万吨等。降低指标是注意到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也是压缩空气，反对浮夸。“在这转弯的时候，市委要掌稳舵。这不是说过去犯了错误，同时注意不要反冒进”。要肯定群众的劳动有伟大的成绩，但是指标高了些。农业过去喊亩产粮食几千斤，我们要心中有数，要从实际出发，按片定指标。要注意领导艺术，不要使群众感到是翻了筋斗。要向大家讲清楚，任务比较重，稍一不稳就会发生问题。随即和大家研究了新年期间的副食品供应问题。对知名人士如薪水较高的京剧演员等，为照顾他们的生活，不要减薪。同时，给每个职工发“跃进奖”，数额相当于

半个月工资，以资鼓励。决定这些意见由市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后执行。

△ 晚，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电话会议，布置当前大城市人民的生活供应问题。讲话说：到本月十六日为止，全国钢产量已达到一千零六十三万吨，铁完成二千零六十万吨；农村深翻土地、秋收任务已完成；冬季农田水利，原定一千九百亿土方，武昌会议上，毛主席决定降为五百亿土方，把劳动力腾出来，让群众好好休息，过年不要苦战。要大力抓好大城市的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要用抓钢铁一般的精神来解决生活供应问题。今后，大城市要库存三个月的粮食，一个月的煤；副食品，由中央抓天津、北京、辽宁、上海四处，由全国支持；各省负责本地的城市供应。价格一律不涨，由国家补贴。城市副食品供应由谭震林挂帅安排。讲话强调：要用一个多月时间突击一下，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报纸要讲清楚今年的伟大胜利，缺点不到一个指头，引导大家看成绩，也看各种经验。

12月20日 晚，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应约到刘少奇处讨论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问题。晚十时后，一同去中南海西楼看国庆十周年十大建筑的模型。

12月22日—29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指示，总结北京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和经验，研究和部署明年的工作。

12月2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零四次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二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安排、基本建设与生产安排、副食品供应、对外贸易和党内高级干部减薪等问题。会议决定党内一、二、三级干部的基本工资一律减

到四百元；党外人士和文化艺术界等方面人士的高薪不减，此事提请中央政治局审议。在发言中说：对资本家，一不取消定息，二不取消高薪，我们很主动。

12月25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开幕会。会前接见了会议主席团全体成员。

12月26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批准国家计委、经委和建委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基本建设安排的报告》，决定由薄一波根据会议讨论中的意见加以修改后发出。会议还讨论并批准了财政部党组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第一季度的收支计划》。

12月2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零五次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拟订、基本建设及设备配套，国务院组织机构、人事安排和宣传工作等问题。在讨论宣传工作时发言说：新华社、《人民日报》不要跟着空气走，你们是指导空气的。要宣传党中央确定了的意见。

12月30日 下午，主持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共有二千二百多人参加，其中包括市、区党政各单位负责干部、城市街道、农村人民公社、工矿企业、文教卫生等部门的党政负责干部，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干部。万里、吴晗、程宏毅、贾庭三和赵凡在会上分别就一九五八年本市工业、基本建设、农业、城市供应和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作报告。

△ 晚，到刘少奇处开会，讨论劳动工资问题。

12月31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零六次会议。会议讨论粮食产量、供应和调拨问题，国家机构调整问

题，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第三届常委会的成员组成等问题。

1959年 五十七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在题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的社论中说：一九五九年钢的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煤炭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左右，棉花一亿担左右。

△ 下午，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到北京体育馆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闭幕式。

1月2日 和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等到周恩来处开会，讨论准备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1月3日 下午二时，到周恩来处商谈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和施工等问题。

△ 下午四时，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零七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第三届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各部部长人选推荐名单。

△ 晚，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电话会议并讲话。讲话要点是：（一）总结经验，整顿作风。武昌会议提出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这不是什么“纠偏”。去年，全国几亿人参加的大跃进，工农业战线取得很大成绩，工作中难免产生一些毛病，需要总结经验。武昌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

党委的总结，还需要从上到下层层总结，整顿组织，整顿作风，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据反映，基层有百分之五的干部有较严重的违法乱纪，有的公社干部还有贪污，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够继续前进。（二）粮食产量有“两股风”：去年各地虚报产量的较多，瞒产的不少。实际上全国的产量不平衡，有增产的，有平产的，有减产的。有的省现已发现有饿死人的现象。广西有一个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公社增产，百分之二十的社遭灾，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各地要注意那些因减产或遭灾发生粮食不够吃的社、队和工作不好的社、队，调粮去支援，千万不要饿死人。（三）要抓紧粮、棉、油料的收购工作，控制粮食的消费。丰收了，有的地方人、畜、家禽都敞开肚子吃，长此下去，粮食有接不上的危险。粮食的销售现在比去年同期增加九十亿斤。要反对浪费，要从省到村层层算个账，安排口粮，距新粮下来还有几个月，要防止青黄不接时可能发生的灾荒。（四）报纸宣传要注意分寸。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讲清楚，干部的错误要认真处理。但在宣传上分寸要恰当。省、市、区党委负责人要提醒报刊的编辑人员，在我们工作上面临转弯子的时候，如果宣传不当，不仅给群众泼冷水，而且给敌对势力攻击我们提供口实。

1月5日 晚八时三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会议开至深夜十二时。

1月6日 上午九时，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零八次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的生产计划、当前基本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工业企业管理制度等问题。发言指出：现在建筑材料方面出现的黑市交易，是发生在国营企业和公社之间，原

因是摊子大，基建材料不足，互相私约搞东西。归根到底要“看材定项”。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武昌会议后，下放的企业和权力收回来了，全国现在一盘棋，大家服从中央，重点的项目定下，心里有底，便于打歼灭战。会议决定，就工农业生产发展中个别地方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黑市交易，由薄一波、李先念拟定取缔办法，报中央批发。

1月7日 同刘仁、郑天翔等及北京市公安、政法、统战部、《北京日报》的负责人座谈公安工作。谈话说：今年是建国十周年，敌人不会放松。历史反革命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但还会有新生的敌人。对付暗藏的敌人，光喊口号不行，首先要把全市的敌情掌握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般透明。为了暴露敌人，可以采取“明松暗紧”的策略，放他八个月，看准目标，到九月动手。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依靠党委，走群众路线。近几年，工厂招了许多新工人，公安部门要派人到工厂去做工作。只有同各单位的党委联系、研究，才能克服盲目性。不要跟着“空气”走，要分析“空气”，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

△ 同蒋南翔等谈梁思成入党问题。梁思成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致信毛泽东，提出入党要求。毛泽东批示：“我觉得可以入党，请北京市委酌处。”但事隔近三年，并未落实。为此批评清华大学党委说：梁思成是有代表性的学者，解放后表现一直是好的，爱护人民的国家，拥护共产党领导，这是大节。至于他建筑上赞成“大屋顶”，是学术问题，允许有不同派别；况且他没有擅自修建过一个“大屋顶”建筑。只要政治上一致，其他方面可以有所不同。十一日，清华大学党委报告彭真、刘仁并市委书记处：经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党支部通过，八日，学校党委已批准接收梁思成为中共党员。报告并就

拖延梁思成入党事作了检讨和解释。

1月8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零九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祝词和致词；同意康生对全国教育会议的开法和要解决的问题的意见。

△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陆定一、康生等接见出席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各省、市、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和各省、市、自治区宗教事务局（处）长会议的全体人员。

1月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一十次会议。会议讨论农业问题。会议听取刘瑞龙关于农业情况汇报后，同意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安排的意见：农村人民公社管理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合理安排劳动力；坚决削减水利建设的指标；公社大协作是必要的，但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对少数地区可能发生春荒应有足够的重视以及争取在上半年把市场紧张情况缓和下来等。

△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在讨论安排基建项目时，讲话指出：（一）要顾全大局，集中力量，保证中央的重点项目。北京市的基建项目，除了急需的和已接近完成的外，其余的推迟一下。（二）要集中资金，加强管理。由市下放给区的工厂，一切开支纳入统一财务计划，但要考虑区的一定机动权。银行对市委批准项目的款项有监督作用。只凭热情，不讲纪律会造成混乱。（三）设备由市工业基建委员会和计划委员会统一管理，重要设备的分配报市委批准。下放的工厂，区、乡解决不了的原材料和设备，由市计委解决。但区、乡自办的工厂，原材料和设备自理。（四）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工业基建委员会应尽快组织起来。

1月11日 和陈云、邓小平等参加公祭张玺〔1〕的仪式。张玺于一月八日去世。

△ 和邓小平、谭震林收到李先念的来信。信中说：油的问题比粮食问题还大些。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秋收中浪费不少；二是收购工作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三是农村放得过宽。

1月12日 主持召开庆祝建国十周年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讨论确定了有关的建筑工程、展览馆的展出思想、文艺演出与出版物的编写、外宾和海外侨胞的邀请与接待和游行队伍组织等问题及具体分工。讲话中谈了以下意见：（一）各项建筑都要强调质量第一，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内部装修要朴素、大方、实用、美观；装饰尽量用国画；严防铺张浪费。毛主席说，馆内一律不放他的塑像。建筑物安全由万里、刘秀峰负责。（二）展览内容要注意思想性、真实性、全面性，防止庞杂、重复。对古人和今人，都要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陈独秀、康有为要考虑摆上。革命历史部分，要注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与地方的关系，既要有历史的全面，又要有各阶段的全面，以增强全党团结，还要注意国际主义的内容。重大问题要拿到中央书记处、政治局以至毛主席那里讨论决定。（三）文章、电影、戏剧和出版物，中宣部每个月开两次会检查。要防止有些人借国庆展览的名义搞个人名利，凡冠用“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名义的著作，一律经中宣部审批。是否组织审查委员会，由中宣部提名，报书记处批准。（四）外宾、华侨的邀请和接待工作，外宾控制在三千四百人以内；华侨六百至七百人以内，由廖承志统一掌握。各地来京观礼的，由习

〔1〕 张玺（一九一二——一九五九），生前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仲勋、齐燕铭统一掌握。参加全运会的运动员，一律住帐篷。（五）游行队伍的组织，由刘仁负责组成一个小组，原则上，军队检阅一个半小时，群众游行一个半小时。

1月13日 上午，出席邓小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轻工业生产问题。会议决定增加十亿元投资用于化工、纺织、轻工业。

1月14日 晚，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电话会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布置工作。说：去年第四季度，我们主要抓钢铁，办水利，对群众生活问题抓得迟了些。目前，生活问题成了全国的突出问题。这是关系到广大群众的政治问题，解决不好，生产也会受影响。（一）要抓粮食。抓增产，也要抓节约。“不要把跃进太夸大了”，“粮食恐怕有接不上的危险”。去年全国受灾面积一亿亩，每个省增产情况是不平衡的，湖北、江西两省仍有灾区。各地都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接受广西有的地方曾发生过饿死人的教训。要通过安排生活，核实粮食产量。大城市要库存三个月粮食。（二）要抓轻工业。书记处认为挤了轻工业就是挤了群众生活日用品，就会引起不满。去年决定下马的一批企业中，有一批轻工业厂要“归队”，还要挤出一点原材料，增加一部分劳动力，增加轻工产品。（三）要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劳动力。水利建设中央已降低了指标。投入“小土群”炼钢的劳动力，有的地方还没有下“火线”，要快下决心停下来，不然过度紧张，可能影响健康。（四）农业“少种多收”问题。作为方针，应该是多收有了保障，才能少种。如果少种而不能多收，就是很大的冒险，就会栽大筋斗。（五）要抓钢产量。从月初以来，钢的日产量最高为二万五千吨，按此速度，下半年又很紧张。要抓紧重点企业，抓紧“小洋群”，抓基本建设和冶金、电力配套。

1月15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中共河北省委汇报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会议决定力争上半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把市场调整好，同时要保证完成已公布的钢、煤、粮、棉的生产指标；帮助河北省解决洗煤、炼焦和调整年度计划问题，解决天津工业生产中出现的問題等。在讨论时说：上海大米、猪肉和煤炭供应都告急，请河北省先把供应上海的煤炭运去，车皮问题由铁道部解决。上海、天津、北京物资供应紧张，党组织要在机关、部队干部中布置，不要到市场上去排队抢购，以免造成恐慌。所需用品可由总务部门统一采购。并强调说：今年重点是两项，一是钢，二是群众生活。

1月17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一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听取国防科委负责人汇报工作，同意国家科委党组提出的关于一九五九年科技发展计划草案。

1月20日 上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张闻天、康生、廖承志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1月21日 上午，出席邓小平主持的有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薄一波、谭震林、杨尚昆、胡乔木等参加的会议。会议研究将于本月二十六日开始在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的准备工作，及支援古巴、刚果等问题。决定将七个文件提交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一）一九五九年度计划。（二）轻工、化工和市场问题。（三）农业问题。（四）人民公社问题。（五）劳动力的调配问题。（六）当前生产中的若干问题（包括煤、铁、木材、化工、绝缘材料、交通运输、建筑材料等。）（七）中学生的供给问题。

1月22日 上午，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欢迎墨西哥前总统、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拉萨罗·卡德纳斯将军的大会上讲话，表示中国人民全力支持亚、非、拉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正义斗争。中午，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欢迎酒会。

△ 下午，和周恩来等到机场欢迎奥托·格罗提渥总理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1月23日 上午，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三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改期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决定延期至一九五九年四月召开；通过《关于决定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事条约〉的全权代表的决议》，并决定派陈毅为签订该条约的全权代表。会议还听取了廖鲁言关于农业工作的报告。

△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一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刘宁一汇报全国总工会党组第四次扩大会议的情况，讨论并批准全总党组的报告及相关事项。

1月24日 凌晨一时三十分，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中央来信。信中告知赫鲁晓夫将在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上提出取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

△ 上午九时，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会议商谈省、市、自治区第一党委书记会议的开法。

△ 上午，和邓小平等到机场，为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送行。同时，送胡志明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

△ 下午，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首都各界人民欢迎格罗提渥总理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讲话。讲话

中向诞生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民族致以崇高的敬意，赞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取得的巨大进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和祖国统一作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1月25日 上午，在首都各界十万人支持古巴和刚果人民的反帝斗争大会上讲话。指出：古巴人民和刚果人民的斗争，是当前民族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发展。中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自由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并将永远团结在一起。

1月26日—2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农业、劳动力调配等方面的问题。

1月27日 上午，和刘少奇等陪同毛泽东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下午，和刘少奇等参加陈毅代总理和格罗提渥总理签署中德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德两国外长签署领事条约的仪式。晚，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为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二十九日上午，去机场送格罗提渥一行离京回国。

1月29日 审阅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向中共中央的情况报告稿，以及为贯彻中央少杀、少捕、管制也要比过去少的精神所草拟的《关于当前对敌斗争中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稿。会议情况报告稿中提出：与会的多数同志，认为从实际斗争和国家法制建设来看，检察机关有保留的必要。政法各部门，在工作中既要互相协作，又要互相监督和互相制约，目的是严格分清两类矛盾，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错误，以完善法制。阅后签写“拟同意。”并将以上两稿送刘少奇、邓小平核转中共中央。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政法会议的情况报告和《关

于当前对敌斗争中几个问题的规定》。

1月31日 上午，出席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讨论市场问题。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等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后勤工作会议、空军后勤工作会议、铁道兵政治工作会议、工程兵党委扩大会议、北京地区部队党代表会议和后勤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2月1日 出席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讨论工业生产和劳动力安排问题。

2月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一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文件的修改事宜。会议还讨论决定由邓小平、彭真等和中联部研究后，提出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党的负责人的谈话方案，向刘少奇汇报后报毛泽东；调用各省、市、自治区的外汇进口化肥；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部长会议。会议还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吸收陈垣^{〔1〕}、周培源入党的请示，报毛泽东阅后，同吸收梁思成入党一起公布。在会上建议：近几年许多负责人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读书，理论上很混乱，应安排他们读点书。

2月5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一十五次会议。会议同意《红旗》杂志编辑部提出改进刊物的各项措施；听取陆定一关于文教工作中几个问题和宣传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汇报。在发言中说：《红旗》的面貌反映我们理论队伍薄弱，杂志应以提高为重点。

△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六次会议。会议听

〔1〕 陈垣，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取张霖之关于煤炭工业生产的报告。此前，委员们已听取了关于农业生产、钢铁生产、化工生产、市场情况等报告，并进行了讨论。

2月7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一十六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工业部起草的关于改进现代化工业企业工作的指示稿。发言说：现在有的企业党政不分，实际就是以党代政，取消了党委的领导；还有一个问题是企业中沒有政权组织，企业行政上对政权方面的事不能管，政权方面又没有管，应加以研究。会议决定文稿再加修改后，提交拟于三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部长会议讨论。

2月9日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到首都机场迎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后回国；同时欢迎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后同机抵京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和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高士。

△ 晚七时十分，和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等乘火车去上海。十日早七时到上海。

2月11日—16日 在上海。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江南造船厂、上海手表厂、上钢三厂、上海电机厂、华孚金笔厂等。期间，赴苏州、无锡游览。

2月13日 毛泽东批示彭真，将外交部代中央所拟中共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连同附件《关于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的骄傲、急躁和轻敌情绪的一些材料》“一起发出”，发文范围由彭真商周恩来、陈毅“酌定”。

2月17日 上午，和邓小平等看望宋庆龄，共进午餐。

2月18日 全天听取中共上海市委的工作汇报。

2月19日 上午，参观静电纺纱厂、离心纺纱厂等。

2月20日 上午，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

邓小平等在开幕式上讲话。

△ 毛泽东批示徐冰，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名单，“与总理和小平、彭真同志商酌定案，我无意见。”

2月21日 零时三十分，乘火车离开上海。下午，到达济南。看济南附近的麦田，听取中共山东省委几位负责人汇报工作。夜十二时，乘火车离开济南。二十二日上午，回到北京。

2月22日 下午五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薄一波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2月2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决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三月十日在上海举行；还讨论了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党外委员名单、给青海柴达木和果洛调粮及“小洋群”生产的好铁的调价问题。

2月2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一十八次会议。会议同意薄一波在前日书记处会议上作的关于冶金、机械、煤炭三个部的生产情况和计划安排几个主要问题的汇报，讨论了工业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法问题；批准陈其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同意可和梁思成等人入党一并公布。

△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一盘棋》的社论，强调必须“把全国经济组成一盘棋”，更好地“加强集中领导和全面安排”，以便“最有效、最合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中钢、煤、粮、棉等生产指标。

△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对当前工作提出以下意见：（一）国庆工程以天安门前的大会堂、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和长安饭店最为紧张。指出：工程现已进入“冲锋陷阵”阶段，要与有关部门商订进度计划，所需材料开列清单向国家

计委提出。请上海、天津、沈阳来人订好合同，并抽人到生产厂监督，力争八月二十日竣工。（二）农业要贯彻政治挂帅，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吃饭不要钱三条，把干劲鼓起来。去年秋后，因为劳动工分不算了，所以棉花、花生扔在地里没人收，“这是小生产者对我们的严重抗议”。当务之急是要提出谁从地里摘来的棉花，卖给国家，现钱交易，钱归本人。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的办法，使到手的劳动成果不糟蹋。农民不可能一下子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所以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政策要坚持十年二十年或更长久。总之，要用“政治鼓动加物质保证，把干劲鼓起来”。（三）工业方面，落实武昌会议的精神，关键是向职工交底，把方针、任务和困难都告诉群众，发动落实指标，要防止保守，但“不要搞反右倾保守运动”。其次是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经过反右派、整风，斗争很紧张。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人的积极性，要把所有的老教授都使用起来，让他们有所贡献，不要搞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统战工作的范围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就是要带领更多的人走社会主义道路。

△ 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宫本显治、日共中央干部会委员春日正一和日共中央副部长西泽富夫。

2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会议再次讨论《关于改进现代工业企业领导制度和领导方法问题的决议（草案）》。发言说：企业领导党政合一，势必降低、削弱党的政治领导，把党陷入具体事务中去；一长制，厂长在党委之上，没有群众路线，没有民主集中制。要正面把问题说清楚，厂长负责制是指在日常生产管理和指挥方面，以厂长为首，集体领导，分工负责。职工代表大会包括所有非工会会员

都应有代表参加。

2月26日 下午，和邓小平等约张启龙、徐冰谈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2月27日 上午，和邓小平、杨尚昆等接见出席第三次情报工作会议的部分人员。

△ 下午一时，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乘飞机去郑州。

2月27—3月5日 出席毛泽东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通称为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审阅《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稿，主要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继续压低一九五九年的经济指标等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在会上作的讲话，指出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的倾向，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形成并下发了《郑州会议记录》，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规定了十四句话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具体划分了公社、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的职权范围。管理区或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2月27日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听毛泽东谈所有制、劳动力分配、消费资料消费和干部下放当社员等问题。

2月28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听毛泽东谈人民公社分配问题。

3月1日、2日、5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听毛泽东讲话。

3月3日 下午，在郑州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

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宫本显治和春日正一、西泽富夫的会谈，并一同出席邓小平和宫本显治签署中日两国共产党联合声明的仪式。四日上午，和邓小平去郑州飞机场送宫本显治一行前往广州。

3月6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由郑州乘飞机返回北京。

3月7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二十次会议。会议讨论如下事项：（一）同意胡耀邦关于共青团三届四中全会情况的汇报。（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三月三十日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二十五日先在上海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作为七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三）政治局常委会建议，四月十六日在京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中心是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由彭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扩大会议商定，并和杨尚昆一起安排大会发言和会务。（四）三月十日由邓小平向中央各机关负责干部传达郑州会议精神。

△ 下午四时，和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四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并在会上讲话。

3月8日—17日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市、县、区、公社、生产队五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二千二百多人。会议传达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人民公社体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等重大政策。在三月八日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向大家讲明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区别后说：把分配问题搞好，内部矛盾可减少，农民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现在实行的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是最大的社会保险，但实际上是劳动力多、劳动力强的户，管了劳动力弱而人口多的户的饭。只有生产水平很高、道德品质很高时才能实行，不是现阶段根本分配的原

则。现在，按劳分配是主要的。去年，我们走得远了点，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好在弯子转得很快。现在要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原则，多劳多得，多得多用，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要评工记分，超产部分二八开，三七开，大头在下边。强调：如果“五亿农民心情不舒畅，我们是可能翻船的。如果农民深藏密窖，站岗放哨，来对付我们，还能不亡。”所以干部一定要务实，不脱离实际。不能做风筝、氢气球，要下去当社员。东倒西歪，就是自己没有根。如果有典型，就有了根。

3月8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在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工作总是先做典型试验，这样做的都成功；搞合作化未经试验，在郊区一律搞大社，费了很大劲才巩固起来。领导工作要抓三四个据点，摸清典型，不要到处跑。就怕这样的干部：情况不了解，你说左，他比你“左”；你说右，他比你右，这就让你跌筋斗。现阶段我们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价值法则办事，但去年我们实际上靠调拨来办事，国家与个人之间，不讲等价交换，不讲按劳分配。过去的计件工资还是起好作用的。要重视农业，大部分领导力量要抓农业。要把农业上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是就是，非就非，把道理讲清楚，提高干部的水平。工业，北京以后要搞现代化的，不要“饥不择食”，上一些技术落后与首都不相称的工厂。

3月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二十一次会议。周恩来、陈云参加会议。会议同意李先念的提议：四月十四日在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财贸书记会议，讨论农产品收购、市场安排、农村人民公社财贸体制等问题；同意李富春关于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和第二季度工业生产安排的意见。

3月10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传达第二

次郑州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处以上干部、国家机关党组成员，军队少将以上干部，及北京市局长以上党员干部共七百余人。在邓小平、杨尚昆传达后，就当前工业生产等问题讲话，指出：今年第一季度生产情况不好，重工业不如轻工业，主要的不如次要的，该重的没重，该急的没急。钢和生铁的产量只能完成调整以后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和八十二；基建原计划七百二十八项，现开工一千零九十六项，所需要的钢材只能分配到一半多一点。东北、上海、天津、太原、重庆等地工业所需的原料、燃料、设备得不到保证。主要原因是“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没有很好地贯彻。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纲；大中小结合，以大为纲；土洋结合，以洋为纲。现在的问题是“抓纲不够”。有些中央部门和地方“留后手”、“开后门”。结果是力量分散，重点上不去。强调要执行六中全会的方针，全国一盘棋，把主要精力、现有的原材料、设备集中到决定命运的项目上来。中央各部门，一不要自留储备力量，二不能层层加码，三不准开后门，搞物物交换，私接任务。要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是对的，但现在的情况是重点和一般不可能兼顾，否则重点也上不去。至少在一、二季度内，对一般的项目要忍点痛停下来或推迟一些。要按照轻重缓急，一环扣一环地排出进度表，中央以此来检查。要派专人对每台轧钢机、每个电站、每个重大项目管起来，逐日逐项检查，保障今年任务的完成。关于农产品收购问题。指出：粮、棉、油的收购任务完成得不好，形势很紧张。城市要有三个月的存粮，而现在有的城市只有几天的存粮。要求各地在六级干部会上督促一下农产品收购工作，包括出口商品的收购。

△ 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同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

者勾结，阴谋搞所谓“西藏独立”，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

3月11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陆定一、林枫关于全国工作会议和职工业余教育会议的情况汇报。

△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七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各选举单位选出的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当选代表共一千二百二十二。会议决定四月十七日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3月11日、12日、14日 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西藏叛乱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陈毅、杨尚昆、徐冰等。十二日至十五日，毛泽东从武昌三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示弱、胆怯、无能。指示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并请中央考虑对达赖〔1〕可能出走，在政治上取何种态度和需要采取的措施。十四日晚，黄克诚、张经武、张国华、杨静仁〔2〕参加会议。

3月12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等接见出席人民解放军通信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全国工矿企业职工教育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3月13日 出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欢迎总书记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3月14日、18日、19日、20日、21日、23日 出席中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学会名誉会长。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出走印度。

〔2〕 杨静仁，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西藏叛乱和军队入藏平叛等问题。

3月16日 在北京市郊区五级干部会议上讲话。主要内容是：（一）去年有很大成绩。成立了公社，深翻了土地，建成了密云水库，思想大解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但是人民公社的管理没有搞好，实行了公社所有制，生产队里的劳动力随便调度，粮食、蔬菜等说调走就调走，不记账，不给钱，搞得生产队好像不存在了。从去年北戴河会议到现在，因为我们对公社所有制没有搞清楚，出了不少问题。去年底中央召开武昌会议，最近又召开郑州会议，一步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土地、劳力、农具、产品都在生产队；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和物资要给钱；互相协作，要等价交换。这样，各级就可以搞经济核算。这件事首先是市委对公社所有制没有弄清楚，对新事物没有经验。大家不要顶牛。穷队、富队合并一起，有意见的可以分开；规模小的生产队，愿意合并的，可保持高级社的规模。这样，贫富拉平的矛盾解决了。（二）工资制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是目前最大的社会保险，但这是平均主义。工资制就是多劳多得，评工记分。有人说，“评工记分，三年两吹”，要记取这个教训，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分配原则。吃饭不要钱，一半人高兴，多劳多得，另一部分人高兴。这就好办多了。（三）积累和分配。积累是为了扩大再生产，但要恰当。生产队的总收入，除了征购、积累，大部分应归社员分配，不能随便调用。穷队和富队，富队是社员劳动的结果。穷队变富，要靠自己劳动，自力更生，市、区和公社给予一定照顾，不能用穷富拉平的办法。（四）干部作风问题。调整政策，目的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今年生产。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订指标，亩产

能八百斤的就八百斤，去年天坛大会的挑战指标不算数。指标确定后，研究措施；还要搞多种经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然发不出工资。干部一要讲民主，有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的要向人家赔不是。二要廉洁，经济上不干净的，要保证退还，生产队定期公布账目。三要参加劳动，保持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讲话最后鼓励大家鼓足干劲，搞好生产，使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都，而不是“尾都”、“末都”。

△ 同程宏毅、张晓梅、杨伯箴、萧平〔1〕等谈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说：公社的组成形式，可以有所不同，有的以街道为主，有的以工厂、学校为主。四季青公社也可以试一个点。“消灭家庭”是自然的漫长发展过程。现在是要积极地把职工家属和城市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参加生产。生产搞起来了，生活就要社会化，需要办食堂、托儿所、幼儿园。要自愿参加，不要百分之百的人都参加，先组织有积极性的、有需要的人参加；不愿意参加的不要勉强。办这些事情，以自力更生为主，政府可以给些帮助，自己出钱出力搞起来的就会更加爱护。要从实际工作中找出一条通向共产主义之路。

3月17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西藏叛乱、藏军劫持达赖出拉萨的紧急情况 and 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会议还讨论了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 下午，会见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

〔1〕 张晓梅，时任北京市妇联执委会主任。杨伯箴，时任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第一书记。萧平，时任石景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

3月1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央高级党校今后的办校方针、任务和加强对理论工作的领导问题。会议决定《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总结稿件，由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修改后送毛泽东审定。

3月20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试验改革学制的规定》、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教育事业计划的意见》等十一个文件。

△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号召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解放军的平叛活动。

3月21日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陈毅、黄克诚、杨尚昆、汪锋、徐冰、张国华、张经武等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研究西藏平叛问题。

3月22日 下午，约劳动部、北京市委有关负责人谈城市人民公社组织家庭妇女参加生产、服务等问题。

3月23日 晚十一时二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乘火车离京去上海。二十四日中午，到上海。

3月25日 上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西藏平叛、即将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开法和国家机构领导人的人选等问题。

3月25日—4月1日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通称为上海会议）。会议为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做准备。（一）检查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

顿工作，讨论了毛泽东提出关于人民公社十二个问题〔1〕，形成了准备提交八届七中全会讨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稿。（二）检查了第一季度工业生产计划执行情况和当前的财贸工作；研究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的生产指标，提出了调整意见。（三）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

3月26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和第二季度计划的报告。

3月28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当前财贸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3月2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工农业生产计划问题。据各大区提出的产量，今年钢产量可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万吨。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了计划问题。会议建议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候选人。同意董必武辞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职务，建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候选人。上述建议，将提到中共中央全

〔1〕 一九五九年三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原提纲共十四条，前六条是邓小平拟写的，毛泽东在修改时增写了后八条。三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上讲到了其中的前十二条：（一）公社的组织章程。（二）小队的部分所有制。（三）吃饭不要钱。（四）算账问题。（五）五月各公社都要开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六）十月至十一月间各省开六级干部会议，讨论今年的分配问题和计划（措施）。（七）税收、积累的绝对数的规定。（八）县一级要不要积累问题。（九）贷款的收回和下放的问题。（十）投资十亿元（扶助穷队和帮助公社）的分配、用途。（十一）开会方式，要使层层都到，基层人数要超过上层。（十二）管理费和不脱产人员的补贴的规定。

会讨论决定，并在同各方会商后，向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名。

3月30日 上午，和谭震林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有关负责人开会，商谈粮、棉、烤烟及外贸等问题。

3月31日 下午，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及书记处成员汇报各小组的工作情况。会议决定去年和今年钢、煤、粮、棉四项指标均不改动。

4月1日 下午，和邓小平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4月2日 上午，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劳动工资方面的问题。

△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至五日结束。会议通过《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建议由国务院提交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

△ 晚，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4月3日 回到北京，准备接待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

4月5日 上午，到机场欢迎从波兰、匈牙利、蒙古等国开会和访问之后，途经北京回国的、由副总理武元甲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中午，设宴招待越南客人。

4月6日 到机场欢迎以中央书记贾恩·卡洛·巴叶塔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晚，会见并宴请意大利客人，双方就当前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

4月8日 上午，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介绍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情况与经验。十七日、十九日，先后陪同刘少

奇、邓小平和毛泽东会见意共代表团，并出席中共和意共会谈公报的签字仪式。

4月9日 上午，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郊区人民公社小队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电话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了以下问题：（一）尽快讨论确定生产小队的包工、包产、包成本问题。包工包产“与社员有利害关系，是社员的事情”，“不能由生产队长、支书一讨论，一商量就算了”；承包额要“留有余地”，使生产小队有一二成的超产可能，“这样群众才有奔头”，超产部分秋后归小队分配。副业收益多的，与社员商议，社里可以提一点。生产措施由生产小队自己决定，公社、生产队只能建议，不得强迫命令。（二）劳动报酬按评工记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样做，“收入有差别是社会主义允许的，无差别是平均主义”。（三）公社要抽出时间搞大鸣大放，把干部的作风整一下，谁有毛病就给谁贴大字报，干部挪用公款的要退，在整风基础上民主选举干部。今后每月公布一次账目。工分账、工资账、伙食账、预支账，都要公布，由群众监督，防止贪污、浪费。（四）食堂不能搞得太大，可以根据生产队收入情况，分三种：一种是既供给粮食又供给蔬菜；一种是只供主食不供副食；一种是供给一部分，由各社队自己定。总之，“一切要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有利于鼓足干劲。”

4月10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会议认为清明节已过了五日，是春耕生产关键时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是“三包到队、评工记分，小队所有”。对会上反映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要算的“旧账”，如一九五八年上半年评的工分、包的工分、产量账和大办钢铁、大修水利、上交的废铜废铁账算不算等问题，答复说：账都要算，处理由群众公议。并提出了以下意见：一是为了取信群众，现已评工记分的工资，四月

份起开始发放。二是凡达到基本工分的劳动者，吃饭不要钱，不够基本工分的，要缴部分伙食费。三是所有劳动力承担的义务劳动，收入归社，作为对国家投资。四是按自报公议，迅速包工、包产到生产小队，留百分之二十的超产数归小队分配。五是公社占用群众的房屋应交租金。六是公社脱产的文工团员、篮球队员回到生产中去，否则工资从公社干部工资中扣，上级决定的，扣上级的工资。会议决定召集公社干部、区委干部和市级有关干部开会，进行整顿人民公社和干部工作作风的思想动员。

△ 在中共北京市委主持召开的市、区县、公社三级农村工作干部参加的电话会议上讲话。说：为了发动群众整顿人民公社，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已经把党的政策直接传达给群众。整顿干部作风原来安排在五月份，现在等不及了，趁热打铁，让群众一起大鸣大放。我已经点了火，让群众给我们做个鉴定。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即使是一个指头也不行。在整风中，“头一条就是硬着头皮，让群众把意见说出来”，即使是偏激的、错的，也要“静心听，耐心听”，对的意见马上接受，改进。当然，你们的问题，市委要担一部分责任，但各有各的账。你打人骂人，强迫命令、贪污、挪用公款，自己负主要责任。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赶快退回去，争取主动。让群众鸣放，不要划格子，让群众在格子里走路。我们管了群众一二年，现在让群众批评我们一周，群众心平气和了，生产就能大跃进。

4月11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二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的议程和准备工作等。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决定：（一）两会的筹备工作由彭真负总责。（二）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建

议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名单提交各党派、人民团体协商后向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三）原则批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稿和《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公报》稿，以及李富春和李先念拟向会议作的相关报告。（四）同意李先念关于调拨粮食的意见；由于原棉不足，请李先念通知各地纺纱厂每周开十八班，利用剩余时间检修机器。（五）同意宋庆龄建议，在两会期间召开中苏友协全国代表会议。

△ 下午，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向郊区人民公社社员讲话。说：昨天电话会议后，大家鸣放起来了。这次鸣放，“主要是整顿我们的工作，工作做得好不好，生产搞得对不对，干部哪些做得不对，哪些强迫命令、主观主义。”“群众鸣放，干部整改”。人民公社是新事物，市委也有搞错了的，比如算旧账，上次说不算，错了。大账得算，小账也得算。去年大跃进，大兵团作战，深翻地、炼钢铁的旧账，都可以算。还有包工包产问题，办食堂问题，都希望提出意见。对的意见，有的可以马上办；不能马上实行的，慢慢办也得办，我们是讲信用的。

4月12日 收到周恩来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彭真等阅的国务院秘书厅《关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和十五省春荒情况的统计表。周恩来批示：这五省部分地区缺粮问题，最严重的是山东、河北两省，已在调粮进去，其他问题，当与五省来开人大

会议的负责同志一谈。〔1〕

4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二十五次会议。会议议定：（一）提交两会的有关文件，修改后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核阅，由彭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二）同意将国家计委所拟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几点说明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三）批准彭真代表常委会拟向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工作报告稿。在讨论人民公社的算账和整顿干部作风问题时建议：整顿干部作风请中央发一指示。还说：在整顿公社时，要发动群众鸣放；干部要耐心听取意见，争取主动，有错即改；经济上借支、挪用要还，贪污要退；要固定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误工要给予一定补助。干部的缺点错误，上级要负一部分责任，要治病救人，检讨在前，处分在后，处分面不要超过百分之一至三。

△ 下午，出席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八次会议，作关于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准备情况的报告。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事条约》；批准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和城步苗族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1〕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晚十一时，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上送国务院秘书厅整理的材料及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后批示：“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并请周恩来“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发文件一份。”同时，将原件安一个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 下午，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到京。和周恩来等到车站迎接。晚六时，陪同周恩来接见班禅等，并出席欢迎宴会。

4月15日 上午，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就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的主席团名单和议程交换了意见，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准备向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建议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名单。

4月16日 上午九时，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二十六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钢铁生产保证重点等问题。会议通过拟向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建议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名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名单。

△ 主持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第五十五次会议。会议通过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召开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的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和分组召集人名单草案等。

△ 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在会上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大代表这次也出席会议。因为他们还有一定的代表性。两年来，他们已检讨了好几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让他们好好工作。这次会，对国内要强调团结，心情舒畅，鼓足干劲，继续跃进；对外是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

〔1〕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风。

4月17日—29日 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再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4月17日 上午，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九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各代表组召集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本次人大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秘书长人选的提名草案；讨论了二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以及本次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大会的议程。在会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会议还通过二届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提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委员名单。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和刘少奇等十二人当选为主席团常务主席。

△ 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工业、交通各部委党组书记发出党内通信，通告四月以来的钢铁生产情况依然不好，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立即对生铁的生产和调出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4月18日—28日 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大会听取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审议批准李富春作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报告、彭真作的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彭真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

长。

4月19日 晚九时，和刘少奇、邓小平等陪同毛泽东会见以贾·巴叶塔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

△ 晚十一时，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如何反击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所谓声明〔1〕。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

4月20日 下午，主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一十次会议。在讨论常委会提交大会的工作报告稿时着重说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法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适时修改。因此，工作报告稿中加了一段文字，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有些已经不适用的法律条文，需要由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地加以修改。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第十九项的规定，建议大会授权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按照情况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对现行法律中一些已经不适用的条文，适时地加以修改，作出新的规定。”会议通过了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二十一日，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4月21日 晚九时，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李先念、张闻天。

4月23日 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会休息期间，毛泽东同周恩来、彭真、陈毅谈话。

△ 下午，出席朱德主持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会上对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提名方案和选举办法作了说明：关于毛泽东不作国家主席候选人，去年

〔1〕 指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达赖逃到印度后，由印度外交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英文稿）。

武昌会议后就发了新闻。当时也估计国外会有各种议论，毛主席说，吵那么一两个礼拜就过去了。今年三月，在上海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酝酿了国家领导人候选名单。副委员长人选，这次没有变动，只有达赖喇嘛，原来是副委员长，现已被挟持在国外，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讲了这个问题。如果确实是被挟持的，没有理由撤换他。现在印度人说他不是被挟持的。达赖申述他不是自愿的；到会的藏族代表也有人说，他还是被挟持的。所以还是作为候选人好。现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由班禅〔1〕代理，所以除达赖外，班禅也提作副委员长候选人。对撤销监察部和司法部的说明是：干部违法乱纪问题，共产党内有监察委员会，行政处分，各部都有专人管，经验证明单设一个监察部没有必要。法院和司法部，一个管审判，一个管司法行政和干部，分开，工作有很多不便，应当撤销司法部，把司法行政和干部管理工作并到各级法院去。但事情牵涉到法院的组织法。如大会同意撤销司法部，法院组织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必要修改。此外，增补卫立煌〔2〕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项，提请主席团讨论。

4月24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到毛泽东处谈话。

4月25日 晨六时，毛泽东就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函示胡乔木、吴冷西、彭真；同时请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林彪、陈毅阅。毛泽东指出：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应“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政治记者

〔1〕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2〕 卫立煌，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

评论的路线〔1〕说话”。请胡乔木、吴冷西当天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并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上午十一时五十分，和胡乔木、吴冷西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 将邓小平阅后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的决议草稿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核阅，并批告：原来拟议的关于迎接建国十周年开展增产节约的决议，已起草和修改，但不大满意，且内容和李富春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有关部分差不多，有关内容可以加在批准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中。

4月26日 上午，主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向大会提出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名单、二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法案委员会名单草案，提交大会选举或决定。会议还通过进行各项选举的监票人名单。

4月28日 收到毛泽东“略有修改”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

△ 下午，出席朱德主持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就大会审议的各委员会的报告和各项决议草案作出说明。当晚，大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1〕 这里的“十八日”可能是二十日之误。《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发表了新华社政治记者二十日的一篇评论，题为《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其中讲到：四月十八日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

《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和《关于撤销司法部、监察部的决议》。

4月29日 上午，毛泽东致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林彪、朱德、谭震林〔1〕、彭真：“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讯》〔2〕，请你们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直作改动。”五月二日，毛泽东嘱刘少奇、邓小平阅后交杨尚昆将上述致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的修改稿“在今天或明天，用电话发去。再另印如前示”。

4月29日、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工业生产安排、农业和粮食等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3〕和部分省市委书记。由于一至四月钢的产量仅完成三百三十六万吨，钢

〔1〕 谭震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2〕 毛泽东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二日致省、地、县、社、队、小队级干部的信中，提出关于农业的六个问题，和大家商量。六个问题是：（一）包产问题。（二）密植问题。（三）节约粮食问题。（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五）机械化问题。（六）讲真话问题。毛泽东写道：“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3〕 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材仅完成二百二十七万吨，实际可供的货源只有二百零五万吨，以致第二季度按计划需分配的钢材缺口达四十五万吨。会议讨论决定：（一）本年度的钢铁生产应按照实际可能，采取具体措施。（二）基本建设和生产计划有些部分需要削减。（三）注意春荒问题。会议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提出一九五九年钢铁生产的可靠指标和争取指标，进一步提出可靠数量的钢材分配方案，如钢材分配数量减少了，如何保证生产、市场和维修的需要，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三十日，在会上发言说：要分几类定下来，不要再摇摇摆摆靠推算吃饭了；北戴河会议以后，吃亏就在推算，而且推算还不完全。我们党历来是讲实在的，不靠空气吃饭的。怎么办？一是十八个重点企业要保证完成计划。二是设备不足是关键，要快点补上去，使产量很快上去；缺得多的，要仔细研究，分别去搞。三是体制问题，不能用去年的办法解决今年的问题，必须全国“一盘棋”。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讲空话。地方也要先把任务分配好，该保证的不要留后手。冶金部就是摊子摆大了。

4月29日 上午十一时，去首都机场迎接以明尼赫·费伦茨总理为首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三十日下午，出席首都八千多群众在北京体育馆为欢迎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集会。在会上讲话，并代表首都人民献旗、献礼。

△ 下午，出席周恩来在政协礼堂举行的敬老茶话会，会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多位六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

5月1日 上午十时，在天安门城楼主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群众游行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出席大会。在大会讲话中庆祝我国人民在工农业战线和其他各条战线的伟大胜利和人民

公社化运动的伟大胜利。庆祝平定西藏反动集团叛乱的胜利，向平定西藏叛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协助平定叛乱的西藏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并警告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平定西藏叛乱是我国的内政，绝对不容许任何外国人干涉！”号召大家坚决实现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决议，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发扬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当年的工农业生产计划而奋斗。北京市五十万群众游行队伍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5月2日 下午，和周恩来、董必武、林彪、邓小平等出席中苏友好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宋庆龄在大会上讲话，并再次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

△ 下午，和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会见以费多罗夫为首的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

5月3日 上午，出席朱德主持的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的决议》、《关于决定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全权代表的决议》，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全权代表。

△ 下午，出席北京市三万多人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大会。

5月6日 下午，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

△ 晚，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字仪式及匈牙利驻华大使为匈牙利党政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5月7日 上午，和朱德、周恩来等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届体育运动大会的航空表演。

△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陪同毛泽东接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詹东·计晋美〔1〕及随行藏族官员。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先后接见云南、贵州、宁夏少数民族参观团和青年参观团、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一劳动节观礼团、出席总参三部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公安学院藏族班学员、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学员等。

5月9日 下午，会见访问苏联后顺访北京的柬埔寨金边市市长麦广等一行。

5月10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等陪同毛泽东会见人民议院主席狄克曼、第一副主席马特恩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

5月11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陈云关于工业生产问题的汇报。

△ 和邓小平等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马特恩。

5月12日 下午，出席全国政协三届常委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表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

5月16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二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西藏工委关于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草案）》。在讨论西藏民主改革问题时说：山南、日喀则、拉萨和昌都等地区的民主改革可以先搞。债务要坚决废除，先

〔1〕詹东·计晋美，时任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委。

废除。土地实行减租减息，谁种谁收。牲畜要早点确定所有权。前后藏同昌都地区不同，青海、昌都、甘南地区有个人所有制，前后藏没有个人所有制。废除差役和债务，要发文件。先搞些改革试点，组织农会，武装积极分子头脑，搞诉苦运动，诉阶级压迫之苦。政权要拿到贫苦劳动者手里。对上层人士要开展统战工作，要安置，成立政治协商委员会。先收获一季庄稼，利用秋后和明年春季搞民主改革。边打边改的方针不变。平叛的任务准备三年、争取两年完成。根据上述原则，由西藏工委讨论提出具体办法。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二十九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

△ 晚，陪同朱德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欢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阿沛·阿旺晋美及其随行官员回西藏。

5月20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谭冠三、邓少东〔1〕关于西藏情况的汇报。

5月21日 下午，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后勤工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全国烈军属和伤残、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和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大会的全体代表，以及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干部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

5月22日 上午，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从五月十八日开始，讨论决定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下午，在刘仁作总结

〔1〕 谭冠三，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邓少东，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

报告后讲话。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作风问题。去年大跃进成绩很大，但也有些不实在的地方。有些部分发展不平衡，比例有些失调；修了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水渠还没有配套；工业的新产品，未经反复试验，质量待提高；炼钢的转炉建起来了，技术还不熟练等。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需要完善调整，因此步子要放慢一些。千变万变，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能变，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但是有些人作风像风筝，像氢气球；风筝还有根线拴着，氢气球完全随风乱窜。唯物论者的工作方法就是要抓典型。市委要掌握全局的实际，就要搞若干典型，这是了解实际的“根”。（二）波浪式前进。军队打仗，一个战役后就有一段休整时期。经过大跃进后，我们在休整时期重点应放在落实上。跃进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实事求是、按总路线的精神多快好省地跃进；一种是虚报浮夸式的“跃进”。落实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坚持总路线的精神，排除主观主义，实事求是地落实，这是根本的东西。另一种是背离总路线的精神，右倾保守的落实。“虚报浮夸的跃进，右倾保守的落实，都是违背党的总路线的。”为了落实，在工厂里要召开五级干部会，开展比产量、比质量、比成本的“三比”活动；领导上要做到“三保”，即保证原材料供应，要有指挥部专门管理；保证机器的零备件和保证把不成套的、积压的设备很快投入生产。各单位要不存私心，不打埋伏，互相调剂。市里抓这些，厂里就可以放心抓质量、产量和成本了。再就是抓职工的劳动热情，改进劳动组织，改进工具，改进操作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首先要落实“三包”，把增产措施搞上去。要一块地一块地的研究产量和措施，不要轻易地给人家扣右倾保守的帽子。（三）生活问题。去年有一时期，对群众生活用品生产确有点疏忽。北京人口已近七百万，副食品不足，是个大问

题，连牙签、笊帚、发卡也供不上，群众都有反映。现市委专人组织人抓生活资料的生产，情况已有变化，但还不够。

△ 下午，周恩来到彭真处商谈问题。

△ 下午六时二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 中共北京市委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和《关于当前工业基本建设情况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汇总的情况是：全市今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为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百六十八，超额完成了产值计划。但是，八十种国家主要产品中，有四十五种未完成计划，包括矿山设备、轧钢设备、电站设备、排灌机械和机车车辆。特别是国家按计划分配的原料、材料不能及时满足。第一季度钢材只到货百分之四十九，轴承只能满足百分之五十五；由于原棉不足，五六两月棉布和针织品比第一季度产量降低百分之十以上。工业战线“第二季度原材料不足的问题，涉及的面更大”。市委决定，发动群众，挖掘潜在的物资力量，在市计委主持下，组织各厂矿企业交换、调剂，并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把能用的土铁、土钢设法利用起来。基建方面，除已将开工的六十五个地方项目停了三十六个外，“当前必须把战线更加缩短，力量更加集中，才能打歼灭战而不打消耗战，达到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设的目的”。

5月2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三十次会议。会议听取并研究了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汇报的北京市场供应问题。会议决定：（一）工业生产计划落实以后，应把工作重点转向市场和农业。（二）同意召开大城市的蔬菜、养猪、养鸡鸭的三个专业会议。（三）国庆节前，要压缩在北京召开的会议。陈云等出席会议。这个会议一个重要起因是，五月二

十一日，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办公厅五月十九日编印的简报第四十一期登载的《目前市场的一些情况》作出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阅，请书记处召集北京市委，对市场供应问题，讨论一次如何？”当日，邓小平即批示杨尚昆阅转彭真：“此事请告市委研究一下。请尚昆通知于后天（星期六）上午九时讨论（已告先念准备一下）。”北京市委办公厅的材料反映，目前蔬菜上市量和品种都不能满足需要，购买蔬菜排队情况严重；糕点、国药、日用百货等方面，也都品种不全，货源紧张。

△ 和刘少奇同谢富治谈政法工作报告的起草问题。说：大跃进中凡是按照法律办事的，错误不大；不按照法律办事的，错误就大。河北徐水县的主要领导人搞了两千多人的劳教，就是没有人管他。要抓典型，通报一下。

5月24日 去沈阳视察钢铁生产情况，随行的有孙志远〔1〕、徐达本、刘仁、吴冷西等。

△ 听取黄火青、杨春圃、杨士杰〔2〕等汇报鞍山钢铁公司的生产情况。汇报说：鞍钢一九五八年原计划年产钢三百八十万吨。八月“大跃进”，指标提高到四百五十万吨，占全国钢总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的百分之四十二。年终只完成好钢三百九十四万吨，虽比上年度增产百分之三十五强，但完不成“跃进”指标，评不上红旗。中共鞍山市委和企业领导作检讨，十八万职工政治上抬不起头，经济上得不到奖金，反映说评比不公道。加上在批判一长制、“拔白旗”运动中，界限不清，

〔1〕 孙志远，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杨春圃，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士杰，时任中共辽宁省省委常委、鞍山市委书记。

破立不当，以致行政领导削弱，连三月底上海会议〔1〕规定的今年产钢指标五百六十万吨指标，省委至今尚未下达等。听完汇报后首先说：“鞍钢十八万职工说评比不公道，这是一件大事。”并讲了以下意见：（一）跃进有两种，实事求是的跃进和虚报浮夸的“跃进”。落实也有两种，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条件统一的落实和右倾保守的落实。政治挂帅是在客观条件基础上，加上鼓足干劲。真理超过了限度，就成了谬误。（二）在某个时期，突击一下是必要的，但正常情况下不能老靠突击。当前，人、机器、矿井都很疲劳，要进一步跃进，一要让劳动者休息好，二要把设备准备好，维修好。工人每天干十小时不行。领导要抓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目前任务和生产准备，要有全面安排。（三）要尽快把今年的指标定下来，落实指标可以低一点，但是不要泄气。只要士气饱满，过些天，产量还会上去。生产计划要让干部和群众讨论，发动大家提出赶超的措施，使大家有产可超，无非是多发点奖金。计件工资取消了，计划指标高，职工得不到奖金，就会泄光大家的干劲。（四）人要有精、气、神。领导要在复杂的现象中，找出结合点，鼓足干劲，指标恰当，留有余地，实事求是地落实，就不能说是右倾保守。

5月28日 到鞍山市。听取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及公司负责人的汇报，并讲了以下意见：（一）要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估计鞍钢的成绩和缺点。鞍钢去年产钢四百零七万吨，其中好钢三百九十四万吨。在全国钢的总产量中，几乎占半边天。大家努力了一年，不肯定成绩怎么行？毛主席说，为什么不给鞍

〔1〕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钢红旗？对鞍钢要说几句公道话。（二）关于改革一长制。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改变领导体制是一个过程。有人说，党委领导会妨碍工作。党委领导主要是决定大政方针。群众路线是我们的根本路线。要总结一年来“三结合”的经验。鞍钢有一批地（专）级干部，大家作风不完全一样，认识一致，指挥就如如意了。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事情就好办。（三）规章制度的破和立问题。要破的是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不是鞍钢全部的规章制度。要认真分析，凡是破得对的，要肯定下来；没有宣布破除、但松懈了的规章制度，合适的要抓紧执行；破而未立的，在新规章制度未立之前，要在旧的基础上修改试行。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一样，都是按劳分配的形式。全公司四十三个单位，有十三个单位取消了计件工资，应加以研究。原则是政治挂帅和物质利益相结合。因技术提高、工具改进，原有的定额很不合理的，可以调整后继续实行计件工资。高炉利用系数，不能无限度地提高。既要跃进，又不能冒险。（四）贯彻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拔白旗”，打击面容易宽，使知识分子惶恐。除了右派外，要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自己人，帮助他们好好改造。（五）生产指标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既不应右倾保守，又不能经过努力完不成。鞍钢五月份日产钢一万四千吨，年度指标由五百六十万吨改为五百二十万吨，超过这个指标，就算超产。指标多点点问题不大，关键是气不可泄。大家思想一致了，指标一定，哪些该做，哪些该“革”，哪些该立，哪些该破，开出单子来。大家脑子热的时候，领导要冷静。

6月1日 参加鞍钢干部座谈会。会议由杨克冰〔1〕主持。

〔1〕 杨克冰，时任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处书记。

在与会干部发言过程中，几次插话。在讲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插话说：去年全国钢的产量，比张之洞、蒋介石加日本鬼子时代产钢最高年份的总和还要多，成绩很大，鞍钢有什么抬不起头呢！至于定的任务重了，是中央调整的问题，是总结经验问题。在谈到全市贯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时，插话说：这是个根本问题。我们对一长制不是全面否定，而是一面要党委领导，一面要厂长负责，而且要负责得更好。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我不主张用批斗的办法，但思想必须闹清楚。当杨克冰宣布鞍钢今年的生产指标：确保五百二十万吨，力争五百三十万吨时，插话说：要订一个实事求是、能落实的指标，既要充分利用客观条件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留有余地。鞍钢应学习别厂的经验，还应总结自己的先进经验。要注意质量。大企业一方面要不断改进，一方面要稳当，要有预见。关键是生产跃进上去后，各方面要有准备，不然就会被动。还向大家提出：北京天安门工程所需的钢材，给了你们很大的压力。希望你们以总路线精神来完成为建国十周年的纪念工程所承担的光荣任务。

6月2日 在鞍山市党员干部会上讲话。要点是：（一）全国的形势。去年是很大的跃进，人民公社建立，钢铁翻番，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以及生产关系上，都是个很大的跃进。搞革命不是绘图画，这么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出点事是难免的。在大跃进中连我们自己脑子也有点发胀。结果摊子铺得很大。粮食多了，敞开肚子吃饭。三个月吃了一年的粮食。所以，现在要提倡增产节约，要好好总结经验。（二）鞍钢去年生产的好钢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成绩很大。但是，中央原定的指标是四百五十万吨，高了。后来中央调整了指标，完

成了四百零七万吨，这也是大跃进。当然要总结经验，把缺点、错误改掉，准备新的比去年更好的、有秩序的跃进。（三）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问题。关键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两大根本问题。大家应该一心一意地按照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原则去做，创造一套办法，这对全国很有指导意义。苏联好的经验我们就学，不好的经验我们不学。（四）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要有个过程。企业里的知识分子接触生产，接触实际比较好一点，但要放下架子，同工人打成一片。鞍钢要求知识分子参加劳动，这是促进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得更快些。有些青年知识分子从整风、反右以来，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了界限，有部分老知识分子开始转化。像鞍钢这样的企业有这么多高级干部，要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应以更高的速度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6月6日 上午，杨尚昆来电话告：邓小平五日晚右大腿摔伤骨折，已入院治疗。毛泽东指示：原定六月份召开的中央会议推迟；请周恩来、彭真九日回北京；邓小平养伤期间，中央书记处工作由彭真主持。

6月9日 到大连乘飞机，中午回到北京。

6月10日 上午，和周恩来等接见出席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的代表。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接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的文艺工作者。

6月11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三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党组六月八日《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周恩来参加会议。报告提出，上海会议制订的经济指标中，钢材、煤炭、铜、铝、木材和水泥六种主要物资不可能达到，必须调整；建议压

缩工业方面的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的二百八十亿元调整为二百四十亿元，增加农业、林业和地方交通的投资。在发言中说：报告中对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写得较清楚，供应市场的材料也增加了，但煤的产量还缺一点。并对文件的修改提出以下意见：第一，要承认上海会议规定的指标仍然偏高，有些重要的原材料不能按时、按量、按质、按品种分配，所谓有粮票领不到粮食，使生产被动。第二，要说清情况，统一认识。我们的底数就是一千三百万吨钢，二千万吨铁，以这作基础，防止各地锣齐鼓不齐，几项指标过高，其他的跟不上。既不要浮夸，又不要指标落得愈少愈好。退也要有秩序。第三，各地要在以上两个条件下，争取超产。中央企业超产的部分，三成归地方；地方企业超产的，七成归地方。地方分得的部分，用于生产设备的维修和供应市场需要。会议决定文件修改后，送刘少奇和毛泽东核定。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

△ 收阅毛泽东晨七时“倚枕”写给杨尚昆的信。信中称赞六月六日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问题的报告》“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文件”，要杨“立即发送”给在京的五位政治局常委及彭真等共三十五人，请他们“立即阅读”，并“限于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读完，并且想一想，同自己的秘书及一二个同事谈一谈”，以便十二日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会议等。

△ 收阅毛泽东阅改的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分配自留地、充分利用零星闲散土地和鼓励私人植树等四个问题的指示》稿。

6月12日 下午，和周恩来、李先念应约到毛泽东处开

会。毛泽东问李先念：市场是不是还要紧张下去？李先念说：应该说现在到了顶点了。

6月13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工农业生产 and 市场问题，决定一九五九年钢的生产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在发言中指出，大跃进中的主要问题是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抓得不够。今后七个月，就要搞好综合平衡。

6月14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宣传工作座谈会。在会上讲话说：前一时期对工农业生产形势和市场情况看不清楚，宣传方面沉默一下是必要的。现在形势明朗些了，不能再沉默，但也要渐进，不能盲目。宣传教育要实事求是，有针对性，要内外有别；对干部和群众，对朋友和敌对势力，分寸不同，总的目的是肯定总路线，肯定“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肯定五个“并举”和群众路线。这些是我们的思想阵地。要把总路线本身和执行中的问题如放开肚皮吃饭、大兵团作战等缺点区别开来，不要搞得漆黑一团。市场情况开始好转，上海估计一个月，辽宁和北京预计两个月见效。一种办法是等更好转了再宣传；另一个办法是索性放开讲，因为全世界都在议论。现在各方对跃进的怀疑主要在市场情况和农民吃饭问题上，《人民日报》可以作些对比，如办食堂后农民粮食消费的变化，六亿多人购买力提高对市场的压力。关于工业生产的指标，如年产钢一千三百万吨，铁二千万吨，钢材九百万吨，等总理在全国人大的会上讲了再报道。现在可宣传一厂一矿今年的生产指标、采取的措施，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等情况。农业方面，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的指标以后再说，但一个队、一个社、一个县采取什么增产措施和试验田的种植情

况可以宣传，大面积的推广要慎重。去年报上登的许多“卫星”，大家都有意见。有些是报纸吹的。对人民公社的宣传，报刊上“再沉默一个时期”，等八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整社结论后再报道为好。这些意见，毛主席同意后，整理成文下发或召集省级负责人开会。

6月15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黄克诚到毛泽东处，听取彭德怀关于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八个兄弟国家的情况汇报。

6月16日 上午，同杨尚昆商谈问题。

6月17日 毛泽东认为赵尔陆五月二十六日上报的《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写得很好”，批示：“除已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外，加发中央各经济部门党组和各省、市、区党委”，并请刘少奇、彭真阅后，交杨尚昆办理。赵的报告认为：当前国民经济出现一些脱节、失调现象。其原因：一是计划指标高了。钢铁指标一高，各方面都跟着高上去，使彼此依赖、互相制约的国民经济失去综合平衡。二是工业产品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有统一性，当前三者之间有畸重畸轻和重视数量而忽视品种和质量以及制造、维护和修理脱节现象，必须加以弥补。毛泽东认为文件“有相当的说服力”。

6月18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谭震林汇报山东济宁专区的春荒〔1〕情况。发言说：（一）济宁事件党内不要互相埋怨，省委应首先承认官僚主义，下面的错误，当做经验教训。省委、地委多承担一点

〔1〕 为供应大炼钢铁和修京浦复线民工的口粮，一九五八年，中共山东省委从济宁专区计划外调粮一亿斤，使这个受灾区春荒严重，人口外流，到一九五九年五月间中央得知，才紧急处置。

责任，积极解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去年，下面的干部工作相当艰苦，上下都压他们，日子不好过。（二）山东今年麦子产量不错，群情开始安定。粮食问题，按人平均口粮四百斤安排，全省留饲料八十亿斤，种籽四十亿斤。毛主席说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山东还不是富日子，河北、苏北、皖北、河南也如此，至少是半穷日子。全省征购粮降为七十五亿斤，超产归农民，多产不多征；口粮要分到户，食堂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有这两条，群众就放心了。（三）当前，省委要抓紧秋田管理和秋收秋种，秋种搞不好，明年春荒还过不了。至少要抓三个月。现人畜都很弱，抓煤和铁的劳力要减少些，或帮他们搞机械化。（四）领导讲话要注意前后连贯。去年我们对工业、农业、教育等方面讲的话，下面是照着办的，现在你批评下面，话讲得不连贯，关系到中央、省委同下面干部的关系。像“拔白旗”问题，我们自己概念就不清，能怪下面吗？大跃进中书记处在一些问题上批的文件、讲的话，也偏到一面，我们要对全党全民负责。如鞍钢四百五十万吨钢的任务，是我们给的，人家本来就完不成。不要着急批评消极方面，要着重从积极方面去解决。（五）小平同志说明年就按九百万吨钢材、一千三百万吨钢预作安排。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中央书记处都要千方百计鼓足干劲抓生产。

△ 和陆定一等到周恩来处开会，谈钢铁生产问题。

△ 晚，同陆定一等商谈报刊宣传问题。

6月20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报刊宣传问题。

△ 晚，和胡乔木、吴冷西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报刊宣传的情况。汇报后，毛泽东同彭真单独谈话。次日

零时三十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

6月21日 晚十二时，和周恩来等到刘少奇处开会。会议同意毛泽东当日下午从郑州打来的电话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决定杨尚昆二十三日先去庐山做准备。

6月23日 上午十时，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向中央机关干部作当前形势报告的内容和分寸问题。发言说：现在国内外议论纷纷，中央不讲不好。总理的报告是面向国内国外、党内党外的，可讲当前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的解决过程和具体的措施。总理一讲，人家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方向就基本上清楚了。整个经验的总结，要等问题解决得差不多时再讲，至少要到秋后至明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为宜。去年大家脑子发胀，现在有一部分人又看黑暗面多了一点。再过几个月，舆论全面点了，再作结论。这一段工作，总的说缺点还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路线、“两条腿走路”和几个“并举”的方针等都是正确的。此外，去年党内纪律有点松弛，未经中央同意的事，有的同志在外地讲话口径不一。现在应该抓一下政治纪律。对中央同志在外地的讲话，报纸、新华社发稿前，一定要经本人审阅。在谈到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工作时说：外宾除原计划三千五百人以外，尽量少请。

△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张霖之关于当前煤炭生产问题的汇报；讨论并基本通过《中央高级党校关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

6月25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工农业生产的增产措施和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情况等问题。讲话指出：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增长是促进生产的动力。郊区农业发

展要订出几年之内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利化的计划，待铁和钢超产一些后，搞点农业机械。要摸清哪些厂子生产“吃不饱”，哪些厂子产品不配套，哪些已有设备而只差一点土建的厂子，还有哪些厂子能生产农机而上级不知道，摸清情况后，组织农机生产，这是带方针性的问题。浇多少地，养多少猪和鸡，密植到什么程度较合理，要总结经验，由群众自己决定。肥料问题，要把城里的粪、护城河的泥挖干净。日用品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要，可生产点高质量的产品。生产计划要有两个数，一是确保数，二是最大可能完成数。农村食堂，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管理人员由社员选举，三分之二通过。总之要有一个自由的空气。

6月26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会议听取全国总工会党组汇报，讨论工会工作。讲话指出：（一）工会是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工厂里，行政管理由厂长负责，是自上而下的；工会是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响应党的号召，两者是党委的左右手。过去有的工会领导人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与党分庭抗礼。（二）当前工会工作的重点是按中央“六·一”和“六·一三”指示〔1〕的精神，鼓足干劲，超额完成本企业今年的生产任务，并实现精减职工一千万。这是一项经济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这一千万人是近两年从农村召之即来，现在不能挥之即去，应作为一件大的政治任务来处理。要

〔1〕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九年六月一日发出的《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和中共中央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发出的《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

向工人说明，近两年，我们增加了二千八百万城市人口，农村提供不了那么多商品粮，造成市场供应很紧张，影响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工会应及时向党组织反映工人的情况和要求。

(三) 关于县工会的问题。去年有人从理论上探讨工会消亡问题，这是“浪漫主义”，未经中央通过的。县级工会，凡有国营厂矿的必须成立；没有国营厂矿的县内，店员、教员等是否成立工会，由当地党委请示上级决定；手工业和公社厂矿是集体经济，不成立工会。有关的理论问题待进一步讨论。最后强调：中央在庐山开会期间，我们在这里主要抓生产。

6月27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情况的汇报。

△ 和谭震林、陆定一、习仲勋〔1〕去周恩来处谈工作。刘少奇、周恩来当日离开北京去庐山。

6月29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三十八次会议。会议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集国家经委、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安排落实一千三百万吨钢的生产问题。据国家经委综合汇报，上半年仅完成调整后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其余百分之六十要在下半年完成，因此当前亟须加紧调整比例，加强生产调度。在讲话中说：（一）年产钢一千三百万吨的新任务是政治局讨论决定的。事实说明去年钢产量的跃进是可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现在出现的不平衡，又告诉我们跃进有个限度。这使我们对工业生产的跃进摸到了边。各部门有意见可以讲，但不要埋怨，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一心一意为一千三百万吨钢奋斗。如果统帅部军心混乱，就会使大家泄气。这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二）落实钢的生产指标要建立

〔1〕 习仲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

在运输、木材、电力、化工等各部门的工作基础上，各部门最近要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不要议论太多。经委和计委负责解决结合部的问题。包钢、太钢搞上去，出的好铁给一机部。（三）要抓紧第三季度的工作，产量、质量、生产秩序要全面抓紧，事关全年计划的完成，也使明年第一季度工作不至于被动。（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节约原材料，减少煤耗，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五）减少城市人口，九月底减掉一千万，可能要求过急，中央直属企业要考虑到明年一季度劳动力的需要后再减，省以下企业由他们自己考虑。（六）各部门要调查以下项目：有多少积压的半成品；基建的“烂泥头”项目有多少；有哪些未利用的设备和“吃不饱”的生产单位，摸清实底，挖掘潜力。讲话最后强调：各单位作总结、写文章要肯定去年大跃进的成绩，但有一二个指头需要修理，不要看大了缺点，再翻一个筋斗。

7月2日—8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

7月2日 晚，接杨尚昆从庐山来电话，得知下午毛泽东召集开会，决定讨论十九个问题，其中十四个问题是毛泽东在汉口时提出的〔1〕，上山后，又增加了五个问题，即：（一）团

〔1〕 十四个问题即：（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党的政策》三本书。（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

结问题（中央至县级）。（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会议先开几天座谈会，然后再开二三天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7月3日 下午五时，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中缅边界问题。

7月6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三十九次会议，听取安子文汇报农村调查的情况。讲话说：大跃进后，党组织抓了生产任务，放松了党的建设，以致党不管党，团不管团。去年放“卫星”的县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基层干部“毛病中很大一部分我们也有责任，但各有各的账”。现在还是要把群众的干劲鼓起来，头脑要冷静，但不要泼冷水。调查材料要整理成简报，送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参阅。

7月7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四十次会议，听取李立三关于工业管理和牛佩琮〔1〕关于夏粮征购问题的汇报。讲话指出：去年工矿企业中破“一长制”的问题，目的是发动群众，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因为许多旧的规章制度是和“一长制”联系着的，它妨碍了群众路线，束缚了生产力；绝大多数破是对的，有一小部分破错了，破过了，新的建设未赶上，没有及时的立。破有它的积极面，不破不可能有去年的成绩。当然，浮夸之风是不好的。但不能说“一半以上是破乱了”。夏征任务，上面分配的任务数，下面顶牛问题尚未解决。还是实事求是地先核实产量，有些产量吹得高的地方，承认事实后，适当地核减一些任务。总之，要把群众路线、群

〔1〕牛佩琮，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

众观点和完成国家任务统一起来。过去习惯吃麦子的地区，留粮标准要适当照顾。购粮任务完成后，其余的粮食由生产单位处理，也可以进初级市场。油料也要给群众留一点，我们要行“王道”，不要搞“霸道”。此事要和先念同志商量，召开一次电话会议。

7月10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四十一次会议，主要讨论民政工作问题。听完钱瑛〔1〕汇报后说：（一）优抚工作要起草一个条例，和全国总工会、劳动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财政部等商定。其中阵亡、因公牺牲、病故要加以区分；优抚费用不得挪用。特大灾荒由中央拨款救济，春荒、夏荒先由地方管，灾情大的由中央管。（二）民政机构县以上可以设立，机构规模本着短小精干原则，按工作需要定编，公社以下要有人管，专职或兼职由地方定。民政部已有的福利事业可继续办，新的不再办。

7月11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四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王磊关于商业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并讨论关于商业体制、农村集市贸易、扩大计划收购、农产品收购与加强重点工矿副食品、日用消费品的供应等问题。讲话指出：（一）商业体制过去统得太死，去年下放是必要的，但毛病是放得多了一点。最近，中央提出要收“四权”，不是所有的都收回，是有限度的。工权指批准办工厂之权；人权是用工之权；商权、财权是指国家管理的物资，并不是所有的商品流通权。毛主席说，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是因为半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和农民的自留地都生产部分商品（自留地的产品没有剥削，不是资本主义），他们的交换都是商品交换，国家包不了，也统

〔1〕 钱瑛，时任内务部部长。

不了，所以商权不要收过了头，不然又要放。只能集中国家必需的、可能的、管得了的物资。公社一级的供销部门，作为群众力量，国家可以委托他们收购统购物资，给手续费，其余的由他们自负盈亏。（二）既有商品经济，就要研究价格政策。（三）初级市场肯定需要搞，但小商贩要严格控制，这个口子一开，会影响农民、工人当商贩，会滋生资本主义。（四）统购指标不能定得过高，要使下面有超过的可能，完成任务后的统购物资，可进入农贸市场。此外，还可以生产一点优质优价的高档商品，以弥补长期配给的被动局面。总之，“要千方百计增加生产，千方百计刺激生产，通盘考虑商业问题”。最后申明：以上所说不是结论，体制问题、初级市场问题，你们形成文字后送庐山会议，请中央政治局决定。

7月13日 在北京市工业企业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松劲情绪和右倾保守思想是当前威胁我们更好地完成全年任务的主要危险。

△ 晚十时三十分，收阅胡绩伟〔1〕送审的《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发表的题为《祝贺伊拉克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社论稿。

7月14日 晚，接听杨尚昆从庐山来的电话，得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纪要》十二个部分已全部讨论完毕。

△ 彭德怀在庐山给毛泽东写信。十六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题目，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7月16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四十三次

〔1〕 胡绩伟，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会议。会议听取宋乃德^{〔1〕}汇报轻工业部的工作情况，并就与轻工业、商业及农业部等有关的问题进行讨论。在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同农民的关系，所有制解决了，还有粮食征购指标、商品价格政策和干部作风上的强迫命令三个问题。关于价格政策，农业、轻工业、商业各部要专门搞一些文件，经委和计委也应研究，书记处应讨论一次。季节性生产的東西如松香、药材等要督促采集，林业、农业、轻工业、商业等部门应供给材料，由新华社或《人民日报》写短评或社论促进。佳木斯造纸厂浪费纸浆，如不尽快克服，可登报批评。为了增加农田肥料，小型的榨油作坊、烧酒的“烧锅”，都应搬到乡下或县城去，出口的油厂、酒厂也应放在产地，并指定王光伟^{〔2〕}“挂帅”，提出方案，交中央财经小组讨论决定。烟叶种植和卷烟生产，应加强指导。轻工业需要的原材料，建议经委设一机构专管。原材料分配“一竿子”捅到底，另拨一部分归省、市作为补充，回收的废钢，如轻工业部门能用的，应利用起来，不要回炉等。

△ 上午，和罗荣桓等接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的第二批代表。

△ 上午七时，毛泽东致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信：“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三委^{〔3〕}若干副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又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

〔1〕 宋乃德，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

〔2〕 王光伟，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3〕 指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能则不要来。此点亦请酌。”

7月17日 乘飞机抵达庐山。

7月18日 下午五时，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听取周向刚从北京来的人员报告庐山会议的情况和问题。

7月19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周恩来参加会议。

△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小组讨论杨尚昆、胡乔木等主持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和毛泽东批示讨论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下午，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

7月20日 和周恩来、李富春、胡乔木听杨尚昆谈昨夜毛泽东听取杨汇报后谈话的情形。

△ 和周恩来、李富春、杨尚昆就计划部门的工作交换意见。

△ 晚，出席周恩来召集的有三十二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煤炭供应不足的问题。

7月21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钢材、木材、煤炭的生产情况的汇报。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当前生产和计划安排问题。会议开至晚十一时。

△ 晚十一时后，参加听取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直至次日凌晨三时。

7月22日 上午、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中的第一部分：“形势和任务”，当晚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后印发。周恩来在会上就关于手工业、基本建设、运输、财政、金融和粮食工作的布置形成的三个文件的主要内容作了说明。

7月2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毛泽东作长篇讲话。此后，会议集中批判彭德怀等。

△ 下午，同杨尚昆谈《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的修改问题。晚，和杨尚昆同胡乔木谈话。

7月24日 晚，和杨尚昆商量在会上批判的范围不要扯开去，要保护“秀才”。杨尚昆把保护“秀才”的建议向刘少奇、周恩来汇报后，于二十五日上午，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评“秀才”们方向有些不对头，要夹着尾巴做人。说：过两天，我会在会上打招呼，对“秀才”挂免战牌。

7月25日 下午，毛泽东约彭真、柯庆施、李井泉、林铁、张德生、陶铸、王任重、欧阳钦谈话长达四个多小时。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

△ 晚，同杨尚昆、胡乔木商谈《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三稿）》中“形势与任务”部分的修改意见。

7月27日 上午十时三十分至下午三时二十分，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谈话。

7月28日 上午，和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晚，到毛泽东处谈话。

7月29日 上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贺

龙、罗瑞卿、李井泉、张德生、陶铸、林铁、欧阳钦、曾希圣〔1〕、王任重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问题。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宣布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准备讨论两个问题：（一）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二）总路线问题。并要大家开门见山地提意见，不要外交辞令。

7月30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当前工农业生产问题。

△ 在中共辽宁省委就鞍山钢铁公司关于超产提成应按中央工作组六月十三日的许诺办理致黄火青的电报上批示：“我觉得中央六月十三日指示已讲过。应按全国一千三百万吨钢的落实口径办。鞍钢按五百二十五万吨钢的指标办才好。”

7月31日、8月1日 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彭德怀、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2〕。在这两天的会上，毛泽东说他与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是三七开。彭德怀不同意，说是对半开。林彪即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泽东说：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又说：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7月31日 下午五时余，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六时

〔1〕 曾希圣，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2〕 周小舟，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惠，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锐，毛泽东兼职秘书，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起，李井泉、张德生、林铁、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曾希圣参加会议。

8月1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就手工业、财政金融、粮食、基建、运输等工作，通过三个文件〔1〕。当晚，周恩来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作报告后，致函毛泽东报送这三个文件的草案，请审阅批复；并附送七月三十一日经周恩来审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切实抓紧和妥善安排今后五个月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运输的决定》稿。

△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简报上半年生产情况。简报说：在继续贯彻执行总路线的精神下，北京市工农业生产继续保持了高速度的发展。工业总产值较去年同期提高了一点三倍，钢增长百分之五百三十一，棉纱增长百分之六十一；农业总产量同比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点八，小麦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在全国的支援下，市场供应情况，有了改善。但肉食供应平均每人每月新秤四两，标准仍然较低，今后会逐步改善。市委认为：“只要提高思想，鼓足干劲，不在困难面前低头，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大跃进是能够继续实现的。”

8月2日—16日 出席在庐山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进一步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1〕 指中共中央《关于当前财政金融工作方面的几项决定》（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粮食工作的指示》（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和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指示》（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

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1〕。全会还检查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搞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精神，调整降低了当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规定钢产量为一千二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五千五百亿斤。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认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十六日，全会通过《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全会建议国务院提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意见，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8月3日 毛泽东致函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杨尚昆和各组组长〔2〕：在会议简报上的称呼不妥当，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如同意，请各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请尚昆告简报编者，一律从四日起照此改正。”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夏 入夏以来，广东、河北、辽宁、吉林、内蒙古等省区暴雨集中，洪涝成灾；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江西等省则干旱严重。八月初，潮白河流域发生特大暴

〔1〕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 指当时在庐山会议上所编的各组组长。

雨，施工中的密云水库有漫坝危险。北京市郊周口店日暴雨量达二百毫米。京郊受灾面积达二百二十万亩，市区副食品供应紧张。

8月4日 晚十一时二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话。

8月6日 晚十一时，毛泽东同彭真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编组问题。决定将六个小组改编为三个临时小组，即：第二组，组长柯庆施，代组长曾希圣，副组长廖鲁言；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每个组五十余人。张闻天、周小舟在第二组，彭德怀在第四组，黄克诚在第五组。从八月七日起，小组会议按临时小组的编组进行。

8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决定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展开抗灾斗争的紧急指示》。该紧急指示于十三日发出。

△ 收到毛泽东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该指示于当日发出。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8月8日 收到毛泽东批示印发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草案的第四稿，分发范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彭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和出席会议的七大区组组长及曾希圣。

8月9日 中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杨尚昆陪同毛泽东会见本日到达庐山的胡志明，并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谈话。

8月10日 到周恩来处讨论关于彭德怀问题的决议草稿。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到毛泽东处开会。

△ 晚九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到毛泽东处开会。

8月11日 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稿。毛泽东作个别文字修改后，批示：“送彭真同志即办。”通知说，为了传达讨论和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其他决议，中央决定八月十八日起在北京召集军委扩大会议。

8月12日 上午，和谭政、萧华到毛泽东处，商谈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问题。

△ 晚，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商讨十三日召开中央全会的安排。

8月13日—15日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连续举行全体会议。十三日，张闻天、彭德怀作检讨。十四日，黄克诚作检讨。十五日上午，彭德怀、黄克诚再次作检讨；下午，张闻天再次作检讨，周小舟作检讨。

8月13日 晚，和周恩来等同李锐谈话。

△ 晚十时三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草案）》。

8月14日 晚十一时，和刘少奇、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商谈问题。

8月15日 晚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一时许，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谈当日大会情况和十六日会议安排问题。

8月16日 晨，收到毛泽东五时核定的《中国共产党八

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稿和批示：“即刻照此印发。其他三个决议〔1〕，一个会议公报，请你督促即行做最后一次修改，务于明（十七日）下午发给各同志，以便十八日各同志动身回去时能带回去照办。”

8月17日 晨四时，毛泽东批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胡乔木“即刻看一下”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稿，“如同意我的那一些修改，即刻付印”，以便与会者“明日带回去”。

△ 上午，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人事安排问题；布置庐山会议结束后的工作。下午继续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改由毛泽东主持。在下午的会上，传

〔1〕 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人事安排的意见〔1〕。意见传达后，毛泽东作大会讲话。

△ 中午，应约到毛泽东处谈话。

△ 晚，和汪锋、张国华、徐冰到毛泽东处谈西藏问题。谈话结束后，又同谭震林、杨尚昆约张平化、周惠、李瑞山〔2〕等谈话。

8月18日 晚，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8月19日 回到北京。

8月20日 上午九时，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传达问题。周恩来参加会议。

8月21日 下午，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副处长以上干部和国家机关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在

〔1〕 彭真传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人事安排的意见是：第一，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第二，撤销黄克诚的中央军委委员、秘书长、总参谋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第三，林彪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贺龙任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任中央军委第三副主席；第四，罗瑞卿任中央军委委员、秘书长、总参谋长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第五，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其工作由中央另行分配；第六，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第七，调张平化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决定华国锋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第八，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部，任命陈正人为部长，黎玉、沈鸿为副部长；第九，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资供应部，人事问题待定；第十，免去罗瑞卿的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和公安部部长职务；第十一，调谢富治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和公安部部长；第十二，调阎红彦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2〕 李瑞山，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传达庐山会议情况后也讲了话。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聂荣臻会见胡志明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武元甲。

8月22日 晚九时，和陈毅、聂荣臻、王稼祥、胡乔木到刘少奇处开会。

8月23日 上午，和王稼祥会见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介绍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情况，并回答问题。会见后，应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的要求，单独会见并回答了关于我国人民公社情况等问题。

△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四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冶金工业部和煤炭工业部的汇报，讨论钢铁、煤炭生产等问题。在讲话中提出：为完成今年一千二百万吨好钢的任务，由经委召集有关部门研究落实，需要解决的问题，请示国务院。完成时间最好安排在十二月十五日、二十六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增产节约决议公布后，应组织各方面响应。建国十周年展览和纪念文章，由中央宣传部检查落实。

8月24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

△ 出席刘少奇召集的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七次会议。周恩来报告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提出继续鼓足干劲、反对右倾保守、厉行增产节约的任务。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情况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刘少奇通报了一九五九年生产指标调低的原因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有关情况。

8月26日 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

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并通过相应决议。会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农业机械部，任命陈正人为部长。

8月27日 晚九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贺龙、陈毅、罗瑞卿出席下午五时许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八月十九日开始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

8月28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四十六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在八月二十四日写给刘少奇的信中提出的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子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的建议。

△ 下午，会见前来北京市政府辞行的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应对方要求，简要介绍了我国当前情况。

8月29日 上午十一时余，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贺龙、陈毅、罗瑞卿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8月29日、31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四十七次和第一百四十八次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周恩来参加了二十九日的会议。在听取汪锋和张国华的汇报后，发言说：西藏叛乱基本平定，现群情高涨，迫切要求改革，形势很好。（一）西藏的改革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阶段，一定要划清。从群众的觉悟出发，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的重要思想。每个阶段中，工作步骤是先点后面，地区上先山南，后后藏；先农区后牧区；先叛区后一般地区。（二）对贵族和僧官的赎买问题。土地折价收买，要清产自报，按质论价，原则上不要多给钱。得钱的是少数人。贵族欠国家的债务要算清，有的可在赎买金中扣除，还不起的，记下账，一定时期宣布废除。上层的爱国分子，以团结为主，但有斗争。早些赎买，有利于团结他们，增加其威望，消除不安。（三）寺庙应废除剥削，取消特权，实行民主管理。老、弱、病的喇嘛，

给开支，不能解决时，给以帮助；壮年喇嘛自食其力；还俗、出家自由。勾结叛匪的，查清后宽大处理。（四）宗教改革是复杂问题，涉及其他宗教和邻国。宗教改革和民主政策，不登报宣传，埋头干。（五）牧区面积很大，干部不足。为了保护牲畜，先规定叛乱分子的牲畜归牧民所有，谁牧谁管，畜产品归牧民，管理好的给奖励。以奖为主，个别坏的惩处。其他的先不许愿，工作队去后再研究分配。（六）斗争方式。对所有拥护党和政府，拥护改革的贵族、僧官和农牧主，由农奴背对背诉苦。他们认错后，坚决保护。中间的，当面认错后，保护过关。杀人要报中央研究。（七）藏民的枪支问题。藏民有了枪就坚强起来，但要掌握在真正的积极分子手里。（八）要培养藏族干部，只要忠实于革命的，不要要求过高。会议还讨论了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

9月1日、3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贺龙、陈毅、罗瑞卿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两次会议。

9月1日 晚十一时，和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熊复、邓力群〔1〕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

9月2日 下午三时，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四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提议的特赦一批战争罪犯和摘掉一批右派分子帽子的问题及相关的文件稿。关于学衔问题，会议决定不搞。

9月5日 上午十一时，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五十次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有关特赦一批战争罪犯和摘掉一批右派分子帽子的文件稿。

〔1〕熊复，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邓力群，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9月6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贺龙、陈毅、罗瑞卿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9月7日 约集王稼祥、刘澜涛、杨尚昆、廖承志〔1〕等开会，讨论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安排问题。

△ 晚十一时四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罗瑞卿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三时四十分。

△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书面报告：八月份工业总产值超过计划百分之十五点二，比七月份提高百分之十九。钢和钢材的产量都创造了今年的最高纪录。但是，五月以后，右倾保守思想从各种渠道吹来，以致从五月下旬到七月初，生产出现了下降局面。“目前，有些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人，慑于八中全会的威力和群众的声势，消声敛迹，缩了回去。”市委准备在九月五日全会扩大会议以后，“进一步在党员干部中揭发和批判右倾思想。同时还要防止在取得了重大成绩以后出现新的自满松劲情绪。”

9月8日 下午三时，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张国华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汇报，原则同意中共西藏工委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方案的报告和张国华、谭冠三、汪锋关于西藏民主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会议还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等文件。

9月9日 陪同毛泽东视察人民大会堂工程。该工程于八月底竣工，建筑面积十七万一千八百平方米，占地十五公顷，

〔1〕 廖承志，时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工期历时仅十个月。

△ 晚，和周恩来等出席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潘切夫斯基为庆祝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 晚八时，约集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潘琪〔1〕等商谈短途运输问题。

9月10日 上午十一时，和周恩来、陈毅、贺龙出席朱德召集的会议。

△ 晚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罗瑞卿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三十分。

9月10日—17日 出席北京市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十日上午，主持大会开幕式。十七日，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讲话。在列举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全国和首都的生产、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成就后指出：和旧社会比，我们的生活虽然提高了，但是还是比较贫苦的，全国六亿多人口，有五亿多人专门搞农业，为了糊口，为了穿衣，这是因为我们工业不够发达，没有钢铁，农业主要还靠手工。假如一亿人搞吃的穿的，五亿多人搞别的，那我们的生活就要比现在好了。所以，要改善生活，就得发展工业；就要搞原材料工业，要搞钢铁、煤炭、机器工业等各种加工工业。联系到北京的市政建设存在的问题时说：居民的住房，一半以上过了“年龄”，很多房子下雨就漏水；公共交通，无论电车、公共汽车，还不能满足需要；很多学校还是二部制，儿童课余又没有足够的活动场所；特别是为了修建国庆十周年的一批工程，拆民房比较急，一部分人没有安置好，或搬迁后使职工上班、学生上学不方便，我们向他们赔个不是，道个歉，请代表们转达。讲到特赦一批罪犯问题时说：

〔1〕 潘琪，时任交通部副部长。

新中国建立已十年，在群众的政治觉悟、组织程度、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都提高的条件下，特赦一批真正改造好的刑事罪犯，对一部分在押刑事犯减刑，有利于对他们的改造，也使犯人的家属增加信心和希望，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有好处。

9月13日 上午十时前，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短途运输问题。

△ 上午十一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陈毅、王稼祥、安子文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答复苏共中央来信的问题。

△ 主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八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批准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完全同意中国政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方针，希望印度方面能够迅速撤出入侵的地点，停止反华煽动，同中国开始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友好谈判。会议还通过了庆祝建国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组成名单，彭真为主任。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陈毅等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9月14日 下午，去机场迎接应邀来访的瑞典共产党主席希尔宁·哈格堡夫妇。

△ 晚十时至次日凌晨一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罗瑞卿、杨成武〔1〕、徐冰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召开各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等问题。

△ 毛泽东收阅九月十一日中共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的

〔1〕 杨成武，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报告〔1〕后，批示彭真：用中央名义复电甘肃省委，“指出省委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十七日，中共中央复电甘肃省委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9月15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邀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文教界人士七十八人参加的座谈会。毛泽东就反右倾、特赦战犯、为部分右派分子摘帽子等问题发表讲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出席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正式宣布，在党外人士中不搞反右倾运动。

9月16日 晚七时三十分，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向下传达和讨论处理各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集团的方针和具体意见。十七日，会议继续讨论。

9月17日 下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九月十四日代表中共中央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关于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书面建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发布《中华

〔1〕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说：目前全省秋田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迅速。报告强调要进一步在收、管、用等方面加强工作，防止浪费，真正做到“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仓，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1〕；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

△ 晚，审阅《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发表的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稿。

9月18日 上午十一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到毛泽东处开会。

△ 晚，听杨尚昆谈宋致和〔2〕汇报的中共河南省委扩大会议的情况。

9月21日 下午，到机场欢迎参加我建国十周年庆典的、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何塞·冈萨雷斯为首的智利共产党代表团。

9月22日 下午三时，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五十三次会议，讨论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品陈列问题。周恩来、贺龙、康生、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等参加会议。在发言中说：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的展览内容，要政治挂帅，突出毛泽东思想，以党的历史为框架，体现毛主席《〈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法宝”的思想内容。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各个方面军、各个根据地、解放区、蒋管区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各方面的贡献都要摆得恰当，搞不好，影响党内团结。革命博物馆先内

〔1〕 特赦令发布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首批释放在押的战争罪犯三十三名，其中原属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三十名，原属伪满洲国的二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一名。各省、市、自治区第一批特赦的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共一万二千零八十三名；由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及由无期徒刑减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共三百八十九名。

〔2〕 宋致和，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部预展，听取各方意见后再公开展出。会议决定要吸收研究党史、军史、战史的人员共同拟定革命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的展览内容，并成立领导小组，由陆定一牵头，先写出大纲，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

9月23日 上午，和杨尚昆等到机场迎接总书记兰斯·路易斯·夏基为团长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和总书记维克·威尔科克为团长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他们是来参加我建国十周年庆典的。

△ 下午三时，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当前工业生产形势和今后措施的汇报、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形势和今后工作的汇报、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下午，会议继续进行。

9月24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接见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后回国的一批留学生。

9月25日 下午，到机场迎接来华访问并参加我建国十周年庆典的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团。他们是：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古巴人民社会党、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瑞典共产党、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伊朗人民党、荷兰共产党、希腊共产党、乌拉圭共产党、瑞士劳动党、巴拉圭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厄瓜多尔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圣马力诺共产党的代表。

△ 下午，从机场返回城时，和杨尚昆去看望住在北京西郊的彭德怀。

9月26日 上午，到机场迎接来华访问并参加我建国十周年庆典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尔为团长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团。

△ 上午，和周恩来、林伯渠等前往机场迎接德国统一社

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第一副主席赫尔曼·马特恩率领的民主德国党政代表团。下午，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林彪等前往机场迎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晚，和周恩来、林彪等前往新建的北京火车站，迎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他们都是来参加我建国十周年庆典的。应我国国防部邀请的越南军事代表团和朝鲜军事代表团随同该国党政代表团同时到达北京。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中国与印度边界有关问题。

△ 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竣工。扩建后的广场面积，由原来的十一万平方米扩大为四十万平方米。

9月27日 下午，和朱德等去机场迎接来参加我建国十周年庆典的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约多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哈里·波立特率领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

△ 下午，在机场迎接来参加我建国十周年庆典的总书记赫苏斯·法利亚率领的委内瑞拉共产党代表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巴格达什率领的叙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克沙尔·忠格·腊伊马吉率领的尼泊尔共产党代表团、中央委员阿诺耳多·弗富托率领的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代表团、中央委员曹勃扬纳逊率领的冰岛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以及以色列共产党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兹维·布莱斯坦和土耳其共产党代表。

△ 晚，同周恩来等商谈国庆节外宾接待工作。

9月28日 下午一时三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陈毅、罗瑞卿到毛泽东处商谈问题。

△ 下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大会由刘少奇主持。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党政代表团和各国兄弟党代表团、亚非国家政府代表团、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八十三个国家的来宾应邀出席庆祝大会。有六十位外国代表团领导人在大会上致词。二十九日下午，大会继续举行。当天到达北京的阿富汗等国政府代表团也参加了大会。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谈话。

△ 晚，九时三十分，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见金日成和他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

9月29日 晚，和周恩来等在首都剧场观看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的演出。

9月30日 上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林伯渠等到机场迎接来参加我建国十周年庆典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等。代表团成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等已于二十七日下午抵京。

△ 上午，和朱德等在机场迎接来华访问并参加我建国十周年庆典的总书记高士为团长的印度共产党代表团。

△ 晚，出席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宴会。八十多个国家的贵宾和我国各界人士共五千人出席。

10月1日 上午十时，在天安门城楼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典。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

庆龄、董必武、林彪、邓小平等和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六十个兄弟党代表团和代表、八个亚非友好国家政府代表团和代表，以及越南、朝鲜军事代表团成员及在华的各国来宾出席庆典。七十万群众举行了游行。晚，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群众大联欢和节日焰火。

10月2日 下午五时，毛泽东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会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苏方出席的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苏联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在会谈中谈到中印边界冲突问题时，彭真说：麦克马洪线是一九一四年英国同西藏秘密签订的，很长时期英国都不敢画在他们出版的地图上。后来，英国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上也没有这条线。这是一条不光彩的线，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印度地图上也没有这条线。

△ 参加中共中央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的座谈会。

10月3日 晚，会见并宴请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萨瓦茨基和格雷克。

△ 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董必武等出席文化部为招待来参加我建国十周年庆典活动的各国来宾和国内各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音乐舞蹈京剧晚会。

10月4日 上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林伯渠等到机场送苏联党政代表团回国。

△ 下午，和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林伯渠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庆祝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十周年大会。

10月5日 上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观礼代表团、接受检阅的部队代表、参加献礼演出的军队文艺代表队和参加全运会的军队体育代表团。下午，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会见来参加我建国十周年庆典的拉丁美洲十七个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团和代表。

△ 陪同毛泽东、刘少奇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一行。

△ 同拉丁美洲兄弟党的代表座谈党的建设问题，介绍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历程。

10月6日 下午，陪同毛泽东、刘少奇会见总书记高士为团长的印度共产党代表团。

△ 晚，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招待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运动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招待会前，接见了各体育代表团负责人，以及世界乒乓球单打冠军容国团和陈镜开、穆祥雄、郑凤荣等三十多名世界纪录创造者。

10月7日 下午，陪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会见阿根廷、古巴、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海地等拉丁美洲国家的议员团、文化友好代表团和其他方面友好人士。

△ 下午五时，会见伊朗人民党代表团团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塔巴里和团员弗鲁潭。交谈中询问伊朗的社会结构，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待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基本政策。

△ 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

毅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汪戴尔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民主德国成立十周年招待会。

10月8日 上午，和周恩来等到机场先后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和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回国。

△ 陪同刘少奇会见伊拉克共产党代表团。

△ 中午，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招待参加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的各族文艺工作者，共二千三百多人。接见各剧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俞振飞、言慧珠、陈伯华、常香玉、徐玉兰〔1〕等。

△ 晚，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庆祝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和华侨大厦等十大建筑工程和密云水库拦洪工程的胜利完工。在讲话中说：各大建筑工程的胜利完成是大跃进的成果，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周恩来出席宴会。

10月10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五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冶金部、煤炭部的报告提纲中提到的庐山会议前的六七月份，生产上出现“小马鞍形”问题，认为每年第一季度产量低一点，是波浪式发展，和一九五七年反冒进时出现的马鞍形不同，中央没有动摇过。会议修改通过冶金、煤炭两部的报告提纲，送政治局常委审议。关于中央书记处向政治局常委报送简报的问题。讲话说：毛主席、少奇同志对书记处

〔1〕 俞振飞，昆剧、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京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汉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豫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越剧表演艺术家。

工作是满意的，信任的。有一点不满意，就是没有经常向他们下“毛毛雨”，不能让他们糊里糊涂签字。因而书记处要到经委、计委找几个联络员，经常送点材料，有问题带人去谈谈，把做毛主席秘书的责任担当起来。应当通风报信，不管对的或不对的。关于农业机械化和水利问题。讲话说：明年拟拨一百万吨钢，四十万吨铁，下星期专门开会议定；水利的重点省，请谭震林排队。谭震林提出，重点首先是晋、冀、鲁、豫、陕、苏、皖七省，第二是东北三省加内蒙古，把水利和机械化搞好。要抓紧建立商品粮基地。

10月11日 下午，会见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书记凡迪斯率领的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代表团。应客人要求，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还谈及台湾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等。

△ 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宋庆龄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李济深。十五日上午，参加李济深的公祭大会；李济深十月九日逝世前，曾往北京医院看望。

△ 毛泽东批示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1〕“是一个好文件”，交刘少奇、彭真阅后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参考。报告提出：要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今冬明春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10月12日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林彪、谭震林到毛泽东处商谈问题。四时三十分谈话结束后，和毛泽东等一同接见来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各民族观礼团和青年学习团。

〔1〕 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向中共中央和上海局的报告。

10月13日 上午，和刘少奇等到机场送保加利亚党政代表团和英国、葡萄牙、以色列共产党代表团离京回国。

△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五十五次会议，专门讨论工业支援农业问题。在讲话中说：成立农业机械部，毛主席的意思是这个机构专门武装人民公社，凡是农林牧副渔和农垦部门所需的机械，都归农机部研制，包括运输工具在内，所需的钢材，今年拨给五十万吨，生铁二十万吨；明年再拨一百一十万吨钢材、四十万吨生铁，由李富春挂帅去计算。农机部党组由陈正人任书记，黎玉任副书记；局长从机械部门选调，干部从工业部门调配。中央指定一个组，薄一波负责。地方的农机干部，由各地党委配齐。还说：一定要抓农业，抓轻工业和农副产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认真抓好生活和市场。要埋头去做，少吹，少宣传。

△ 晚，和刘少奇、宋庆龄、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观看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出的《吉赛尔》。

10月15日 上午，去机场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和圣马力诺共产党代表离京回国。

△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五十六次会议，讨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稿。在讲话中说：明年的计划恐怕要反复搞多次才行。国家计委党组的报告，作为中央政治局没有审定的方案发下去征求意见。主要指标如钢按一千八百万吨或二千万吨安排。希望提出问题，发现矛盾，供中央考虑。各部、委的不同意见也注上去。总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能统得过死。集中过多，那就成一条腿走路了。政治局也认为必须有些下放。农业的提法，是提“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纲”，还是提“以农业为基础”，毛主席正在考虑。粮食

指标，明年可选定六千亿斤。农村的整风，就是要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斗争比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更深入、尖锐，延伸到党内。困难在于有些人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老战友，下不了手。但他们是“同路人”，要帮助他们过社会主义关。

△ 参加毛泽东同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的谈话。

10月16日—29日 出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会议。

10月16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陈伯达到毛泽东处谈话。

10月17日 上午，和杨尚昆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

△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五十七次会议，研究书记处如何向政治局和常委“通气”即反映情况问题。讲话说：书记处的工作就是给政治局做秘书。现在毛主席感到情况摸不清，有苦闷，要解决“封锁”的问题。今年主席六十六岁，要逼得他看那么多东西，要书记处干什么？书记处成立时，小平同志提出一个“挡风”，一个“通风”。“挡风”做了，可以打三、四分；“通风”做得不很够，只能打两分。现在要想法解决“通风”问题。要当做一个政治问题来考虑。分工主管的人有问题要随时向毛主席谈。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包括中央各部委，要写报告，一方面给政治局，一方面给书记处，这是一条腿；另一条腿，书记处要发挥秘书的作用，要能看出问题，搞出材料给主席。一是提出问题，一是提供材料。主管部门要提醒，特别是各口、各部有什么争论，有什么看法、问题和意见，要使书记处、政治局了解。还要经常有人参加各部门的党组会议，了解情况。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提议：书记处成

立四人小组，由王稼祥、胡乔木、刘澜涛和杨尚昆来管这件事，请稼祥分出些时间管全面的工作，由胡乔木负责编写简报。会议决定书记处和各主管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向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反映情况和工作；书记处还要定期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和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传达政治局和书记处决定了的事项。

△ 晚，会见并宴请越南首都河内市行政委员会主席陈维兴和越南劳动党河内市委常委会委员、《首都河内报》主任阮明勤。

10月18日 出席一万七千多名“红领巾”和少年先锋队辅导员在人民大会堂的集会，庆祝北京市建立少年先锋队十周年，并讲话鼓励少年先锋队员们。

△ 到机场送荷兰共产党代表团和瑞士劳动党代表团回国。

△ 晚，和朱德、周恩来等出席刘少奇为欢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访华举行的宴会。

△ 晚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等陪同毛泽东会见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见前一小时，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王稼祥、廖承志商会见日共代表团事。

10月19日 上午，主持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座谈会。周恩来等出席会议。在会上讲了以下意见：（一）关于形势。今年四至七月，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社会上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相当猖狂。我们要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产。（二）整顿公社问题。这次是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结合整党。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党员是富裕中农，他们有的是我们的老同事、老部下，要严肃地以党的立场作标准批

判，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除了那些阶级异己、蜕化变质分子应开除出党外，其余的还要给以机会挽救。不这样做，“公社不能巩固，跃进不能，供给制也搞不好”。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条政策〔1〕，不要轻易改变。不然，农民又会三心二意。（三）指标问题。现在干部群众干劲快起来了，领导同志的头脑要冷静，不要跟着膨胀。做计划要订先进的、积极的指标；但要恰当，可以完成，力争超过。去年钢的指标降下来的经验要很好接受。明年钢的指标“还是按一千八百万吨靠得住”。粮食明年可订六千五百亿斤。毛主席讲每年增产一千亿斤就不得了。所有全国性的指标，一定要中央批准后才公布。（四）要抓农业和轻工业，事关六亿人民生活问题。因此，农、轻、重的顺序不能忽视。解决人民的生活，基础是发展生产，还要勤俭节约，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农业机械化问题，中央已决定调拨钢材一百一十万吨，由国家计委通盘安排。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罗瑞卿到毛泽东处谈话至次日凌晨二时。

10月20日 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包括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作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进攻的性质是“十年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自中央提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来，一部分富裕中农和资产阶级感到资本主义的根子被挖掉了，就要试一下和共产党较量。如不严肃批判，总路线贯彻不了，大跃进不

〔1〕指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纪要）。

能实现，人民公社不能巩固。党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团结一批评一团结；但批判要提到原则高度。这次斗争不整党外人士，不登报。

△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联合声明》的签署仪式，刘少奇和野坂参三分别代表各自的党签字。二十二日晚，出席中共中央为以野坂参三为首的日共代表团饯行的宴会。二十三日上午，和朱德等到机场为日共代表团送行。

10月21日 上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杨尚昆参加毛泽东同彭德怀的谈话。毛泽东要彭真、杨尚昆安排彭德怀的学习；要杨尚昆常去彭德怀处，每月两次。谈话结束后共进午餐。

△ 主持全国政协和北京市政协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听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和周仁山〔1〕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

10月22日 上午，和王稼祥会见巴拉圭共产党总书记克雷特。双方就党的工作交换了意见。

△ 下午，和陈叔通、程潜〔2〕、汪锋、杨静仁等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接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帕巴拉·格列朗杰和阿沛·阿旺晋美等。

10月23日 上午，出席毛泽东召集的谈国内外形势的会

〔1〕 帕巴拉·格列朗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仁山，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

〔2〕 程潜，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议。出席会议的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有陈毅、贺龙、康生、王稼祥、罗瑞卿。晚，毛泽东去外地。

△ 下午，出席文化部招待各省、市、自治区来京的十六个艺术表演团体的宴会。

10月26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林伯渠等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亦称群英会）开幕式。有六千多名代表出席大会。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

△ 晚，出席刘少奇召集的有周恩来、朱德等参加的会议，听取薄一波、李富春汇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的情况。在讨论时说：今年五六月三个月生产有所下降，反右倾以后，又有些盲目性，指标一下子都上去了。要实事求是，明年钢产量确定一千八百万吨，超产后要解决缺口问题；基本建设分两步走。要吸取去年的教训，去年大跃进，群众干劲鼓起来了，但企业管理、技术改造没跟上，所以安排计划要冷静。中央和地方都安排大了，矛盾就是从高指标这里来的，各地要交底账。农业十年实现机械化是内部口号，如仅指拖拉机是可以的，全面解决则不行。对外宣传应加以控制。明年还是提“继续跃进”，不要急于称“大跃进”。

10月27日 零时许，和刘少奇、周恩来听杨尚昆汇报二十六日下午同彭德怀谈话情况。

10月29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全国工业生产会议情况的汇报，讨论今冬明春的工业生产安排问题。

10月31日 出席刘少奇召集的研究劳动工资问题的会

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马文瑞〔1〕、王稼祥、刘宁一等。

11月1日 到机场送澳大利亚、加拿大、比利时、乌拉圭、尼泊尔等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代表团同机离开我国。

11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五十九次会议，讨论理论和文教工作。在会议批准关于理论工作的报告时讲话说：（一）同意成立理论小组，康生任组长，陈伯达任副组长。指定专人为大学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教材，为中学编写逻辑学课本，限期写出初稿。（二）毛泽东自《论十大关系》以来的讲话，由理论小组整理，交书记处看后，作为未经本人审阅的党内文件印发各地。（三）关于扫盲的文件，中央的批语中要加上生产忙时少学，闲时多学，细水长流精神。关于农业中学的文件的批语中要加上“两条腿走路”组织农民业余学习的意思。（四）农村开展两条道路斗争中的重点批判对象，文件中应规定人数限在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下或千分之五，还要写上没有重点对象的地方不要硬找，县委要严格掌握，实事求是。（五）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毛主席处谈过，要批判。由《光明日报》、《新建设》先发表文章，最后由《人民日报》定音。

△ 到机场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回国。

△ 晚，和王稼祥、胡乔木到周恩来处，研究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11月3日 中午，和周恩来、王稼祥、胡乔木等同机到达杭州。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毛泽东将杜勒斯一九五

〔1〕 马文瑞，时任劳动部部长。

八年、一九五九年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三篇讲话〔1〕连同由林克〔2〕代拟的批语发给到会人员。会议讨论了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印边界问题等。在讨论一九六〇年的生产计划时，周恩来和彭真都说：现在各地计划指标看涨，我们控制了。计划是一千八百万吨，死啃一千八。毛泽东说：死啃一千八，搞个半年再讲。到六月间时，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一千九。谈到农村整社时，彭真说：现在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对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批评得太凶。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彭真说：现在劲已经起来了，要专门讲一下方式。毛泽东说：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11月4日 下午一时，回到北京。四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作关于目前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会议基本通过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和中共中央给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的信。

11月5日 和朱德、林伯渠等接见河北省少数民族参观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参观团的全体人员。

△ 晚，出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宴会，招待出席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

〔1〕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篇讲话是：（一）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二）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的证词。（三）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

〔2〕 林克，毛泽东秘书。

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11月6日 下午，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大会上讲话。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四十二年的历史，确定无疑地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平力量必将战胜帝国主义战争势力，被压迫民族必将推翻殖民主义反动统治，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历史的车轮是不能阻挡的。”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林伯渠等出席。

△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同康生、陈伯达、胡乔木商讨修改中共中央给印共中央总书记高士的信稿和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稿。

11月7日 上午，会见新任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交谈真理的普遍性和具体运用中的特殊的方面时说：普遍真理是根和干，特殊方面是枝和叶，枝叶不仅长在干上，而且也是靠根生长、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团结的基础。

△ 晚，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二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1月9日、10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六十次会议。会议听取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整风反右倾运动进展情况的汇报。在讲话中指出：（一）这次运动主要解决党内问题，党外不进行。党内的主要对象是“当家作主”的领导干部，内容以两条道路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为纲；对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态度是分水岭和试金石。这个问题解决了，天下大定，其他问题放在次要地位。（二）斗争的对象，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们党是在民主革命中发展起来的，部分同志对社

会主义缺乏精神准备，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头脑还留在民主革命时期；一部分富裕中农，向往资本主义道路。其中当然会有党外性质的问题，但根本上是党内和人民内部问题，和反右派斗争有所不同。要帮助他们过社会主义关，因此，斗争的方式方法一定要和风细雨，要很诚恳，很热情，多开小组会、中组会，摆事实讲道理，或找熟人分头去谈话、规劝。这样，副作用小。彭德怀接受批评后，毛主席寄予很大希望，要我们经常去看他。（三）要抓住两头。既不要过火，又不能不发动群众。有的省，一部分干部对一九五七年反“反冒进”不满，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吹阴风。这个问题不解决，总要出问题。北京市和中直机关中，也有对无产阶级思想格格不入的干部。毛主席嗅觉灵敏，一回到北京就感到不舒服。所以北京市要把运动搞透，把“司令部、参谋部搞好”。

△ 下午，和杨尚昆到北京西郊吴家花园彭德怀住处，召集有杨献珍、艾思奇〔1〕、范若愚参加的中央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安排彭德怀在党校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派专人辅导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由杨献珍同他联系。在会议召开前同彭德怀交谈时说：庐山会议对你的斗争过分了一些。

△ 晚，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及首都一万二千多名职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全国群英会胜利闭幕的联欢大会。

11月11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六十一次会议，讨论轻工业发展和市场供应问题。讲话说：农业和轻工业直接关系到六亿人民的生活，现在轻工业还不像农业和重工

〔1〕 艾思奇，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

业那样有头绪。要真正把轻工业从原材料、生产到市场抓起来。是否归一个口统一抓。建议由李先念挂帅，薄一波帮助。

△ 下午，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林彪关于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

11月15日、17日、18日 出席周恩来召集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计划、工业、农业、科技、商业、国防建设、文教等问题。

11月21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六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包括宋希濂、杜聿明、王耀武和溥仪在内的第一批特赦战犯的名单和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名单，同意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核定后，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意见，交由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讨论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时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问题，和资产阶级右派根本不同，主要看问题的情节，态度好坏，在处理时予以区别。在讨论《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当前宣传问题的请示报告时说：报道要实事求是，要报喜，但不要夸大，去年就是好话讲多了，被“擦粉”擦坏了。要说到做到，宁肯少说点多做点，也不说做不到的话。任务完成以后再说，估产最使人上当，去年就是教训。不要图虚名招实祸，宁实副于名，而不要名副于实。报喜也要报忧。报忧也可以不泄气，如宣传群众千方百计战灾保产，就不会泄气。新闻报道要抓先进和落后的两头，有毛病的也可以批评。

△ 下午，和杨尚昆听取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汇报反右倾运动情况。

11月22日 上午，和周恩来等同机到杭州。下午，出席

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中印边界和国际形势问题。

11月23日 凌晨二时三十分，毛泽东阅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情况简报》（特第一期）后，批退给彭真：“这期简报登载了《中直机关反右倾斗争中重点对象的统计》一文。有重要材料性文件，请随时选一些给我看看。”

△ 上午，返回北京。下午，和周恩来、杨尚昆到邓小平处开会。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彭真传达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情况；并决定二十八日到杭州毛泽东处开会。会议汇报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1月25、26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周恩来、朱德出席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国务院有关部长列席会议。

11月27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防建设问题。会议批准中央军委提出的两项特殊工程。周恩来参加会议。

△ 下午三时，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发言中说：我国周边的民族主义国家，取得政权后，政治上的两面性多了，我们要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同他们和平共处是我们的方针。

△ 下午，主持有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参加的座谈会，就西藏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海外华侨问题交换意见。

11月28日 上午，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同机到杭州。下午，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给尼赫鲁的复信和汇报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胡乔木等。

11月29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乔木继续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给尼赫鲁的复信、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养猪问题等。会议决定将华中协作区与华南协作区合并为中南协作区，由陶铸任协作区主任。出席会议的还有李富春、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林铁、欧阳钦、张仲良〔1〕等。

11月30日—12月4日 出席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国际问题和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2月3日 凌晨三时，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

12月5日 和周恩来、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到毛泽东处，听康生汇报全国文教书记会议的情况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来我国访问的问题。

12月6日 回到北京。

12月8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胡乔木传达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有关的部长列席会议。

12月11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家科委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初步总结和一九六〇年计划的报告》。周恩来参加会议。

12月13日 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今冬明春开展整社运动的指示。指示提出：必须在今冬明春集中地开展一次以兴社会主

〔1〕 张仲良，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义思想、灭资本主义思想的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社运动。整社的步骤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重点批判的人数，包括基层干部和党员在内，“一般以控制在农村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以下为宜，没有重点对象的单位，不要硬找或勉强凑数”。对被批判的农民和一般农民党员不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对在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一般在整社后期进行处理。

12月16日 致信请示毛泽东：拟以中央名义批转下面三篇材料：（一）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整理的《老干部为什么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二）中共陕西省委送来的《关于渭南县城关公社张义生产队富裕中农思想动态的调查》。（三）中共北京市委以北大一些党员专家作典型的《关于高等学校一批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党员专家的报告》。

12月25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在谈到整风问题时说：此次整风重点是干部，特别是中央和省、市管理的干部。我们的党员干部是在革命过程中锻炼出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是主流。但是，有一部分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有的脑子里有资本主义思想，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个人主义等。他们过去很有干劲，现在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感到不舒服。党就是用整风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渡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历史是无情的，领导是有情的。对犯错误的同志，应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尽可能少戴，要防止扩大化；必须戴的当然要戴，千分之几。戴也是为了治病救人。这场斗争不但是人民内部问题，而且是党内问题。开除党籍的当然更要少。凡是愿意革命的，能够工作的干部，总是要给工作做；做原来的工作不

合适的，可以调动一下。总之，整风要进行到底，特别是中央和市委管的两千多干部，要搞清楚，轻装前进。

12月28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六十六次会议。在讨论整风反右倾运动和农村整党中的问题时说：关于整风，思想批判要严要透，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是对比较负责的干部，面要控制严些，一是要定“标兵”，二是经上级批准。又说：去年工作中确有很多错误。领导同志心中要清楚，反右倾要反到底，同时要接受教训。在大浪潮中，真正反对总路线的究竟有多少？有一个材料反映，富裕中农中反对总路线的也只有百分之十。所以，对“戴帽子”，我有些动摇。对收发人员、采购管理员等干具体事务的人有些不满情绪，给戴上“帽子”，是严肃还是不严肃？从哪级领导干部起才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考虑。

12月2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六十七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扬、钱俊瑞汇报全国文化工作会议情况，研究文化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在谈到少数名演员的高薪问题时说：原有的几个人不要减了。

△ 晚，出席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宴会，招待帮助我国建设的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兄弟党的专家和他们的家属。

12月30日 晚，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新年联欢宴会，招待帮助首都建设的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等国的专家和他们的家属。

12月31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讲党内整风问题。说：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阶段论者。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要整风。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思想右倾，跟不上总路线精神和社会主义革命步伐，或在思想上

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消极的东西。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才能鼓足干劲搞社会主义，对党和人民事业一条心。对愿意革命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尽量少戴，可戴可不戴的不戴，必须戴的大概不超过千分之几。就是戴了帽子，改正了也就算了。只有实在不可挽救的个别人，才开除党籍。

△ 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和市政协常委第二次会议联席会上讲反右倾整风的精神。